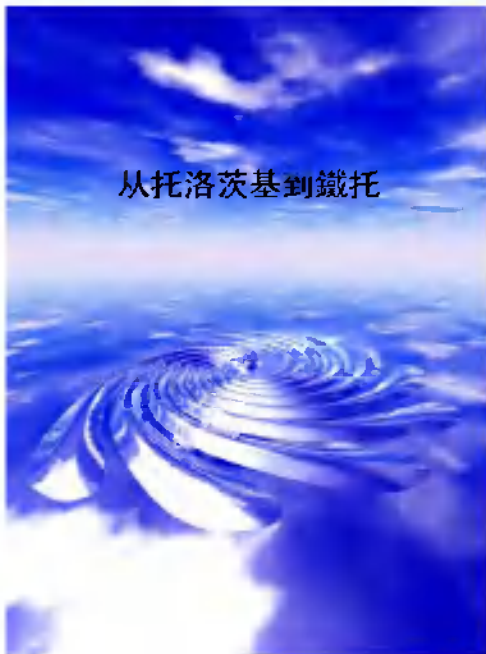


从托洛茨基到鐵托



# 從托洛茨基到鐵托

詹姆斯·克勒曼著

吳繼淦譯

世界知識社出版

一九五三年·北京

# 從托洛茨基到鐵托

著者  
譯者  
出版社  
發行者  
印刷者

詹姆斯·克爾曼  
吳 繼 棻  
世界出版社  
北京東總布坊四十號  
新華書店  
北京新華印刷廠  
定價八千五百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字數：187,000  
印數：1—8,000  
書號：0333

JAMES KLUGMANN  
FROM TROTSKY TO TITO  
Lawrence & Wishart Ltd.  
London, 1952

---

本書根據英國勞倫斯—韋沙特書店一九五二年版譯出

## 目 錄

第一章	共產黨情報局決議	一
第二章	審判案揭露的真相	五
第三章	勞工運動裏的間諜和特務	七
第四章	鐵托分子今天扮演的角色及其策略（上）	一六
第五章	鐵托分子今天扮演的角色及其策略（下）	二三
第六章	鐵托南斯拉夫內幕	二七
第七章	強烈的對照	二六
第八章	幾點結論	二六

## 第一章 共產黨情報局決議

鐵托主義問題——鐵托和鐵托分子的作用——並不是巴爾幹和東歐問題專家們的問題。無論從那方面講來，這也絕不是共產黨人相互之間在爭取社會主義的戰略戰術和方式方法問題上的私人爭端。這是任何要求社會主義和任何有志於保衛和平的人所不能袖手旁觀的問題。

勞工運動裏面出現叛徒並不是這一次才開始的事。那些自有英國勞工運動以來就始終爲這個運動工作和鬥爭的人已經了解這一點。當然，他們是付了代價的。資本主義永遠是一種腐蝕力量。資本家爲了在勞工運動和進步運動裏面取得勢力，不惜使用任何方法——從強迫到賄賂，從威脅到誘騙。這是他們一貫使用的辦法。他們常常是勞而無功的。但有時在不同國度和不同時間裏，他們也有過曇花一現的成功。

鐵托及其主要同謀犯的叛變使全世界進步人民都感覺突如其來，感覺震驚。其所以令人震驚，一方面是因爲他們這種背叛長期以來都是小心翼翼地掩蓋着的，一方面也是因爲過去他們能够使自己隱匿在南斯拉夫人民羣衆的崇高威信後面。這種威信是南斯拉夫人民羣衆在反對國內反動派和專制獨裁，反對外敵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侵略的長期

英勇鬥爭中贏得的，也是他們可以當之無愧的。

這本書的目的是在詳細闡述這次叛變的真情實況。我們相信，對於這些事實的研究，可以使所有的人——共產黨員、社會主義者、進步人士和愛好和平的人——都認識到：鐵托分子現在已經變成大資本家的走狗和戰爭工具，因此，每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和每一個誠心誠意愛好和平的人都應該努力來了解鐵托主義和鐵托分子問題。

一九四八年六月，八個國家的共產黨代表在羅馬尼亞參加共產黨情報局召開的會議。他們在一起討論了南斯拉夫共產黨的情勢。但當時仍為共產黨情報局第九個成員的南斯拉夫共產黨卻沒有派代表來，他們對於多次的邀請都粗魯地加以拒絕了。

情報局經過長久討論以後，通過了一個「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情勢」的決議。這個決議已在報刊上和廣播中予以公佈。決議包括對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機構，尤其是實際上統治着黨的四個人——鐵托、卡德爾、德吉拉斯和蘭科維奇——的政策的一系列深刻的批評。

### 主要的批評

決議說：在共產黨情報局會議前不久的一段時期中，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機構：「在對內和對外政策的基本問題上，進行着一種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正

確的路綫。」

決議贊同聯共(布)率先揭露這種不正確政策的行動。

決議指出：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者用一系列的方式實行對蘇聯和蘇聯共產黨不友好的政策。決議揭露了很多事實。例如：對於應南斯拉夫當局的邀請訪問南斯拉夫的蘇聯軍事專家的誣蔑正在傳播；對於在南斯拉夫的蘇聯非軍事人員的專家建立了一種「專門制度」，使南斯拉夫的保安警察對他們進行監視和跟踪；情報局駐在南斯拉夫的代表，如「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報編輯尤金，就有秘密警察跟在後面釘梢；蘇聯駐南斯拉夫的很多官方代表也受到同樣的待遇。南斯拉夫黨和政府發表的有關蘇聯和聯共(布)的聲明表面上看起來仍然是友好與和睦的，仍然用着感激和敬仰的辭句。但在同時，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內部却在傳播反蘇宣傳；妄談蘇聯和蘇聯共產黨的「蛇化」；這些謠言使用的是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的陳腔濫調。

決議概括地說明了鐵托、卡德爾、德吉拉斯、蘭科維奇及其他南斯拉夫領導者拒絕國際工人運動的經驗——特別是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全部經驗——和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三個方面：

(一) 他們正按照孟什維克和蓋姆賽·麥克唐納的方式和傳統，提倡一種風平浪靜地、和平地轉入到社會主義的理論。

「他們否認國內資本主義成分的增長，和由此而產生的階級鬥爭在南斯拉夫農



村中的加劇。」

(二) 他們拒絕承認農民中的任何階級分化。但是，如果他們建設社會主義的計劃果真是表裏如一箇計劃，那麼，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上，他們就必須對不同範疇的農民採取不同的態度。

「南斯拉夫領導者在農村中也進行着一種不正確的政策：忽視農村的階級分化，把個體經濟看成是一個整體，違反了列寧的著名論證：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大批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

(三) 他們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拒絕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一貫教導我們的，並為整個工人階級運動歷史所證實的論點：工人階級是唯一革命到底的階級，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才能過渡到社會主義。

「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者在關於工人階級領導作用的問題上，離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走向民粹主義富農黨的道路上去，認為農民是「南斯拉夫國家的最穩固的基礎」。」

隨後決議就用最嚴厲的辭句批評了南斯拉夫共產黨在理論和實踐中表現出來的關於共產黨本身的任務和組織的思想。決議指出南斯拉夫黨如何被溶化在包羅甚廣的人民陣綫組織裏面：

「在南斯拉夫……認為國內基本領導力量不是共產黨，而是人民陣綫。南斯拉

夫領導者降低共產黨的作用，實際上是使黨溶解在非黨的人民陣綫中。」

在黨內，一種由高高在上的小的權力集團所實行的軍事專制制度（決議稱之為「土耳其式的制度」）代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原則，一種高高在上發號施令，只准服從不許質疑或討論的制度代替了黨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

「黨內沒有民主，沒有選舉，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

南斯拉夫領導者毫不注意聯共（布）及其他兄弟黨的批評，把這種批評對他們自己的黨員隱瞞起來，認為這是一種侮辱，並且不經過討論就粗暴地加以拒絕：

「染上了野心勃勃，高傲自滿和目空一切等毛病的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者，不去誠懇地接受這些批評，不去布爾什維克式地改正所犯的錯誤，却以兵刃相加的敵視態度來對待這種批評。」

決議明確指出，南斯拉夫共產黨並沒有因為它的錯誤和不正確的政策而被共產黨情勢局開除。任何人，任何共產黨支部以至於中央委員會都可能犯錯誤。甚至於它也並沒有因為不接受這些批評而被開除。一個黨的組織或黨員常常需要相當時間，相當長期的深入討論，才能漸漸了解並改正一種錯誤政策。

但是，拒絕討論世界上若干佔着最重要的領導地位和和經驗最豐富的共產黨人的批評，特別是蘇聯共產黨中央的批評；把這些批評對黨員隱瞞起來；拒絕會晤其他八國共產黨的代表；這種行動的趨勢不能不使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機關處在共產黨大家庭

之外。

「……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者把自己與參加情報局的各國共產黨對立起來，走上了脫離統一的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陣綫的道路，走上了叛變勞動人民國際團結專業的道路，而採取了民族主義的立場。……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使自己及南斯拉夫共產黨處於自己兄弟黨的大家庭之外；處於統一的共產主義陣綫之外；因而處於情報局隊伍之外。」

決議的結尾提出了嚴厲的警告。那些以前曾經喬裝起來的民族主義分子，在一九四八年上半年中，在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機關內取得了支配地位。南斯拉夫的黨離開了它的國際傳統，走上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道路。鐵托、卡德爾、德吉拉斯、蘭科維奇和他們那一夥人妄想用護步的方法賣弄殷勤，從而博得西方帝國主義者的青睞。他們鼓吹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論點，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對於南斯拉夫獨立的危險要比蘇聯對南斯拉夫獨立的危險來得小些」。他們逐漸離棄了和蘇聯的友誼，引頸西望。這種態度只可能有一種結果：

「……這種民族主義的立場，只能使南斯拉夫蜕化爲一般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喪失南斯拉夫的獨立，變南斯拉夫爲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

當時，對於某些人說來，這種警告似乎是過於嚴厲。但是在決議最初公佈後三年以來，這種警告已經完全得到證實。歷史的邏輯是無法逃避的。和平陣營與戰爭陣營之間

並沒有第三條道路。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政策和反動陣營是一脈相通的。

### 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

鐵托和卡德爾這一流人所領導的南斯拉夫在戰爭和戰後時期中出現了這樣一種思想：認為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的領導階級和新南斯拉夫社會的棟樑將是農民，而不是工人階級。

這種思想的產生起源於軸心國佔領期間南斯拉夫抗戰的某些特點。並沒有任何進步人士，更沒有任何共產黨人，想要用任何方式來貶抑南斯拉夫人民的鬥爭和他們在反對軸心國軍隊、爭取民族解放鬥爭中的英勇和犧牲。但是，儘管有這些軍事上的巨大成就，南斯拉夫的解放鬥爭在某些方面事實上要比相鄰各國——例如保加利亞——較為薄弱。

為了對佔領者進行戰鬥，南斯拉夫的人民和青年紛紛參加了丘陵地帶的游擊隊，進入了深山和密林。這些參加游擊隊的新兵大多數是從農民中來的。在農民佔人口大部分的南斯拉夫，這是很自然的事。工人階級裏面的最優秀的分子很多都拋棄了自己的職業，離開了工廠，走出了城市。到羣山、森林和山溝裏去參加游擊隊。城市裏面，在嚴酷暴虐的軸心國佔領下，非法的抵抗運動還沒有得到廣泛的發展。東歐某些國家的武裝

游擊鬥爭規模上並沒有達到南斯拉夫那樣壯大的程度，但是他們在工業內部進行的反軸心國的破壞運動，大小城市裏的非法的地下抗戰，非法的工會運動却比南斯拉夫有了更大的發展。經過了三、四年的軸心國佔領，到解放時，發現南斯拉夫城市裏的工人階級運動在政治上，和相鄰各國比較起來，是落後的。

身居領導地位的鐵托分子完全沒有自我批評的精神。他們不但不認為這是應該加以反對和克服的弱點，反而拋棄馬克思主義，揚言農民將成為南斯拉夫的領導力量，希望這樣一來就可以使弱點看起來像是優點。他們不但企圖篡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最基本的思想，即工人階級起領導作用的思想，反而積極阻止工人階級在解放了的南斯拉夫起獨立和領導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鐵托在克羅西亞首府薩格勒布聲稱：

「我們告訴農民說他們是我們國家最堅固的基礎，並不是我們想贏得他們的選票，而是因為他們實際上組成了這樣一個基礎。」

德吉拉斯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又加了一番解釋：

「召集專門的職工會和專門的人民陣線會議都是絕對錯誤和毫無意義的。這些會議應歸併成一個會議，因為職工會也是隸屬於人民陣線的。」

這樣，職工會就被降低為第三等的機構，它們的活動是隱蔽的，工人階級和包括國家一半以上人口的廣泛的人民陣線也便混為一體了。

一九四八年年初，自詡為理論家的莫薩·皮雅傑在黨的日報「戰鬥報」上寫道：南斯拉夫職工會在解放鬥爭中沒有起任何作用，因此不能代表新的南斯拉夫政權體系中的領導力量。

這種低估無產階級作用的態度——變而為蔑視工人的態度——很清楚地表現在南斯拉夫共產黨本身的成分上。一九四一年帕心國家開始進攻時，南斯拉夫地下共產黨約有一萬二千個黨員，其中八千人在抗戰中犧牲了。解放的時候，只留下了四千人。但在戰爭結束時南斯拉夫共產黨却有了十四萬黨員。到一九四八年年中，黨員人數差不多到了五十萬。

戰爭時期吸收黨員是以對民族解放鬥爭的態度為基礎的。數以千計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富農分子都被批准入黨，因而減低了工人階級出身的黨員比例。在戰爭結束以後大批吸收黨員時，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者不但沒有特別注意吸收產業工人，把無產階級提到領導地位來補救這種形勢，却反而進一步使這種形勢更加嚴重了。

仔細研究一下一九四八年七月南斯拉夫共產黨的社會成分就可以看出：黨內——包括最主要的位置上——不僅有成萬的富農和資產階級分子，而且工人黨員的人數只佔百分之三十，大部分還是手工工人。按理說，大工廠本應該是共產黨的主要根據地，但是南斯拉夫共產黨在大工廠裏面吸收的黨員却非常有限。例如，到一九四八年年中為止，斯洛文尼亞三個擁有七千工人的工業企業黨全部黨員只有二百四十五人。人員總數約一

萬八千名的克羅西亞五個大企業裏面只有三十二名黨員。波斯尼亞——赫茲戈維拉一個擁有七千工人的企業裏只有九十二名黨員，而九百五十二個職員當中却有一百二十五個黨員。

還有什麼做法能够比這種政策更公開地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和蘇聯的經驗呢？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從科學的社會主義開始發展時起，就堅持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社會主義中起領導作用的必要性。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

「在現時與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才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餘一切階級都隨着大工業的發展而趨於衰落和滅亡，而無產階級却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譯文引自「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二頁。）

他們指出無產階級是唯一的革命到底的階級。

「馬克思與恩格斯教導說，工業無產階級是最革命的階級，因而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裏最先進的階級；只有無產階級這樣一個階級，才能把一切不滿意資本主義的勢力集合到自己周圍，並引導他們去衝擊資本主義。」（譯文引自「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一九五〇年，第一二頁。）

無產階級專政的全部思想是以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即其領導作用為基礎的；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使建設社會主義成為可能。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即勞動者先鋒隊與人數衆多的非無產者勞動階層（小資產階級，小業主，農民，知識界等等），或與大多數勞動者建立的特式階級聯盟，是反資本的聯盟，是為完全推翻資本，完全鎮壓資產階級反抗及其復辟企圖而建立的聯盟，是為最終建成並鞏固社會主義而建立的聯盟。」（譯文引自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一九四九年，第一二四頁。）

其次：

「『無產階級專政』，如果我們把這個科學的歷史學的哲學的拉丁名詞譯成更簡單的語句，那就是說：在謀推翻資本壓迫的鬥爭中，在實行這種推翻時，在為保持和鞏固勝利的鬥爭中，在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這一事業中，在謀完全消滅階級的全部鬥爭中，只有一個階級，即城市工人和一般工廠工人，即工業工人，才能領導全體被剝削勞動羣衆。」（譯文引自「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第一二四頁。）

以鐵托為中心的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者忽視、輕視、並藐視工人階級的作用，悍然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最基本的原則。

他們同樣明目張胆地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關於農民的作用以及在走向社會主義的各個階段上把不同範疇的農民加以區別的必要性的指示。

一方面，鐵托與卡德爾想把農民當成一個單一的無區別的整體看待。他們拒絕蘇聯的榜樣。他們杜撰了許多關於農民的口號，然而並不解釋農民的階級組成以及貧農、中



農和富農的態度及所起作用的差異。因爲有些富農曾經參加過反對軸心侵略者和佔領者的愛國的民族解放戰爭，他們就大發議論，說這些富農在解放後向社會主義前進的時候也會起同樣的進步作用。當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在解放後土地改革中被分掉時，他們否認富農一定會竭盡全力來剝削小農和中農，抗拒向社會主義農業前進。他們不承認如果不採取及時而有效的措施制止其發展，土地的個體所有制就會產生資本主義。

最後，當他們由於這種傾向富農的政策在聯共（布）黨的信中受到批評時，他們就採取一種完全冒險主義的、爲托洛茨基的極端左傾的狂言所特有的方式，開始自吹自擂地喧嚷要在幾個星期之內或數月之內肅清「資本主義的最後的殘餘」。

鐵托和卡德爾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三日致聯共（布）的信中寫道：  
「中央委員會全體大會同意了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在國內肅清資本主義殘餘的  
方案。」

卡德爾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貝爾格萊德人民議會上宣稱：

「人剝削人的一切殘餘在我國存留的時間已經屈指可數了。」

不過對待富農的右傾態度和過左的高調總是二而一的東西。拒絕分析農民的階級成分並且按照這種成分來加以區分，「肅清資本主義」的豪語及其紙上談兵的決議；二者結果同樣都是容忍、依賴和照顧富農分子。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指示一直告訴我們，小規模的生產會產生資本主義。

列寧在估計「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的力量」時，特別指出了三種主要因素，其中寫三種是：

「在於習慣的力量，在於小生產的力量」，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大批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譯文引自「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社中文版，一九五〇年，第六九二頁。）

斯大林寫道：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農村是自流式地跟着城市走的，因為城市資本主義經濟和農民小商品經濟，基本上是同類的經濟。當然，小農商品經濟還不是資本主義經濟。可是，它基本上是和資本主義經濟同類的，因為它倚靠於生產資料私有制。列寧在評論布哈林所著『過渡時期經濟』一書時說得萬分正確，他說『農民有商品資本主義趨勢』，即是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趨勢背道而馳的趨勢。」（譯文引自「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第三八三頁。）

馬克思主義的指示與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說明，在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中，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並不等於和全體農民的聯盟；而是指和勞動農民羣衆——小農和中農的聯盟。這種聯盟包含着對農村中的資本主義分子——富農——進行長期鬥爭，另一方面又要採取一切步驟來幫助小農和中農，把他們爭取到集體的、社會主義方式的農業這邊來。

「我們堅決站在小農方面，我們將極力設法改善小農生活，使他們易於過渡到共耕制，要是他們決意這樣辦的話，如果他們還不能決意這樣辦，那我們就要設法給予他們儘多的時間，讓他們在那一小塊土地上考慮考慮這個問題。其所以這樣來作，不僅是因為我們認定有可能使獨立工作的小農轉到我們這方面來，而且也是爲着黨的直接利益。被我們救全而沒有降落爲無產者，還在農民地位時就被我們吸收到自己方面來的農民人數愈多，社會改造也就會愈加迅速和愈加容易實行。」（譯文引自「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第七三頁。）

但是，無論是馬克思還是恩格斯，無論是列寧還是斯大林都從來沒有說過要在幾個星期以內或幾個月以內肅清農村裏的資本主義這種官僚主義的言之無物的話。他們知道，而且蘇聯的經驗也已經證明，要「肅清」富農這個階級，就必須把勞動農民羣衆爭取過來，使他們自覺自願地擁護大規模的農業集體化。爲了把小農和中農爭取到這方面來，又必須經過長期的「限制」富農的階段，使小農和中農得到國家的具體幫助，使他們從使用先進的技術設備中獲得共同合作勞動的經驗，給他們提供一些範例，使他們可以親眼看到並從而深信集體耕作的優越性。當然，要辦到這些事情，起碼要建立一種工業，這種工業將供給大規模轉入集體耕作時所必需的、不可或缺的先進農業裝備。任何其他方法都是官僚主義的方法，其結果不是鞏固工農聯盟，而是使工人和勞動農民互相對立起來，否則就只是一種籠絡人心的花樣，只是紙上談兵的決議。

在十月革命以後的十五年中，聯共（布）從來沒有忽視：在可以把富農作爲一個階級消滅掉的時機成熟以前，必須採取限制富農的措施。

蘇聯共產黨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實行了累進稅法，使賦稅的負擔絕大部分都落在富農身上；他們限制土地出租，擴充供應農業裝備的工業，用貸款支持小農，把小農和中農團結到工人階級這一邊來，使富農陷於孤立。在引導勞動農民羣衆自覺自願地走上集體化道路的先決條件創設以前，他們一直都實行着這種政策。這也是把富農作爲一個階級加以摧毀的先決條件。

「蘇維埃政權在一九二九年以前所實行的是限制富農的政策。……在一九二九年年底的時候，因爲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已有充分的增長，於是蘇維埃政權就放棄這個政策而實行了一個急劇的轉變。此時它已過渡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過渡到剷除富農階級的政策。……這是一個極深刻的革命，是從社會底舊質態轉變到新質態的突變，照其結果來說，它是與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具有同等意義的。……這個革命底特殊處，就在於它是由上面，由國家政權來提倡，並由反對富農盤剝，爭取自由集體農莊生活的千百萬農民羣衆從下面直接贊助實現的。」（譯文引自「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文版，第三七四——三七五頁。前兩處着重點中文版上沒有。）

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者一方面藐視無產階級，並對富農照顧備至；一方面他們又手

忙脚亂地鼓吹着走向社會主義的新路。他們說：沿着這條路，解放了的南斯拉夫可以不像蘇聯那樣，可以不用加強階級鬥爭就風平浪靜地安然進入社會主義——包括資本家、富農和所有一切的人。回想起來，這些公式有些也許還是英國費邊派創造出來的。舉例來說，南斯拉夫對外貿易部部長尼古拉·彼特羅維奇在一九四七年中對其前途就曾經作過這樣的簡要敘述：

「和社會主義經濟密切相關的農業包括在總的經濟計劃以內。它在計劃實施過程中將逐漸改變自己的性質，逐漸達到完全和徹底消滅經濟法則的一切自發性——包括這方面的經濟法則的自發性——的階段，而不會形成一種妨礙社會主義經濟及其發展的無法克服的、本質的障礙。」（「斯拉夫人」一九四七年第五期。）

這樣太平的前途也許會使藍姆賽·麥克唐納都讚賞不已的（「人類歷史上一個時代會風平浪靜地進入另一時代」）。不過它忽視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種最基本的理論：被推翻了的剝削階級在第一次慘敗後會以十倍、百倍的努力，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更爲不顧一切地進行反攻，以圖捲土重來：

「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乃是一整個歷史時代。當這個時代還沒有終結時，剝削者就不免還保存有復辟希望，而這種希望就變爲企圖復辟的行動。被推翻的剝削者是不會料到會被人推翻的，是不相信這點，想不到這點的，所以他們遭到第一次嚴重失敗之後，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增長百倍的仇恨來拚命鬥爭。」

以求恢復他們已被奪去的「天堂」。(譯文引自「列寧文選」中文版第二卷，第四四九頁。)

在南斯拉夫，和其他爲紅軍所解放的東歐各國一樣，勞動人民在走向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所面對着的不僅有和他們不共戴天的過去的資本家，地主和被趕走了的舊的反動國家機器的官僚殘餘，不僅有以美國和英國爲主要核心的、決心不惜一切幫助舊的階級勢力捲土重來的國際資本主義的全部實力，而且還有他們自己的富農。此外，從事個體生產的南斯拉夫大部分人口還「經常地，每日每時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

因此，爲了對這樣一些敵人進行戰鬥，就必須有系統地鞏固南斯拉夫的人民民主制度，必須對富農作鬥爭，必須更進一步地——比當時徹底得多地——清除國家機器裏面的反動分子，必須加強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使它在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時能夠鎮壓剝削者，捍衛國家不受帝國主義的干涉，必須加強南斯拉夫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聯系，尤其要加強和蘇聯的聯系，必須使勞動羣衆離棄資產階級，加強和無產階級的聯盟，必須加速國家經濟方面的進展，爲社會主義奠定基礎。

列寧這樣說過：

「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爲反對較強大的敵人，爲反對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最奮勇和最無情的戰爭，而資產階級底反抗，正因其被推翻……而增加十倍，它的勢力

不僅在於國際資本的力量，不僅在於資產階級各種國際聯系的力量和堅固性，而且還在於習慣的力量，在於小生產的力量。」（譯文引自「列寧文選」中文版第二卷，第六九二頁。）

鐵托分子領導者不但不組織力量抵抗國際資本，反而積極和國際資本進行勾結。他們吹噓的「通往社會主義的新路」不僅幫助了南斯拉夫資本主義的復辟，而且，他們還利用南斯拉夫解放運動帶來的威信（雖然他們實際上是在出賣這個運動）來宣傳這種所謂「通往社會主義的新路」，因此積極地影響了，從而也削弱了其他一些國家的共產黨向社會主義前進的鬥爭。

## 黨的毀滅

南斯拉夫解放以後，鐵托分子「理論家」整天忙着發展一種「新的」共產黨的觀念——這種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事實上與馬克思主義一向為之而鬥爭的任何黨的組織原則都是背道而馳和互不相容的。

這種「理論」認為共產黨應該從人民面前隱藏起來，應該溶解在人民陣綫這種更為廣泛的人民團體裏面，而人民陣綫却應該成為南斯拉夫人民的主要組織。共產黨要不要在人民面前公開提出它的綱領，並且公開為爭取人民擁護這個綱領而努力呢？鐵托的回

答是：無此必要，因為南斯拉夫共產黨的綱領和人民陣綫的綱領在任何方面都並無不同之處。

「南斯拉夫共產黨在人民陣綫的綱領之外有沒有任何其他綱領呢？沒有的。南斯拉夫共產黨沒有另外的綱領，人民陣綫的綱領，就是共產黨的綱領。」（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鐵托在南斯拉夫人民陣綫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共產黨是不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和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呢？鐵托再一次回答說：不是的。

「因為人民陣綫不僅是我國人民政治上團結的最好形式，而且是我國人民在民族關係上友愛和團結的最好形式。無論什麼政黨都不能代替這個人民陣綫。因此人民陣綫將成爲永久的全民政治組織。」（鐵托的話，來源同前。）

南斯拉夫人民陣綫章程（「南斯拉夫人民陣綫基本組織原則」）第一項就開門見山地指出：

「南斯拉夫人民陣綫是主要的政治力量。」（着重點是我加的——著者。）

人民陣綫是什麼呢。人民陣綫在解放戰爭中起過很大的進步作用，而且解放以後本來是可以繼續起這樣的作用的。它是在德國進攻南斯拉夫以前由共產黨倡議而發展起來的，並由不同的集團（包括若干舊政黨在內）和個人組織而成。其中包括克羅西亞共和農民黨，塞爾維亞共和黨，民主黨與獨立民主黨，塞爾維亞國家農民黨與農民聯盟（這兩



個黨派後來合併成爲塞爾維亞統一農民黨，以及職工會、青年和婦女等等羣衆團體的代表。

因此，人民陣綫裏面除了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以外，還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富農、商人和製造商。一九四七年九月，德吉拉斯在共產黨情報局最初成立大會上宣稱：

「參加人民陣綫不受思想、宗教或任何其他方面的限制。」

如果把人民陣綫看作是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一個人民羣衆組織而把它引導到反對國內外反動派的鬥爭中來，並清除其中反動的成員，人民陣綫應該可以在鞏固人民民主制度的工作中起重要作用。但是鐵托分子並不是這樣做的；他們建立人民陣綫是爲了併吞共產黨，最後則取共產黨的地位而代之。

結果如何呢？結果是共產黨在人民面前消失了。在一個據說是由共產黨領導的政權裏面，共產黨却只有半合法的地位。如果你在「一九四六年或一九四七年到貝爾格萊德去，你無法找到任何公開的共產黨的辦公室。共產黨不發表任何宣言、決議或聲明。黨員的身份對勞動人民是秘而不宣的。甚至於共產黨的機關報「戰鬥報」也幾乎完全沒有刊載過關於黨的生活與活動的新聞或消息。從解放起到一九四八年七月止，「戰鬥報」沒有刊載過任何黨的決議。

拿一個典型的實際例子來說明這種政策的後果吧。貝爾格萊德附近的規模宏大的茲

列尼克工廠裏面約有四千名工人，其中有一百六十個共產黨員。黨的會議是秘密召集的。沒有一個非黨工人知道它在什麼地方開會；討論了些什麼或作了些什麼決定。沒有一個非黨工人知道那些人是黨員。黨員們很怕醜似地設法執行黨的決議而不說明這是共產黨提出的。新黨員的吸收則是通過秘密邀請的方式。

因此，對於南斯拉夫的勞動人民羣衆說來，共產黨就似乎是一種秘密的陰謀社團組織，雖不出頭露面然而却暗中統治着他們的生活。它的決議道過在國家機構裏面担任職務的個別「共產黨人」而加諸於勞動人民。共產主義的敵人慣於誣蔑黨是一個「秘密的陰謀團體」。這種誣蔑就南斯拉夫來說却成了真情實況。這樣一來，黨不但沒有在努力提高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政治水平方面起了公開的先鋒隊作用，反而降低到最落後的水準，被合併、溶解在人民陣線裏面。

這完全破壞了列寧關於共產黨及其作用的思想。

列寧寫道：

「我們是階級約黨，因此差不多整個階級（而在戰爭時候，在內戰時代，甚至完全是整個階級）都應當在我們黨領導下行動，都應當盡量密切地接近於我們黨；可是，如果以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有什麼時候，幾乎整個階級或是整個階級都能升到自己的先進部隊；即自己的社會民主黨（即共產黨）的覺悟程度與積極程度，那就是馬尼洛夫精神和「尾巴主義」了。……忘記先進部隊與趨向於它的一切羣衆

間的區別，忘記先進部隊的經常責任是要把愈益廣大的階層提高，到這個先進水準，那就只是欺騙自己，故意漠視我們的巨大任務，縮小這些任務了。」（譯文引自「列寧文選」中文版第一卷，第四〇一—四〇二頁。）

當然，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地下活動時期，南斯拉夫共產黨不能公開召開會議；但是，儘管有這一切困難，黨的路綫和政策仍然通過非法的傳單和刊物被帶到了人民面前。可是現在，在一個完全合法的時代，黨却隱藏起來了。黨被溶解在其他組織裏面去了，黨的綱領和政策掩蔽起來了，黨的領導地位也被拋棄了。黨員們不但不能在人民面前挺起胸膛，驕傲地公開宣佈他們的目标，反而在鐵托集團的命令下逐漸失去黨員的面目。

但是鐵托分子不僅在黨的作用這個問題上違犯着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排斥聯共（布）一切最寶貴的經驗。他們在共產黨內部組織的「理論」與實踐上也存在着同樣情形。

鐵托、卡德爾、德吉拉斯，在這方面特別是蘭科維奇，結成一幫狹隘的統治權力集團，高高在上獨斷獨行地決定着黨的政策。他們實行着托洛茨基所鼓吹的「軍事方式」的黨內領導。托洛茨基一方面認為黨是各色人等的組合，一方面主張「高高在上發號施令」，這種「右傾」和「左傾」思想的結合並不是偶然的事。「右」的和「左」的路綫總是殊途同歸的——都會湮滅共產黨的革命性。各級黨組織的選舉停頓了。黨的領導機構

則由互選方式組織起來。黨內的討論受到打擊。批評與自我批評受到壓制。而蘭科維奇更濫用其內政部長兼保安警察（國家保安處）頭目的職權，對於胆敢討論或批評統治集團御旨的黨員採取無情的紀律制裁。

只要研究過列寧與斯大林所指示的並為聯共（布）所實行的聯共（布）的組織方法，就會完全了解蘭科維奇在南斯拉夫黨內的統治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南斯拉夫黨在兩次大戰之間曾經處於非法地位，在解放鬥爭中又是處於戰時編制的情況之下。但是這個事實同樣也不能作為今天的藉口。布爾什維克黨人早就懂得，並且教導過我們如何從非法地位和戰爭狀態轉入合法地位。

一九二三年蘇聯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結束以後，斯大林曾經解釋黨的新任務說：

「首先，要用一切方式不倦地向我們黨內從戰爭時期遺留下來的舊習氣作鬥爭，要向那些把我們黨看作彷彿是一種機關系統而不是善於靈活地思考、富於首創精神、過着生氣勃勃的生活、善於摧毀舊事物、創造新事物的無產階級的戰鬥組織的不正確觀點作鬥爭。」

「第二，必須加強黨員羣衆的積極性，把一切使他們感到興趣的問題拿出來讓他們討論，要保證對黨機關所提出的任何一點有自由進行批評的機會，盡量使得這些問題能得到公開的討論。因為只有這樣做，才能使黨的紀律真正成為自覺的紀律，真正成為鐵的紀律；只有這樣做，才能增進黨員羣衆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

面的經驗。……

「第三，必須切實實行一切黨機構和黨負責人選舉制……當提出某些同志擔任黨內重要職位時不考慮組織內部多數人的意見的做法必須予以制止。必須使選舉制的原則切實實行。」（「論黨的任務」，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日，「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三六二——三六三頁。）

這種使黨適應新的時期的工作是在列寧和斯大林的指導下完成的。隨着沙皇制度的消滅，十月革命的勝利和干涉軍的失敗，列寧所說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就在布爾什維克黨內完全建立起來了。

「黨要正常地動作和有計劃地領導羣衆，就必須按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就需要有統一的黨章，需要有統一的黨的紀律，需要由黨代表大會所體現，在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由黨中央委員會所體現的統一領導機關，需要使少數服從多數，各個組織服從中央，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沒有這些條件，工人階級的黨就不能成爲真正的黨，就不能實行其領導本階級的任務。」

「當然，因爲當時黨在沙皇專制制度條件下處於秘密存在的地位，黨的組織不能建築在從下而上的選舉制基礎上，因此黨不得不具有極秘密的性質。但列寧認爲這是我們黨生活裏一種暫時的現象，這種現象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後就會立刻消失，那時黨就會成爲公開的合法的黨，而黨的組織就會建築在民主選舉制原則上，建築

在民主集中制原則上。」（譯文引自「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文版，第六八頁。）列寧和斯大林總是教導我們：沒有批評（自下而上的和自上而下的）和自我批評就不可能有共產黨內的民主集中制。

「但從上而下的檢查決不是檢查工作的全部。還有另一種檢查——從下而上的檢查：黨員羣衆和下屬檢查領袖們；指出他們的錯誤，告訴他們改正錯誤的方法。這種檢查是檢驗人們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在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中，在黨大會和代表大會上，普通黨員應傾聽他們領袖們的報告；批評他們的缺點，最後選舉或者不選舉某些領導同志到領導機關裏去，以此來檢查他們的領袖。我們黨章所規定的黨內民主集中制的正確使用，黨機關無條件服從選舉，提出和撤消候選人的權利，秘密投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自由，所有這一切以及其他類似辦法都必須實行起來，以便普通黨員可以隨時檢查和控制黨的領袖們。」（斯大林，「論實際工作」，斯大林小叢書第六冊第十五頁。）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示總是着重指出：我們不可能風平浪靜地輕而易舉地向社會主義前進，黨在領導這種前進時，其黨員，包括其領袖在內，要一點不犯錯誤也是不可能的。自我批評並不是曇花一現的現象。這是黨的生活和黨在理論方面的進步所不可缺少的東西，這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精神訓練勞動人民幹部的方法。我們可以從一個黨或一個黨員對待自己錯誤的態度上來衡量他們。他們是拒絕批評；認為批評是對於他們個人的

侮辱，是對於他們的威信的打擊；還是歡迎批評，從批評中學習，自我批評地檢查自己的工作，承認錯誤，找尋錯誤的原因並且努力加以糾正呢？真正的共產黨員從來不害怕承認自己的錯誤。只有資產階級的政黨和資產階級的政客才害怕真理。

「政黨對於本身錯誤所持的態度，就是表明這個黨是否鄭重，是否在其正執行自己對本階級和勞動羣衆所負義務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鄭重的黨的標誌，這才是黨執行自己的義務，這才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羣衆。」（譯文引自「列寧文選」中文版第二卷，第七二二——七二三頁）

「一切過去的已經滅亡了的革命政黨之所以滅亡是因為它們驕傲自滿起來了，看不見自己力量之所在，害怕說出自己的弱點。」（列寧：一九二二年三月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然而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袖們是極端狂妄的。他們不僅拒絕承認自己的錯誤，從錯誤中吸取教訓和改正錯誤，他們甚至於拒絕承認他們也許會犯錯誤的可能性。

他們在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從聯共（布）及其他共產黨那裏收到的全部信件在南斯拉夫黨員面前都秘而不宣，而且未經黨內討論即加以拒絕。如果是經過黨內充分討論以後而他們在某一個時期內仍然堅持自己的政策，那麼也許可以認為他們不過是思想錯誤，然而還是真實的。但是他們做了些什麼呢？是否可能想像任何真摯誠懇的黨的領導機關，

在接到一個像聯去(布)這樣富有經驗和成就的黨的批評以後，不經過黨從上到下的徹底討論就貿然加以拒絕呢？是否可能想像一個忠誠老實的共產黨員接到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拉科西、陶里亞蒂或多列士所領導的黨的批評而不感覺光榮呢？

而在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公佈以後，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者已經無法對他們的黨員加以隱瞞的時候，他們又做了些什麼呢。他們在他們的黨員能夠有時間討論這個決議之前發了一篇洋洋萬言的狂妄答覆，不承認絲毫錯誤。他們所發出的長達萬言的答覆裏沒有一個字的自我批評。南斯拉夫共產黨自己的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尤約維奇和海布朝，兩位革命領袖，已經因為大胆批評鐵托分子領導者而被投入了監獄。

當情報局決議公佈時(一九四八年六月底)，南斯拉夫第五次黨代表大會已定於七月裏的第三週召開。任何忠實的黨的領導機關都會延期召開這個大會的。

「如果現在有人問我，假如我有權對於南斯拉夫代表大會有所作為，我會怎麼辦，我的答覆就是：我會使大會延期三月，使工廠和支部可以對共產黨情報局決議進行黨內討論，那麼，在舉行代表大會的時候，這個問題就已經經過討論並且已經獲得相當程度的澄清了。」(波立特：一九四九年七月七日給倫敦共產黨員全體大會辯論會的答覆；刊載於一九四九年第二八期「世界新聞與評論」，合訂本第三〇二頁。)

鐵托分子不但不遵循這種民主的路線，反而在他們給情報局的答覆中企圖完全歪曲



他們受到的批評的性質。鐵托分子報刊馬上就對這個決議發動了大規模的明目張胆的攻擊。各種會議都匆匆忙忙地召開了，會上所有批評鐵托分子領導機構的人都被制止發言；會後，很多人被開除黨籍，並被逮捕入獄。奉派前往參加黨代表大會的是經過挑選的代表團。這個大會並不是一個批評與自我批評和深入討論的代表大會，而是鐵托分子的頭目們揮筆情報局的一連串的新說。南斯拉夫共產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和共產主義之間並無任何共同之點。

貝爾格萊德共產黨學生領袖寫給情報局的信，揭穿了鐵托分子所採用的假迫黨員接受他們路線的手段。該信全文發表於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第十七期（總第二十期）。這裏是從信裏摘錄出來的幾段話：

「我們現在用這種方式和你們聯繫，因為通過我們的黨組織不可能表示我們對情報局決議的擁護。……」

「我們完全同意你們的意見：最微小的批評都會遭到壓制。黨受着軍事方式的統治。在尤約維奇和海布明的問題上，我們首先聽到的是非黨人士和國外來的不同的說法。後來我們才被召集到一個黨的會議上，聽到報告說這兩個人因為進行敵對活動已經被解除中央委員會的職務。他們說正在對這件事進行調查，並將隨時把情況通知我們。第二次開會時收到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和黨的政治局的一個聲明。據這些文件說，尤約維奇在德軍第五次進攻游擊隊時影響一個游擊師團，使它進行突

間。……據說這種行動會使游擊隊陷於危境。不過我們的問題是：爲什麼尤約維奇在當時當地沒有作爲叛徒而受到審判，爲什麼他正因在這一次戰役中所起的作用而被擢升爲將軍。這些問題仍未得到答案。……」

這封信簡單地敘述了大學黨支部塞面對鐵托分子政策進行的一切誠實批評如何受到壓制和打擊的情形：

「獸醫學院會議的過程是這樣的：第一天召開了全體黨員大會以便對中央委員會表示信任。但由於黨員們意見分歧，清一色的投票顯然是得不到的。於是第二天，當該院大部分黨員都忙於其他事務的時候，黨組書記與大學黨委會委員就滾了遠不到全體三分之二的黨員，指使他們對中央委員會投了信任票。

「礦冶學院只開了兩個鐘頭的會。其中一個半鐘頭都消耗在朗誦那兩個文件上面——剩下的半小時才用於討論。不但如此，當一位黨員提出說中央委員會本來應該參加情報局會議時，討論就馬上被制止了。」

該信隨即詳細描寫了工業技術學院、工藝學系和機械學系如何煞費苦心地壓制討論，強迫黨員通過對鐵托分子有利的決議。開會期間，一切敢於擁護情報局、或對鐵托分子路線表示任何異議的人的名字被編成了名單。隨後就對大學學生黨員進行了集體開除和集體逮捕。美國記者榮·坎農也因爲報道貝爾格萊德學生共產黨員反對鐵托分子領導者的消息而被驅逐出境。他們對於一向是南斯拉夫最優秀的最富有戰鬥性的共產主義

中心之一就這樣進行了粗暴殘忍的攻擊，並且對進步學生實行了「整肅」。

這就是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者實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民主集中制原則的方式。

###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會經受到全世界進步人民公允的稱道。但是在戰爭已經結束，南斯拉夫已經獲得解放的時候，鐵托集團的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者就開始塗抹南斯拉夫鬥爭的面貌，把這個鬥爭描寫成和其他民族的抵抗運動——例如法國人民或保加利亞人民的鬥爭——有着本質上的不同。他們開始散播一種神話，認為南斯拉夫和其他民族不同，他們純粹是由於自己努力得到解放的。他們開始預言南斯拉夫發展的遠景，認為這種發展是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及蘇聯都不相干的「獨立的」發展。

戰後，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年中這個時期裏面，主要的鐵托分子在他們的公開發言中則歌頌蘇聯和蘇聯共產黨，但是暗地裏，在他們自己的圈子裏，他們已經在攻擊和誣毀蘇聯；他們歪曲南斯拉夫解放運動的真相，想在他們自己的人民中間降低蘇聯的作用，從而削弱他們對蘇聯人民和聯共（布）的感戴和景慕。

還有什麼能够比一幅把南斯拉夫被從軸心佔領下解放出來這件事和南斯拉夫建設社會主義的工作描寫成是與蘇聯並無關係的「獨立的」行動的圖畫更為歪曲事實呢？

如果沒有紅軍阻遏納粹主力部隊的進攻，把他們趕回去並把他們打垮的話，南斯拉夫的民族解放運動能夠採取過去那種形式和達到過去那種規模嗎？

如果沒有紅軍，那些在重山密林中取得那種勝利的南斯拉夫游擊部隊難道就能把納粹從大城市中趕走嗎？如果沒有紅軍，難道貝爾格萊德和南斯拉夫其他大城市就能獲得解放嗎？

蘇聯第二和第三烏克蘭戰線軍隊在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渡過了德拉瓦河與提查河；解放了塞爾維亞與沃沃丁納，並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與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第一及第十二兵團並肩作戰，解放了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

南斯拉夫部隊的參謀長阿爾索·約凡諾維奇上將在他的「貝爾格萊德戰役」裏面評論紅軍在當時的作用說：

「偉大的俄羅斯人民世代一向都是我們的希望和保證。這次也是一樣……

蘇聯軍隊給我們兄弟般的大公無私的援助。蘇聯士兵把他們的血流在我們家鄉的土地上；——在塞爾維亞；在貝爾格萊德的街道上，在斯蘭姆。這兩個斯拉夫國家牢不可破的兄弟之情與團結是從共同的受難和流血中生長起來的。這是和我們各族人民的長期奮鬥、文化與歷史的發展相適應的唯一的正確外交方向。這是我們各族人民使自己免受民族厄難的唯一保證——在我們痛苦的歷史上已經有過多次危難了。」

阿爾索·約凡諾維奇上將了解並且承認紅軍在南斯拉夫解放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但是因爲這種了解，尤其因爲他直率而公開地承認這種歷史事實，鐵托集團就決心要把他置之死地。

貝爾格萊德的解放對於駐在南斯拉夫的納粹部隊和南斯拉夫內部的賣國賊們是一種致命的打擊。十五萬餘名德國兵和大量裝備均被俘獲。蘇聯軍隊曾經盡力幫助南斯拉夫游擊部隊改編成一支現代化的正規軍。它供給了現代化的裝備——大砲、坦克和飛機。在南斯拉夫人的請求下，蘇聯的軍事專家曾經協助訓練改編後的部隊。

紅軍把在貝爾格萊德繳獲的全部裝備都交給了南斯拉夫軍隊。十幾個步兵師的軍火都是從多瑙河補給棧來的。當一九四五年一月德國人突破斯蘭姆戰綫而重新威脅貝爾格萊德時，托爾布欣元帥從巴拉頓湖附近的匈牙利戰綫上派來了強大的部隊，粉碎了納粹的進攻。

只有蘇聯，才使南斯拉夫或任何其他東歐人民民主國家免於遭受英美帝國主義式的「解放」；只有蘇聯，才使他們免於遭受邱吉爾所夢想的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如果沒有蘇聯的幫助、友誼和保護，南斯拉夫或其他任何東歐人民民主國家能够建立起他們的人民主制度和決定他們的社會主義道路嗎？

在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情況最危急的時候，在西方國家還在打算向南斯拉夫勒索政治讓步作爲以糧食供給陷於飢饉的南斯拉夫人民的代價的時候，難道不是蘇聯（雖然它自己的領土也飽受摧殘）毫不遲疑地送來了糧食和一切經濟援助嗎？

面對着西方帝國主義貪婪的進攻，南斯拉夫如果沒有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同盟與友誼而仍然能够保持自己的獨立，這件事能够想像嗎？一刻也不能這樣想！

實在的：哪一個真正共產黨員會不引以為榮地和滿足地承認蘇聯在解放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向社會主義邁進途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呢？

事實是這樣的：鐵托集團所遵循的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路線，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路線。雖然鐵托集團最初只是偷偷摸摸地，暗中設法離開南斯拉夫人民和蘇聯及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友誼和同盟關係。在共產黨情報局決議公佈以後，鐵托分子馬上就開始明目張胆地以民族主義者面目出現，煽動「大塞爾維亞民族」——「塞爾維亞沙文主義者」：曾經長期鼓吹的沙文主義的舊仇來反對匈牙利、羅馬尼亞、希臘和阿爾巴尼亞各民族人民，而且逐漸開始對蘇聯和聯共（布）進行直接的公開的攻擊。鐵托分子領導者的公開走向民族主義是他們努力在南斯拉夫恢復資本主義的反映；他們在南斯拉夫人民面前開了一條回到舊秩序、重新變成西方帝國主義軌道內的半殖民地死路。

「民族主義傾向，……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民族主義傾向就是要把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政策適應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政策。民族主義傾向所反映的，是『自家的』『本族的』資產階級想破壞蘇維埃制度，恢復資本主義的企圖。」（譯文引自「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第六二九頁。）

「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情勢」的決議對於全世界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說起來無疑是一件令人震驚的事。我們大部分人都曾經把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成就和犧牲與主要的鐵托分子集團的行動錯誤地混爲一談。我們是誤信了鐵托、卡德爾、蘭科維奇和德吉拉斯這樣的人對他們自己的渲染，毫無批判地觀察他們的行動，看不見他們暗中是在出賣民族解放運動的事業，是在領導他們的人民走一條錯誤而危險的道路。

情報局的決議戳穿了騙人的幌子。它揭露了以鐵托爲中心的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者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行爲，指出以前曾經被掩飾着然而已經漸趨明顯的民族主義，說明這種政策的不可避免的前途。

首先指出鐵托集團的錯誤的是具有警惕性和深刻政治經驗的蘇聯共產黨。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是在聯共（布）的提議下作出來的。將來這個決議將被奉爲國際工人階級運動史上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文件之一。因爲它不僅最明確地指出了鐵托、卡德爾、德吉拉斯、蘭科維奇及南斯拉夫共產黨其他領導者的錯誤，而且使曾經受到鐵托分子理論影響的其他各國共產黨得以糾正自己的錯誤，在所有共產黨面前提出了深刻的理論原則。這些原則引起了深入的討論，並且使所有的黨都可以帶着更清楚的頭腦向着更明確的方向

繼續鬥爭下去。對於主動這樣做的蘇聯同志，我們應該表示最深切的感戴。

所有的共產黨都討論了共產黨情勢的決議。在討論中這個決議得到了全世界共產黨人的完全擁護。共產黨隊伍裏面毫無分歧存在。一切參加討論的人都在討論過程中解到決議裏面所說的原則的正確性。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尚未得到解決。為什麼會產生這些錯誤呢？它們是單純的政策錯誤，或者它們背後還隱藏着什麼別的把戲呢？為什麼英美反動派好像把鐵托集團看得那麼重要？以鐵托為中心的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者這樣一羣人怎麼能夠拒絕討論其他兄弟黨提出的批評呢？

對於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者的完全非共產主義的態度，可能有什麼解釋呢？

在拉伊克、科斯托夫與科奇·霍克西審判案揭露出鐵托分子的錯誤原來是英美帝國主義的直接代理人有意識作出的反革命計劃的一部分以前，這些問題並未得到完整的解答。



## 第二章 審判案揭露的真相

一九四九年布達佩斯、索菲亞和地拉那舉行的三次審判證明：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機構裏面發展着的危險情勢不單純是政治上的錯誤和錯誤政策所造成的，而是以主要鐵托分子為核心的一幫警察告密者、挑撥者和間諜所實行的蓄謀已久的、反革命、反共產主義陰謀的結果。

匈牙利的拉茲洛·拉伊克及其同謀犯的起訴書公佈於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九月十六日在布達佩斯開始審判。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檢察署署長季米特爾·格奧爾吉耶夫發表了控訴特拉伊科·科斯托夫及其同謀犯的起訴書。審判開始於十二月七日。以科奇·霍克西為首的阿爾巴尼亞叛國集團的審判則已於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地拉那舉行。這些陰謀推翻人民經過無數犧牲奮鬥才得到的新的人民民主制度，陰謀暗殺季米特洛夫、拉科西與恩維爾·霍查等領袖的叛徒是些什麼樣的人呢？

他們主要是這樣一些人：在威脅下出賣了黨、變成了警察告密者、後來又成為外國帝國主義情報機構代理人的前共產黨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快結束時戴上一副左的假面具的右派軍官和官僚。其中還必須加上曾經參與各種陰謀的南斯拉夫官員、鐵托的使

節們。

匈牙利叛國案裏有八名被告。當拉伊克還是一個參加了共產黨的青年學生時，他曾經在一九三一年因散發共產黨傳單一事而在布達佩斯被匈牙利半法西斯式的警察逮捕。爲了想苟全性命，他同意充當告密者和挑撥者，並且在表示同意這樣做的文件上簽了名，使自己聽從匈牙利秘密警察使喚。從這一天起他就開始墮落。起初，他奉令調查布達佩斯大學的共產黨學生，其後又去調查地下活動的共產主義青年工人聯盟，後來又鑽到建築工人裏面去做特務工作。一九三五年有兩百多個建築工人就是由於他的挑唆而被捕的。這以後他被調到捷克斯洛伐克去了，後來又被調到西班牙的國際縱隊去，在拉科西大隊裏進行偵察和破壞活動。

他離開西班牙以後就到了法國，先後被關在法國南部幾個專爲西班牙共和派和國際縱隊人士設置的集中營裏——在聖·西普里安、居爾、維爾奈等地。他在這些地方勾結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各種托派小組，繼續從事告密者和特務的工作。後來，他在德國秘密警察幫助下回到了匈牙利；在地下的匈牙利共產黨內部又做起警察告密者的工作來。解放以後，他做過大布達佩斯區黨委書記、內政部長，最後做了外交部長。

與叛國案有牽連的另外兩個特務和警察告密者是蒂波爾·佐恩尼博士和安德拉斯·

薩萊。佐恩尼在一九四四年就被吸收到美國間諜機構裏去了。他奉命回到匈牙利，「鑽到左派裏面去」，後來做了共產黨的人事部長。薩萊是一九三三年在貝克斯被匈牙利政治警察頭目收買過去充當密探者的。一九四二年出賣進行地下活動的青年工人聯盟領袖的人就是薩萊；當時洩漏薩托拉達萊利監獄裏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政治犯的越獄計劃，以致有六十四人當場慘遭殺害或在後來被處死刑的人也就是薩萊。解放以後，他在共產黨宣傳部工作。

喬治·巴爾費中將是通常稱之為「保險揭客」的匈牙利機會主義者之一——這種人，不管他們的真正政治觀點是什麼，總要設法投靠當權者以求「保險」。巴爾費的父親是銀行行長，祖父是富農；他受的教育是資產階級教育；有一個時期，他就在那一向是訓練舊法西斯軍閥的穆多威卡學院唸書。由於他曾經在意大利的法西斯軍隊裏面服役過一年，他這一種政治色彩就更為濃厚了；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成了他的政治理想。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他是霍爾第軍隊裏的軍官，曾經參與佔領喀爾巴阡烏克蘭的工作。一九四四年納粹敗局已定時，他爲了替自己的前途「保險」，決定和他的同僚——與他同在霍爾第軍隊裏担任軍官的伊斯特萬·蘭茲上尉——合謀作了一番佈置。

「我同意他的見解：他應該隨着他當時服役的霍爾第軍隊到西方去。當時已經有很多人往西方跑了。他應該在那邊接交英國人或美國人；視誰俘虜他或統治他而定。我則留在國內，想辦法和左翼建立盡可能密切的聯系，甚至要用各種辦法和

共產黨建立聯系。……我們認為，無論形勢變化如何，我們都要……互相包庇。」（拉克索審判案供詞，「記錄」第八四頁。）

一九四六年春天，他的法西斯觀點已經在新的外衣下掩飾得很好了。他成了將軍，陸軍總監和邊防軍總司令。比拉·科隆第的情況和他差不多，只有小巫大巫之別。他起初是索爾第法西斯治下的憲兵，最後在巴爾費中將指揮下的邊防軍裏面工作。

保羅·尤斯爾斯是一個匈牙利托洛茨基分子。他在一九三二年被捕後被警察收買過去做情報員。解放後他在社會民主黨領導機構裏。兩個工人政黨合併後，他在匈牙利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直至被捕時為止。

最後還有南斯拉夫的拉薩爾·布蘭科夫。布蘭科夫是一九四五年以南斯拉夫軍事代表團團員身份到匈牙利來的，一九四七年底他是南斯拉夫公使館參贊；從一九四七年起到一九四八年九月，他在匈牙利担任南斯拉夫秘密警察的主要代理人；當時，他在南斯拉夫內政部長蘭科維奇的命令下搖身一變，偽裝為在匈牙利國土上避難的、共產黨情報局的擁護者。

和科斯托夫叛國案有關的同謀犯的政治背景和類型也都是類似的——不是隱藏在共產黨內部的警察告密者和外國諜報機構的代理人，就是用左的外衣隱藏着自己的真正信仰的右翼商人和假裝反對鐵托政權的南斯拉夫秘密警察。

首先是特拉伊科·科斯托夫自己。科斯托夫曾於一九四二年四月以地下共產黨中央

委員會委員身份被捕。他因為接受了在共產黨內部替保加利亞警察做密探的任務得以苟全性命。解放後他成爲部長會議代理主席和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

此外還有：早在一九三二年在替英國間諜機構工作的共產黨員伊凡·斯捷法諾夫；和科斯托夫同時投黨警察後被派回到共產黨內部工作的尼可拉·巴夫洛夫；一九四一年就和英國諜報機構保持聯系的共產黨員，解放後担任國家財經委員會副主席的尼可拉·納切夫；一九四三年被捕後接受警察密探任務，一九四六年成爲保加利亞駐蘇聯商務代表的鮑里斯·克里斯托夫；一九二四年在發那和一批年青的共產黨人一起被捕時投靠警察，出賣同志，而在一九四一年又和美國諜報機構取得聯系的索努·鍾切夫；解放後冒充人民政府的友人，參加共產黨而替英國諜報機構工作的地主兼企業主的伊凡·傑夫列諾夫；名爲南斯拉夫駐索菲亞大使館參贊，實爲鐵托間諜，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和駐匈牙利利的布蘭科夫一樣搖身一變，假裝擁護情報局的布拉戈依·哈德伊潘佐夫。僅就主要同謀犯來說，以上所列也還不是一張完整的名單。

不過，有一點是他們大家都一樣的——他們都把自己的真面目用虛僞的外表掩蓋起來。他們中間有的是背叛了共產主義事業，因貪生怕死而變成警察告密者，後來被原來的主子交給德國秘密警察、法國英國或美國的諜報機構或同時交給所有這些諜報機構的共產黨員；有的是假裝同情新的人民政權的反動憲兵、軍官或商人；有的是喬裝成新的人民民主國家的友人或情報局的擁護者的南斯拉夫官員——不管他們是些什麼樣的人，

他們都是反對自己的國家、反對自己的民族、反對社會主義的陰謀的擊刺者和執行者。此外，還有一點也差不多是他們共同之處：他們都是通過鐵托集團而接受指令的。

### 鐵托分子真相畢露

這幾次審判歷時甚久。拉伊克審判案於九月十六日開始，九月二十四日宣判。科斯托夫審判案十二月七日開始，十二月十四日宣判。被告們完全有機會作充分的不拘形式的發言。很多證人曾經上庭作證。但是，無論是在拉伊克審判案或在科斯托夫審判案中，有一點十分清楚：那些罪惡最大的犯人並不在場。

因為，如果站在被告席中的是曾經陰謀推翻他們的人民民主政府和殘害他們人民最愛戴的傑出領袖的拉伊克、科斯托夫以及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的同謀犯，那麼站在拉伊克後面、站在科斯托夫後面、站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亞這些同謀犯後面的還有鐵托分子領導者這個罪犯集團——鐵托本人、蘭科維奇、卡德爾、德吉拉斯和其他幾十個人，而鐵托分子後面還站着真正的主謀——英國和美國諜報機構，英國和美國帝國主義。

共產黨情報局決議所譴責的鐵托虛偽政策的真正底細，在這幾次審判中已揭露出來了。這幾次審判揭露了由來已久的鐵托分子的叛變。這幾次審判也揭露了這種叛變如何開始，又如何以鐵托及其黨羽變成在東歐與全世界執行英美帝國主義政策的直接工具為

結束的整個故事：

「坐在犯人席中的，不僅是拉伊克及其同謀犯，而且也有他們的外國主子，他們的教唆者——只爾格萊德和華盛頓的帝國主義者。」（匈牙利人民檢察長吉尤拉·阿拉皮的話，「拉伊克審判案記錄」第二五三頁。）

拉伊克本人對鐵托分子同謀犯的作用作了最清楚的概括的敘述。拉伊克是在法國南部專為會參加國際縱隊者設立的法國集中營裏和他們搭上關係的：

「在聖·西普里安、居爾和維爾奈等地的法國拘留營裏，我和南斯拉夫人在一起。當時法國拘留營裏面存在着非常強有力的托派政治活動。這種政治活動的主要組織者同時也是執行者是南斯拉夫那一羣裏面的人。就我記憶所及，南斯拉夫那一羣人裏面也許有一百五十個人左右是與這種活動有關的。其中絕大多數是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和大学生……」（拉伊克供詞，「拉伊克審判案記錄」第三九頁。）

這些托洛茨基分子裏面很多人是由南斯拉夫秘密警察派到國際縱隊裏去的，其中有些就是現在鐵托分子裏的主要人物。當他們在法國集中營裏的時候，有好幾個國家——法國、美國、以後還有德國——的間諜機構和他們發生關係。

拉伊克講到他們在集中營裏和法國秘密警察——「第二廳」聯系的情況時說：

「作爲一個曾經進行托派活動的前國際縱隊隊員，我被法國在居爾和以後在維爾奈的間諜機構——「第二廳」的軍官召見過幾次。他要我提供有關集中營裏各種

活動的情報……我必須補充說明一點，法國軍官的召見我，並不是需要了解我的過去，因為一般說來托洛茨基分子無論何時何地，在國際方面總是與警察密切合作的……我對那個領導「第二廳」的法國軍官說：「集中營裏面有一個南斯拉夫的托派小組非常活動，並且大略說了一下誰在領導這個小組。後來那個法國「第二廳」的軍官拿出一份名單，上面寫滿了南斯拉夫人的名字，他根據名單仔細核對我列舉出來的名字。我看見我提到的那些領導者在他的名單上面已經註明是這個南斯拉夫托派小組的領袖了。」（同前，第三九——四〇頁。）

他碰見過他們去訪問「第二廳」的官員：

「這件事使我逐漸清楚，這些南斯拉夫人事實上是『第二廳』組織好了的人，和我一樣在執行着它的命令。」（同前，第四〇頁。）

後來希特勒侵入法國。從前被南斯拉夫秘密警察移交給法國情報機構的南斯拉夫托洛茨基分子現在又被德國秘密警察接收過去。拉伊克談到，一九四一年春天有一個德國秘密警察或軍事保衛局的少校率領的德國招募團訪問這些集中營。他說：

「招募團工作了幾天以後，這個少校就把我叫去；對我建議說：我也必須報名到德國去工作，他願意幫助我從德國回到匈牙利去。他對我說：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匈牙利警察政治部頭子彼得·哈因曾經請他幫助我回匈牙利去，因為我是一個曾經替匈牙利警察工作很久的有組織的特務。而他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可以送我



回去。在這次談話中，那個德國秘密警察或軍事保密局的少校拿出一張名單來，詢問某些南斯拉夫人的情況。他唸的名單和我向「第二廳」負責軍官報告南斯拉夫托派小組活動情況時那個軍官曾經仔細看過的名單完全一樣。……他說他之所以問我是因為彼得·哈因曾經請他幫助我回家，因此他信任我的意見，並且就他來看我是一個可靠的人；另一方面，這些南斯拉夫人和很多別的南斯拉夫人——大概就是榜上有名的那些人，約共一百五十名——曾經請他（就是那位少校）幫助他們回南斯拉夫去。我認為有兩件事可以證明他的確這樣做了。第一，和我一起到德國去的小組裏面有很多南斯拉夫人。其次，在我的工作地點萊比錫附近常有為數頗多的南斯拉夫人成羣結隊地動身回南斯拉夫去。像他們那樣大搖大擺地啓程回家，如果沒有德國官方機構——秘密警察或其他機構的支持，顯然是不可能的。」（拉伊克供詞，「拉伊克審判案記錄」第四一——四二頁。）

「地點是在維爾奈拘留營。一個名叫費爾德的美國公民——就我所知，他是美

國在中歐和東歐的諜報組織的頭子——在內戰中結束後到拘留營裏來看我。他說他從華盛頓接到指令，要他和我談話，並且幫助我離開拘留營回到匈牙利去。他甚至

於對我說，他們很願意送我回去。因為我是一個還沒有被揭穿的特務，可以在黨內按照美國人給我的訓令辦事，破壞黨的組織，使黨渙散瓦解，甚至還可能奪取到黨的領導權。」（同前，第四六——四七頁）

因此，拉伊克審判案的結果說明：在三十年代中期與末期，當其他共產黨正勝利地揭露着和清除着類似的托派集團時，南斯拉夫共產黨內，包括很重要的地位上，仍然隱藏着相當龐大的一羣托洛茨基分子和挑撥者。這些叛徒裏面有科斯塔·納吉、伏克曼諾維奇和其他主要鐵托分子等。其中有一大批人曾經被派到國際縱隊裏面去。後來他們在法國南部集中營裏面也和法國及德國的諜報組織以及其他國家的和他們一樣的托洛茨基分子和挑撥者保持經常的聯系。早在四十年代初期，德國秘密警察和美國諜報機構就已經在互相競爭着要接收這些叛徒，把他們送回國去破壞他們本國的共產黨和進步運動。後來他們有很多人終於在德國秘密警察的協助下回到了南斯拉夫。

## 出賣解放鬥爭

拉伊克、科斯托夫和阿爾巴尼亞審判案裏的供詞說明：這些間諜和挑撥者在德國秘密警察協助下溜回國內以後，就和南斯拉夫共產黨內部其他類似集團狼狽為奸，在充任游擊隊和民族解放鬥爭的領導者的時候，繼續進行破壞和出賣工作。

他們有些人繼續替德國秘密警察工作，有些人和英國與美國諜報機構聯系，有些人設法同時替三方面工作，但是，在戰爭過程中領導叛變活動的是一羣組織嚴密的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者，包括鐵托自己、蘭科維奇、卡德爾和德吉拉斯在內。

當一九四一年五月納粹席捲南斯拉夫時，當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納粹頭目及其南斯拉夫走狗們佔領下忍受各種恐怖迫害時，英國的政策起初是支持米哈伊洛維奇和南斯拉夫的契特尼克匪幫。雖然契特尼克在反抗軸心方面毫不起勁，雖然日益增多的證據說明契特尼克事實上是和軸心狼狽為奸的，但是在很多個月裏面，英國的武器、制服等援助仍然繼續空投給契特尼克，屬於軸心戰鬥序列的契特尼克部隊拿着英國湯姆槍，穿着英國軍服，一次又一次地攻擊南斯拉夫的愛國志士和游擊隊。他們甚至於利用英國無綫電設備作號召暗殺游擊隊領袖的廣播。

後來，各種不同因素加在一起的力量終於使這種政策改變了。這些因素包括：

(一) 南斯拉夫絕大多數人民羣衆日益顯著地鄙棄契特尼克匪徒，認為他們是勾結軸心國的賣國賊。英國反動派顯然不能依靠米哈伊洛維奇來達到戰後在南斯拉夫或巴爾幹取得據點的目的。

(二) 契特尼克匪徒不是積極協助軸心國就是完全偃旗息鼓。隨着北非戰役日益增長的困難，英國在北非的軍事領導方面要求在巴爾幹展開游擊隊活動。這種活動可以截斷軸心國的交通綫，制止給隆美爾的源源不絕的增援。

(三) 在英國和美國，甚至於在軍隊裏，愈來愈多的真正反法西斯的進步人民對這種援助軸心國傀儡的政策表示震驚，紛紛要求改變政策。

(四) 在某一時刻（究竟什麼時刻，什麼情況尚待歷史說明），英國參與機密的高級軍政領導機構一定得到了情報（其中一部分也許是他們早就熟悉的），知道游擊隊內部，南斯拉夫共產黨內部有些領導者是間諜、挑撥者、德國秘密警察的特務、托洛茨基分子，從英帝國主義的觀點來看，這些人是「靠得住的」，可以利用他們做出賣南斯拉夫人民解放運動的內奸，利用他們來實行英美帝國主義的政策。這就是一九四二年至四三年間英國政策從支持米哈伊洛維奇轉而支持鐵托這種轉變的基礎。這種轉變是在極端秘密、奸詐欺騙中進行的，英帝國主義在這方面有着長期玩弄權術的無與倫比的經驗，它的臭名早就傳遍全世界了。

表面上，這件事一定要做得能籠絡人心，把它做得像是爲了支持南斯拉夫游擊隊的反軸心的愛國鬥爭，從而使英美的進步人民啞口無言，使他們以爲自己的努力和鬥爭已經開始奏效。英國的（後來還有美國的）諜報機構和鐵托實國集團的聯系不得不極端保密，南斯拉夫和英美雙方都只有很少數完全「可靠」的人才可以參與其事。局外人士，包括英國、美國和南斯拉夫總部很多人在內，都還以爲這是盟國之間爲了抵抗軸心國而作的真正的軍事互助呢。

這樣，他們就可以使各方面的進步人民都進入圈套，都竭盡全力加緊援助鐵托——

雖然這種援助實際上是用來反對進步人民所擁護的一切的。由於極端保密的緣故，美國和英國統治階級裏面的（包括英國外交部 and 美國國務院裏面的）親米哈伊洛維奇派和親鐵托派之間就產生了混亂和爭執。而這種混亂和爭執正好使這種陰謀看起來好像煞有介事。英美這兩方面和游擊隊之間建立了兩套聯系。一套是普通的聯系，用來處理比較公開的軍事援助與聯系事宜；另外一套是內部的、和前面一種平行的、極端秘密的聯系網，專門供給屈指可數的少數參與機密的「可靠」人士使用。通過這個聯系網，他們就可以遮掩各方面大多數領導軍官和官員的耳目，使真正的計劃得以實現。直到現在，因為審判案暴露了很多事實，這種陰謀的性質和組織才開始被揭穿。

被告之一，前南斯拉夫駐布達佩斯公使館參贊拉薩爾·布蘭科夫在拉伊克審判案中談到這個陰謀的性質時說：

「他們（英美情報機構）考慮得很週到。首先，早在戰爭時期，英國人和美國人就已經和邱吉爾學劃好一個秘密的計劃。就這個計劃來看，和往常一樣，他們不願意用英國和美國士兵的血作代價來使巴爾幹變成他們的勢力範圍，而是想通過這些有經驗的諜報人員來達到這個目的，想用這種方式把今天的南斯拉夫的領導者置於他們的影響之下。……」

「當戰爭還在進行時，他們力圖使南斯拉夫屈服在英美勢力下面，然後進一步征服鄰近各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匈牙利。他們的主要目的是限制蘇聯的勢

力，降低蘇聯的影響。因為他們很清楚：南斯拉夫人民絕大部分都站在蘇聯那邊，幫愛蘇聯人民。當時他們計劃首先把鐵托、卡德爾、蘭科維奇和德吉拉斯爭取過去，並且通過他們這些人把南斯拉夫拿過去。……」（拉薩爾·布蘭科夫供詞，「拉伊克審判案記錄」第一一七頁）

布蘭科夫談到他所謂的「邱吉爾計劃」的進行情況：

「另外一種情形是——這更加是邱吉爾的計劃——英國人和美國人必須在戰爭時期佔領亞得里亞海岸。當時本來沒有必要這麼做，因為大部分海岸已經被游擊隊解放和佔領了。不過：對於邱吉爾來說，當時却有必要把他的勢力擴展到南斯拉夫及其相鄰各國去。就在那時候，麥克利安已經把蘭科維奇、德吉拉斯和卡德爾拉攏過去，使他們贊成這個計劃。當時參謀總部曾經發生過一場猛烈的爭論；結果鐵托也再度同意這個計劃，因為他認為不管怎麼樣，南斯拉夫將來總是由英國來解放的。……蘇軍司令部對這個問題具有不同的看法，並且對鐵托提出勸告。結果鐵托放棄了這個念頭。這樣一來，邱吉爾便入巴爾幹和亞得里亞海岸的計劃在戰爭時期就失敗了。」（同前，第一一九頁）

特洛伊科·科斯托夫在他的書面供詞裏面同樣證明了鐵托集團投降英、美帝國主義的事實。他詳細陳述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底他和卡德爾在斯科普里晤面時卡德爾對他說的話的內容：

「於是卡德爾極端秘密地通知我說：戰爭時期，英國人和美國人曾以武器和軍火供給南斯拉夫游擊隊，附帶條件是戰爭結束以後，鐵托要保證南斯拉夫不站在蘇聯那邊，而且，不僅不讓蘇聯在南斯拉夫確立其影響力，而且也不讓蘇聯在巴爾幹確立其影響力。美國人和英國人下了極大決心，無論如何都不讓這些可能被蘇軍解放的國家脫離西方集團。」

「早在戰爭時期，鐵托和英、美就已經在這個基礎上達成了明確的協議。」（科斯托夫審判案記錄，第八八頁。）

西方帝國主義早就夢想在巴爾幹與東歐建立一個傀儡政府的聯邦，在其那翼下作爲一個新的反蘇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戰過程中，西方帝國主義對於這些國家裏面在反抗軸心國統治和佔領的鬥爭中成長起來的人民抵抗運動的性質大感恐懼。在他們心目中，由共產黨人領導的人民的一切鬥爭與犧牲並不是英勇的盟友反納粹法西斯的鬥爭，而是對帝國主義在東歐的前途的一種威脅。即使在戰爭時期，西方帝國主義的目標也沒有改變，只不過換上了新的形式而已。

當蘇軍迎擊納粹德國的主力並且把它打垮的時候，邱吉爾一九四二年十月的秘密備忘錄（現已公佈）裏面說：

「如果俄國的野蠻與蒙昧蓋過歐洲古國的文化與獨立，那將是一種無可估量的災難。」

英國帝國主義一方面極力避免開闢真正的第二戰場，一方面就在計劃侵略巴爾幹，幻想在戰爭進行過程中建立一個反動傀儡國家的反蘇集團。在戰爭時期，當紅軍使英國得以免受侵略時，當數以千計的愛國進步人士在歐洲的抵抗鬥爭中獻出自己的生命時，邱吉爾却正在草擬計劃，想在東歐建立英、美的統治，想在巴爾幹買國賊幫助下，對抵抗部隊——而不是對納粹侵略者和巴爾幹各國的賣國賊——進行鎮壓。

西方帝國主義者在實行這個計劃，努力使邱吉爾的幻想成爲現實的時候，交給南斯拉夫鐵托集團一種具有關鍵性的任務。

南斯拉夫共產黨內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尚在進行時就存在着很多反對鐵托、蘭科維奇和卡德爾的政策的人。領導這個反對派的是卓越的共產黨領袖海布明和南斯拉夫解放軍參謀長阿爾索·約凡諾維奇將軍等。但就是領導反對鐵托集團的這些人也未認識到他們是在對付叛徒。

鐵托分子有一種對付反對派——無論是黨內的還是黨外的反對派——的辦法：

「蘭科維奇在這方面是特別重要的。因爲他是組織書記，他領導人事部，後來又領導間諜和反間諜組織。全部黨的機構都掌握在他手裏，他得心應手地把自己人安插到每一個地方去。他把所有對於鐵托、卡德爾、德吉拉斯和蘭科維奇的戰時路線表示異議的人，特別是對他們的狼狽爲奸表示異議的人，都順利地加以清除了。並且在黨員面前指責這些人犯了左傾偏向。舉例來說——早在一九四四年游擊隊員



們就已經對這件事情議論紛紛了——這些被認為左傾的、追隨蘇聯的、不願意和英美密切勾結的人，在戰爭時期都被派到毫無生還希望的地方去了。」（希爾科夫供詞，「拉伊克審判案記錄」第一二一——一二二頁。）

這樣一來，南斯拉夫共產黨內部的托洛茨基分子和特務集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過程中就奪取了更多的領導地位。他們把自己喬裝成游擊隊領袖，利用職權採取一切手段，包括最毒辣的手段，來消滅反對他們的人。戰爭結束時，他們幾乎盤據着南斯拉夫共產黨的一切主要職位。隨着一九四八年四月尤納維奇與海布朗的被捕並由於阿爾索·約凡諾維奇將軍慘遭暗殺，這種從黨的領導機構裏清除真正國際主義者的辦法更變本加厲。從此以後，鐵托分子就為所欲為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組織南斯拉夫共產黨內部的托洛茨基集團並和他們取得協議這件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國帝國主義。這並不是偶然的事。英國是所有帝國主義裏面經驗最豐富和最懂權術的。幾百年成功和失敗的經驗使它學會了陰險機詐和隨機應變的戰術，使它懂得如何把表面上的讓步和殘酷無情的暴力兼施並用。因此在同盟國方面，首先擊劃並且大規模實行滲透政策和從內部來腐蝕左翼的政策的就是英國。

科斯托夫案同謀犯伊凡·吐捷夫受審時供稱：一九四三年初他奉一個英國間諜的命令去結納：

「進步人士，特別是共產黨員，目的是和這些人建立聯系，鑽入黨內，以至成

爲黨員，企圖在十分必要時攫取領導職位。」（伊凡·吐捷夫供詞，「科斯托夫審判案記錄」第二二五頁。）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率先組織鐵托陰謀，準備在戰後進行活動的，就是老奸巨猾的英帝國主義。

「英國政治家們很清楚：戰爭已趨結束，希特勒也已經註定喪失敗了，即使第二戰場尚未開闢，蘇聯也將得到勝利……局勢這樣發展下去，蘇聯必然會在東南歐與東歐各國建立起顯著的優勢。英國對於蘇聯這種優勢不能容忍而置之不理。因此英國打算竭盡全力阻止蘇聯在巴爾幹，特別是在保加利亞確立其影響力……爲了完成這種任務，英國情報機構必須徹底了解將來情況發展時蘇聯和共產黨的意圖。」（伊凡·吐捷夫供詞，同前，第二二五頁。）

但是：如果說首先動手的是早就囑目於戰後世界的比較狡狴多謀、經驗豐富的英國情報機構和英國帝國主義，那末，在戰爭結束時接過手來的就是實力較強的美帝國主義了。特務、間諜和走狗們很快就開始了解到大勢所趨，誰將成爲他們的新主人。

「當我向鐵托問到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方向時，他表示出對英國的蔑視。據他說，作爲一個強國來說，英國已經是強弩之末，不得不讓位給一帆風順的美國資本主義。鐵托使我了解到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方向具有日益增長的親美趨勢，與從前的親英迥然不同。他並勸告我們保加利亞人與美國人建立聯繫……」（科斯托夫詳

述一九四六年夏天與鐵托會晤情況的書面供詞，「科斯托夫審判案記錄」第九九——一〇〇頁。）

在戰爭結束的時候，鐵托集團已經變成了美國帝國主義的直接代理人。

### 戰後的陰謀

邱吉爾想在戰後世界中建立一個唯西方帝國主義之命是聽的反動東歐的計劃是完全失敗了。紅軍解放了東歐。這些國家裏而領導抵抗軸心國佔領的是本身受工人階級與共產黨領導的勞動人民。舊統治階級——資本家和地主——和舊國家機構的舊領袖——將軍、警察和法官——的勾結軸心國、出賣祖國的醜惡嘴臉已經暴露無遺。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雖然發展並不平衡，而且還不是所有國家裏的人民都同樣堅決——準備在與蘇聯友好合作下走向勞動人民掌握政權的人民民主制度。

邱吉爾計劃失敗了，但是這計劃還沒有被放棄。那是不會放棄的！西方帝國主義暫時失敗以後又更加賣勁地挖土重來了，拚命掙扎着想扭轉歷史，使為人民所鄙棄的舊政權在東歐復辟。在希臘，他們用的辦法是暴力、暗殺，對曾經領導反軸心的抵抗鬥爭的人作戰，對希臘人民作戰，和希臘賣國賊勾結起來作戰。在蘇聯實力足以阻止公開的干涉戰爭的東歐其他國家裏面，他們就通過更隱秘的陰謀、暴動和隨機應變的辦法想重演

他們在希臘玩的把戲。

起初他們試圖利用舊統治階級組織的法西斯或秘密軍事組織進行直接的反革命活動，從而恢復舊政權。例如在波蘭，受西方帝國主義金錢與武器接濟的法西斯匪徒們使數以千計的波蘭民主人士喪失了生命。但是這些計劃都失敗了。他們第二步就轉向舊農民政黨的右翼領袖，如羅馬尼亞的馬尼烏，匈牙利的費倫茨·納吉，波蘭的米科拉茲柯，保加利亞的格麥托，吉米特羅夫和彼特科夫等。但這些陰謀都破產了。於是他們把希望寄托在舊社會民主黨的右翼領袖身上，陰謀反對工人階級日益增強的團結和正在建立中的新的人民民主制度。但這些陰謀也都失敗了。因此，到了一九四八年，帝國主義暗藏在共產黨和工人黨內部的代理人，特別是這些代理人的組織中心——南斯拉夫共產黨裏的鐵托集團，就變成了他們推翻人民民主制度，建立依附西方國家的東歐政府的帝國主義陰謀的主要武器。

這樣，到一九四八年年中，原來作為西方帝國主義的輔助武器和後備武器的鐵托分子集團就變成了它在東歐的主要代理機構。

帝國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國家或人民民主國家的計劃與陰謀不是很簡單的，也不是只有一條路綫。帝國主義者的工作是通过一切可能的媒介來做的。財產被剝奪了的地主或大實業家；前軍隊、警察或秘密警察的領袖；通過富農、民族主義者、蜕化分子、吸毒者、從前的一般罪犯；通過共產黨的叛徒或有翼勞工領袖；通過安插到革命組織裏面

來的代理人和挑撥者。他們希望同時保持一切可能的聯系，把一切可能的反革命分子都串在線上讓他們牽着鼻子跑。但是通常他們在一定時期內主要只支持某一特定集團，希望利用這個集團使他們俯首聽命的反動政權復辟。

帝國主義想推翻蘇聯無產階級專政，恢復依附西方國家的俄國資本主義的接二連三企圖很清楚說明了這一點。起初，他們試圖通過公開的干涉戰爭而依靠沙皇的白衛軍，依靠俄國的地主和資本家、舊軍官和舊警察。這個辦法失敗以後，他們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試圖依靠富農來進行反革命的陰謀活動。在富農作爲一個階級終於被消滅掉以後，隱藏在共產黨內部的帝國主義代理人——托洛茨基分子以及以前一直作爲後備軍的其他類似的「反對派」集團，在三十年代中期就變成了他們推翻社會主義、倒轉歷史的主要希望與主要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歐的情形也是這樣。起初，南斯拉夫以外的鐵托分子只是一種備而不用之武器。帝國主義通過南斯拉夫的鐵托分子，下令給他們，要他們幫助其他反動集團發展。科斯托夫密報案說明，科斯托夫及其同謀犯慣於鼓動保加利亞人民不滿意新的人民當局。拉伊克最初也曾在一九四六年秋天奉美國間諜馬丁·希姆勒之命，用進行內部破壞從而削弱左翼勢力的方式幫助匈牙利右翼實行他們的陰謀。

「他（馬丁·希姆勒）對我說：匈牙利各種不同的右翼勢力主要集中在費倫茨·納吉，比拉·科瓦奇和比拉·瓦爾加的領導下。小農黨的右翼，伊姆雷·科

瓦奇領導的農民黨右翼，皮耶爾、施德爾、基斯利和施利格領導的右翼社會民主黨的勢力，以及尚無組織然在地下積極活動的霍爾第分子與從前的查拉西法西斯勢力在奪取政權和推翻左翼革命勢力——共產黨與左翼社會民主黨人——在政府中的權力的工作中都起勁。他想交給我一種任務，要我在拉科西領導的黨內組織反拉科西的宗派，從而使左翼革命勢力的最大的組織——共產黨解體，保證右翼勢力可以篡奪權力。……同時，馬丁·希姆勒告訴我：這次談話大概將是我和他以及所有美國間諜機構的代表的最後一次談話。因為他們要把整個間諜網交給南斯拉夫人。將來我可以通過南斯拉夫這條路接受以後工作的指令。」（拉伊克供詞，「拉伊克審判案記錄」第四七——四八頁。）

後來，當其他右翼集團真相暴露以後，拉伊克從蘭科維奇那裏接到美國的特別指令，要他幫助那些現在得到西方國家全力支持的反翼社會民主黨的領袖。

「那時候蘭科維奇寫來的另一封信——這封信與關於選舉的信有密切關係——要我在選舉中對右翼社會民主黨人極端強烈的反人民民主、反黨、傾向於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政策裝聾作啞故作不知，並且以書記處書記之一的身份，設法使黨的領導機構，使共產黨的領導機構也容忍這種政策。信裏面說，我可以和黨進行辯論，使黨相信，在選舉時期不可能兩樣同時開火，不能在與法西斯性質的右翼作戰的同時對一個歸根結蒂說來總算是一個工人政黨的黨派的右翼作戰，因此必須在兩害之間取

其輕的政策基礎上允許右翼社會民主黨人自由活動。在這個問題上，蘭科維奇的信指出，就他所知，右翼社會民主黨人——他怎樣知道的就非我所知了——打算利用選舉、競選運動和以後的選舉結果，來訛詐共產黨，從而在國家機構中攫取各種領導地位。他的信——根據上面那種政治推理——說我應該在黨的領導機構內部進行辯論，主張給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各種職位，使他們保持中立。必要時我應該說我們這只是暫時的讓步，以後會把它們拿回來的。」（拉伊克拱詞，「拉伊克審判案記錄」第五七頁。）

這樣，在戰後歷史的一定階段上，原為帝國主義後備武器的南斯拉夫鐵托分子被提拔成為西方國家政策的主要工具，他們在匈牙利、保加利亞及其他國家的奴才也都從次要地位被擢昇到主要地位了。原因是帝國主義的軟弱而不是帝國主義的強大，是它的失敗而不是它的成功。拉伊克和科斯托夫審判案中兩位檢察官的總結演說都很好地概括了這種「演變」。

匈牙利人民檢察長吉尤拉·阿拉皮博士說：

「鐵托匪幫的政策可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當東歐各國資產階級反動派與人民民主勢力的鬥爭還未分勝負，還可以期望反動派在人民民主國家裏各種力量的鬥爭中佔上風的時候，鐵托集團還處在後備軍地位，還沒有露出他們的獍狍面目，還沒有明目張胆地以美帝國主義反蘇挺進隊的姿態出現。只是在東歐發展的第二個

階段，他們才以這種挺進隊的姿態出場，那時，民主和社會主義勢力已經在這些國家裏面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要用那些被打垮了的、人所共知的反動派來組織反蘇親帝的政治力量已經靠不住了。……

「正像南斯拉夫在戰後初期還處在後備軍地位，以後才公然以帝國主義的挺進隊姿態出場一樣，拉伊克在匈牙利走向民主的第一個階段裏面還沒有馬上顯露頭角，還只是國內外反動派手中的工具。只是在匈牙利工人階級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各種反動派紛紛失敗以後，他才挺身而出，作爲鐵托集團指派的總理候選人，至少暫時成爲匈牙利反動派的頭子。鐵托分子和他們的帝國主義主子要利用拉伊克並不是因爲他特別精明能幹，而是因爲他們不能再依靠納吉和明曾蒂了。」（「拉伊克審判案記錄」第二六八頁。）

保加利亞首席起訴人弗拉吉米爾·吉姆切夫在科斯托夫審判案的總結發言中說：

「當美、英特務機構組織和唆使我們國家裏面的反動派與法西斯力量向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進攻的企圖化爲泡影以後，他們就開始把希望寄托在特拉伊科·科斯托夫的叛國集團的身上，這些叛徒長期以來一直在替他們做間諜工作。在他們這個反對我們國家的陰謀計劃裏面，英、美帝國主義者把鐵托及其黨羽的叛國間諜匪幫當作他們的主要工具。」（「科斯托夫審判案記錄」第五〇九頁。）

這說明曾經是帝國主義重要後備武器的鐵托分子，到一九四八年年中如何變成了西



「方帝國主義在東歐進行反革命陰謀的主要工具。

南斯拉夫鐵托分子和他們在其他東歐國家裏的「聯系」怎樣能夠為他們的英美主子服務得最好呢？鐵托分子反對歐洲人民的陰謀如何實現呢？這個陰謀的主要內容與步驟是什麼呢？

顯然，甚至在鐵托分子還只是處在帝國主義後備武器地位的時候，他們的任務就已經不僅僅是準備對東歐人民民主政權進行反革命的暴動，也不僅僅是進行破壞左翼的工作，必然的推論是：他們極力要在東歐羣衆中間破壞他們對蘇聯的熱愛和景仰，破壞他們對蘇聯的深摯友情和感戴。這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工作，不能直接地正面進行，而只能間接地作為一整套辦法的一部分來進行。

對蘇聯進行正面攻擊勢必會激起東歐人民羣衆的憤怒的撥斥，立刻揭穿鐵托分子的假面具。因此，這個計劃首先要抬高鐵托南斯拉夫和鐵托分子領導者的身價，使他們成為一切宣傳的中心；從而把人民從蘇聯那邊吸引過來，這個計劃要激起人們對南斯拉夫的興趣和熱情；從而使蘇聯退居到一個不顯著的地位。以後，鐵托分子就可以利用這種巨大的「威信」繼續引誘東歐各國人民，使他們拋棄對蘇聯的友誼，一步步地把他們拖進西方帝國主義的圈套。這樣一來，南斯拉夫不僅本身會被鐵托分子從進步國家的大家庭裏拖出來陷入帝國主義貪得無厭的魔掌之中，而且也會把東歐其他各國一同拖下水。這種辦法對於在東歐國家內部準備右翼暴動和右翼政府的辦法來說當然只是輔助性的。

這就是蘭科維奇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凱利比亞會晤拉伊克時對拉伊克敘述的鐵托計劃的本質。

「……這個計劃就是：因為所有人民民主國家的右翼勢力均被一一擊敗，南斯拉夫就不得不在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工作中担任組織者與主謀者的任務。但是——蘭科維奇說——據鐵托估計，南斯拉夫明目張胆地宣佈這樣一種政策是行不通的。南斯拉夫不能這樣做是因為在南斯拉夫以及大部分人民民主國家的人民羣衆裏面，對蘇聯的友誼已經根深蒂固，同時也因為社會主義陣營具有強大的實力。因此，鐵托必須在偽裝下利用欺騙的手法來實行這個計劃。據蘭科維奇說，鐵托這種欺騙政策是這樣想出來的：首先，由於戰爭的緣故，或者說得更適當些，由於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英勇游擊戰鬥的緣故，南斯拉夫對於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鐵托認為這種吸引力，這種豪望所蘊的形勢——表面上着重強調與蘇聯以及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友好——必須加以利用和強調，以便以南斯拉夫為中心建立南斯拉夫和其他各國的各種聯盟。鐵托要用一種騙人的方式來建立這個以南斯拉夫為中心的集團；表面上仍然打着社會主義以及親蘇、親人民民主國家的幌子，說南斯拉夫的地理形勢使它在反對美國以及整個盎格魯撒克遜的侵略政策方面有一種重要的戰略任務。」（拉伊克供詞，「拉伊克審判案記錄」第六三——六四頁。）

鐵托計劃裏面包括建立各種各樣的巴爾幹和東歐組織——從以南斯拉夫為中心的聯

郭到以南斯拉夫為中心的青年組織——的辦法。吸引人民與國家離開蘇聯的第一步是要把這些人民與國家組織在鐵托南斯拉夫周圍，而出賣英勇的南斯拉夫解放運動的鐵托分子則隱藏在南斯拉夫人民由於他們的犧牲而贏得的受之無愧的巨大威信後面。

因此，鐵托計劃是要把鐵托捧上天去。

「鐵托因簽訂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即將訪問保加利亞時，我採取了一切必要步驟，使他可以受到最補張最動人的歡迎。」

「鐵托在他所想像的聲勢顯赫的氣派中到達保加利亞，乘坐專車，除了他的私人保鏢外還有兩列衛隊車前呼後擁。」（科斯托夫書面供詞，「科斯托夫審判案記錄」第一〇六頁）

這個計劃要努力建立一個南斯拉夫——保加利亞聯邦，保加利亞在這個聯邦中將成為南斯拉夫的第七個共和國，俯首聽命於南斯拉夫與鐵托。計劃中還包括建立以鐵托南斯拉夫為中心的多瑙河流域聯盟的各種計劃，要建立一系列的巴爾幹與東歐的各種組織的聯盟——以貝爾格萊德為中心的體育、青年、婦女、工會等等組織，使貝爾格萊德成為中心——這是引誘人民離開蘇聯而倒向西方的辦法的第一步。

「前面所提到的計劃，本質上就是要把這些國家從蘇聯那邊拖到美國那邊去。

在這個龐大計劃的範圍之內，鐵托和美國人一起又擬訂了一個詳細計劃，一個區域性的計劃，就是巴爾幹聯邦計劃。按照計劃，這個聯邦將包括作為領導者的南斯拉

夫以及匈牙利、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以後也許還有……羅馬尼亞。」（巴爾費供詞，「拉伊克審判案記錄」第九二頁。）

「這時——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蘭科維奇另外還有一封很重要的信也是我無法解釋的，而他在凱利比亞才予以詳細說明。這封信說：如果南斯拉夫政府就建立青年、婦女與工人的巴爾幹聯盟一事向匈牙利政府提出建議，則我作為政府一員必須盡我所能地支持這個建議。」（拉伊克供詞，「拉伊克審判案記錄」第五七頁。）

一九四八年年中共產黨情報局決議之公佈沉重地打擊了鐵托的計劃。鐵托分子不能再「從容不迫」了。他們按照美國的命令，唆使他們的拉伊克和科斯托夫這一流的人加緊準備暗殺他們國家裏最優秀的共產黨領袖和加緊進行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計劃。但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的警惕性使他們沒有能夠實行他們的計劃。

### 鐵托對阿爾巴尼亞的陰謀

一九四九年五月開始的阿爾巴尼亞鐵托分子的審判案說明，從一九四三年起，南斯拉夫鐵托分子就一直實行着敵視阿爾巴尼亞人民利益的政策，他們（當然是在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內部某些分子的協助下）繼續執行着黑索里尼的老牌帝國主義政策。

人數雖少然而英勇無畏的阿爾巴尼亞人民曾經渴筆而起，和南斯拉夫人民並肩對軸

心國佔領軍作戰。他們在新成立的阿爾巴尼亞共產黨領導下組織了游擊隊。早在一九四三年春天，鐵托就把他一個主要特務——依克曼諾維奇（特姆波）——派到阿爾巴尼亞去了；表面上是去和阿爾巴尼亞游擊隊建立關係，事實上是到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內部去建立以科奇·霍克西與潘吉·克里斯托為首的機密的鐵托分子反對派。鐵托分子奪取阿爾巴尼亞黨的控制權的努力就是從此開始的。

鐵托分子對阿爾巴尼亞愛國者的事情進行干涉的第一個階段就是控訴以恩維爾·霍查為首的阿爾巴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於民族主義者的組織「巴利·康比塔爾」的態度是機會主義的。這個由阿爾巴尼亞反動封建貴族組成和領導的組織以民族解放運動的姿態出現，實際上是拖住人民的腳，不讓他們參加人民解放軍（阿爾巴尼亞游擊隊）去抵抗軸心國佔領軍。但是「巴利·康比塔爾」隊伍裏面有着很多誠實的只是誤入歧途的阿爾巴尼亞愛國志士。

阿爾巴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目標首先是要把「巴利·康比塔爾」裏面的真正愛國者爭取過來，使他們脫離那些反動的領導者。然而鐵托分子要求對整個「巴利·康比塔爾」立即採取直接行動。這種政策表面上好像是「左傾」的，事實上只是幫助了意大利黑衫黨人。這些黑衫黨人正在努力推動這個組織對南斯拉夫游擊隊採取直接行動。

鐵托分子對阿爾巴尼亞的陰謀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比拉特代表大會上有了「新的發展」。以科奇·霍克西與潘吉·克里斯托為首的阿爾巴尼亞鐵托分子集團在會上提出了使

阿爾巴尼亞從屬於南斯拉夫，使阿爾巴尼亞加入以鐵托南斯拉夫為中心和領袖的「巴爾幹聯邦」的政策。

與此同時，發動了一個極力反對恩維爾·霍查及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其他領袖的宗派運動。科奇·塔克西，和他的榜樣蘭科維奇一樣，在阿爾巴尼亞共產黨裏面盤據着組織書記和內政部長這種舉足輕重的地位。阿爾巴尼亞其他鐵托分子也在黨和政府裏取得了重要地位——潘吉·克里斯托在國家監察委員會裏，其他的人有的在共產黨宣傳部，有的在新聞界或內政部。真正服膺共產主義與國際主義的幹部則受到攻擊、迫害，從重要職位上被排擠出去。工業部長，計劃委員會主席和黨的政治局委員納科·斯皮魯受鐵托分子誣告逼得自殺。雖然他們還不敢公然攻擊恩維爾·霍查將軍，他們却竭盡全力破壞他的影響和聲譽，檢查他的信件，把這些信抄下來送給南斯拉夫鐵托分子的秘密警察組織「奧茲納」。所有對南斯拉夫殖民計劃進行任何方式的抵抗的愛國志士都受到殘酷無情的迫害。

同時，阿爾巴尼亞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在殖民地化。一種南斯拉夫式的馬歇爾計劃，以關稅與通貨協定，組織「合營公司」，經濟計劃互相配合等為幌子，在阿爾巴尼亞實行起來了。南斯拉夫所允諾的二十億里克的貸款一直沒有兌現。「合營公司」的利潤都被南斯拉夫佔為己有。南斯拉夫技術人員在偵察和破壞阿爾巴尼亞工業的發展。南斯拉夫要在阿爾巴尼亞駐紮一師軍隊的要求也提出來了。這個要求被拒絕以後，又提出

了統一軍事指揮的要求。

同時，科奇·霍克西正煞費苦心她想按照鐵托分子的榜樣改組阿爾巴尼亞的黨；和南斯拉夫一樣使黨員身份隱蔽起來；使黨溶解在民主陣線裏。暗殺恩維爾·霍查和其他反抗鐵托分子政策的真正共產黨領袖的計劃也在開始進行。

聯共(布)和共產黨情報局其他各國黨的警惕性使阿爾巴尼亞得免於難，並消滅了阿爾巴尼亞的鐵托分子。他們在一九四八年年中公佈了關於南斯拉夫的決議，使所有真正的共產黨人覺醒起來：認清他們國家所面臨的危險。

### 情報局決議以後

一九四八年年中共產黨情報局公佈了關於南斯拉夫的決議；這使東歐各國共產黨人和全世界共產黨人都對鐵托分子提高了警惕。

就鐵托集團來說，這個決議的公佈迫使他們在尤天化日之下，雖然不是立刻，但是逐漸地顯露了原形。

起初，鐵托分子發誓賭咒表示他們對蘇聯的忠誠，抱怨說他們被冤枉了，而以季米特洛夫和拉科西等東歐其他各國共產黨領袖作爲他們攻擊的目標。例如，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三日由鐵托和卡德爾署名的給聯共(布)的信(答覆聯共對南斯拉夫共產黨政策的批

評)說:

「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要消除對於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蘇聯共產黨的同志和兄弟般的忠實感情的純潔性的任何懷疑和不信任。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一直領導着我們而且將來也會引導着我們，對此，我們將永遠感謝蘇聯共產黨。這是對過去和將來都是我們偉大榜樣的蘇聯的忠誠。蘇聯對於我們人民的幫助是我們極度銘感的。」

如果今天有人說這樣的話，他就會因「共產黨情報局主義」罪名被判長期徒刑，即使不是更爲嚴重的話。

鐵托分子在用虛偽的面紗掩飾自己的反蘇政策時，很快就對其他人民民主國家開始進行攻擊了：

「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必須着重指出，某些人民民主國家的黨和政府機構曾經進行過一系列的無緣無故的攻擊，這些攻擊對於南斯拉夫人民是一種侮辱。……」（「戰鬥報」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的聲明）

鐵托分子同時也開始對拉科西和季米特洛夫（直到他逝世爲止）等共產黨領袖進行最惡毒的誣蔑。

鐵托分子策略的第二階段就是：一方面開始對蘇聯與聯共（布）進行攻擊，一方面努力把事情說得好像斯大林並不同意情報局對鐵托的批評，應該對這件事負責的是日丹諾



夫等等。他們故作姿態地向斯大林呼籲，要求斯大林「出面反對共產黨情報局的謬言」。但是這種姿態，這種無恥的詭計是沒有活動餘地的。全世界都十分清楚：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包括它的領袖斯大林，都一致批評鐵托分子的政策。第三階段很快就到了。

在這個階段裏，鐵托分子開始明目張胆地誣譏和攻擊蘇聯和聯共（布）的政策，誣譏斯大林，說他叛變了列寧主義。到一九四九年年中，鐵托分子就打出了他們真正的招牌，說起話來公開使用托洛茨基主義的陳腔濫調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鐵托分子共產黨的五一節宣言痛罵「來自蘇聯與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對南斯拉夫的攻擊」。雖然他們仍然用左的煽動詞句提到「帝國主義的危險」，他們却攻擊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說它們是「世界工人愛好和平的民主運動的鬥爭進一步勝利向前發展途中最嚴重的障礙」。這種煽動已經日益無力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底，鐵托分子統治下的南斯拉夫軍隊裏的「共產黨」組織的政治部就在宣傳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反革命鬥爭」。一九四九年七月，德吉拉斯攻擊蘇聯，說蘇聯是南斯拉夫的「新創者」（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南斯拉夫通訊社）。鐵托分子的假面具已揭開了。

一九四九年年底，在拉伊克和科斯托夫審判案暴露了很多事實以後，鐵托分子的頭目和鐵托分子報紙就開始對蘇聯進行毫無保留和徹頭徹尾的誣譏。一九五〇年他們走到了最後一個階段——成了西方帝國主義的公開鼓吹者。

鐵托逐步引誘東歐人民離開蘇聯的醜惡的計劃就這樣失敗了。鐵托分子被暴露出

來。他們一步步地被迫在光天化日下顯露出他們反蘇陰謀家、帝國主義代理人的原形。而在他們一旦被迫顯露原形以後，雖然他們仍然是帝國主義的危險武器，但是由於聯共（布）的政治智慧和警惕性，主要的危險是過去了。

## 結 論

拉伊克、科斯托夫與霍克西等審判案揭露了一九四八年年中共產黨情報局通過決議時尚未真相大白的事實。它們說明：決議中所批評的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鐵托分子領導者的虛僞政策——反蘇態度、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歪曲共產黨的作用與組織、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等——並不是一種可以用自我批評認識自己錯誤的方法來糾正的錯誤政策。

審判案說明：這種虛僞的、災難性的政策是主要的鐵托分子，如鐵托自己、卡德爾、德吉拉斯和皮雅傑等蓄謀已久的故意制定的政策。這是在一段長時期內取得了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並在英美帝國主義指使下企圖利用那些地位來恢復東歐的資本主義，把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帶上西方帝國主義的軌道，使它們從屬於西方帝國主義的托洛茨基分子與桃繪者所實行的蓄謀已久的政策。

這幾次審判案對於全世界共產黨人、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和進步人士都是一種嚴厲警告。這種警告用最迫切的詞句使他們了解到需要提高警惕：需要永遠記着階級敵人是一

秒鐘也不會閒着不動的；資本主義不但公開活動，暗地裏也活動；主要的帝國主義集團會毫不停息地採取一切手段來推翻勞動人民取得了政權的國家。

他們可以帶着一種新的迫切的感覺來重讀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聯共（布）莫斯科委員會活動分子會議上講的寓意深刻的話：

「如果以為國際資本會讓我們安安靜靜那就太蠢啦。不，同志們，事情不是這樣的，階級存在一天，國際資本存在一天，它就不會若無其事地瞧着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發展下去。……這二者是不可得兼的；要就是我們繼續奉行革命的政策，把全世界無產者與被壓迫者團結在蘇聯工人階級周圍——那麽國際資本就會千方百計地阻撓我們前進；要不我們就得放棄我們的革命政策，同意對國際資本作若干原則性的讓步——那麽國際資本大概就不會反對『幫助』我們，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蜕化成一個『美好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十一卷；第五四——五五頁。）

審判案說明：鐵托分子已經放棄了革命的政策，他們正在接受國際資本的「幫助」，使他們的國家蜕化成一個資產階級的國家。在帝國主義者的夢想裏，這個國家的任務就是幫助他們扭轉整個東歐的歷史。

### 第三章 勞工運動裏的間諜和特務

「這簡直是駭人聽聞」，資本主義的報紙羣情鼎沸地喧噪起來。「你以為我們會相信這種陰謀嗎？這都是集權國家秘密警察的捏造，是他們爲了掃清道路上的一切障礙而編的托詞。」

「絕不可能！」右翼工黨領袖們隨聲附和地說，「西方民主國家會製造這種陰謀？簡直是令人不能置信的。」

資本主義國家裏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之一就是模糊工人的階級覺悟。社會民主黨關於國家的中立性的理論目的就是要把解除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軍的武裝。作爲這種從精神上和政治上進行解除武裝工作的理論的一部分，右翼工黨領袖們企圖使大家相信（特別是在英國）勞工運動中的間諜、特務和挑撥者是和「英國民主傳統」大相逕庭而且毫不相干的東西。這種事也許可能在東方發生，但是在西方民主國家裏是不可能發生的。

然而事實如何呢？事實上，勞工運動裏大規模使用勞工間諜和挑撥者的始作俑者正是英國資本主義。英國的資本主義國家一直不斷在使用着勞工間諜和挑撥者，雖然它使用這種人的手法來得比較巧妙，有伸縮性、虛偽和詭譎。今天在使用勞工間諜和挑撥者

的國家中間首屈一指的要算是美國了。美帝國主義已經成爲在勞工運動中進行間諜活動的一切卑鄙醜惡手段的最主要的使用者。它不但用這些手段來對付本國的組織，而且還用來對付全世界工人階級和進步運動。美國承擔了英帝國主義的一切最狡猾的手段和帝國秘密警察的一切最殘暴的手段。

事實是這樣的：資本主義使用間諜和挑撥者來滲透、破壞和挑撥勞工運動。自有勞工鬥爭以來就有這回事，其範圍和資本主義的邊境一樣廣闊。事實上，一切資本主義壓迫的公開的露骨的手段——警察、軍隊、反動報刊、法西斯暴徒和警備隊員——和資本家通過間諜和特務從內部來對工人階級和進步運動組織進行滲透、偵察和破壞活動的秘密的隱蔽的努力是相輔相成的。

鐵托大陰謀不過是資本家對工人進行階級戰爭的醜惡傳統的繼續發展而已。在資本主義總危機加深的現階段，這種傳統在詭譎和欺騙方面達到了新的深度，在組織上也達到了新的規模。

### 勞工運動中的暗探——英國資本主義的傳統

英國勞工運動中最初使用暗探和挑撥者的情形在自由主義歷史學家約翰·勞倫斯和巴爾巴拉·哈蒙德的著作中已經詳細加闡述，在「一七六〇年至一八三二年的城市勞動

者」和「一七六〇年至一八三二年的熟練勞動者」兩本書裏面，說得尤其詳細：

「有一種危險是產業地區的工會工作者很少能倖免的，這就是工會委員會裏面的潛在敵人……凡事情沸騰或上層階級驚惶失措時，使用暗探是司空見慣的事；在北部與中部某些地區，暗探已經成了正常的司法機構的一部分。」（「城市勞動者」第十二章。）

喬·道·霍·柯爾在「英國工人階級運動簡史」這本書裏面，也說明了暗探和挑撥者的使用，如何成爲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葉英國政府對付激進派運動和日益發展的工人階級運動的主要武器之一的經過。法國大革命以後——他寫道——：

「（英國）發動了大規模的間諜運動；告密者和警察暗探被安插到大部分激進派組織中去。這種手段在蘇格蘭應用得最廣泛，不過很快也就傳遍了英格蘭。」（「英國工人階級運動簡史」第三章。）

關於暗探和特務如何被用來作爲對工人階級進行鎮壓的比較公開的手段的輔助這一點，他說：

「皮特實行這種鎮壓政策的措施是計劃得很周密的，我們已經看到他是用什麼辦法把通信會都斬盡殺絕，甚至消滅了整個一代的中產階級的改革運動的。法律

上的追害，加上暗探和告密者的作證，以及接受國家津貼的反宣傳的支持，就足以達到這種目的了。但是工廠和礦山則需要用更厲害的手段才能壓得住。政府在他所發現的每一個工人階級團體裏都派有暗探，告密者以至於挑撥者，去破壞早期的工人階級運動，使每個人都不知道他的鄰人是否可靠；此外，政府還建立了一支強大的武裝部隊，用來應付一切動亂的徵兆。」（見前書第四章）

哈蒙德夫婦在研究現有的內政部文件時，發現第一次提到反勞工的告密者和暗探的時間是一八〇一年。從此以後內政部文件中（僅就已經公諸於世的那一個時期來看）就充滿了這一類的記錄。

從這樣一個無可疑疑的來源，他們就可以看出內政部本身許多坐鎮在產業地區的軍官、成批的法官和他們的書記員（如見名遠揚的波爾頓的弗萊徹，斯塔克波特的勞埃德或蘭開夏的梅氏等）經常使用暗探和告密者對付工人特別是工會組織的情形。

這些密探都是從人類的渣滓裏面揀出來的。很多人過去是罪犯，被警察利用各種各樣辦法控制在手裏。他們毫無實據地敘述被當作確實可靠的證明。一八一三年，由於一個聲名特別狼藉的特務的毫無實據的證明，有五名工人被判終身流放。當時這些特務拿的報酬已經是非常優厚了。這裏是哈蒙德夫婦從內政部文件（內政部四二一、八三號）裏面找出來的一份賬單。這是法爾頓的弗萊徹交來的自一八〇五年七月八日起至是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止使用勞工間諜的費用賬單，看上去和美國拉佛列特委員會在約一百三十

年後從勞工間諜組織中抄出來的文件完全一模一樣。

	磅	先令	辨士	磅	先令	辨士
「布·時」……	九	五	〇			
費……	一七	二	一一			
斯				二六	七	一一
特·時……	四	一三	〇	四	一一	〇
費……	四	八	六			
勒·弗·時……	一八	八	〇	九	〇	六
費……	四	一八	〇	二二	六	〇

六三磅五先令五辨士

到一八一六年，這個地區在半年以內用在勞工密探和特務方面的費用增加到了二二六鎊（內政部四二·一六〇號）。

● 表上第一個「布」「斯」等是特務姓名代號。第二欄「時」指這個特務進行活動時所耗時間，應得報酬若干。「費」指他在進行活動如收買、賄賂時的用費。——譯者



當局非常注意掩飾和保護他們的勞工間諜。他們不願意把這些人提到法庭上去作證，因為一旦「使用」以後，這些密探就變成了廢物。例如一八一四年諾丁漢城詩記官科德漢先生曾經反對把他的一個密探帶到法庭上去，他的理由是希望使「我們情報來源保持純潔並不受污染」（見漢蒙德夫婦所引內政部文件第四二·一三七號）。波爾頓區的弗萊徹上校四月三十日（一八一二年）寫到另一羣勞工間諜時說：

「我們很不願意提出這些證人，因為我們寧願用一個影子來掩飾我們的情報機構，也不願把來源暴露在天化日之下。」（「熟練勞動者」第十章。）

由此可知，首先便利用密探、特務、挑撥者滲透，偵察和從內部破壞勞工運動的辦法成爲一種熟練的手段的就是英國的資產階級。

「有了像愛塞斯頓一樣輕信人言和像勞埃德或梅氏一樣專橫獨斷的地方當局，有了像席德茅斯這樣把每一個窮人都當作雅可賓黨人的內政大臣，就有一種以間諜爲基礎——而又有各種引誘使這些間諜捏造事實和縱容他們犯罪——的偵探系統給工人的日常生活帶來一種朝不保夕的不安感覺，使他們懂得在威利利誘面前保持榮譽和忠誠。每一個爲增加工資或幫助同志而組織的小團體都處在俄國革命團體所處的那種空氣中。……」（「城市勞動者」。）

現在讓我們看看英國勞工和進步運動員上由特務和挑撥者一手製造的幾次比較臭名昭彰的審判案。

一八一七年六月，改良黨的傑出黨員詹姆士·華生在皇家法庭上因叛國罪被提起公诉。他曾經和著名的一演說者「亨特和別的一些人負責向攝政王呈遞了一份重要的請願書。請願書被拒絕了。消息傳出時，一八一六年十二月二日在倫敦斯巴菲爾德舉行了羣衆大會。會上有人發表了一些激烈的演說（雖然並不是華生講的），發生了若干騷亂情況。當晚華生即因叛國罪被捕。原告方面的主要證人是一個叫約翰·卡斯爾的人。一個潛入人民運動、因言論激烈而獲虛名的告密者。審訊過程中，卡斯爾的卑劣品質被揭露出來了，他曾經兩次因造假鈔票罪受審，並且有重婚罪和其他罪名。連市陪審官也無法包庇這樣一個人。因此華生才得無罪獲釋。

同年，在所謂德比郡暴動案中，暴露了密探奧利弗這個惡名昭著的人物所起的作用。哈蒙德夫婦在「熟練勞動者」一書中生動地描寫了這個人的一生和他的毒辣行爲。奧利弗，又名理查茲，又名霍布斯，是一個勞工閒談、挑撥者、重婚罪犯和民事犯。他的一生是英國工賊史上最醜惡的一章。

一八一七年，他攜帶着偽造的激進黨領袖的介紹信在周遊全國，在比較穩健的改良者的圈子裏自稱爲要求改良的大請願的組織者之一，在比較左傾和激烈者的圈子裏就自稱爲準備武裝起義的倫敦「實力」集團的代表。他帶着白廳的文書（內政部文件第四

二·一六五號）交給經過選擇的極少數「可靠」的法官和權威人士——北明翰法官、萊斯特市長、賓恩將軍和北明翰教區法官。但大部分法官都只曉得他是一個極端激烈的煽動家。他的身價之高使得很多地位崇高的人都不能與聞共密。（可是，在一百三十年後的今天，據稱英國間諜機構實際上已不可能在一個可靠的小圈子裏保守鐵托陰謀的秘密了！）在設菲爾德一個法官打算逮捕他的時候，內政部就驚惶起來，內政大臣唐德茅斯爵士在五月三十一日寫信給法官帕克爾先生說：

「奧利弗是我僱用的人。此時此刻，他是在我的指示下周遊各地的。我有理由相信，他的性格與能力會使他在目前情況下大有用處；因此，我頗為焦灼地等待着以後的消息。如果得知他並未遭受逮捕，我將大感寬慰。」

這個人的確是「有用」的。他一方面號召德比郡的工人武裝起義，一方面就跑去告密。一八一七年十月十六日有三十五位工人被帶上法庭。就如哈蒙德夫婦寫的那樣，他們的罪名是「被魔鬼的教唆所引誘和打動」，準備進行反對國王的戰爭，並圖謀廢除國王。控訴的言語之中很帶有冷酷的諷刺味道。三人被處絞刑了，其他的人被處終身流放或長期監禁。威廉·滕納（被處決者之一）在絞刑台上的最後一句話是：

「這是政府和奧利弗做的事！」

當諾丁漢市書記官和地方法官之一要求內政大臣准予查閱奧利弗報告時，唐德茅斯爵士回答說：

「英王陛下政府的否認是掩飾已成過去的騷亂情況。」

要在這一章裏面爲其後一百三十年中英國資本主義使用特務的事寫一篇詳盡的歷史是不可能的。這是勞工運動歷史學家的任務，爲了粉碎保守黨和右翼工黨歷史學家粉飾真相的努力，這也是必將做的。不過資產階級國家用暗探和告密者來反對勞工和進步運動在過去的英國歷史上並不只是唯一的一章醜史。

剛剛相反。在臭名昭著的一八二〇年卡托街「大陰謀」案裏也可以發現特務參與其事。據說當時，發現了一個暗殺內閣的「魔鬼的陰謀」。這個消息使英國大爲震動。後來事情一天比一天清楚，煽動這個陰謀的原來是挑撥者愛德華，武器也是由他供給並且由他仔細周密地分佈在那些他打算出賣的人的家庭裏面去的。五個人上了絞刑台，四名終身流放。但是這位罪魁禍首，告密者愛德華，却「一直沒有露面」。

我們可以看到在對付憲章派的時候，警察特務和挑撥者也極爲活躍。一八四八年八月四日，倫敦警察發現了一個「憲章派的龐大陰謀」。他們對很多憲章派的集會場所進行了搜捕並且找到了武器。主要證人都是警察告密者，其中一個叫波威爾的承認他曾經一鼓勸和煽動這些人以便告發他們。五個工人被判終身流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漸趨結束時發生的醜惡的惠爾登案裏面也可以看到特務和告密者

的活動。那時有一個積極反對戰爭的家庭被加上準備毒害勞合·喬治的莫須有的罪名。後來逐漸發現原來是一個政府僱用的挑撥者利用陰謀詭計取得了這個家庭的信任，他假裝著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建議他們使用各種暴力方式來反戰，可是遭到了拒絕。最後終於設法把他們牽累到這個捏造的事件裏去——爲要求給帝國主義戰爭供給人力和軍火的沙文主義運動火上加油。

我們發現警察特務和挑撥者也被用來偵察和破壞全國失業工人運動協會所領導的失業者的偉大的富有戰鬥性的運動。失業工人運動領袖漢寧頓在「失業工人的鬥爭」這本書第八章（警察特務與挑撥者）裏面講到他在自己經歷中遇到的一個特務。這個特務在一九二二年設法鑽入反飢餓大進軍指揮委員會。他引起了人們的懷疑，因爲「他一再揚言他比任何別的人更爲革命」，他建議進行向郵筒裏投引火物等一類的行動；這樣，就正好供給了警察最迫切需要用來誣陷和迫害參加反飢餓大進軍者的材料。在失業工人鬥爭和反飢餓大進軍的全部歷史裏都充滿着特務和暗探的活動。（參看漢寧頓「失業工人的鬥爭」與基德「英國自由在危險中」（一九四〇年）第五章「警察」。）

現在，一九五〇年，軍事情報局第五處和各種各式秘密警察和諜報人員的機構都和從前一樣活躍。他們努力鑽到戰鬥性的勞工運動特別是共產黨裏面去進行偵察和內部破壞工作。

當然，有一段相當長的時期，英國帝國主義曾經利用它從對外貿易的壟斷和它在殖

民地的投資所獲得的超額利潤收買工人的上層，從而遏止了英國勞工運動的革命鬥爭；它曾經以社會民主主義作為阻止工人進行戰鬥性的鬥爭的主要武器。但這絕不是說，它就解散了勞工間諜和挑撥者的組織。相反地，當英國工人暫時受到從殖民地剝削果實裏面抽出來的賄賂的阻礙時，一切偵察、挑撥、滲透的武器都加強了十倍，並且被用來反對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英國當局對於愛爾蘭、印度、緬甸、錫蘭、非洲及其他各地的工人和人民進行偵察和挑撥的故事是罄竹難書和極為醜惡的。在被英國帝國主義發展到最高度（或最卑劣的程度）的壓迫殖民地的全部「藝術」裏面，除了賄賂收買和公開鎮壓等武器外，偵察和挑撥等武器一向起着主要作用。

英國本土的國家機構也從來沒有放下武器。相反地，就是在工黨政府時期，它也發展了它用來對付工人階級的武器，使之更趨於完備。在階級鬥爭暫時平靜時期，特務和間諜就「悄悄地」進行他們的工作。他們偷聽電話，檢查信件，密報開會情況，編列名單，記錄各種活動。他們努力偽造革命理論，發展敵對性的小宗派組織，鼓動私人糾紛，組織內部破壞。在行動激烈和階級鬥爭尖銳化時，國家的偵察和挑撥機構就更公開地投入戰鬥了。

最近這一個時期，在爭取和平的羣衆運動和要求提高生活水平的工會鬥爭開始行動起來的時候，軍事情報局第五處和其他類似組織的活動更大為發展了。不僅共產黨內部有他們活動的消息，且工黨和工會內部也有。一九五〇年年底，倫敦警察廳（蘇格蘭場）

設立了一個特別小組，專門調查富有戰鬥性的工會工作者的活動，這件事引起了英國報界廣泛的議論。在碼頭工人中間和任何由於工人的戰鬥性而發生了非正式罷工的地方，這些人都特別活躍。

一部分反動報紙甚至於公然號召在共產黨內部加緊使用暗探和挑撥者。因此，「瑪克西姆」在「觀察家報」（一九五〇年五月三日）上寫的「注意共產黨人」這篇文章中，也號召要招募「以前的」或動搖後退的黨員來擔任這種警察工作。

「有些人一度曾是黨員，在脫黨和被開除以前曾經擔任過黨內重要職務。對於治安當局幫助最大的是差不多已經決心脫黨但是還沒有採取最後那一步的人。如果能給他若干鼓勵，那他不是說願意延緩一步了嗎？」

年復一年，大批款項繼續撥給秘密情報機構。這筆賬是從來沒有公開過的。到一九五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的一年的民政預算中在「中央政府與財政」這一項下面有一條毫無說明的第二十一款：「皇上對外及其他秘密機構費用」——四百萬鎊。比前一年增加一百萬鎊。誰都知道，英國秘密機構，無論是「對外」還是「其他」，今天都是以爭取社會主義與和平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主要對象的。

用暗探和挑撥者來對付勞工運動對於英國傳統講來完全不是陌生的事。這是英國資本家奉行已久的傳統的一部分；而且已經被英國資本家整理成爲一種周密然而醜惡非常的藝術了。

## 美國——密探的國家

如果說首先大規模使用暗探和挑撥者對付勞工運動的是英國；如果說這些活動在法西斯的「奧夫拉」<sup>(1)</sup>和「蓋世太保」手裏進行得更瘋狂，那麼現在承襲這種醜惡藝術裏一切最惡劣最令人厭惡的衣鉢並且變本加厲地加以使用的就是美國帝國主義。暗探、挑撥者和告密者的使用已經成爲「美國生活方式」的不可分的一部分。

一七九八年，托馬斯·傑弗遜的朋友愛德華·利文斯頓斥責即將爲阿當姆斯總統的聯邦主義者的政府訂爲條例的「外國人與煽亂法案」時說過這樣預言性的話：

「告密者、暗探、煽動家和在國內政權的羽翼下培養出來的一切奇臭無比的奴才勢將充斥全國……最無可懷疑的家庭、親密的友誼、或家庭休隱之處都毫無安全可言。你最可靠的同伴，你所相信的朋友，侍候你起居的家僕都很容易出賣你偶爾不慎的出於無心的傻話；曲解你的話，用誹謗加以歪曲，把它們帶到秘密法庭上去——在這個法庭上嫉妒佔着統治地位，恐懼担任着原告，懷疑是唯一可以聽到的證據。」不過這種嚴厲警告和腐朽的反動的美國警察國家過去三十年來的所作所爲比起來還

① 奧夫拉 (O.V.) 是意大利墨索里尼的特務機關。——譯者



未免過分溫和。奸細和密探等奴才加上腐敗和野蠻的警察，已經成爲現代美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們這裏談的是對美國本土的普通的、進步的、安分守己的公民所進行的——而不是在「東方」國家裏面進行的——行動與活動。

我們第一次認識美國密探之王，現任美國聯邦調查局長約翰·埃德加·胡佛的面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瘋狂搜捕運動中。一九一八年十月，正當搜捕浪潮的高峯，美國國會通過了表面上用來對付外籍公民的「驅逐出境法案」。翌年，司法部調查局成立了聲名狼藉的「反激進活動司」，由埃德加·胡佛指揮。

很快我們就看見了這個司活動的情形。用檢察長帕麥爾自己的話來說，我們看見它建立了：

「一種卡片索引制度，包括二十萬以上的卡片，記載着不僅有與極端激進運動相聯系的個別煽動者，並且有關於各種組織、協會、社團、出版物和某些地區特別情況的詳細材料。」

在挑撥者和警察走狗協助下，他們發動了一次反對勞工和進步運動的恐怖運動。一九一九年年底（參看紐約李爾出版公司一九五〇年出版的艾伯特·埃·康恩著「反人民的陰謀」，司法部調查局副局長弗蘭克·伯克對美國全國聯邦情報人員下了一道緊急而且極度機密的指令，通知他們司法部將對「共產黨人」和「激進分子」實行一網打盡的一系列搜捕。他們奉令動員埋伏在「共產黨團體內部」的全部特務盡一切努力使這些

組織在指定的那天晚上開會。伯克是這樣說的：

「假如可能，你們應與你們暗藏的告密者佈置好，使共產黨與共產主義勞工黨在規定的那天晚上召開會議。……這當然會便利逮捕的執行。」（艾伯特·埃·康恩：「反人民的陰謀」第一頁。）

在這以前的整個春夏兩季，這個反勞工的「攻勢」計劃就已經計劃好了。數以百計的暗探、特務和告密者被派遣到勞工和進步組織裏去。司法部的暗探不惟奉令隨時注意「顛覆性」的文件，而且，在很多情況下，自己印這種文件來栽贓，讓警察在搜捕中查出來。

這次進攻以一九二〇年六月的大搜捕為頂點。六月二日在七十個城市裏一舉逮捕了一萬多人。特務在這次「攻勢」的準備工作中扮演著主要的角色。

「這一行動的到來雖然帶着戲劇性的突然性，但却是經過仔細規劃、研究和系統化了的。……好幾個月來，司法部人員已經拋開其他一切工作，集中精力在赤色分子身上。特務們悄悄地滲入了激進的隊伍……有時扮做遼遠礦區的廚子，有時扮做鋼鐵工人，或者遇到機會，甚至裝作最激烈的煽動者，進行着工作。……有一些潛藏的特務們設法在激進運動中取得更高的地位，而且至少在一個事例上，竟成爲一區中公認的領導者。……」（一九二〇年一月三日「紐約時報」。）

在這整個時期裏，司法部調查局的工作和美國大企業公司的勞工間諜機構有着最密

切的合作——這是同一階級反對同一階級敵人的兩種武器。教會間世界運動調查委員會在它關於一九一九年鋼鐵業大罷工的報告裏說：

「聯邦移民當局向本委員會證述，爲了『激進主義』等等的搜捕，會根據鋼鐵公司密探的告發與報告而特別在匹茲堡區域進行過，並將被捕的人解交司法部。」

（「反人民的陰謀」第二七頁。）

匹茲堡區一個聯邦調查局特務在向該委員會作證時說：「所有被捕入獄的激進分子百分之九十是由一個鋼鐵業或煤業的大企業公司所密報的。」

後來因公衆的抗議和怒吼而舉行的調查迫使那些對這些暴行負責者當衆作證時，才發現那些據說是爲了反對外國間諜而製訂的法律，和反動分子及其報紙所煽起的瘋狂情緒，都是爲了進攻戰鬥性的工會和勞工運動這個唯一目的而使用和製造出來的。連檢察長帕麥爾在美國衆議院規則委員會作證時也不得不承認這是在放逐不受歡迎外僑出境的烟幕後面隱藏着的真正目的。

「因爲我老實對你說，主席先生，我認爲這個驅逐出境條例不僅僅是把幾個罪犯或宣揚危險理論的誤入歧途的過激派送出國去聊示懲罰的問題，而是一個運動，反對的是……一個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

帝國主義國家爲了造成間諜恐怖和對「赤色分子」進行搜捕而組織的特務和挑撥者，被用來進攻一切戰鬥性的工會工作者，進攻所有的自由主義者、民主派、愛好和捍衛民

主與和平的人士，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

由於資本主義傳統的美國政府使隱蔽地滲透、從內部偵察勞工運動的工作和從外部進行的公開的警察鎮壓結合起來。德國秘密警察用不着走出西方「民主國家」的範圍就儘可以學到一套方法。一九二九年，胡佛總統任命組織了一個以另一共和黨總統在華爾街的夥伴、前檢察長喬治·吳·威克沙姆爲首的全國執法守法委員會。退伍的警察訪員和威克沙姆委員會調查員埃·伊·賀浦金斯先生在「我們無法無天的警察」一書中總結這個權威性委員會的調查結果時這樣說：

「威克沙姆委員會發現，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〇年間發生的各種各色案件裏，曾有嫌疑犯忍飢挨餓，晝夜不准睡眠，禁閉在漆黑窒悶的地下室的情形；他們飽嚼拳頭、木棍、酒瓶、橡皮水管、電話簿、皮帶、鞭子的毒打；他們的脛骨、膝蓋下（在試樣蓋反應處）、小腹上、喉頭、臉龐、頭部、肩胛、腎囊、腎部和腿都遭到毒打；他們的脛骨、身軀、鼠蹊部受到腳踢；他們的手臂被曲扭，睾丸被曲扭和壓榨；他們受到催淚瓦斯、煙孔放大注射和哥羅仿的茶毒；他們被迫撫摸死屍，攪拌認屍所裏面被謀殺者屍體的手；女人被拉着頭髮拖起來，有一次，一個男子被平放在地板上，好幾次被抓住生殖器拉起來。

「這是在憲法頒佈後一百四十年到一百五十年間——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〇年間——的現代美國發生的事，目的是使人「自動」承認罪行。」

一九三七年，美國舉行了參議院教育和勞工委員會小組委員會（一般稱之爲拉佛列特公民自由權委員會）關於公民自由權和勞工間諜問題的著名審訊。記錄全文約三十餘卷，是由美國政府出版的（價格頗不便宜）。

被傳訊作證者有一位全國勞資關係局的產業經濟專家赫伯·卜蘭克霍恩先生。二十年來他一直在研究勞工間諜問題。這位先生交給這個委員會一份名冊，上面所列的機構專供給資本家僱主以偵察、破壞、腐化和誣陷他們工廠裏的工會的去狗來漁利。例如一九三六年四月有二百三十個這樣的機構，以每人平均月薪一百七十五元的代價僱用告密者和暗探約五十萬人。其中平克頓、彭斯和迪耶爾這三家最大的組織一共租出去四萬至十三萬五千名特務。例如，通用汽車公司的職員在訊問中作證說，僅在一九三四年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七月之間，他們付給平克頓這一家機構的錢就達九十九萬四千八百五十六元（六角八分）。一位勞工領袖對調查委員會說他從來不「知道有一個大得足以稱得上會議而又小得連一個暗探都無以容身的集會」。這個委員會報告說，「利用這些機構作間諜工作的公司，已知的總數近二千五百家。全部名單看起來像一本美國產業藍皮書。」

滿肚子不願意的僱主和壓臉狠狼的間諜機構頭子被迫把他們的特務和告密者的記錄、總名單和使用費數字等交給該委員會。他們使用美國廣告術上的一切花招和計謀來鼓吹自己那個牌子的暗探。「你有一個工會——我們會破壞它。你要暗探，我們有最好

的貨色。」這裏是佛斯特產業偵探寫給一個有希望成爲他們顧客的人的典型的信：

「七月二十八日來信收到了。……」

「第一，我可以說：假如在僱工尚未組成任何工會或組織以前就僱用我們，那就不會有罷工和騷亂。這並不是說就不會有工會組成，但確實可以說我們將會控制工會的活動並指導它的政策，只要我們的委託人肯讓我們自由行動。」

「第二，如果工會已經組成，然目前尚未罷工，預計三十天至六十天內也不會宣佈罷工，雖然我們所處的地位和前面的情況不同，但我們可以——並且我相信可以成功地——實行一種巧計，結果會造成分裂、不和、負責人的辭職和會員的普遍減少。」

這些密探偽裝作積極的工會工作者數以百計地鑽營到產業工會聯合會、美國勞工聯合會和鐵路兄弟會——美國三個主要工會組織——的領導職位。他們一旦得到這些職位，就利用職權進行破壞。有一個被選爲美國勞工聯合會康涅狄克州哈特佛城打字機工人工會地方分會書記的特務，在一年之間「成功地」使該分會會員由二千五百人減少到七十五人。這裏是一個平克頓的特務巴克的供詞的簡單摘要：

參議員拉佛列特：「巴克先生，按照你作爲隱蔽活動者、告密者及暗探的經驗，你對於這種勞工間諜工作破壞或阻止工會——真正的工會——成立的效用或毫無效用有何印象？」

巴克先生：「非常有效，尤其是在我所隸屬的地方分會中。……蘭興——費休廠的人曾經一度幾乎百分之百地組織起來了。最後它降低到，我已說過，只剩下五個職員。」

參議員拉佛列特：「你認為這是暗中活動的結果嗎？」

巴克先生：「是的，我認為是這樣的。」

這些開課機構對他們的特務進行的訓練是很有說明性的。這裏是從全國製造商辛迪加長達二十四頁的「產業工作者函授教程」中摘錄的幾段。

教程第一頁裏面說：

「我們的工作是最光榮的、最人道主義的，並且是很重要的。對於我們的工作必須這樣認識。」

教程第二頁裏面說：

「非常清楚，我們要成功就必須用一種隱蔽方式進行工作。因為如果愚昧無知的普通工人知道工廠裏有我們存在，認識了我們，就容易誤解我們的動機。」

教程第三頁裏面說：

「我們組織的規則和章程禁止將代理人可能接到任何委託的詳細情況的任何消息透露給即使是你的最知心的朋友和家人。」

教程第四頁裏面說：

「記住我們一貫地反對設法引起工人對僱主不滿、猜疑和不友好的一切集團、激進主義者和鴉亂分子。……」

「作為我們的代表，你必須首先發現心懷不滿情緒者，然後和他交朋友，贏得他的信任。

「你必須準備拋棄道德上的顧慮。你必須冷酷無情。你必須視撒謊如家常便飯，常常……你必須圓滑、乖巧、銳敏、機警。……」

從拉佛列特報告裏不厭其詳地敘述的這些間諜機構和特務的工作到派遣特務和暗探到其他國家工人階級組織裏去的工作，是不是距離很遠呢？這裏就是訓練對其他國家特別是工人作主人的國家的勞動人民進行間諜戰的操場。從平克頓的密探到鐵托、科斯托夫和拉伊克不過是咫尺間的事。

從這些活動到搜捕、間諜恐怖、整肅、日益發展的法西斯主義，到一九五〇年的美國，也不過一箭之遙。以十一位共產黨領袖的審判為例來說，原告方面十三個證人裏面有兩名是聯邦調查局的「正規」特務，十名聯邦調查局的便衣特務或與共產主義不共戴天的共產黨叛徒。此外就一無旁證。艾伯特·埃·康恩是這樣描繪幾個原告方面的主要證人的：

「路易斯·弗·布登茲：前『工人日報』總編輯，一九四五年十月離職，加入天主教，寫了一本名『我的絕歷』的陰險的反共書；他還在非美活動委員會及各種



聯邦驅逐出境案中，以共產主義「見證專家」的面目出現作證。……

「威廉·歐·諾威爾」：一個共產黨叛徒，曾經被汽車工人控為福特公司「服務部」哈利·班奈特僱傭的工賊。他一離開福特汽車公司，就當了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吉洛特·勒·克·史密斯，前銀衫黨三二二三號的「種族關係」機要顧問。戰爭結束時，諾威爾成為聯邦調查局的告密者，在若干牽涉共產黨員與左翼工會的案件裏，作為政府證人出現。……

「查爾斯·吳·尼哥但麥斯」：過去是工廠工人，因煽動反對黑人在一九四六年被共產黨開除出黨。一九四八年春，當他因私帶武器「意圖非法傷害」未指名人士的罪名在匹茲堡被捕和被控的時候，尼哥但麥斯曾經承認有罪。接着他被准許撤回這項承認，控告他的狀子亦被取消，大致在同一時期他成為聯邦調查局的一個告密者。

「威廉·庫明斯」：以前是工賊，為聯邦調查局派入共產黨內的告密者。他潛伏在共產黨內時曾經介紹自己的三個親戚入黨。然後又將他們的姓名交給聯邦調查局。

「約翰·維克多·布藍克」：一個潛伏在共產黨內的密探，他曾吸收工人入黨，自己代他們付黨費，然後又把他們出賣給聯邦調查局。在布藍克交給聯邦調查局的人名中，有他自己姐夫的姓名，那人其實從未入黨，但是他的名字被布藍克發在一張

入黨申請書上。」（「反人民的陰謀」第三三五——三三六頁。）

這次審判說明：聯邦調查局的告密者和挑撥者不僅接連不斷滲入美國共產黨，而且不斷滲入一切進步組織——工會、青年團體、「進步黨」（從前是華萊士所領導的）。隨探們不僅正薪很高，而且以「政府見證專家」身份在反勞工案件中出庭作證時還有特別費（有時每天二十五元）。

我們發現政府對於把特務提出來當衆作證這種「使用」方法有着和一百三十年以前就在英國發現過的同樣的憂慮。「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寫道（一九四九年七月八日）：

「它（聯邦調查局）發現它是以犧牲它與秘密社會的聯系作爲代價才取得勝訴。它在紐約審判十一個共產黨人時把七個隱藏在共產黨內的特務送上了證人席，這樣就犧牲了七個特務。而由於在科普朗案中出示檔案的結果，它失掉得更多。」

美國資本主義日益走向法西斯主義。國家一切鎮壓機構現在都在加強，與此同時，也加強了現在被用來反對有進步運動色彩的各個部門的勞工間諜機構。形式是改變了；方法流綫型化了；告密者仍然是告密者！勞工間諜機構的工作在羅斯福總統時代會受限制，但是今天偵察工人運動的工作已被國家接收過去。勞工間諜是第一個被美國政府「國有化」的事業！

聯邦調查局的機構已經發展到龐大的規模。它逐漸從司法部的附屬機關變成政府的一個特殊部門。一九五〇年，它的預算增加到五千七百萬元，約翰·埃德加·胡佛的年

薪加到了兩萬美元。最近聯邦調查局的代表在國會一個委員會作報告時說，這個機構有一萬名以上全日工作人員，並且還需要大大增加；當時它正在進行關於兩萬件「顛覆分子」案件的工作；它的諜報網每天要呈上二十到二百件關於個人的報告。

十一位共產黨領袖之一吉伯特·格林在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的美國共產黨全國委員會全體大會上說：

「總統和國會都更動了，但是約翰·埃德加·胡佛和他的警察國家諜報網却一年比一年更強大和更凶險。」

### 馬歇爾的間諜援助

資本主義在勞工運動內部使用暗探和挑撥者的歷史是自有勞資鬥爭以來就開始了的。凡是有資本主義的地方就有它的特務。

這段簡短的插曲可以無限地寫下去。它可以揭露沙皇政權如何以其秘密警察——沙皇暗探局——為中心建立打入俄國革命運動的秘密特務小組和狗腿子——像曾任沙皇特務達二十年的亞賽夫，他曾經以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委員身份組織恐怖行動，然後對進行這種活動者加以告發，像加邦祖父，他曾經組織工人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一血的「星期日」，向沙皇請願，使工人在聖彼得堡的大街和廣場上血流成渠，像曾經赫沙皇暗探

局頭子祖巴托夫工作過的特務們，像馬林諾夫斯基，他曾經做過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委員和「真理報」的編輯；直到十月革命以後警察檔案落到工人手裏的時候才被揭穿。

在這裏可以進一步揭露兩次大戰之間的東歐國家的獨裁政府及其秘密警察和間諜機構大量使用特務、告密者和挑撥者的情形。例如，波蘭的秘密警察專門訓練滲入共產黨、農民和激進民主黨組織的特務。它曾經派遣十名特務到國際縱隊的波蘭大隊裏去。在南斯拉夫，使資本主義特務工作得到方便的不僅是黨的不合法地位，而且有廣泛的宗派主義。這種宗派主義同時也受到資本主義特務的推動和鼓勵。早期共產黨領袖西瑪·馬爾科維奇和在鐵托以前擔任黨的總書記的戈爾基奇兩人最後終於被揭穿是黨內的暗探。法國工人階級運動裏也會經過陶里奧和希東一類的人。

一九四九年九月底，拉科西在蘇大布達佩斯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工作人員談警惕性問題時告訴他們：在德國勞工運動早期，社會民主黨拉薩爾的信徒如何受到一個名叫薛威徹的特務所領導。薛威徹是最早被選入國會的德國社會黨人之一。老社會黨領袖貝貝爾總感覺薛威徹是一個暗探，然無法證實。當薛威徹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期死去時，葬儀非常隆重。貝貝爾說：「我雖然沒有物證，我肯定這個人是一個暗探。同時我確信這樣的證據早是會發現的，也許是在我死後，但是我在九泉之下也會因為我是正確的而感到高興。」貝貝爾於一九一三年逝世。一九一八年德國革命以後，工人們打開了德皇的檔案，發現了薛威徹作為俾斯麥的特務經常接受津貼的全部收據。

不過這一章的目的並不是替勞工團體寫歷史，而是說明拉伊克與科斯托夫審判案所揭露的事毫無特殊、奇異和懸空臆測之處。使用特務滲入工人階級運動進行內部破壞是自有資本主義以來就有了的。審判案所揭露的間諜和挑撥方法，遠不是「非英」或「非美」的，而是由英國資本主義首先大規模發展，繼而為美國密探國家機構發展到極端的手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資本主義大國の間諜機構不僅使用暗探滲入自己國家的工人階級和進步運動中去，而且還滲入較小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和進步運動中去，這已經成爲習以爲常的事了。資本主義弱國（包括東歐各國）的秘密組織是強國情報機構訓練出來的，並且常常處在它們間接監督之下。一忽兒是軍事情報局第五處，一忽兒是德國秘密警察，一忽兒是美國間諜機構，一忽兒又是法國「第二廳」在發號施令、聽取報告。有些特務走狗，甚至於還有小國家的警察頭目，常常同時從幾個大國方面接受命令（和款項）。在任何情況下，當所有的大國忙於互相偵察的時候，他們對改善機構來偵察和破壞所有國家裏的工人階級和進步運動也都具有同等的興趣。

如果他們在偵察和破壞全世界尚存爲反對資本主義和反動派而鬥爭的工人階級和進步運動方面都是這樣積極，那麼這些大國の間諜機構在滲入和破壞工人作主人的國家——蘇聯——的工人階級運動方面當然更不遺餘力了。從一九一七年十月開始，偵察蘇聯成了全世界每一個資本主義間諜機構的中心任務；——滲入到聯共（布）裏去成了它們的

最高目標。數以百計的白俄受到英國、法國、德國和美國的政治和軍事間諜機關的僱傭。反蘇的憎恨成了資本主義諜報機關的動力。

所有資本主義間諜機構對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裏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叛黨潮流所感到的莫大興趣都是從此而來的。凡是可以在共產黨內部發現潛藏的、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心懷私怨而又對黨隱瞞的集團的地方，帝國主義間諜機關就會對它發生興趣。

「革命運動的歷史說明：對於警察間諜在運動內部進行分裂和政治挑撥活動特別有利的空氣和依據就是以脫離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為基礎的宗派活動。」（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波萊斯瓦夫·貝魯特在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大會上的講話。）

在俄國勞工運動初期，托洛茨基分子還代表工人階級裏面某種一定的派別。這就是說，他們形成了一個集團，有他們自己的政綱和章則，並公開為這個而鬥爭。當然，他們的綱領是反對工人的利益的，是一種極其虛偽的綱領。他們一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及其後的年代裏，都在每一個生命攸關的措施上，在俄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所面臨的每一個重大決議上反對布爾什維克的。

但是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裏，特別是在二十年代後期和三十年代早期，當托派路線在蘇聯共產黨內部遭到徹底的失敗時，他們就不再是一種政治派別。那些仍然留在蘇

聯的托洛茨基分子表面上偽裝接受黨的路綫，暗地裏却開始進行反黨和反革命的工作。他們墮落成資本主義的特務，開始爲各種各樣的資本主義間諜機構工作，陰謀使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使蘇聯在資本主義強國正準備進行的侵略中遭受失敗，在蘇聯工業和農業中組織破壞活動，並陰謀暗殺共產黨的領袖。亡命國外的托洛茨基本人和隱藏在聯共（布）內部的秘密小組保持着密切聯系，並成爲全世界對蘇聯進行破壞和偵察的間諜網的中心，企圖在全世界各國共產黨和戰鬥性的工人組織以及進步的民族解放組織內部組織類似的秘密小組。斯大林在一九三七年寫道：

「現時的托洛茨基主義並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派，而是一夥無原則的和無思想的暗害者、軍事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的匪幫，是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是外國偵探機關所僱用的奸細匪幫。」

「這就是最近七八年來托洛茨基主義演變之無可爭辯的結果。」

「這就是過去的托洛茨基主義和現在的托洛茨基主義之間的區別。」（譯文引自「論黨工作底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分子及其他兩面分子的辦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第一五頁。）

因此，帝國主義間諜機關就竭盡全力招募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秘密集團如布哈林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到他們隊伍中去，用他們自己的經過特殊訓練的特務擴充這些集團。特別是在三十年代，托洛茨基主義變成了一種警察馬克思主義，成了勞工運動裏面

的特務的綱領。在德國和波蘭以及在西方，專搞勞工運動方面工作的警察特務都受到托洛茨基主義的特別訓練。

兩次大戰之間日益加深的資本主義矛盾使帝國主義者的夢想——全世界統一的資本主義消滅蘇聯的夢想——不能成爲現實。第二次世界大戰並不是他們寤寐求之的那種戰爭。德、英、法、美各國間諜機構發現他們互相之間技術上是敵對的，但是素有反蘇訓練的西方間諜機關不可能輕易放棄自己的目標。雖然英、美諜報人員技術上是在和德國秘密警察和軍事保衛局作戰，但是真正的敵人大半還是蘇聯和各國共產黨，所有國家的工人階級和進步運動。

戰爭迫使他們擴大組織，招募熱心對法西斯主義作戰的愛國青年軍官和士兵，因此機構複雜，疊床架屋。舊的反蘇、反共集團仍然是內部核心組織，進行着反對工人階級的更深入的長期戰爭。

英國資本家在整個戰爭時期仍然保持着他們的誹謗法和官方保密法案，防止暴露英國間諜機構的反蘇方向的材料被公佈出來。美國法令比較鬆弛，可以找到比較多的材料。美國戰略服務處（O. S. S.）——美國諜報機構——在戰時從美國反動派中堅分子裏招募了許多高級官員。它的頭子是紐約一家大法律公司的合夥人杜諾萬將軍。前戰略服務處軍官科雷·福特中校和阿利斯泰·麥克班少校在他們的「外衣和匕首」這本書裏面寫道：

「他（杜諾萬將軍）招募聲勢顯赫的銀行家和工業家担任關鍵性的職務，如



范德比爾特、杜邦、摩根這些人。……他募集大名鼎鼎的外交家，如我們最後一任駐德大使休·威爾遜，前駐立陶宛公使約翰·維利，和與德國黨衛隊將軍伍爾夫及德國駐意大利司令部秘密談判的主角艾倫·杜勒斯。」

會一度為戰略服務處工作的安娜貝爾·布加在「美國外交官真面目」一書裏寫道：

「我在戰略服務處工作時，很快就發現這個機構的主要間諜活動不但是反對德國，而且也反對蘇聯。……美國諜報機構活動的反蘇性質為這個事實所證明：在美、蘇聯盟反對法西斯德國的戰爭時期，戰略服務處裏面最大的一個司就是俄國司。」

當邱吉爾拖延第二戰場的開闢，鼓動侵入東歐以便使舊的法西斯勢力重新袍笏登場的時候，美國和英國的諜報組織就在為設法「滲入」抵抗軍和左派，特別是共產黨而忙碌。就在這裏他們找到了一種特殊武器——南斯拉夫的鐵托集團。

早在戰爭尚在進行時，反勞工的間諜活動顯而易見就具有某種國際性質。進攻工人階級是不擇手段的。德國秘密警察發薪單上保留着被佔領了的東歐的秘密警察移交過來的暗探和告密者，讓他們繼續做他們的卑鄙勾當。英、美間諜機構則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去了解德國秘密警察和意大利與日本秘密警察所僱用的狗腿子，以便收為己用。鐵托分子的情形尤其是這樣的。

拿拉茲洛·拉伊克這個典型例子來看，他是匈牙利秘密警察招募的狗腿子，他的名字被他們交給了德國秘密警察。他在法國集中營時受到法國「第二廳」、美國戰略服務

處和德國秘密警察代表的訪問。戰爭時期，德國秘密警察把他送回匈牙利。戰爭結束時，當時在西德的舊匈牙利警察頭目索姆波爾——斯韋尼澤又使他和美國間諜機關發生聯系。從一九四七年起，南斯拉夫的鐵托分子集團就成了他和西方帝國主義之間的主要橋樑。還有什麼可以更好地說明帝國主義的「國際主義」的例子呢？

戰爭結束了。西方帝國主義發現自己所面對的不僅是社會主義的蘇聯，而且還有東歐各國勞動人民的政權。從此以後，滲入和偵察這些國家裏的工人階級組織的工作就成了主要任務。而當這些國家裏的舊反動集團的陰謀詭計接二連三垮台以後，以南斯拉夫鐵托分子為中心組織的潛藏在各國共產黨內部的秘密特務組織，如我們已經知道的，就變成了帝國主義組織反革命和戰爭的主要武器。

從此以後，特務和狗腿子的盜匪集團不僅在本國而且在全世界工人階級和進步運動中的發展，就成了英國尤其是美國間諜機構工作的不可少的一部分。

這就是美國一九四八年爲了進行世界性的間諜活動和世界性的挑釁而擘劃的臭名遠揚的「X計劃」的基礎。「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敘述這個「計劃」時是這樣說的：

「按照這個計劃，火力甚強的隊伍將在美國指導下成立起來。暗殺重要共產黨人將受到鼓勵。空降到東歐的美國特務……將被用來配合反蘇行動。」

新的中央情報局在舊的戰略服務處基礎上發展起來了。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日，杜魯門總統簽署了中央情報局法案，即一般所稱的「間諜法案」。這個法案的條例裏面包

括使美國特務滲入外國尤其是進步組織的計劃和撤消移民法令以便招募外國特務的規定。因此，在有組織的大規模驅逐會作為善良美國公民而在美國居留三、四十年的進步人士的時候，另一方面却在大规模輸入納粹和日本間諜，使他們作為「忠誠的美國人」而參加新的世界密探部隊。

## 結 論

爲什麼一本論述鐵托分子作用的書裏面要包括這些關於世界勞工運動裏的特務和挑撥者的極爲簡短和概括的敘述呢？理由很清楚。保守黨和右翼工黨領袖想把拉伊克和科斯托夫審判案的證據一笑置之，告訴工人，尤其是青年（在美國這個國家裏他們還沒有經歷過尖銳的階級鬥爭時期），說這樣的事是不會有的——或者對他們說，即使「鐵幕背後」可能有特務和告密者，這樣的事也不會發生在「西方民主國家」。但是歷史所告訴我們的却並非如此。

關於受資本家雇用而滲入、偵察和對勞工和進步組織進行內部破壞的暗探與挑撥者的任務：儘管只作了這樣走馬看花式的研究：我們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

（一）自從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以來，自從有勞資鬥爭以來，資產階級就在使用暗探、告密者、挑撥者來反對勞工運動。

(二) 使用特務和挑撥者破壞勞工運動這個辦法絕不是和英、美生活方式毫不相干的事。這種手段第一次得到大規模發展是在英國；而且今天更變本加厲了；而作爲今天世界帝國主義中心的美國則已經變成首屈一指的密探國家，這個國家使用特務和挑撥者對付工人運動的規模只有納粹德國曾經有過。

(三) 從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起，帝國主義強國就一天比一天更殘酷地發展特務和挑撥者的系統，不僅在他們本國，不僅在他們的殖民地或附屬國的領土，不僅在其他較爲弱小的資本主義國家，而且特別是想滲入蘇聯——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勞動人民首先取得政權的國家。

帝國主義強國在兩次大戰之間努力發展一種間諜和特務系統，使他們成爲反對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五縱隊。在蘇聯，從高爾察克和鄧尼金開始的帝國主義大陰謀由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繼承下去了。

(四) 今天，當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口都在人民自己的政府管理之下、政權落在工人階級領導的勞動人民手裏的時候，努力在這些人民作主人的國家裏尤其是在他們的先鋒隊組織共產黨裏發展間諜和挑撥者系統的政策，就成了西方帝國主義備戰活動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這方面充當主角的是美國帝國主義，美國間諜機關，其次是英國。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工作由鐵托分子在繼續着。西方帝國主義在國外有鐵托集團替它服務，而在國內則有軍事情報局第五處和聯邦調查局的特務替它服務。他們是相輔相成的。英

美帝國主義要發動侵略戰爭就必須努力分化國內的工人階級和進步運動，努力分化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和進步運動，努力在「敵人」——即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後方建立第五縱隊。爲了這個目的，鐵托分子就變成一種主要工具。

帝國主義者問：「爲什麼革命運動裏面可能發現這麼多叛徒呢？」這再也沒有比這種宣傳更僞善的了。匈牙利人民檢察長吉尤拉·阿拉皮博士在拉伊克審判案的總結演說裏作了很好的答覆：

「關於這次審判，西歐各國某些人士發問——怎麼會有這麼許多買國賊鑽到革命的工人運動的隊伍裏面去的呢？滑稽的是，提這個問題的人正是那些最有資格答覆這問題的人。帝國主義間諜機關和托辣斯的這些代言人要我們說明關於這些叛徒的問題。恰恰就是他們，爲了要從內部瓦解革命運動，把這些叛徒塞進我們的隊伍來的。把充滿敵意的間諜和挑撥分子派遣到工人階級政黨裏面去，這是敵人的慣技！但爲什麼工人的政黨未能立即就把這些叛徒揭發出來呢？假若我們手頭有那些包括這些人名單在內的檔案就行了！大家都知道，匈牙利警察的檔案並不在我們手裏，而是在美國間諜機關的手裏。」（「拉伊克審判案記錄」第二二二頁。）

十月革命以後，馬林諾夫斯基被發現是一個鑽到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裏來的沙皇間諜。這時候，孟什維克就拚命攻擊布爾什維克讓一個好細混進了黨的中央委員會。但是列寧回答說：

「……在克倫斯基執政的時期，我們要求逮捕杜馬議長羅將科並將他提交法庭審判，因為他在戰前已經知道馬林諾夫斯基是奸細，却没有把這事實通知杜馬中的勞動派和工人；但是當時與克倫斯基一起參加政府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都不贊助我們的要求，因此羅將科得以逍遙法外，自由自在的投奔到鄧尼金那裏去了。」（譯文引自「列寧文選」中文版第二卷，第七一二頁。）

今日英國的右翼勞工領袖則更為矯揉做得多。他們完整地保存着並且加強着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加強着用來反對工黨和工會會員，反對共產黨人的保安機構，加強着那些正在努力鑽到人民民主及社會主義的國土裏進行破壞的間諜和挑撥者的機構；與此同時，他們却大聲叫囂，攻擊拉伊克、科斯托夫及其他賣國賊的審判！

（五）不過現在還有第五條也就是最後一條結論。聯共（布）所領導的蘇聯政府與人民的警惕性擊敗了托洛茨基分子和他們的帝國主義主子的間諜活動。在聯共（布）以及斯大林親自幫助和建議下，東歐人民已經拆穿了鐵托分子的陰謀詭計。這些陰謀詭計僅僅在南斯拉夫本土得到成功，而且也只是暫時的成功。

間諜和挑撥者反對國內外勞工和進步運動的陰謀是可以擊敗的。不過，這就提出了勞工和進步運動必須提高警惕的迫切問題。

## 第四章 鐵托分子今天扮演的角色及其策略(上)

### 從托洛茨基到鐵托

鐵托在英國的主要鼓吹者之一齊里亞庫斯先生在鐵托的政策和鐵托南斯拉夫的實踐裏發現了他所說的「一種新型共產主義」——這就是他十分明確地表示贊同的「一種共產主義」。美國所有的右派，赫斯特系報紙，「紐約先驅論壇報」，「華爾街日報」，英國右翼報紙從「泰晤士報」到「每日電訊報」都提供了篇幅，而且是一天比一天大的篇幅；來表示支持這種「新型共產主義」。它們發現這種「新型共產主義」和蘇聯的共產主義大不相同。與後者比較起來，這種「新型共產主義」正是它們所竊寐以求的。

齊里亞庫斯現在發現的這種「新型共產主義」，有時也叫做「國家共產主義」；和西方反對派以前在希特勒德國發現的「新型社會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是一流的東西。西方帝國主義需要鐵托，歌頌鐵托和利用鐵托，正因為他是反對真正社會主義和真正共產主義、反對勞動人民的武器。發現「新型社會主義」和「新型共產主義」的也不止希特勒和鐵托兩個人。鐵托和鐵托分子們走的是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老路，他們是

托·洛·茨·基·與·托·洛·茨·基·分·子·的·直·系·子·孫·和·門·徒·。

托洛茨基分子同樣冒充真正的共產黨人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說「斯大林分子」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托洛茨基分子的理论，齊里亞庫斯的先輩稱之為「真正共產主義」的理论，也得到了大托辣斯和壟斷資本家的做心。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與共產黨有任何關係都意味着長期監禁、酷刑，甚至於死亡；不僅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一切著作；就是任何意大利或外國民主人士或進步人士的著作，也都嚴禁在圖書館陳列或在書店發售。而這時候，托洛茨基論「新型共產主義」的著作却「自由地」廣泛地被翻譯和傳播。一九三八年我到貝爾格萊德大學去會晤反法西斯的共產黨學生時；途中經過意大利，在墨索里尼治下的米蘭盤桓了幾個鐘頭。我記得很清楚，一個書店的櫥窗裏用顯著地位陳列着的一些有「共產主義」字樣的書，曾引起我極大的注意。這些書就是剛翻譯過來的托洛茨基的大作。

在希特勒德國，做一個共產黨員或社會主義者或戰鬥的工會工作者或自由主義者或民主人士都意味着逮捕、集中營；常常還意味着死亡與酷刑；希特勒德國對文學實行了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徹底的「清洗」和禁書的辦法；席勒的「唐·卡洛斯」、海涅的詩和湯瑪斯·曼的小說都被認為是「顛覆性的」東西而被禁止或焚毀。這時候，托洛茨基的大作却被廣泛地翻譯着和傳播着。



美國赫斯特系報紙在三十年代中葉和末葉毫無拘束地刊載托洛茨基和他的信徒的文章。薩拉曼卡與布爾戈斯的佛朗哥報紙也刊載了托洛茨基闡述他的「新型共產主義」的著作。波蘭獨裁政權的秘密警察受過托洛茨基理論的特殊教育，以便在波蘭工人階級運動內部更好地進行間諜和破壞活動。

儘管托洛茨基分子唱着過激的革命濫調，他們在資本主義報業大王的報紙上總是受歡迎的，使他們成爲反動派極爲寶貴的武器的正是他們的「革命」花腔；他們的「革命」招牌，托洛茨基分子和資本主義的宣傳家及間諜進行了分工；他們把自己喬裝成革命者，才有希望得到應聲蟲，而保守主義和反動派的公開發言人，甚至於右翼社會民主黨人都會在他們面前當場碰壁的。

所有國家的托洛茨基分子到三十年代中葉都是在爲世界反動勢力三個主要目的服務：

(一) 他們做了西方反動派希望用來在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內部攫取立足點的主要工具，担任社會主義陣綫後方的第五縱隊，在蘇聯內部進行間諜與破壞活動來協助和補充在蘇聯外部進行的公開的備戰活動。

(二) 他們做了製造右翼反動宣傳，製造對蘇聯、對各國共產黨、對戰鬥的社會主義者和工會、對反法西斯的和平勢力的誣蔑宣傳的兵工廠——一個製造披着左翼詞句外衣的反動的右翼宣傳的兵工廠。

(三) 他們做了資本家的幫兇工具，努力打入工人階級，人民與民族解放運動，特別是各國共產黨的隊伍——從內部來進行偵察、搗亂和破壞活動。

到三十年代中葉，那些陳腐不堪的反蘇謠言日益軟弱無力。資本主義宣傳家曾經預言蘇聯政權很快就會垮台，但是蘇聯政權並沒有垮台。他們在他們「有聲望的」報章雜誌上面曾經用「烏克蘭大飢荒」殺死了比蘇聯全部人口還多很多倍的人。他們曾經宣佈蘇聯已瀕於經濟崩潰的邊沿，但是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世界經濟大危機裏面「崩潰了」的却是資本主義。歷史的現實，社會主義計劃化的輝煌勝利，生產的突飛猛進，集體耕作的勝利，與資本主義世界裏面的災難性的經濟蕭條成爲日益觸目的強烈對比。因此，資本主義報紙一天比一天更依賴托洛茨基主義的兵工廠來使它的篇幅充滿反蘇的惡毒謊言。

到三十年代中葉，工人階級與勞動人民在蘇聯爭取和平的鬥爭和爭取集體安全的不斷努力的感召下，在全世界各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起反對戰爭反對法西斯的統一戰綫和人民戰綫。因此反動派又一次要依賴托洛茨基分子了。當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軍國主義者、張伯倫、賴伐爾、右翼社會民主黨的領導者公開進攻和平民主陣綫的時候，托洛茨基分子則在左的詞句掩蓋下滔滔不絕地傾瀉着惡毒宣傳來替他們捧場。他們大放厥詞，說蘇聯爭取集體安全的鬥爭是「背叛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說共產黨爭取統一戰綫和人民戰綫的鬥爭是「背叛列寧主義」。

「斯大林分子的那種統一戰綫不是爲了行動上的統一，而是把全體工人引入帝國主義戰爭的統一。」（英國托洛茨基分子詹姆斯。）

「人民戰綫……是在羣衆裏面爲達到民族統一而作準備的主要形式……是支持將來的戰爭的。」（詹姆斯·伯納姆，美國托洛茨基分子，現在是華爾街擴軍備戰活動的聲名狼藉的積極支持者。）

在三十年代中葉，當蘇聯內部一切舊的反動階級的勢力都已經被打垮了的時候，俄國托洛茨基分子，如所週知，變成了帝國主義努力從內部破壞蘇聯與偵察蘇聯的主要武器。而在法西斯對西班牙和中國的侵略中，佛朗哥和日本法西斯認爲這些國家的托洛茨基分子是潛藏着的輔助部隊，是支持它們侵略行動的第五縱隊。

「……我們依靠着四百個隨時可以行動的人。這些人都有優良的裝備，並且在馬德里戰綫上佔據着有利的地位；我們的人滲透到極端的無政府主義者和 P·O·U·M·（Partido Obrero Unido Marxista——自封爲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實際上是半托派的組織，主要活動範圍是加泰羅尼亞與馬德里）的隊伍裏去的工作進行得很成功。……爲了執行你的命令，我親自到巴塞隆那去會晤了一位 P·O·U·M·的領導人。……他答應派遣新人到馬德里去使 P·O·U·M·的工作活躍起來。加上這些生力軍，P·O·U·M·就會和在巴塞隆那一樣成爲我們運動的堅實有效的支柱。」（摘自西班牙內戰時期在馬德里秘魯大使館發現的，佛朗哥派到西

班牙共和國領土內的一個主要特務的報告。)

「我們必須收買機會主義的黨派。這樣的黨派華北是很多的。其中，特別要提到托洛茨基分子。我們必須幫助他們發展，使他們可以在每一個地方爲我們帝國服務。信奉托洛茨基的那些中國人能夠用他們的工作腐敗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推毀中國的統一。他們的工作方法是以具有非常的手腕出名的。爲了要加速我們的工作，我們就必須跟他們學。」(摘自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上海「申報」所載日本侵華時期被繳獲的華北日軍參謀本部的文件。)

凡是研究三十年代托洛茨基分子的任務的人至少可以看清楚一點：鐵托和他的狐羣狗黨(他們大部分和托洛茨基分子有直接聯繫)今天正在執行和托洛茨基分子一模一樣的任務，並且使用着同樣齷齪的手段。

舉例來說，閱讀一下托洛茨基在聯共(布)內部的主要黨羽和同謀犯皮達可夫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在托洛茨基反蘇中心審判案中的供詞吧。他詳細敘述他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與托洛茨基會晤的情形說：

「那時他(托洛茨基)告訴我，他與德國國社黨副主席赫斯曾經進行過相當長期的談判。……如果把這個協議(托洛茨基與赫斯之間的協議)簡單地說明一下，它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東西呢？

「首先，德國法西斯答應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分子集團採取照顧的態度。

如果這個集團能够當權的話，德國法西斯答應支持它，不管是在戰時還是在戰爭爆發以前，只要它辦得到。但是在法西斯方面要得到下列的報酬：在一切國際政策問題上完全採取對德國利益和德國政府有利的態度。……

「協議的第二點說明德國資本可以在蘇聯開發它所需要的原料資源的方式。這牽涉到金礦、石油、錳、森林以及磷灰石等等的開採。……」

「除開我們已經想到的很多讓步以外，我們所說的這些讓步以及給予我們爲了對斯大林作戰而將要動員的勢力——這是指敵對勢力——以某種緩靖的需要是怎樣的呢？我說的是敵對集團——富農。在這方面，除開對外國人讓步以外，還必須在內政政策方面實行一種相當大的退却。……簡單說來，托洛茨基的解釋是，這將是一次非常嚴重的退却。……在這方面，托洛茨基說，我們的綽領本質上和右翼的綽領並無不同之處，因爲右翼也採取了一種聲東擊西的破壞性的綽領，並且認爲必須向資本主義退却。」（一九三七年莫斯科「托洛茨基反蘇中心審判案法庭審訊記錄」第六四——六六頁。）

當你看到托洛茨基分子和德國法西斯之間的秘密協議——他們準備從內部破壞蘇維埃政權、暗殺蘇聯領袖、恢復從屬於德國帝國主義的俄國資本主義的計劃——時，你看到的正是鐵托分子和德國法西斯的繼承人美國帝國主義的協議的範本。唯一的不同是：鐵托分子在南斯拉夫實行他們的計劃的工作已經得到了暫時的成勳。

托洛茨基分子與鐵托分子之間有着最緊密的聯系——人的聯系、目的的聯系、手段的聯系。在很多事例中，今天的鐵托分子就是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

科斯托夫在他的書面供詞中揭露了一九三四年他在莫斯科第一次會見鐵托的情形。他陳述當時在「華爾特」的化名下活動的鐵托如何被兩個仍未暴露真面目的托洛茨基分子——比拉·庫恩和瓦列茨基——提名担任南斯拉夫的領導工作，鐵托如何對科斯托夫傾心地敘述他的托派的見解：

「鐵托在一九三四年一次談話中對我談到他的托洛茨基思想。……在這方面，他暴露出他對於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領導機構的憎恨。鐵托渴望儘快地動身到南斯拉夫去，以便無拘無束地按照他自己的政治思想辦事。鐵托親口對我這樣說，要求我給他必要的幫助，並且在他要提出解決個人問題時幫他說話。我答應這麼做。完全由於托洛茨基分子比拉·庫恩和瓦列茨基的支持，由於我幫他說話，鐵托才得以在一九三四年回到南斯拉夫，並且在那裏担任要職。」（「科斯托夫審判案記錄」第九八——九九頁。）

由此可知，鐵托在一九三四年已經是一個托洛茨基分子了，而且是由於托洛茨基分子的提議和協助才在南斯拉夫共產黨裏飛黃騰達起來。

拉伊克與科斯托夫陰謀裏很多同謀犯都是通過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接觸而開始自己的叛變行徑的。保加利亞案同謀犯之一伊凡·斯捷法諾夫就是一九二五年在巴黎會見當時

蘇聯駐巴黎大使俄國托洛茨基分子拉科夫斯基的時候受他的影響而接受托派理論的（「科斯托夫審判案記錄」第一二七頁）。拉茲洛·拉伊克的同謀者之一保羅·尤斯圖斯早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間就是一個托洛茨基分子。因此他就受到霍爾第獨裁政權的警察的寬容。在他真正成爲一個有組織的特務以前，他已經變成霍爾第警察的有力工具了。

「因爲這個組織（托派組織——著者）是專門對付地下共產黨的，所以霍爾第的警察不僅對於這個運動不加干涉，甚至於還照願備至地替它撐腰。他們允許我和我的同夥使用着表面上最激烈的詞句，同時則對共產黨進行最慘無人道的迫害。」

「今天回憶起所有這些事來，我已經認識到在我真正被拉以前，我在事實上已經是能爾第警察的同盟者和工具了。」（「拉伊克審判案記錄」第一八八頁。）

工人運動裏的托洛茨基主義和警察的密探活動是密切聯系着的。托派宣傳一方面替叛變鋪平道路，一方面又供給有組織的警察特務一種從內部破壞共產黨組織的有用的綱領。尤斯圖斯是這樣說的：

「如果我回顧自己的事業，我發現自己所犯的一切罪行都有一個共同的原因，這就是我的托派信仰。通過托派的文件……通過和國際托派領袖的接觸，通過他們的影響，我自己已經變成共產主義運動的死敵。我近二十年的政治活動裏面充滿了托派的毒藥。早在三十年代，我就與反對當時地下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各種宗派結成

同盟。因此，我甚至於在還沒有做有組織的特務以前就成了警察的幫手，而不久以後我就成了有組織的特務。……」（同前，第二九七頁。）

從托派到警察特務進而參加匈牙利鐵托分子同謀者的隊伍，這種轉變是合於邏輯的。鐵托匪幫主要的所謂「理論家」之一莫薩·皮雅傑在一九四九年九月月底在「戰鬥報」發表的評論位伊克審判案的文章（南斯拉夫通訊社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出版共英譯本），暴露他自己是一個長期埋伏的托洛茨基分子。他在惡毒地攻擊拉伊克審判案時寫道：「這使人想到一九三六年蘇聯的審判案，那些審判案的組織者可能曾用他們豐富的經驗協助布達佩斯審判案的上演。」這篇文章之所以有意義並不是因為皮雅傑的反蘇謔言，現在這種謔言已經多得不足為奇了；而是因為它揭露了皮雅傑的真相，說明很多年來當他假裝毫無保留地擁護蘇維埃政權、蘇聯共產黨的政策以及共產國際的時候，暗地裏他實在是蘇聯的敵人。

鐵托分子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共產黨情報局決議以後，很快就開始在他們的公開宣傳和教育資料方面採取日益公開的托派路線。英國新聞記者亞歷山大·韋爾恩早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就已經提到這一點：

「南斯拉夫普通共產黨員裏面進行的『政治教育』現在所走的是一條很有趣的道路——如果我可以按照我在火車上和兵士與軍官們的談話來判斷的話——認為真正發生偏向的是斯大林，只有南斯拉夫還保留着列寧的精神。有一個兵士告訴我一



個故事——「列寧的聖經」的故事。這個故事對於他顯然是很新鮮的，但是曾經聽過托洛茨基文章的人當然都是很熟悉的。」（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曼徹斯特衛報」。）

到一九五〇年年底，鐵托分子政治宣傳與政治教育的主要路綫已經完全符合於托洛茨基的綱領了。他們在稍爲現代化的外衣下面重覆着托派的陳腐的謊言和誹謗。

托洛茨基的衣鉢已經傳授到鐵托手裏去了。

### 鐵托在西方侵略中的作用

由此可知，鐵托分子和三十年代的托洛茨基分子一樣，在西方帝國主義對人民做主人的國家（今天已經有很多這樣的國家了）進行侵略戰爭的計劃裏扮演着一個重要的角色。唯一不同的地方是——鐵托分子有一個根據地。他們通過進行內部陰謀和暴動的辦法暫時在南斯拉夫取得了政權。因此，他們準備帝國主義戰爭的方式就不只是在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國界後面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步組織內部進行第五縱隊的活動，而且能够把他們的南斯拉夫根據地變成西方帝國主義進行反蘇的侵略戰爭的武裝基地。

到一九五〇年年底，鐵托擁有一支人數超過百萬的軍隊，這比鄰近各人民民主國家武裝部隊的總和還多得多。軍費預算（即使根據鐵托粉飾過的官方數字來看）從一九四

八年起到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底公佈的一九五一年預算草案止，每年都增加很多。

美國非正式地運軍火給鐵托南斯拉夫是在一九五〇年年初就開始了的。一九五〇年夏天有時每星期有十五列到二十列火車載運繳獲的德軍武器從西德美國佔領區經過奧地利運到南斯拉夫北部。一九五〇年年底，華盛頓更公開決定運糧食給南斯拉夫的武裝部隊。一九五〇年十月，「星期日觀察週報」報道（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

「美、英、法原則上已決定對南斯拉夫進行軍事援助。這個決議是最近在紐約舉行的三國會談通過的。」

西方帝國主義小心翼翼地掩蓋他們武裝鐵托南斯拉夫的事實，因為它們知道這個事實會拆穿鐵托自命為「建設社會主義」的一切說法。他們曾經公開承認掩蓋武裝鐵托這一事實是必要的：

「對於南斯拉夫不能考慮像對大西洋公約國家，西德、希臘和土耳其那種直接聯盟和公開保證，因為那是鐵托元帥無法接受的，因為這樣做就是給蘇聯說鐵托是西方工具的宣傳運動火上加油。」（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觀察家報」。）

有一段長時期鐵托所採取的路線是說他既不需要也不希望從西方得到武器。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他在他的近衛師團第二層「黨」代表大會上仍然宣稱：「現階段談不上向西方尋找武器的問題」（「泰晤士報」駐貝爾格萊德記者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九日報道）。但是歷史很快就揭穿了這種姿態。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泰晤士報」駐貝爾格萊德記者報道了伊凡·戈斯尼亞克上將的一篇演說。在這篇演說裏面，這位身任國防部副部長的鐵托分子吐露，當時已經作出決議準備公開向西方要求軍事援助。六月九日，卡德爾宣佈南斯拉夫陸軍參謀長科查·波波維奇將軍已經出國，到美、英及其他國家去「考察與西方政府代表談判關於爲南斯拉夫軍隊購買裝備與武器的可能性」。波波維奇將軍在美國訪問了國務院和美國軍事領導當局，包括美國參謀長赫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將軍。到六月十九日，「紐約先驅論壇報」報道說價值一百萬美元的武器已從美國運往南斯拉夫，六月二十七日這個報紙又報道說運去的武器價值已超過三百萬美元，更多的武器尚在途中。

美國曾經要求對一切運往南斯拉夫的武器的分配有監督權，並且很快就僞在美國訓練南斯拉夫的軍事人員作了佈置。

美國一切最右傾和最反動的報紙都熱烈歡迎這次輸送武器的事，認爲這是與反蘇活動生命攸關的行動。政論家約瑟夫·阿爾索普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一九五一年七月七日）上評論道：

「唯一必須考慮的是：在這裏要購買實力比在其他地方，例如法國，要便宜多少。」

南斯拉夫境內到處在建築具有明確的軍事戰略目的的新道路。從前在外國青年大隊協助下開始建築的從貝爾格萊德通往薩格勒布的公路現在發現已是聯結東歐各人民民主

國家邊界上的英美軍事基地的西方戰略計劃的一部分。這是歷史的悲劇和諷刺之一。現在的計劃是使這條路向北和向南發展，使英美在的里雅斯特的基地通過薩格勒布，貝爾格萊德和斯科普里，而和英美在希臘北部的薩隆尼卡基地聯繫起來。在剛解放後的緊急時期裏青年和人民自願支持的志願勞動隊變成了強迫勞動隊。現在這條公路就由這些拿不到工資的裝備惡劣的勞動隊來完成。沿路還有一系列的飛機場。公路本身有幾段也擴大了，鋪上了鋼骨水泥路面，使它可以做飛機跑道用；然後上面鋪上薄薄一層土築裝起來。值得注意的是在的里雅斯特、路布里雅納、薩格勒布與貝爾格萊德之間已經有鐵路聯繫，而極爲迫切需要的聯結布拉格尼亞與沃伊沃丁納的富饒地區和達爾馬其亞的貧瘠海岸的裝載東西的道路却反而沒有着手建築。但是聯結南斯拉夫及鄰近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新公路，那些西方戰略所需要的公路，如通往保加利亞邊界的厄斯 加里布羅德公路，却正在計劃中。

關於貝爾格萊德—薩格勒布公路，「新蘇黎世報」記者曾經這樣說（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

「關於這條『汽車路骨幹』的經濟價值，意見殊爲分歧。這條路沒有真正和什麼路交叉之處，並且繞道避開貝爾格萊德與薩格勒布之間大部分的重要經濟中心和交通中心。貝爾格萊德與薩格勒布的道路交通是否值得糜費這麼多錢是可以商榷的。」事實上，當這位記者沿着這條路上已經完成的部分旅行時，他只碰到四輛私人汽車

和爲數甚少的貨車。但是對於這種「奢侈品」美國政府從來沒有表示過不滿的意見。爲了建築機場及其他軍事設備，從農民那裏奪過來了成萬英畝的耕地。

在美國專家的援助下，舊的機場擴充了，新的機場在建築中。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華盛頓宣佈美國已批准南斯拉夫輸入飛機引擎與零件，並且還有一系列的公開或秘密的協議使美國有權使用南斯拉夫的機場。「紐約先驅論壇報」駐貝爾格萊德記者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七日報道：「泛美世界航空公司職員與南斯拉夫政府官員經過短短一天談判的結果，美國客機將從下星期起開始飛越南斯拉夫。」同時他預言南斯拉夫與英、法、意之間也會訂立類似的協議。

南斯拉夫在亞德里亞海岸的很多港口也以同樣方式在美「援」下擴充了，並被置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支配之下。一九五〇年四月十日，鐵托政府發表了關於准許外國船隻駛入南斯拉夫領海並在南斯拉夫領海內航行與停泊的決議。這個決議授權海軍司令部批准外國海軍司令官的請求，使他們可以進行海軍演習，他們的船員可以登陸，武裝人員可以登陸「參加進行和出殯」。西方對於參加南斯拉夫土地上舉行的殯儀的興趣，也許正象徵着西方帝國主義在南斯拉夫及其他東歐領土內的作用。

## 鐵托分子戰爭集團

但是鐵托南斯拉夫在西方戰爭計劃裏所担负的任務不只要把南斯拉夫變成美艦進攻蘇聯與各人民民主國家的許多基地中的一個。大西洋公約策略中的軍事外交計劃還打算把南斯拉夫變成一個核心，一個位於人民民主歐洲邊界的西方戰爭集團的中心。

西方反動派在鐵托分子幫助下，企圖建立一個從奧地利向南經過南斯拉夫到希臘以及從意大利向東經過南斯拉夫和希臘到土耳其的戰爭集團。貝爾格萊德——雅典軸心集團在一九五〇年三月初就形成了。這是鐵托分子出賣希臘民主軍的必然的結果。早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塞魯斯·蘇茲貝格就在「紐約時報」上寫到建立「維也納——貝爾格萊德——雅典對角線」的事。「星期泰晤士報」（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五日）解釋說，土耳其的報紙注意力都集中在建立包括希臘、意大利、南斯拉夫與土耳其在內的「安全集團」方面，對於土耳其政府的改變倒比較漠然；約在同時，土耳其報紙「新時報」說，雅典和貝爾格萊德之間比從前更為親密的關係對於「改變巴爾幹局勢」是具有歷史性和決定性的意義的。

鐵托南斯拉夫和奧地利反動派之間更為親密的政治關係與軍事聯繫也正在形成。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八日維也納宣佈，在奧地利駐貝爾格萊德公使與南斯拉夫外交部副部長會談以後，所有在南斯拉夫判決的奧地利戰爭罪犯的處刑都要減輕一半。釋放納粹佔領軍戰犯後監獄裏面留下的空位很快就被逮捕的共產黨人和游擊隊員填滿了。「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八日）在一篇訪問貝爾格萊德某南斯拉夫高級官

員的報道中說，該報提出的問題中間有一個問題得到的答覆（曾經南斯拉夫內閣討論）是：「和希臘的關係已大有改進。事實上目前的關係差不多可以說是誠摯的。和土耳其的關係也是一樣。同時和意大利的『關係也有好轉』。」

意大利的反動報紙一反過去兩年來的態度，日益公開呼籲和鐵托南斯拉夫進行密切的經濟與軍事合作。「的里雅斯特報」在一九五一年度的新年論文中要求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在經濟、政治上進行密切的合作。的里雅斯特一向是意大利反動派攻擊南斯拉夫最尖銳之點。因此來自的里雅斯特的這樣一個呼籲更具有說明性。同時，當鐵托分子的報紙和意大利的右派報紙在國內讀者面前繼續討論的里雅斯特問題的時候，各種情況證明，不管是加斯貝利還是鐵托都沒有任何要求英美軍隊撤出的里雅斯特的意圖。「紐約光驅論叢報」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標題是這樣寫的：「意大利、南斯拉夫均不願採取步驟成立撤退美、英駐軍的協議。」

無論怎麼說，軸心也好，對角綫也好，「安全集團」也好，日益明顯的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外交目的是要在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戰略邊界上建立一個奧地利、南斯拉夫、希臘、意大利和土耳其的戰爭集團；鐵托南斯拉夫將成爲這個包括奧地利天主教反動政府、意大利天主教民主黨人、希臘保皇法西斯黨徒和土耳其半法西斯分子在內的集團的核心與樞紐。

現在來研究一下這個戰爭集團如何拼湊起來的過程是有好處的。這個集團的形成並

不表明鐵托分子政策的突然轉變，而是長期背叛過程的頂點。

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間貝爾格萊德——雅典軸心的公開建立是多年來暗中出賣希臘人民解放鬥爭的結果，這種叛賣直到現在才逐漸被揭露出來。一九四三年，南斯拉夫游擊隊和希臘游擊隊——希臘人民解放軍（E. L. A. S.）取得了聯繫。但是埋伏在南斯拉夫共產黨內部活動的鐵托集團對希臘早就有了陰謀，並開始濫用這種聯系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他們開始在希臘國土上發展自己的組織，招募特務，特別是在希臘東北部斯拉夫馬其頓人中間招募。替他們做這個工作的特務頭子是伏克曼諾維奇，一般人知道的名字是特姆波。特姆波在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游擊運動中也進行過同樣的工作。

一九四四年年底，在邱吉爾準備進攻希臘人民的時候，鐵托命令希臘人民解放軍裏面的斯拉夫馬其頓部隊撤退到南斯拉夫。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鐵托和特姆波就在訓練南斯拉夫軍隊，準備和希臘人民解放軍裏面的這些馬其頓部隊一起佔領希臘的馬其頓，把它合併到南斯拉夫領土裏面去。

當希臘人民解放軍和英國軍隊在雅典作戰時，鐵托拒絕給希臘游擊隊任何援助。但是在在一九四五年極力主張希臘民族解放運動（E. A. M.）應該廢除和英國政府訂立的伐爾基薩協定並繼續鬥爭的正是鐵托。

希臘共產黨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二日（伐爾基薩協定剛滿一年）舉行二中全會時通過了採取新的武裝鬥爭形式的決議。在這個決議裏面，鐵托所滿口答應的全力支持起着



決定性的作用。但是就在這個時候，事實上鐵托正在大力展開他那叛變希臘民族解放運動，希臘共產黨和希臘民主軍的工作。鐵托分子特務暗殺了很多希臘共產黨領袖，包括政治局委員齊夫戈斯在內。蘭科維奇的組織也滲透到希臘民主軍裏面去了。

一九四八年六月共產黨情報局決議公佈以後，鐵托分子開始在希臘更公開地活動起來。

有一個時期，當希臘保皇法西斯困難重重時，鐵托分子立刻拔刀相助。希臘內部從屬於鐵托的那一羣人（凱拉米傑耶夫、米特羅夫斯基、戈斯等等）加緊在民主運動和軍隊內部進行破壞工作。他們組織斯拉夫馬共頓人逃亡到南斯拉夫去。一九四九年春天，鐵托和希臘保皇法西斯在岡馬克察倫開始公開勾結。最後，在希臘保皇法西斯和希臘民主軍的武裝鬥爭的生死關頭，鐵托在保持中立和封閉邊境的藉口下對保皇法西斯軍隊敞開了邊境的大門，使保皇法西斯軍隊從後面出其不意地進攻希臘民主派。

這種一言難盡的挑撥和出賣爲現在的貝爾格萊德，雅典軸心準備了道路。  
希臘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結他們一九四九年在格拉莫斯和維奇的軍事敗績的經驗時說：

「爲什麼我們在格拉莫斯和維奇會遭到軍事上的失敗呢？」

「經過了三年的鬥爭，希臘民主軍除了不能解決後備軍這個基本問題外（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了，它在反保皇法西斯的鬥爭上就應該已經得到顯著的結果），已

經使反動派和外國帝國主義爲了消滅他們而進行干涉的努力全成白費，並且正在穩慢地但是穩步地創造勝利的條件。

一九四八年年底和一九四九年初這個時期，保皇法西斯正經歷着一種深刻的精神上的危機。士氣渙散的跡象一天比一天顯著；希臘反動派軍事上日趨窮途末路，軍事危機日益迫近。

「就是在保皇法西斯處在這樣的生死關頭的時候，英美帝國主義把他們的鐵托後備軍拋進了秤盤……」

鐵托從頭到尾都在扮演第一等的挑撥者的角色。他努力尋找各種巧妙的行動形式，以便在緊要關頭進行叛賣。就如上面所引的那篇總結所說的：

「在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間我們運動所經歷的那種條件下，鐵托的背信棄義是使我們在維奇——格拉莫斯戰役以後作暫時然而必要的退却的決定性的原因。我們這裏必須毫不隱晦地說，如果我們從一九四六年起就了解到挑撥者鐵托所扮演的陰險角色，希臘共產黨就不至於作出重新拿起武器的決定，它會走另一條路……，因爲在保皇法西斯擁有美國和英國的全力支持的時候，希臘共產黨沒有安全的後方顯然是不會進行新的武裝鬥爭的。」

希臘民主軍所遭受的暫時失敗，鐵托在其中是起了決定性作用的。認識到這一點的不只是希臘共產黨人。維尼齊洛斯在担任希臘政府委員會副主席時宣佈：

「沒有南斯拉夫的援助，我們決不可能得到這樣的成功。」

英國保守黨人也濫用了這種分析。他們的話說得比較隱晦：

「我們並不想貶抑希臘軍隊所起的作用，但究竟是什麼東西使希臘內戰的形勢爲之一變的呢？是鐵托和斯大林之間的爭執……」（一九四九年底保守黨議員哈羅德·麥克米倫）

「但最重要的是鐵托對希臘態度的轉變……鐵托封鎖（即對保皇法西斯開放——著者）希臘——南斯拉夫邊境的行動加速了」（一九四九年）十月間希臘叛軍的崩潰。」（安東尼·艾登，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每日電訊報」）

休·塞頓·華生先生在他寫的完全仇視蘇聯和共產黨的「東歐的革命」（一九五〇年）這本書裏面說：

「一九四九年夏天，政府軍終於獲得了真正的成功。鐵托在七月裏封閉邊境似乎不起決定性作用的條件。」

由此可知，希臘的完全美國化的南方戰爭基地之所以能夠暫時建立起來，保皇法西斯在受到嚴重威脅的威脅時之所以能夠復辟，鐵托是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這的確是一種新聖共產主義。

在以南斯拉夫爲中心的「安全集團」正在替將來西方侵略東歐作準備工作的時候，鐵托在相鄰各國的邊境上進行了接連不斷的戰爭挑釁。每個星期都帶來南斯拉夫在保加

剛亞、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邊境上進行推毀的新的報告。鐵托在這些國家的邊境上集結着重兵。南斯拉夫的戰爭挑釁活動特別集中在阿爾巴尼亞這兩個小國家方面，並且和意大利的加斯貝利政府以及希臘的半法西斯政府採取着一致的步調。科索沃和米托希雅的阿爾巴尼亞少數民族遭受着恐怖迫害。但是阿爾巴尼亞的戰爭罪犯却在南斯拉夫受着優渥的款待。早在一九四九年底（十二月五日），美國記者蘇茲貝格就報道說：

「鐵托元帥把阿爾巴尼亞難民組織的所謂『科奇·雷克西大隊』運到了斯庫台里邊疆區。理論上這個大隊的工作是築路，實際上是在給恩維爾·霍查總理的政府製造煩瑣。」

從一九四九年初到一九五〇年六月底為止，鐵托的武裝部隊從陸、空、海三方面對阿爾巴尼亞進行了一百五十多次挑釁，以後則更爲變本加厲了。

單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二日到四月三十日這個時期裏面，鐵托的武裝部隊侵犯阿爾巴尼亞邊境即達八次之多。

鐵托南斯拉夫已經變成西方反動派的戰爭計劃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爲它：

(一) 在西方援助下建立了一支以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爲進攻對象的龐大軍隊和警察部隊。

(二) 使自己變成了西方的軍事基地。

(三) 成了東歐邊境上反蘇，反人民民主國家的「安全集團」的組織者和核心。

(四) 在東歐各鄰國的領土內展開了破壞和偵察等第五縱隊活動。

(五) 使其經濟變成了對西方帝國主義及其傀儡輸出侵略戰爭所需要的戰略原料的經濟。

我們只要信手一拈就可以找到證明鐵托這種叛賣行徑的證據。這是侵略戰爭和帝國主義外交的發言人親自提供的證據。

約瑟夫·哈希和埃米爾·倫吉爾在一九四九年底由美國外交政策協會出版的一今「東歐」這本小冊子裏面說明，解放波斯美國外交在「東歐的投機活動」是以對新政策採取敵對態度的分子為基礎的。他們承認這樣做結果得不償失。但是，他們說，鐵托却是一筆非常好的投資。他們說：

「鐵托的價值等於那些敵對分子的總和。……我們要花十億美元才能裝備九個法國師，但是鐵托帶來了二十個可能站在西方這邊的師。」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解釋說：

「從美國觀點來看，鐵托是反對斯大林師的。……鐵托的軍隊包括三千個隨時可以並且願意對斯大林作戰的師。……鐵托的位置是有戰略意義的。……」

杜魯門總統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八日致函國會領袖，請立主張立刻援助鐵托，因為這是美國政府「在該地區的戰略利益和政治利益」所需要的。他說，鐵托「控制着僅

次於蘇聯的歐洲最龐大的戰鬥部隊」，這支軍隊是西歐防線的一部分。他繼續說，美國對待南斯拉夫的政策就是給鐵托為保護美國戰略利益與政治利益所必需的一切援助。南斯拉夫的糧食和經濟情況使美國政府必須在國會開會以前就立刻採取措施，否則這種情況可能引起嚴重的後果。如果「援助」的措施不立刻予以加強，鐵托控制南斯拉夫「顛覆分子」的能力就會受到嚴重的，以至於致命的打擊，而南斯拉夫軍隊的實力就會被削弱到危險的程度。

鐵托南斯拉夫所奉行的政策是代表西方帝國主義利益、代表西方戰爭政策利益的政策，這是世界上最上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總統的由衷之談。這等於直言不諱地承認：南斯拉夫內部反對鐵托的勢力正在迅速發展，已經成為鐵托政權的威脅。最後，這還證明杜魯門和鐵托給「顛覆分子」下的定義是完全一致的。

倫敦「經濟學家」在評論杜魯門總統的聲明時說（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造成政府（對支持鐵托）的偏愛的最強有力的因素無疑是不能喪失鐵托前三十二個師這件事的重要性。總統在他給國會領袖的原來的信裏面說明了下面這一點：鐵托元帥除了作為一種政治象徵的重要性以外，還擁有他次於蘇聯的歐洲最強大的軍隊；現在很清楚，只要這支軍隊還在鐵托控制之下，西方在緊急情況下就可以——即使沒有緊急情況也同樣可以——憑藉這些軍隊牽制至少同等數量的蘇聯軍隊；但是，如果南斯拉夫不能立刻得到援助，鐵托對付顛覆分子的能力就會受到

「即使不是致命的至少也是嚴重的」損害。」

到一九五一年一月，美國看翼報紙就在公開宣揚鐵托·南斯拉夫在美國反動派的戰爭計劃裏的中心任務了。「舊金山紀事報」在一月初寫到：

「南斯拉夫是民主國家戰略防禦綫（在英文裏面這句話的意思是『帝國主義戰略防禦綫』——著者）上的重要據點……如果丟掉這個據點，希臘就會隨之而去，也許還有土耳其。整個中東、近東也都會接踵而去的。」

約瑟夫·阿爾索普和斯圖華特·阿爾索普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評論「鐵托的價值」時寫道（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八日「紐約先驅論壇報」歐洲版）：

「……三十個南斯拉夫師，將近三十師的土耳其軍隊和重裝旗鼓後的希臘軍隊……湊在一起，他們事實上要比想像中的西歐最少要耗費兩年時間才可能組織的在阿軍隊還要龐大……喪失南斯拉夫（即鐵托垮台——著者）的結果幾等於一次大戰的最後失敗。」

換句話說，一九五一年一開始，鐵托扮演的角色實際上就已經不再是秘密了。南斯拉夫鐵托分子在西方反對蘇聯和反對人民民主國家的侵略戰爭計劃中扮演着主要角色，這個事實已被公開承認。

在鐵托這方面，也為情勢所迫而日益顯露原形。他否認希望從西方帝國主義那兒得到戰爭物資。這種否認很快就變成了在公開場合下使用的托詞。他起初說自己是保持

「中立」和「獨立政策」的。但是他和他的集團很快就公開和美國的戰爭政策一鼻孔出氣了。鐵托在一九五一年九月二日接見「觀察家報」特派記者時，用一種和任何美國大使館的官方報告毫無二致的語言表示和蘇聯與各人民民主國家合作是不可能的，並且說西方給他的完全是仁慈的大公無私的援助。他反對五大國和平公約的想法。他說南斯拉夫和保皇法西斯的希臘與土耳其獨裁政權的合作是必要的。

在這幾天以前，「紐約先驅論壇報」的記者曾經發表了她單獨訪問這位元帥的報道（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八日）。鐵托對她說，「如果蘇聯進攻歐洲任何地方，即使這種攻擊離開南斯拉夫自己的邊境很遠」，他也會「立刻站在西方這邊作戰……南斯拉夫認為自己是正在建立中的反對蘇聯帝國主義的集體安全的城牆的一部分」。

這是杜魯門的語言，也就是和西方戰爭計劃者所使用的完全一樣的語言。真理被整個顛倒過來。當他們事實上正在以蘇聯為對象準備進行侵略時，他們說這種侵略是蘇聯計劃的。但是，現在鐵托分子連他們是西方戰爭計劃裏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重要工具這件事也不再隱諱了。

杜魯門特使阿弗里爾·哈里曼先生在國務院的石油專家們的陪伴下從伊朗返國，歸途中於一九五一年八月底訪問了鐵托，他們在討論外交政策和戰爭問題時發現彼此意見完全是一致的。這件事還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嗎？

鐵托南斯拉夫已經被美國帝國主義錄用作戰爭計劃裏的一名爪牙。



## 第五章 鐵托分子今天扮演的角色及其策略(下)

### 製造反蘇謠言的兵工廠

鐵托的任務和他的前輩托洛茨基一樣，不只是幫助帝國主義進行反社會主義的戰爭計劃，而且要源源不絕地供給帝國主義用左派語言和革命詞句喬裝起來的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謊話和謾言。幾乎全世界所有國家裏的南斯拉夫大使館以及貝爾格萊德用外國文字所發表的大部分材料都十分明確地說明了這一點。

有史以來，世界上從來沒有像過去三年來南斯拉夫官方在國內外所發出的那麼多的政府授意的官方宣傳品到處氾濫。這些宣傳品用幾十種語言印出，免費地發給成千成萬的人，雖然人們並不索取它，也不需要它。數以噸計的（照字面解：並非借喻）文字重量向各方向發出，從這一點來看，就十分清楚，這種宣傳的費用不是單來自南斯拉夫，甚至大部分都不是來自南斯拉夫，而是用美元、英鎊和狄那一起支付的。在南斯拉夫國家機器裏面充當戈培爾這一類角色的德吉拉斯曾經在南斯拉夫宣傳部裏增加了一個「反對共產黨情報局宣傳處」，這個機構在一九四八年得到了四千萬狄那，一九四九年得到

一億多狄那。南斯拉夫廣播電台用約十四種語言向國外散播它的謠言。爲什麼英國政府在戰爭快結束時會那麼變快同意南斯拉夫修理主要廣播電台和擴充廣播設備的要求，這裏面的原因現在已不難理解。

隨便把最近鐵托分子的出版物拿一套來簡單地作一次數學分析，就足使我們看出這些「新型共產主義者」對於攻擊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是多麼熱心，而對於西方資本家却除了偶爾爲了籠絡人心而作一些不痛不癢的批評以外就絲毫不敢觸犯。

以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五〇年六月期間南斯拉夫當局在倫敦所發佈的「南斯拉夫公報」前三十期爲例來說。這裏給它作一個簡短的分析。第一期裏面有對世界和平大會和英國和平大會的攻擊；對於西方帝國主義並無攻擊。第二期裏面有對「工人日報」和對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的攻擊；對西方帝國主義並無攻擊。第三期裏面有對英國和平委員會，對國際學生聯合會，對英南協會（南斯拉夫人民的朋友的組織，因此是批評鐵托政權的）的攻擊；對西方帝國主義並無攻擊。第四期裏面有對英南協會，對新匈牙利和對共產黨情報局的攻擊；對西方帝國主義並無攻擊。第五期裏面有對保加利亞人民民主制度的攻擊，有對季米特洛夫的捏造事實，有對蘇聯的攻擊；對西方帝國主義並無攻擊。第六期裏面有對世界工會聯合會和對新匈牙利的攻擊；對西方帝國主義並無攻擊。第七期裏面有對保加利亞政府的攻擊；對西方帝國主義並無攻擊。第八期裏面有對共產黨情報局的攻擊，並企圖用一系列曲解的事實指責蘇聯的貿易政策，爲南斯拉夫和西方的貿

易辯護。第九期裏面有對蘇聯的攻擊，以及爲喬里亞庫斯先生反蘇宣傳的吹噓。

第十一期到第二十期裏面除了其他東西以外還攻擊了共產黨情報局（爲數甚多）、英南協會、國際學生聯合會、英國共產黨黨員、世界民主青年聯盟、保加利亞政府、世界工會聯合會以及蘇聯（爲數甚多）。

第二十一期到第三十期裏面攻擊了國際新聞工作者協會、共產黨情報局（爲數甚多）、蘇聯（爲數甚多）、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匈牙利、和平請願運動以及西班牙共產黨。

這是三十期裏面對蘇聯、共產黨和進步人士的攻擊和誹謗的極爲簡略的敘述。在很多情況下，這些攻擊和誹謗佔去公報大部分篇幅。對於西方帝國主義的攻擊，即使誇張一點來說，也不過是滄海之一粟而已。

這種「新型共產主義」博得了資本家的歡心，難道還有什麼奇怪的嗎？

這樣的分析同樣可以用在過去兩年來任何南斯拉夫報刊上面。拿所謂「南斯拉夫保衛和平委員會」出版的「捍衛和平」雜誌作爲例子來看。這個雜誌在一九五〇年一月至二月出版的第一和第二期裏面除了別的文章以外就是對共產黨情報局、世界工會聯合會和蘇聯科學的攻擊。還有論南斯拉夫中世紀藝術和論與孔子差不多同時代的中國哲學家墨子的文章。這裏面攻擊資本主義的一篇文章是一九一〇年塞爾維亞一個社會主義者的演說詞的翻版，並沒有任何比較新鮮的東西。資本主義戰爭販子或金融巨頭都會毫不

如考慮把這篇文章拿給他們的孩子們看。這是一種十分「愜意」的和平運動，是使戰爭販子開心的和平運動。

或者拿南斯拉夫（鐵托分子）新聞工作者聯合會一九五〇年七月用英文及其他文字出版的所謂「國際問題評論」為例。這個以建立鐵托分子的國際講壇為目的的反動透頂的雜誌裏面，特別刊載着下面的文章：攻擊共產黨情報局、意大利共產黨、蘇聯、以色列共產黨、蘇聯哲學、蘇聯「知識」雜誌、意大利共產黨機關報「團結報」、「消息報」、蘇聯作家西蒙諾夫、莫斯科廣播電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比利時共產黨機關報「紅旗報」、布拉格廣播電台、布達佩斯廣播電台、德國統一社會黨、西德共產黨以及西班牙共產黨。這些文章大部分是用「左翼」的詞句寫的。我們很難發現任何保守黨雜誌——甚至於戈培爾過去的任何出版物——在這樣比較短的篇幅裏面集中發表過這麼多反蘇反共的謬言。必須說明的是，這一期比起後來各期來還算是一溫和的。

或者拿所謂南斯拉夫共產黨機關報「戰鬥報」來看。從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開始的四個月內出版的一百零五期裏面，沒有一篇攻擊英國或美國帝國主義的社論或專論。但是同樣這一百零五期裏面却有一百七十四篇對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進行全面攻擊的社論和長篇報道。「戰鬥報」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至五月一日期間登載了十三篇攻擊阿爾巴尼亞的長篇大論，十五篇攻擊保加利亞的，八篇攻擊匈牙利的，以及其他文章。但所有這些，在鐵托分子的宣傳中都還是屬於較早的、「比較溫和」、比較「公正」的時期。

一九五〇年，對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共產黨、和平與民主組織的攻擊就日益擴大，日益囂張，而且日益頻繁了。代替對西方資本主義不發一語的態度的是更露骨地替帝國主義大國的內政外交政策捧場的粉飾性的文章。

那麼，鐵托的「戰鬥報」何以是右翼報刊以及英、美、法和西德的右翼勞工領袖的報刊引用最多的報紙，這一點還很難理解嗎？

鐵托報刊上的反蘇、反民主的誹謗被資本家的右翼報刊如飢如渴地採用着。鐵托南斯拉夫已經變成製造這種謠言的主要兵工廠。

很多人對於保守黨人、托辣斯與其他國家裏和他們一鼻孔出氣的人這種公開來源是信疑參半的。因此，鐵托分子比較狡猾和牽強附會的謊話就得出售了，就如三十年代托洛茨基分子的謊話得出售一樣。「泰晤士報」和「電訊報」、「每日快報」或「每日郵報」、「紐約時報」或「紐約先驅論壇報」，赫斯特系報紙或「華爾街日報」幾乎一字不改地抄襲着它們的同夥「戰鬥報」的捏造，有時註明來源，有時不註明來源。

「紐約先驅論壇報」駐貝爾格萊德記者在一九五〇年四月六日該報歐洲版上寫道：「貝爾格萊德每隔幾天就要控告共產黨情報局進行新的性質醜惡的、見不得人的反南斯拉夫的活動」。他列舉一九五〇年最初數月的幾次「控告」——「羅馬尼亞秘密警察的行爲」，對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攻擊，「保加利亞秘密警察的行爲」，和對多瑙河委員會的攻擊等等。這一切謠言都被資本主義報刊廣泛轉載。英國和美國的一切資本主義報刊都與

高采烈地記載着鐵托分子發表的一個名叫德·麥·季米特里耶維奇的南斯拉夫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監獄裏面遭受所謂「慢性謀殺」的消息。「戰鬥報」的傑作經過南斯拉夫通訊社的公報和鐵托分子其他出版物傳播到世界各地；接着資本主義的報紙上就會出現數不清的大談其「鐵幕背後的警察國家」罪惡的文章——對於一切陷害和憎恨共產黨人的編輯說來，這是一個供應鐵幕故事的廉價來源。事實上，季米特里耶維奇是和其他一些南斯拉夫人一道因為合謀反對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進行非法貨幣交易而在布拉格被捕的。他因為長期患心臟病，雖然得到很好的醫療，結果還是死掉了。

一萬個例子也是舉得出來的。一九五〇年七月四日「紐約先驅論壇報」（歐洲版）曾經以顯著地位登載一篇俄國人侵佔捷克斯洛伐克油田的驚人故事。這篇故事裏面沒有絲毫真實的東西，但是它所註明的來源是——貝爾格萊德。一九五〇年七月六日同一報紙在「尤金·瓦爾加拜訪匈牙利貿易首腦」這個標題下加上引人注目的副題：「鐵托報紙『呼聲報』稱蘇聯經濟學家是『經濟上的獨裁者』」。這裏面沒有絲毫真實之處，但是它所註明的來源是——貝爾格萊德。意大利和法國共產黨的領袖帕爾米羅·陶里亞蒂和莫里斯·多列士兩人都因為患重病而在蘇聯接受他們迫切需要的醫療。資本主義報刊需要一篇「下流報道」：一篇特別醜惡的反共報道。於是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一日的「紐約先驅論壇報」（歐洲版）就刊載了一篇報道，說他們是應召到莫斯科去接受使他們國家從屬於蘇聯的命令的。

甚至於資本主義的報紙似乎也不敢大胆地主動捏造這樣的事，所以轉載時加上了這個電頭——只爾格萊德電。耐心地研究一下資本主義世界裏所有最反動的右翼報紙就會發現：它們有一個供應「反蘇、反人民民主、反共產黨人材料的豐富來源——鐵托南斯拉夫的報紙和新聞處。

如果在一九四九年鐵托報紙的主要路綫是對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國家進行攻擊和誹謗，對西方則隻字不提；在一九五〇年它就進而替西方帝國主義明目張胆地歌功頌德和粉飾太平。正如拉伊克審判案所揭露的：他們的宣傳計劃是：第一，提高南斯拉夫的身價，使鐵托南斯拉夫成爲衆望所歸的中心，轉移人們對蘇聯作用的注意；其次，逐步開始公開攻擊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對於西方國家，除了問或有些含糊其詞的批評以便使其反蘇謬言看起來似乎有幾分真實性而外就絕口不談；第三，日益露骨地爲西方資本主義粉飾。

「一九五〇年四月七日，鐵托接見了「泰晤士報」的記者。他的主調是「西方比東方好」。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七日，鐵托又在南斯拉夫國民議會兩院聯席會上講了話。

「每日先驅報」（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八日）報道鐵托的消息時的標題是「鐵托說：我們轉向西方」，並且說這是「他對西方最緩和的一次演說」。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亞歷山大·韋爾思在「曼徹斯特衛報」上報道鐵托二十八日舉行記者招待會的消息時說：

「鐵托說西方並沒有對他加什麼政治壓力。總的說起來，他認為：和西方的經濟關係的發展在經濟上已經補償了共產黨情報局抵制所造成的損害……。」

美國政府、英國保守黨人和運輸大廈●千方百計地在替馬歇爾計劃辯護，掩飾美「援」的殖民性質。他們這樣做是一天比一天困難了。他們碰到的阻力一天比一天大。因此，他們就拋出鐵托這張牌來說明西方帝國主義「慷慨好施」的本質，說明資本主義已經不再是資本主義了。

但是資本家在哪方面最需要鐵托分子的宣傳來幫忙呢？當然是在實行他們的中心目的——準備反對社會主義與人民民主國家的侵略戰爭這方面。

當資本主義後方的人民逐漸開始感覺到日益接近的戰爭危機時，帝國主義需要鐵托幫忙迷惑他們，使他們麻痺起來。

當資本主義後方的人民逐步開始認識準備侵略的是他們本國的政府、他們本國的統治者的時候，資本家就努力掩蓋自己的備戰活動，把自己於侵略目的與侵略計劃偽裝成對付所謂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侵略的防禦計劃。既然要歪曲事實、顛倒黑白，還有什麼比鐵托更好的工具呢？

當資本主義後方的人民逐漸聽到蘇聯爲了和平、爲了和平解決西方和東方之間以及



各大國之間的一切問題和糾紛而提出的具體計劃，開始認識到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要求和平、並且正在為爭取和平而努力的時候，西方帝國主義就設法隱瞞蘇聯的和平政策及其一切和平建議，並加以歪曲。這也是交給鐵托分子的任務。

當資本主義後方的各國人民，和社會主義與人民民主的新世界的各國人民一起，開始聯合起來，團結一致，在保衛和平的世界性運動裏組織起來，孤立和揭露戰爭販子的時候，美國和英國政府、托辣斯、保守黨人和右翼工黨領袖的基本工作就是攻擊、誣蔑、破壞這個為它們所痛恨而又畏懼的運動。所以鐵托分子的詭辯也被投入戰鬥，來輔助人所週知的反動派對和平運動的公開攻擊。

鐵托分子的宣傳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努力破壞國際進步運動的團結——包括世界工會聯合會、世界民主青年聯盟、國際學生聯合會，特別是世界和平運動。

鐵托分子在他們慣用的冒牌革命詞句的掩蓋下從事於麻痹人民的工作，使他們產生一種安全的幻覺。他們的方法就是否認帝國主義追求戰爭這個事實：

「我並不認為有任何迫在眉睫的戰爭危機。……熱戰似乎不一定會代替冷戰。」  
(一九五〇年四月八日鐵托接見「泰晤士報」記者時的談話。)

其次他們努力想證明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爭取和平的從不間斷的努力只是毫無誠意的虛偽的姿態。在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為爭取和平而作的繼續不斷的耐心的努力、他們屢次提出的具體和平方案和他們為進行和平談判而作的許多嘗試開始使資本主義國家

的右翼都爲之所動的時候，這種工作就更加重要起來。所以大資本家們就擰開鐵托這個龍頭了：

「南斯拉夫共產黨機關報『戰鬥報』在歐洲勝利日五週年紀念的一篇論文中攻擊蘇聯的政策，認爲它『基本上是帝國主義的』，並稱，從俄國對南斯拉夫的態度和他的宣傳戰、經濟封鎖以及『販賣戰爭的言論』來看，和平口號的缺乏誠意是顯而易見的。」（一九五〇年五月十日「泰晤士報」。）

其次，鐵托的宣傳家們努力想證明戰爭的危險並不是從西方來的，而是從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來的。凡是在西方資本家發動新的侵略戰爭——或在越南，或在朝鮮，或在馬來亞——籌備什麼新的戰爭集團，或者進行新的重整軍備的活動時，鐵托分子就被抬出來，開始大談其「戰爭恐怖」，對蘇聯或東歐大肆誣蔑。凡是鐵托分子自己在他們邊境上採取什麼新的好戰的步驟時，他們就設法把責任推到鄰近各國身上去。如果西方的戰爭宣傳受到一種和平浪潮的「威脅」，鐵托分子的報刊就奉令到他們的邊境上去發現一些新的「威脅」。

因此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七日鐵托情報機構首腦維·德狄耶爾就在貝爾格萊德揚言說南斯拉夫邊境上有敵方軍隊活動。這種宣傳是專門說給國外讀者聽的：

「今天貝爾格萊德報紙並未引用德狄耶爾談論蘇聯在南斯拉夫附近備戰活動的演講中更驚人的聲明，這也許是頗堪玩味的……看來這些聲明似乎主要是想使外國

輿論有所警惕。」（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八日，「曼徹斯特衛報」駐南斯拉夫記者。）

七月中旬，新的挑釁運動開始了，「人民軍隊」（貝爾格萊德出版的軍隊報紙）捏造了許多關於保加利亞軍隊在南斯拉夫邊境上活動和羅馬尼亞軍隊在南斯拉夫邊境採取「非常措施」的報道。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星期泰晤士報」駐南斯拉夫記者埃里克·鮑恩根據他慣常引用的鐵托分子的消息來源報道了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軍隊在南斯拉夫邊境上調動的消息。這正配合了粉飾美軍在朝鮮的行動這種特別迫切的需要。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紐約先驅論壇報」駐貝爾格萊德記者也唱起了同樣的調子。美國在朝鮮的侵略需要使人忘懷。南斯拉夫的重整軍備及其與之俱來的瀕於絕境的經濟情況，也需要「說明道理」，因此：

「鐵托元帥今晚指責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已經武裝了六十萬人……元帥警告這些國家在進行反對他的政權的大規模的軍事準備工作。」（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紐約先驅論壇報」歐洲版）

這正是朝鮮事端在英國、美國和整個西方逐漸引起廣泛地爭取和平談判的運動的時候。因此就需要鐵托元帥和杜魯門、邱吉爾、蔣介石一道幫忙轉移人民的視線，使他們不注意和平解決的道路。

「在他大力抨擊不惜任何代價以求與蘇俄和平共處這種念頭的時候，這位元帥譴責了他所說的『慕尼黑式的和平』（赫斯特系報紙上也用這個口號——著者），這

是侵略者的和平。……在這種情況下，要希望侵略者終會有一天心滿意足，就得要有一個或幾個國家遭受奴役。這種和平只是空中樓閣。這並不是和平。」（同前。）

由此可知，凡是杜魯門或邱吉爾或莫里遜需要替他們的好戰行動找藉口的時候，鐵托分子就會給他們提供這種藉口。

最後，鐵托分子在他們協助華爾街的戰爭運動的工作中力圖證明世界性的人民和平運動是共產黨的姿態，就好像三十年代的托洛茨基分子力圖證明爭取集體安全反對法西斯的世界性運動是共產國際的姿態一樣。當全世界反對原子彈的簽名運動在人民爭取和平的鬥爭中佔首要地位的時候，鐵托一方面禁止在南斯拉夫進行這種簽名運動，同時就指揮他的宣傳機器來反對這個運動。爲了破壞世界和平委員會的有組織的爭取和平運動，鐵托分子設立一個冒牌的南斯拉夫和平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唯一工作是設法從內部分化其他國家的聲勢浩大的和平委員會。

「共產黨情報局爭取和平的宣傳口號是虛偽的。」（一九五〇年五月十日「泰晤士報」關於「戰鬥報」的一篇文章的報道。）

「鐵托元帥說宣佈原子武器非法問題的辯論是在浪費寶貴的時間」；……只有具體行動才能說明誰擁護和平誰不擁護和平，空洞的宣言和漂亮話都是無濟於事的。」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六日「曼徹斯特衛報」報道，聯合國記者協會電話訪問鐵托記。）

由此可知，當爭取和平的鬥爭在西方帝國主義備戰運動面前成爲面臨全世界所有進步人民的中心任務時，鐵托分子却力圖爲戰爭販子粉飾門面，顛倒黑白，把責難都推在愛好和平的國家身上，誣譏蘇聯的和平建議，破壞世界和平運動。希特勒也曾經有過按照這些路綫辦事的「和不宜傳家」。

### 鐵托分子在聯合國

鐵托分子在聯合國組織裏面也扮演着同樣的角色。

到一九四九年年底，想在聯合國組織裏面對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隱瞞事情的真相是越來越困難了。他們無法隱瞞這些事實：和平的障礙是從帝國主義那方面來的；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忠於聯合國憲章，他們接連不斷提出按照聯合國憲章維護和平的具體方案。「莫洛托夫說不行」這種神話日益軟弱無力；對每一個具體的和平方案都說「不行」的是貝文、赫克特·麥克納爾、艾奇遜和杜魯門。蘇聯代表建議廢除原子彈並建立國際管制。答覆是「不行」。他們建議五大國裁減軍備三分之一。答覆是「不行」。他們建議締結五大國和平公約。答覆是「不行」。他們建議再建議，讓步又讓步，答覆永遠是一樣——「不行」。

社會輿論譁然，忍耐不下去了。這時候需要某種新武器給蘇聯建議潑冷水，使貝

女——艾奇遜拒絕任何和平建議這事能言之成理。這就是鐵托分子在聯合國組織裏面的代表的特殊任務。右派對蘇聯建議的攻擊已經變成了陳腔濫調——因此就要從「左」邊來打兩拳。這裏也是按照常例進行分工的。

在聯合國第四屆和第五屆大會上，無論是全體大會還是任何委員會的會議上，只要蘇聯或人民民主國家的代表提出一個具體的建議，鐵托分子——卡德爾或約澤·波爾范或德狄耶爾或者另外一個人——就會一躍而起，用冒牌的革命字眼猛烈抨擊那個提案，誣衊它是「虛偽的」、「缺乏誠意的」，對提案國家進行一系列的誹謗；然後在美國、英國、蔣介石、菲律賓和其他美國附庸國家代表的喝采聲中就座。然後美國或英國的代表就站起身來，熱誠贊同他們「從南斯拉夫來的夥伴」的拔刀相助；拾起那些誹謗繼續嚼舌一番，對原提案則連討論都表示拒絕。有時南斯拉夫代表也會用棄權來證明他的「獨立性」，但是在一切重要問題上他投的票都是「倒向西方」的。當一部分美國右翼報紙對這種絕無僅有的棄權表示反對的時候，另外一部分眼光比較遠大的就會回答說：「爲了表現『鐵托的獨立』，這些棄權都是必要的。因爲，如果他並不是『獨立的』，他就不能繼續做一個真正有用的附庸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蘇聯代表在第四屆聯合國大會的全體會議上提出了具體的和平方案。這次代表鐵托分子講話的是卡德爾。

「在上週聯合國大會的辯論中，南斯拉夫外交部長卡德爾明確地控訴蘇聯干涉

南斯拉夫內政。他並且說，一個國家「不能一方面自稱有和平的願望，一方面又對南斯拉夫大肆威脅，就像蘇聯政府不斷加在南斯拉夫身上的那些威脅一樣。」（一九四九年十月七日倫敦美國大使館發表的「美國新聞公報」。）

英美代表們隨聲附和地說，我們的同僚卡德爾先生當然是正確的。這樣一個虛偽的提案我們怎麼能夠加以討論呢？資本主義報紙則一方面隱瞞或曲解蘇聯提案，一方面大字標題登載鐵托分子的誹謗。

又如幾天以後，在同一屆聯合國大會的經濟委員會上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代表指出了美國政府所奉行的抵制東西貿易的政策，並提出對和平與人民經濟情況有利的改善和發展東西貿易關係的具體建議。鐵托分子威爾范博士就跳起來說話了：

「聯合國經濟委員會已經接到一份分析報告。這份報告指出蘇聯在國際經濟關係上所用的手段和建議中的聯合國對落後地區進行技術援助的方案之間存在着尖銳的對比。

「這種比較是南斯拉夫的約澤·威爾范博士指出的，他控訴蘇聯有帝國主義行爲。……」（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美國新聞處」消息。）

「不錯呀，英美的代表們隨聲附和地說，威爾范博士說得對。蘇聯是帝國主義。杜魯門第四點計劃萬歲！」

辯論繼續着。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國家的代表提出一個又一個計劃。鐵托分子們用

煽動性的辭令發動了攻擊：

「南斯拉夫代表薩瓦·科薩諾維奇說在蘇聯的共產黨情報局同盟國正受到催促，要他們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推翻南斯拉夫政府的時候，由蘇聯來呼籲簽訂新的和平公約是一種十分顯然的矛盾。」（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美國新聞處」消息）全世界的美國新聞機構都在傳播鐵托分子的謠言；對於和平建議則加以抵制。資本主義報紙附和鐵托分子的誹謗，對於和平建議不是絕口不提就是斷章取義。鐵托分子說社會主義是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則是慷慨大量，帝國主義的代表們聽得眉飛色舞之餘，就同意、支持和附和鐵托主義。

一九五〇年年在日內瓦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上，同樣的任務又落在鐵托分子頭上。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國家的代表又一次提請各國注意美國的反動貿易政策和美國指示共「附屬國」割斷對東歐的貿易的命令，使帝國主義的代表們都感覺狼狽不堪。

英國、法國以及斯堪的納維亞各國等國家對美國的經濟獨裁愈來愈憎恨。它們一天比一天清楚：服從美國要他們抵制或割斷對東方的貿易的命令，就會逐漸使他們自己一天比一天更殖民地化，並從屬於危機四伏的美國經濟。要求改弦易轍，增加東西貿易的意見越來越多。俯首聽命於華爾街這件事怎麼說得過去呢？這又輪到鐵托分子講話了。

「南斯拉夫的約澤·威爾范博士回答說，他的國家曾經有機會變成『一個殖民地』——一個蘇聯的殖民地，但是它拒絕接受這個機會；」顯然，在蘇聯看來，只有



附庸和主人而沒有獨立國家這個名詞。」（一九五〇年六月十日倫敦南斯拉夫大使館新聞公報，「美國新聞處」消息。）

「好極了！」資本主義的代表們說，「我們的『共產主義的同僚』說得還不清楚？帝國主義並不是帝國主義，蘇聯才是帝國主義呀！爲什麼說美國禁止對東方的貿易這種廢話？想，想被社會主義國家的帝國主義所抵制的可憐的小南斯拉夫吧，」他們想到這一點的時候就眼淚盈眶了。

「南斯拉夫代表對蘇聯及東歐其他國家作了嚴重而令人信服的控訴……事實是這樣的，一個小國家發現它和某些最接近的鄰國的貿易完全被片面地割斷了……。」

（美國代表團艾歇先生繼南斯拉夫代表講話後在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上的發言，同前「美國新聞處」消息。）

關於鐵托和杜魯門關於「蘇聯帝國主義」的謊言何以完全是顛倒黑白、違反歷史事實的，我們將在第七章裏面詳加研究。

在一九五〇年年底舉行的第五屆聯合國大會中，不僅在一般和平問題上，而且在朝鮮這個具體問題上，同樣的喜劇繼續上演着。這時候美國帝國主義已經賞給南斯拉夫一個安全理事會的席位（邱吉爾也因這件事而頗爲高興）。在這裏，爲了使鐵托分子在總的方面對美國侵略朝鮮的支持來得更有力 and 更有「威信」，鐵托分子偶爾棄權也同樣是可以容許的。在這裏也同樣有分工，當公開的右翼報紙直接替美國的侵略和聯合國的非法決

議辯解時；鐵托分子則集中精力來歪曲事實，努力想證明朝鮮戰爭是蘇聯和共產黨情報局的過錯。

當一九五一年六月底馬立克先生公佈蘇聯主張在朝鮮停火和恢復和平的提議時，暗地裏主動「勸告」美國政府不要接受這個提議的就是鐵托分子。

「主動警告美國人不要鬆懈反蘇的警惕性的是南斯拉夫人……（他們）甚至於警告美國人不要在朝鮮問題方面上了蘇聯的圈套。據說這種對美國提出的毫不妥協地反對俄國的勸告在歐洲其他各國首都還是比較罕見的。」（一九五一年七月九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的確，只有李承晚和蔣介石才作過鐵托分子這樣的「勸告」。

當第五屆聯合國大會政治委員會討論蘇聯關於「制止新戰爭威脅、鞏固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宣言」的提議時，卡德爾斥責這個提議並聲明他要投票反對這個提議。在討論侵犯人權問題的時候，鐵托分子斥責的不是槍殺尼日利亞礦工的英國當局，不是虐待在英領土內佔絕大多數的非洲人口的南非聯邦，不是虐待黑人的美國，而是匈牙利，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鐵托分子支持非法重選特拉佐夫·賴伊担任聯合國組織的秘書長。但是他們最賣力的方面還是在朝鮮問題上。當蘇聯代表否認安全理事會六月二十七日關於朝鮮決議的合法性時，南斯拉夫棄權。當蘇聯代表呼籲美國停止轟炸朝鮮城鎮與和平居民時，南斯拉夫也棄權了。

鐵托的外交部長卡德爾把美國侵略朝鮮的責任推在蘇聯和共產黨情報局身上。他說，這不是朝鮮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而是：

「這個國家廣大人民對解放的期望在這裏，和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一樣，被濫用來服務於一個外國霸主的最高決策的目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不禁要拿朝鮮的情況和自己的情況比較一下，這種情況就是：我們現已處在忍受蘇聯所領導的共產黨情報局各國政府不斷的瘋狂侵略運動的第三年了。……」（卡德爾在離開貝爾格萊德赴聯今國大會前夕的演說詞。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南斯拉夫半月刊」。）

他絲毫不提美國侵略，美軍大批被派到朝鮮國土上去和蘇聯軍隊完全撤出朝鮮國土這些事實，絲毫不提任何足以觸怒杜魯門或邱吉爾或蔣介石的字！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被「泰晤士報」駐貝爾格萊德記者描寫為「南斯拉夫國民議會外交委員會委員和鐵托元帥的親密助手」的德狄耶爾在鐵托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刊物「共產黨人」上發表了一篇關於朝鮮的文章。朝鮮人民那種罄竹難書的苦難從何而來？美國飛機對朝鮮城市和鄉村日夜不息的轟炸和英美戰艦對朝鮮城市和鄉村日夜不息的砲擊是爲了什麼？爲什麼美、英、土、邊、非等國的軍隊要到離開他們自己的國家幾千里的朝鮮土地上來屠殺朝鮮人呢？德狄耶爾先生的答覆是這樣的：

「德狄耶爾認爲朝鮮所發生的事是蘇聯意圖統治世界的表現……如果成功地抵抗這種意圖……全世界的工人都必須『認識到又有一個角逐世界霸權的國家出現

了，並且要消除認爲蘇聯代表着所謂民主和平力量的這種幻覺」。……「蘇聯官僚機構的基本任務就是拖延中國革命的發展，使中國而臨着的國際形勢複雜起來……」。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泰晤士報」駐貝爾格萊德記者訊。）

關於美國的政策連一個字都沒有提。德狄耶爾的文章使用那麼多冒牌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使「泰晤士報」的社論或「紐約先驅論壇報」上華爾特·李普曼的文章看上去都好像是「赤色分子」的大作，使尼赫魯的聲明看上去好像一個危險的革命者的宣言。鐵托分子關於朝鮮的文章和演說被赫斯特系報紙登在顯著地位這件事有什麼奇怪呢？

帝國主義美國最右翼的週刊之一「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在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八日發表了一篇冗長的「貝爾格萊德某南斯拉夫高級官員」訪問記。該雜誌說，「這裏發表的訪問記裏面有南斯拉夫政府某高級官員的答覆。問題和答覆均曾經鐵托內閣討論，故其中表示的看法代表鐵托共產黨人的權威意見。」對於「你對於朝鮮形勢如何理解？」這個問題，那位「高級官員」表示了下面這種「權威意見」：

「朝鮮的衝突純粹是俄國人的偽裝。蘇聯想把遠東局勢搞得非常複雜和混亂。它想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引起戰爭。這就是整個問題的關鍵……俄國在朝鮮的行動是不折不扣的侵略。蘇聯不僅打算侵略南斯拉夫，而且打算侵略歐洲其他各國。它希望使整個歐洲都附屬於它。」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幾乎每星期都在呼籲武裝西德、日本、佛朗哥西班牙和鐵

托南斯拉夫。它對艾德禮先生的英國比對鐵托的南斯拉夫還要批評得苛刻些。這有什麼奇怪嗎？杜魯門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宣稱鐵托南斯拉夫完全符合於美國的「戰略的和政治的利益」這件事又有什麼奇怪呢？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共產黨情報局在關於南斯拉夫的決議裏面說：

「鐵托——蘭科維奇集團變為帝國主義的直接代理人與戰爭販子同謀犯的過程，以南斯拉夫政府在聯合國組織中與帝國主義集團一致行動為最高點。在聯合國組織中，卡德爾輩、德吉拉斯輩與貝勃勒輩已經在國際政策的極為重要的問題上和美國反動派組成了聯合戰線。」

其後一年，鐵托分子和華爾街的戰爭政策更緊密地更露骨地一致起來了。

和三十年代的托洛茨基分子一樣，鐵托分子在冒牌革命詞句的幌子下提供了一座製造反蘇、反共、反進步謬言的兵工廠，作為保守黨人、報紙大王和右翼工黨領袖的公開宣傳家的輔助。和托派一樣，他們的繼承人鐵托分子提供了數不盡的最醜惡、最反動的和販賣戰爭的新聞材料來滿足美國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報紙的需要。

### 從內部破壞左翼

鐵托分子的任務並不限於在報紙上和演說中製造用左的詞句偽裝起來而為全世界反

動報紙和廣播同聲附和的滔滔不絕的右翼宣傳。他們的第三種任務，和他們的前輩托洛茨基分子的任務一樣，是設法打入工人階級和進步運動的核心，進行偵察、搗亂、分化活動，從內部來進行破壞。公開反動派的公開進攻是以隱匿的反動派進行內部腐蝕破壞工作為輔的。無論是在勞動人民統治的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國家還是在資本主義的後方，進步和革命運動愈強大，鐵托分子這種秘密武器對於反動派就愈來得重要。

德國秘密警察，甚至於在希特勒垮台以前的最後幾天，也知道有必要在左翼內部建立秘密「國際」，為塔士重來打下基礎。早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芝加哥每日新聞」和「紐約郵報」記者保爾·加利的瑞士通訊說：

「這些法國人的渣滓正在按照托洛茨基的傳統接受布爾什維克活動的訓練……漢里赫·希姆萊親自指揮的國際……他們正奉令對自己的同胞說，現在的蘇維埃所代表的只是列寧原有原則的資產階級的蜕化，現在正是恢復「健康的」布爾什維克思想意識的時候。這些「真正」列寧主義者小組的成立是希姆萊的最新政策，其目的是創立一個受納粹細菌感染很深的第四國際……」

鐵托分子今天所代表的就是這樣一個國際。這個國際裏面有着同樣的「渣滓」、同樣的「納粹細菌」、同樣的「綱領」，只是控制權和領導權從德國秘密警察的希姆萊手裏轉到了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胡佛手裏。一九五一年一月五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討論了「一九五一年大戰」的可能性。他們估計了一下美國帝國主義有些什麼本錢。他們討

論了原子彈和美國對付其他民族的焦土政策。然後他們談到「鐵托主義——約瑟夫·布羅茲·鐵托元帥所倡導的一種民族共產主義」。他們認為這是另一種反蘇的武器。他們解釋說：「鐵托式的共產黨人在很多國家的共產黨內部都很活躍。在全面戰爭中，他們就會觀望黨的控制權」。美國反動派的這份機關報認為他們是世界工人和進步運動內部的第五縱隊，在戰爭時期對帝國主義是有特殊用處的。

在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裏面，鐵托分子曾經設法，而且現在仍然在設法在共產黨和工人黨內部建立以貝爾格萊德為核心的間諜小組。我們已經看到他們在匈牙利、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按照這些路線所作的一些嘗試，如拉伊克、科斯托夫與霍克西審判案所揭露出來的那樣。這些活動的範圍絕不限於這三個國家。一九五〇年八月初，布加勒斯特對十二名鐵托分子特務進行了審判。這次審判揭露了貝爾格萊德所控制著早在一九四四年紅軍解放羅馬尼亞時就存在的廣大間諜網。同月，布拉格也審訊了一羣以前南斯拉夫駐布拉格的斯拉登副領事塞菲奇·基維奇為首的鐵托特務。這個間諜網也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剛解放就組織起來的。鐵托分子曾經費了很大力氣想在波蘭取得一個立足點。

鐵托分子曾企圖在東歐各國共產黨以至整個進步運動裏面增強其勢力，因此他們不僅招募隱藏在人民團體內部的舊目的特務和反動分子，而且提出經過曲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冀圖打動進步運動內部那些動搖不定的意志薄弱者的心。

他們在整個東歐的主要綱領一直是狹隘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綱領。他們知道幾百

年來巴爾幹與東歐人民裏面最優秀的分子一直是爲反對民族壓迫——反對土巨其侵略者，反對過去奧匈帝國統治，以後又反對西方帝國主義——而鬥爭的。他們知道少數民族曾經遭受迫害，反動派是用發展和煽動人民相互間的民族仇恨和憎惡這種方式來維持自己的統治的。但是現在，人民民主國家裏面出現了一個新的時代。它們終於得到了真正的獨立。一個民族受另一民族統治的時代結束了。舊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基礎廢除了，使新的、進步的、社會主義的愛國主義和東歐各國人民間的真正的國際團結、友好、合作並肩發展的經濟和政治基礎建立起來了。此外，給他們帶來解放的是和蘇聯之間的親密友誼與合作。這種友誼和合作正在幫助他們建立經濟上很強大的獨立國家；爲了維護新獲得的國家主權，這種友誼與合作也是必要的。

鐵托分子希望利用人們思想裏面殘存的舊民族主義。因爲舊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不能在一夜之間就一掃而光。而且，如果不進行强有力的堅持不懈的思想教育運動，即使那些正義的、民主的民族解放鬥爭的往事也有可能被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歪曲爲反動的沙文主義。

因此，鐵托分子就把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作爲他們在東歐的主要綱領。他們拚命煽動南斯拉夫各民族人民對他們的鄰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的仇恨。他們企圖培養一種反對保加利亞和希臘人民的狹隘的馬其頓民族主義，並且提出一切馬其頓人緊聚在鐵托南斯拉夫以內的幻象。他們使一切舊民族主義者，契特尼克、烏斯塔希、大塞爾維



亞主義者和克羅特民族主義者的殭屍復活起來。他們特別希望在東歐各民族的左翼內部發展狹隘的民族主義，並且使這種民族主義的鋒芒指向蘇聯。

蘇聯使各人民民主國家獲得了國家主權，並且使他們有可能維護這種主權。但是鐵托分子的路線是首先離開人民民主國家對蘇聯的友誼，然後煽動民族主義分子反對蘇聯。當鐵托南斯拉夫日益變成美國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時，鐵托分子就把爲反對「蘇聯帝國主義」而鬥爭作爲他們在東歐的主要口號。這完全是顛倒黑白，是杜魯門——艾奇遜的思想路線。

西方反動派正因爲深明此理才對鐵托的「民族主義」大加讚揚。

「民族主義在東歐仍然是一股潛在的力量……鐵托元帥的誇言對於千百萬秘密地——或公開地——站在他一邊的人都將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鐵托主義在東歐」，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日「泰晤士報」社論。）

「……鐵托運動極爲鼓舞人心，因爲它的力量來自民族主義。……」（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每日電訊報」艾登先生的話。）

「最重要的是「鼓勵鐵托元帥在反對俄國消滅東歐各國人民間的民族主義的企圖時所發展的思想路線」。（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泰晤士報」。赫克特·麥克納爾在加拿大的加拿大俱樂部與聯合國協會的講演詞。）

在東歐，各國人民面前的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各人民民主國家已經在蘇聯援助下

獲得了國家主權，歷史上所有會為他們國家的民族解放而鬥爭的人的犧牲都已得到報酬。但是鐵托在東歐的綱領却是「民族主義」，即資產階級民族主義。

拿鐵托分子在殖民地 and 附屬國——特別是在印度、非洲、中東和遠東——的任務和他們在東歐的任務比較一下是很有意思的。鐵托分子的主子要他們和他們的前輩托洛茨基分子一樣，在這些地區擔負一種特別重要的任務。

殖民地人民不會因為社會民主主義就輕易地放棄他們的民族解放鬥爭。對殖民地人民的剝削給帝國主義剝削國家提供了發展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基礎，但是殖民地國家本身並沒有與此相當的便於社會民主主義發展的經濟基礎。因此，帝國主義要使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放棄反帝鬥爭，就不得不尋找新的思想武器。

基於這種理由，早在三十年代資產階級的托派特務就擔負了一種特別重要的破壞任務——不僅在共產黨內部，而且在有他們存在的社會黨內部，以及民族運動內部。托洛茨基分子濫用這些人的烈火般的革命精神，利用若干殖民地國家裏面馬克思主義組織的理論水平較低和進步政治組織較弱這一事實，而在極左的口號下設法破壞廣大反帝陣綫的團結，離間先鋒隊和羣衆，使殖民地附屬國人民的鬥爭與帝國主義國家裏面的工人階級鬥爭分道揚鑣。

他們在革命運動尚未到達適當階段時就要求立即為社會主義而鬥爭，他們（在錫蘭、印度、北非各地）把反法西斯鬥爭誣蔑為帝國主義的策略。他們提出正中法西斯黨

徒下懷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口號（「反對白色帝國主義」等等）。這樣就給印度支那、錫蘭、北非、印尼的反帝鬥爭帶來了很大的損害。日本秘密警察和德國秘密警察對於殖民地國家裏面這一類組織的發展是極爲重視的。

今天，托派在這方面的任務也落在鐵托的肩上了。民族解放運動已經大踏步地前進了。整塊的廣大地區已經贏得了獨立。工人階級已經取得或正在取得解放運動的領導權。在很多殖民地 and 附屬國，共產黨已經成長壯大或正在壯大起來。所有這些國家的任務都是爲爭取民族獨立而鬥爭，爲反對帝國主義而鬥爭。工人階級所面臨的任務，就是在它的領導下使絕大多數人民——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團結起來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封建地主和已經賣身投靠帝國主義的一部分資產階級——即大（「官僚」）資產階級。人民民主政權——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所爭取的人民民主國家的新政權——的第一階段並不是無產階級專政。革命的任務首先是反帝和反封建；而不是建設社會主義。

那麼鐵托分子在殖民地和附屬國的主要綱領是什麼呢？他們的綱領是主張立即實行社會主義，立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他們催促人民在革命鬥爭中躍過最基本的階段，希望用這種辦法使無產階級先鋒隊遠遠走在羣衆前面，用挑撥者的傳統方式來「煽動」他們，使他們向前跑得過份地遠和過份地快，從而使他們處於很容易爲帝國主義所迫害和擊潰的地位。凡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還不高的地方，鐵托分子就設法用聽起來很漂亮

的非常革命的詞句使人民和革命組織陷於混亂。他們希望利用人民的強烈革命熱情和他們隨時準備鬥爭和犧牲的情緒來歪曲、渙散、分化和破壞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把人民要求民族獨立的願望變成盲目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

這就是鐵托分子特別積極努力和殖民地人民聯繫的原因。爲什麼卡德爾早在一九四五年至四六年間就冒充國際問題專家對殖民地作一番「特殊研究」；爲什麼南斯拉夫駐在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大使館會和革命組織聯繫，要求得到殖民地鬥爭的情報；爲什麼南斯拉夫外交部設有處理殖民地問題的專司，索取殖民地世界裏的一切出版物，特別是左翼組織的出版物；現在原因是很清楚了。這說明爲什麼鐵托分子會超出常軌在戰後邀請殖民地革命領袖到貝爾格萊德去。這說明爲什麼南斯拉夫駐英國、比利時、法國、荷蘭及其他各國的大使館會有一種特殊任務——聯繫這些國家裏的殖民地學生，引誘他們訪問南斯拉夫。這也說明爲什麼對於殖民地人民和蘇聯與人民民主國家最微不足道的接觸都十分警惕的帝國主義者却超乎常軌地鼓勵和提倡他們和鐵托南斯拉夫聯繫。

鐵托分子對印度作了一次特別的進攻。他們希望說服印度的共產主義運動，使他們相信貝爾格萊德是世界革命運動的新的中心。他們試圖煽動印度革命者和英國及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之間的不和。他們派遣他們的代表，包括主要鐵托分子德狄耶爾在內，去參加印度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他們在公開或不公開場合都倡導他們所謂的卡德爾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的新發展——「民族解放鬥爭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結合。」他們一再引用

卡德爾在共產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上的報告作爲印度發展的基礎。他們所強調的是這幾點，

「南斯拉夫人民抗敵武裝起義和人民政權的發展，是人民解放戰爭與在力求達到社會主義更高形式的工人階級領導下所進行的人民民主革命進程互相結合的特殊例證。……」

「人民民主革命的發展過程是與今天已佔優勢的社會主義形式結合在一起的。」（一九四八年一月印度「共產黨人」雜誌轉載一九四七年八月卡德爾在共產黨情報局的報告。）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鐵托分子在運用他們的全部影響來說服印度革命者採取左的行動路線，這種路線不可避免地將破壞反對帝國主義的印度各族人民的團結，使先鋒隊脫離人民羣衆，使工人階級的領導集團孤立起來，使他們暴露於反動派的鎮壓和迫害之下。

鐵托分子提出的政策和一九五一年四月公佈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印度共產黨綱草案和後來的政策宣言裏面所規定的印度革命運動的正確前進道路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鐵托分子同樣也曾經試圖在錫蘭共產黨內發生影響。他們和錫蘭的托派集團取得了聯繫，並提供他們一些反蘇謔言。但是，錫蘭共產黨人揭穿了他們所扮演的角色，使鐵托的宣傳家們一敗塗地。他們曾經特別賣力地通過過留學西方的非洲學生去聯繫非洲的馬

克思主義者和非洲民族運動；他們對於越南學生也玩過同樣的把戲。他們表示願意供給特殊的無線電收音設備來幫助殖民地運動，使他們可以收聽南斯拉夫通訊社的報道。他們拚命地但是完全徒勞無益地企圖爭取中國來支持他們反蘇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路綫，企圖和中國留學生取得聯系。在他們真相畢露以前，他們一直試圖使用他們在國際民主組織——國際學生聯合會、世界工會聯合會、世界民主青年聯盟等等——裏面的地位去聯系殖民地人民並且使殖民地人民接受他們的理論。

因此，對於西方帝國主義來說，鐵托分子是破壞反帝鬥爭的一種特別重要的武器。所以帝國主義者就一心夢想在殖民地與附屬國裏面會出現一種新的「民族共產主義」集團。

「東南亞的共產主義危險將為聯邦總理會議在科倫坡開會時的主要議題。……新的民族主義也許是東南亞今天最大的潛在力量。共產主義要和這種民族主義取得協調到現在為止已經碰到若干困難。

「現在已有若干跡象使人相信，一種完全新型的共產主義動物終將在世界的這一部分出現。例如，強有力的托派運動已經在錫蘭存在了相當時間。緬甸的共產黨人已經分裂成兩個集團了。……

「甚至在鐵托反抗莫斯科得到勝利以前，民族共產主義即已存在於東南亞。現在預言這件事可能有何影響雖未免為時過早，但至少可以說鐵托的存在對於這些持

不同意見的集團只會是一種鼓勵。」（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觀察家報」。）

美國國務院過去是、現在仍舊是不餘遺力地在整個附屬國世界裏擴展鐵托南斯拉夫的使館網，其中駐德里的南斯拉夫公使館將成爲主要中心。「每日電訊報」駐新德里記者在一九五〇年年初報道，美國政府將鼓勵鐵托分子在整個亞洲建立他們的使館。比利時的「自由比利時報」（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四日）寫道：

「華盛頓在其對付亞洲各國的未來行動中依賴兩種因素——民族主義和鐵托式的民族共產主義。美國專家們深信後面這種方式和美國打算給這些國家的援助是毫不衝突的。美國這種行動已在緬甸開始。美國在緬甸的代理人事實上正在支持反對斯大林的共產主義集團，並企圖使這些集團和政府黨組織一個共同集團。……如這一行動得到若干成功，則美國甚至將考慮建立一個以阻止親蘇分子行動爲主要任務的中心。」

一九五一年年初，美國人就極力要求在印度尼西亞建立南斯拉夫公使館。

有什麼能够比這更清楚呢？爲了消滅亞洲以及整個殖民地附屬國世界的共產主義，帝國主義需要一種工具。這種工具看上去是（一）民族主義的和（二）革命的，但是它的真正目的却是反共反蘇的。他們需要一種用反帝的詞句喬裝起來的帝國主義路線。鐵托和鐵托分子正可以滿足這種要求。

鐵托分子的活動範圍不限於人民民主國家和殖民地與附屬國。幾乎沒有一個帝國主

義統治下的國家沒有鐵托分子利用這種或那種方式在和國內反動派一道進行着活動——有時在共產黨內部作特務，有時比較公開地在社會黨或民族主義組織裏面，有時在托派小組內，但他們永遠都是反對工人階級與勞動人民的團結和利益的。

在西德，有一個時期他們企圖在共產黨內部進行隱蔽活動。但是在他們的原形被揭露以後，他們就在西方佔領軍的全力援助與鼓勵下轉而組織一個採取沙文主義路線的冒牌「共產黨」。這個所謂的「獨立德國共產黨」是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三日在杜塞爾多夫成立的。它的領袖是一個剛被共產黨開除出來的鐵托分子，名叫赫爾·夏帕。「曼徹斯特衛報」駐西德記者寫道（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德國鐵托主義者的分裂，據夏帕先生談，是由於三個主要原因。他和他的信徒拒絕接受奧得——尼斯界線。……而且他們也拒絕接受一個外國——蘇俄——的政治指示。……」

「夏帕先生說，他的黨將取名為「獨立工人黨」。這個黨準備與社會民主黨人共同奮鬥，但將倡導激烈得多的社會改革。……」

「鐵托主義是這個新黨的範本。……這個黨與蘇聯佔領區的統一社會黨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但自然要使這些聯繫維持「在絕對秘密的基礎上。」」

夏帕先生在對「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報告他們秘密地舉行的會議時說，他的黨「譴責了俄國的戰俘政策」。



帝國主義者在西德需要的是什麼呢？他們需要某種用來輔助那些影響日益減弱的右翼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在工人中間的活動的東西，某種滿嘴左派談吐但採取反對改裝坦協定和反對蘇聯的民族主義路線的東西，某種可以作為在東德區統一社會黨內部進行間諜活動的基礎的東西。這就是一種可以使帝國主義高興得流淚的「新型共產主義」：

「……長久以來存在着的由一種真正強大的獨立共產主義來對付西歐受莫斯科控制的運動的可能性在西方盟國官員心目中引起各種樂觀的政治幻象。」（一九五〇年八月四日「紐約光驅論壇報」駐波恩記者報道。）

在法國，鐵托分子最初試圖在共產黨內部找一據點，但很快就被揭穿了。他們在法國的南斯拉夫移民中進行過特殊活動，結果一事無成。由於社會民主黨已經聲名狼藉，他們就在一九五一年企圖組織一個「獨立的」、「第三種力量」的政黨。這個由著名托洛茨基分子讓·魯斯和前社會黨副書記伊夫·德謝塞爾創立的黨自稱為「獨立社會黨左派」，說他們主張一種「民主社會主義，這種民主社會主義將代替社會民主主義和斯大林式的共產主義」。它和以狂熱的鐵托宣傳家和鐵托南斯拉夫旅行家路易·達爾馬為領袖的「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行動配合中心」是狼狽為奸的。

在意大利，鐵托分子最初也同樣想打進共產黨去。後來他們把注意力轉到南尼的社會黨身上，但是仍然沒有成功。他們喧嚷得特別厲害的是號召舉行煽動性的政治示威，這種示威會為加斯貝利政府提供一個它所迫切需要的便於採取鎮壓行動的藉口。南斯拉

夫駐意大利大使館製造了大量宣傳。他們濫施賄賂想引誘代表團對南斯拉夫去講光。意大利共產黨有兩個黨員因和鐵托分子保持聯繫而被開除黨籍。消息公佈以後，當地警察局長就去拜訪他們表示慶賀，並表示全力支持他們。這使他們很快就認識到鐵托分子的真正任務。

鐵托分子在西班牙共和國流亡者之間也很活躍，企圖分裂和擾亂共和國運動。他們是有關法國境內西班牙共和派人士的「情報」來源之一。由於這些「情報」，法國政府最近曾進行了幾次大規模的逮捕。甚至於佛朗哥現在也認識到鐵托的用處了。長槍會機關報「亞里巴」在一九五一年寫道：「鐵托不是一個真正共產黨人」，而佛朗哥的機關報「阿拉貢先驅報」就解釋說：「繼續稱鐵托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對於西方世界有利的」。

鐵托分子在英國的工作將在以後討論。

總起來說，鐵托分子在對左翼運動進行滲透、偵察和內部破壞方面作了些什麼努力呢？各國鐵托分子所使用的手段有些什麼共同點呢？

鐵托分子首先是想設法打進各國的共產黨組織，在共產黨內部建立秘密小組並發展一種意在使這些共產黨聽任資本主義擺佈的歪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但是在一九四八年六月情報局決議以後，尤其是經過拉伊克與科斯托夫審判案揭露以後，鐵托分子的任務大自於世。當然，他們仍然繼續在各國共產黨內部努力維持着他們的秘密小組。

但總的說起來，鐵托分子是被逐出黨外了，那些在他們原形畢露以前受到他們影響的真正共產黨人也開始對自己如何受騙有了認識。

所以今天鐵托分子們，在他們分裂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目的失敗以後，就努力在社會民主黨和民族主義組織內部繼續進行工作，同時組織一些小規模的分裂小組——使人回想到三十年代那些數不清的托派分裂小組的「獨立的」「社會主義的」團體，如「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列寧主義—國際主義者」、「民族共產主義者」等等——所有這些組織都在各國警察幫助下試圖破壞工人階級和人民的團結。

這些鐵托分子組織的思想是什麼呢？鐵托分子小組是沒有思想，沒有原則的。他們在不同國度、不同地點和不同時間使用不同的口號。他們的口號既不是隨形勢的變化而變化；也不是隨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而變化；而是隨着怎樣便於在進步運動內部給資本主義幫忙而變化的。他們把一切反對工人階級利益、反蘇、反共、反對工人階級團結、反對和平的東西都用冠冕堂皇的非常革命的冒牌馬克思主義的語言打扮起來作為當前的口號。鐵托分子們的唯一共同點，和以前的托洛茨基分子一樣，就是完全缺乏原則。

在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甚至於在進步分子的思想中也還存在着某種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殘餘；所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就成了這些國家裏鐵托分子「綱領」的主要部分。一九四七年至四九年期間這些國家裏面的進步運動的主要任務是進一步走向社會主義，為爭取工人階級領導權而鬥爭，鞏固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的同盟，孤立和限制富農；教

青勞動人民準備進行更激烈的階級鬥爭，加強共產黨和工人黨的領導作用。所以鐵托分子就在公開場合和暗地裏都宣傳着相反的任務。他們發展他們自稱爲「列寧主義的新發展」的東西，宣傳與列寧背道而馳的道路……否認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否認分別對待農民的必要性，宣傳使共產黨銷聲匿跡、把共產黨溶解在人民陣綫中的必要，說階級鬥爭將趨於消亡。當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已被提到日程上來的時候，鐵托分子就宣傳民族主義。當社會主義沒有蘇聯的幫助和友誼就無法建立的時候，鐵托分子就散播對蘇聯的仇恨。

但是在殖民地國家，他們就發了一套口號。這些國家裏的革命鬥爭現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在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被提到日程上來以前還需要經過若干時期的鬥爭，還需要經過若干階段的鬥爭，所以鐵托分子在這些地方就大談其社會主義，宣傳「民族解放鬥爭和爭取社會主義鬥爭的結合」。在一切以民族解放爲當前主要任務的地方，鐵托分子就倡導「社會主義」。但是在以向社會主義前進作爲下一步任務的地方，鐵托分子就宣傳「民族主義」。他們到處提出以分裂革命運動、孤立和摧毀其先鋒隊爲目的的煽動性的左傾口號，企圖阻止革命前進，瓦解革命運動。無論在什麼地方他們都在替帝國主義幫忙。

因此，鐵托分子和他們的托派老祖宗一樣並且和老托洛茨基分子一道（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不分彼此的），都是毫無原則的，他們只有一個立場：仇視工人階級和

社會主義。他們所宣揚的「馬克思主義」只能說是「警察馬克思主義」、「軍事情報局第五處的馬克思主義」。它的內容就是用冒牌馬克思主義術語表現帝國主義目的。

他們是否有一個綱領、一個目的呢？有的。那就是他們主人的目的——恢復資本主義。投靠美國帝國主義和對社會主義與人民民主國家進行戰爭。

不過這只是鐵托分子核心組織的綱領；他們是不敢讓他們的支持者知道的。蘇聯的托派陰謀家也是這樣。他們對自己的主要支持者都不敢宣佈自己的綱領。

一顯然地，這樣的政制，托洛茨基分子是不能不在人民面前、在工人階級面前隱藏起來的。他們不僅在工人階級面前隱藏了這個政綱，而且在下層托洛茨基分子面前也隱藏了這個政綱，他們不僅在下層托洛茨基分子面前隱藏了這個政綱，甚至在總共由三四十個人所組成的托洛茨基分子上層小集團面前也隱藏了這個政綱。當拉狄克和皮達可夫要求托洛茨基允許他們召集三四十個人的托洛茨基分子小型代表會議來傳達這個政綱的性質時，托洛茨基禁止了他們這樣作，說把這個政綱的真實性質即令只告訴托洛茨基分子小集團，也是不適當的，因為這種「作法」可能引起分裂。」（譯文引自「論黨工作底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分子及其他兩面分子的辦法」，第一四頁。）

同樣地，鐵托、卡德爾、蘭科維奇和德吉拉斯的真正綱領也只有他們最核心的一個親信黨羽即帝國主義特務才知道，而對其他所有的人都隱瞞着。

爲了繼續取得較爲疏遠的黨羽們的支持，努力吸引尚未看穿他們的把戲的誠禁的工人，努力擾亂和分化工人及其同盟軍，鐵托分子就和托洛茨基分子一樣，就毫無原則地提出他們認爲當時是對自己有用的任何口號來。他們重彈着托派籠絡人心的陳腔濫調——「斯大林離開了列寧主義」，「蘇聯是一個官僚國家」，「各國共產黨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工具」。德吉拉斯、皮雅傑、卡德爾、蘭科維奇和鐵托的話，句句都可以在托洛茨基的大作裏找得出來。這些大作曾經在希特勒統治下被譯成德文並且在德國秘密警察協助下廣爲傳播。但是工人和進步運動裏面很多人都不知道或者已經忘掉托洛茨基分子的作用。鐵托分子所利用的就是這一點。

斯大林在前面已經引用過的那篇報告中，指出托洛茨基主義在三十年代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裏面的一種政派了。

「……托洛茨基主義不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派，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義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派，現在它已由這樣的政派變成了遵照外國偵探機關所給予的任務而活動的狂暴的無原則的暗害者、軍事破壞者、間諜和殺人兇手的匪幫。」（斯大林。見前所引。）

鐵托分子今天就是這樣一個「無原則的匪幫」。他們那只爲內部核心人物知道的綱領，就是恢復或維護資本主義，擁護美國帝國主義的世界霸權，進攻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戰爭。他們的當前口號是用冒牌的左的詞句湊起來的拼盤，其目的是要擾亂、分

化、破壞和反對任何代表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利益的東西。

拉伊克說得很清楚。在審訊過程中，庭長問他：「你說你奉行着托派政策。這個集團的立場是什麼？」拉伊克回答說：

「我可以用幾句話概括它的本質：這種立場就是在完全沒有任何原則的政治基礎上反對和破壞一切代表革命工人階級運動的利益的東西。」（拉伊克供詞，「拉伊克審判案記錄」第三九頁。）

由此可知，鐵托分子今天在世界進步運動裏面担任着他們的前輩托洛茨基分子在兩次大戰之間所扮演的同樣三個角色：

- (一) 作為帝國主義戰爭計劃的工具。
- (二) 作為製造用「左的」語言偽裝起來的反共、反蘇、反進步的謠言的兵工廠。
- (三) 作為帝國主義滲透到共產黨和進步組織與進步運動裏面進行偵察、擾亂和內部破壞活動的武器。

## 第六章 鐵托南斯拉夫內幕

共產黨情報局在其一九四八年六月關於南斯拉夫的決議中警告南斯拉夫人民，指出鐵托集團的虛偽政策將不可避免地把他們的國家引導到什麼地方去：

「南共領導者顯然是不了解，也可能是假裝不了解，這種民族主義的立場，只能使南斯拉夫蜕化爲一般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喪失南斯拉夫的獨立，變南斯拉夫爲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

這種嚴厲的警告是否已經證明是正確的呢？對情報局決議以來鐵托南斯拉夫內部情況加以研究就知道鐵托分子的統治已經把南斯拉夫人民帶到何等樣苦難的貧困中去了。

### 工人階級

那些暗地裏爲出賣南斯拉夫民族解放運動，爲出賣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宗旨和鬥爭而工作的人不可避免地會憎恨南斯拉夫工人階級。鐵托分子把產業工人們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地位上排擠出去，否認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藐視工人在游擊隊運動中的行動。



在鐵托南斯拉夫，工人的命運是非常艱苦的。最近三年來他們的生活條件一天比一天惡劣。生活費用飛漲了，工資卻依然如故，工作時間不斷地延長了，趕快制度和各種形式的強迫勞動實行了，而危險性工業部門却不注意安全設備，事故率日漸上昇。例如一九四九年年底貝爾格萊德的伊卡魯斯工廠裏每天工作時間多至十二小時左右，此外工人們還被迫奉送若干不拿工資的「志願」勞動時。某些企業裏面實行了一種制度，規定當工人們沒有做到經理部門訂立的標準的時候，他們就必須向該企業交納「賠償費」。

南斯拉夫礦工的情況最足以說明工人階級的一般情況。一九四九年波斯尼亞、斯洛文尼亞和克羅西亞各礦僱用工人約四十五萬名，事故率高到了驚人的程度。塞爾維亞的特別普加礦上經常發生鉛和汞中毒，波爾羅坑陷坍事故層出不窮。莫司塔爾礦工們在深可及膝的水裏工作。甚至鐵托的官方報紙「戰鬥報」也承認（一九五一年七月八日）德斯拉登伐奇附近拉斯托卡煤礦的「情況是悲慘的」。

特別普加鉛礦一個工人寫道：「我們礦工住在傾欹倒坍的兵營裏，溝壑裏和馬廄裏。」

工人們對他們悲慘處境的反應表現在日益增多的集體逃亡上，其規模之大連鐵托的官方報紙也不得不承認。工人們離開工廠。鄉村裏面的貧苦農民，儘管處境悲慘，也拒絕到工業中去工作。當他們被強迫動員到工業中去時，他們就離開城市而遠走高飛。

一九四九年南斯拉夫大部分建築工地上的逃亡數字平均達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礦山

上述亡數字達到百分之四十至四十五。鐵托分子的工會機關報「拉德報」在一九四九年將近年底時報道：一九四九年七月前半個月裏到波爾頓礦作工的新工人有四千三百零六名，而同時期內離開波爾頓的則有五千零七十名。「戰鬥報」一九四九年七月承認分配到特列普加各礦的一萬一千工人中至少有一萬零五百名已經離開了那兒。

一九五〇年三月鐵托在斯普利特演說時承認，二百二十萬工人中有四十萬已經逃亡。南斯拉夫勞動部長一九五〇年七月在「戰鬥報」上撰文說，「被動員」到礦上做工的農民大部分已經回鄉。他說：「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辦法使他們大部分都變成永久性的工人。」

到一九五一年年中為止，被徵調去作強迫勞役的農民約有六十三萬，其中四十萬人

都已經潛逃無踪。

「志願勞動大隊」已經適成其反地變成了強迫勞動隊。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有九十六個礦場從工人那裏無償地勒索了一百萬以上的工時。一九四九年，四十六萬五千人被強迫編入克羅西亞的「志願工作大隊」。

鐵托分子的政府一直打算用飢餓作為一種強迫的武器，來對付集體逃亡。一九四九年，政府曾試圖強迫工人簽訂長期勞動合同，但是一般都遭到廣泛而頑強的拒絕。於是他們就實行一種制度——收回那些拒絕接受長期合同的人的配給證，取消他們在配給方面享受的特權，使他們只能乞憐於糧食、衣着以及一切生活必需品的自由市場上的投機

商。事實上這就等於飢饉。

南斯拉夫的官方工會組織（Z·S·S·S·）不但不保護工人，維護生活水準，反而變成了強迫工人接受苛刻條件的統治工具。一切英勇果敢的戰鬥者都被從公職上清除出去，很多人都在「共產黨情報局分子」的罪名下被逮捕起來。一切重要官員，從朱羅·薩拉伊起等而下之，都是「靠得住的」鐵托分子。Z·S·S·S·同意對不願簽訂長期勞動合同的工人予以懲罰，開除工會會籍，並沒收他們的口糧與衣着配給證，還常常包括他們的整個家庭的配給證在內。

南斯拉夫政治流亡者在捷克斯洛伐克辦的反鐵托報紙曾經發表過下面這封來自里熱加（費烏姆）的一個工廠工人的信：

「這兒工廠裏實行了一種新辦法，決定從此以後糧食與配給證將由經理部在工廠辦公室分發，而不是由市公共供應處分發。如果工人「無故」缺勤，他當天的配給票，包括他的家庭的，就會被經理部取消。只有那些工作三個月到六個月從不曠工的工人，工廠經理部才發給紡織品和鞋的配給票。

「……向工廠工人宣佈鐵托這種新恐怖手段的會是由工會的工廠委員會召集的。宣佈以後，工人充滿對立情緒。儘管抗議者受到逮捕的威脅，很多人仍然對這些奴役手段表示抗議，並聲明他們將停止交納工會會費，因為工會所代表的是法西斯政權的利益，不是工人的利益。」（「新戰鬥報」一九五一年第二十四期。）

貝爾格萊德出版的「共和報」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日報道：

「在各種不同因素影響下，特別是由於像傳染病一樣蔓延的情緒消沉和對未來的憂慮，很多直到最近以前還自覺自願執行職務的腦力和體力勞動者，現在只是因為害怕懲罰才工作，他們最多也只是機械地做他們的工作而已。」  
就是鐵托分子的合法報紙也被迫承認工人階級對鐵托統治的日益高漲的反抗。

## 農民的地位

我們在第一章裏面已經看到共產黨情報局的第一次決議對鐵托分子政策提出的主要批評之一就是他們對於農民的态度。鐵托分子自稱他們正在引導南斯拉夫走向社會主義，但是他們對農民的態度却是一視同仁，對富農和中農也沒有特殊幫助。他們否認農村中階級鬥爭的存在。他們發展了一種所謂「南斯拉夫例外論」的特殊理論。

情報局決議發表以後，鐵托分子就竭力為他們的立場辯護。塞爾維亞鐵托分子頭子尼斯科維奇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八日貝爾格萊德會議上聲稱，南斯拉夫富農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將起進步的作用。他說：

「現在用不着再在我們農村裏存在階級鬥爭這種無中生有的說法上講什麼話。

我們的富農和蘇聯的富農是不同的。他們在戰爭中幫過我們的忙。因此應該把他們看成勞動農民的一部分。我們必須把富農吸收到人民政權的委員會裏來，吸收到人民陣線裏來，吸收到合作社以及其他組織裏來。」

鐵托、卡德爾和蘭科維奇的親信之一、副外長貝勃勒發揮了同樣的理論（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我們沒有蘇聯那種富農。我們的富農都參加過人民解放戰爭。此外，由於蘇聯的存在，我們的富農，對蘇聯富農的命運了解得很多。他們記得這一點，因此表現得比較通達事理和馴服……難道我們必須毀滅富農來滿足那已經陳腐不堪的教條的殘餘嗎？如果我們不經過階級鬥爭就成功地使富農過渡到社會主義，難道是一種錯誤嗎？」

鐵托本人懂得更遠，他根本否認富農的存在，否認鄉村有階級存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初在斯科普里的演說）：

「我們無法說明中農與富農之間的界限何在……按照個人經濟上的土地畝數並不能判定他是富農。」

這就是鐵托分子關於農村裏的階級的理論。他們每天都在說這種理論是「真正的列寧主義」——一種靠資本家幫忙消滅資本主義，否認階級存在，否認走向社會主義的革命階段的階段以及在不同階段中需要不同的階級聯盟的理論。

列寧一再指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必須首先限制作爲一個階級的高農，幫助貧農和中農，爲最後消滅富農這一階級鋪平道路。他指出，不這樣做就會走向恢復資本主義，走向對貧苦農民的剝削，以至出賣革命鬥爭。

最近兩年來南斯拉夫農村裏的發展已經表明，鐵托否認農村階級鬥爭存在的理論實際上已經引起富農階級的增長，使農村受富農統治，使大批勞動農民羣衆陷於窮困，使富有者大規模地剝削貧苦農民。這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結果。

鐵托的稅收政策對於貧農和中農講來就是毀滅。在嫻嫻來遲的有限的土地改革裏得到土地的貧苦農民並未得到政府低利貸款，種子、農具、耕畜等方面的援助。因此，過份沉重的賦稅負擔很快就使他們陷於富農統治之下。國家規定必須以低價賣給督局的農產品，定額沉重地壓在窮人頭上，但有利於富有農民。一九四九年十月所規定的徵購額強迫只有五英畝到七英畝土地的小農繳納四百五十公斤麥子；無論土地質量好壞和農民家庭人口多少。有七英畝到十一英畝土地的農民要繳納八百五十公斤，而有着四十五英畝或超過這數目的則最多要繳納到一千七百公斤。這些措施以及其他類似措施結果使大批勞動農民羣衆傾家蕩產。強迫繳納的實物定額沒有完成者要受到極爲嚴厲的處罰。對於未能及時或未能按足額繳納者所處的罰金高達五萬狄那，或以三個月勞役代替（在警察監視下清除林場、築路、開礦）。

克羅西亞鐵托分子機關報「新聞報」曾經在一九五〇年九月九日出版的一期裏，對

某地區當局大肆喝采，因為該區當局把貧苦農民被迫繳納的穀物定額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使農民自己每年每人僅餘六十三公斤穀子。該報還號召其他地區起而效之。從前規定最貧苦的農民可以免稅的法令業已作廢。根據門的內哥羅「勝利報」關於波德戈里加地區「人民」行政當局工作的報道，這個地區的農民，不計收入和財產多寡，都繳納同等的捐稅。

結果貧農、中農因無力完納強制定額，但又要設法逃避嚴酷的刑罰，只好向富農借貸。他們欠了富農的債，就日益深陷於受富農剝削的地位。

同時富農們却飛黃騰達起來了。一九四八年頒佈的一種法律規定：農民無論貧富都可以出售（繳納定額以後的）剩餘生產品給國家，換得代錢用的配給票。這種配給票能够換取在繳托南斯拉夫極爲希罕的廉價工業品——服飾、工具、傢具等等。這使富農們不僅可以利用他們的剩餘物資作穀物買賣，而且可以在配給票上投機倒把。積累了大量配給票或用來交換配給票的工業品的富農就開始在鄉村裏作起買賣來。因此在鄉村市場上可以開始看到富農們不僅在賣耕畜、穀物、牛奶、油脂，而且也在賣傢具、鞋子、靴子、簾子、鐮刀、工具，甚至於還有美國留聲機——價格都很昂貴。同時，貧苦農民、工人、低級公務員和腦力勞動者常常連一把牙刷也買不到。爲了從富農那種商人那兒獲得這些工業品，貧苦農民必須出讓一部分土地或者到富農農莊上去幹活，用勞力來抵償。

從鐵托分子那裏逃到保加利亞去避難的前塞爾維亞財政部助理部長托多爾·陶多

羅維奇揭露：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八日塞爾維亞財政部第十七號密令曾經指示各省當局重新核定（當然是減低）富農稅率。潘西沃地區富農生產品稅額從兩億狄那減低到一億一千萬狄那；聶戈丁地區則從一億一千二百萬減低到六千五百萬。

與此同時，鐵托分子關於富農在「建設新南斯拉夫」中起作用的理論也正在付諸實踐。富農成批地被容納在農村地方行政機構和「人民陣線」委員會裏面佔據主要的地位。

### 假集體農莊

關於鐵托分子的兩面手法——用左的形式和辭句掩護反動的右翼政策——沒有什麼比鐵托南斯拉夫的假集體農莊說明得更清楚。被大吹大擂地稱之為向社會主義前進的顯著例證的東西，我們仔細研究一下就會發現，原來是保持南斯拉夫農村中富農統治的一種詭譎機詐的形式。

表面上，鐵托分子在一九四六年就已經開始建立他們的「農業合作社」。到一九五〇年一月為止，他們自稱已有六千六百一十五個生產合作社，擁有土地約四百萬英畝。這種合作社的組織形式是，社員們繳納土地、牲口和耕畜，並按照他們繳納的數額分紅。他們認為這種組織形式並不是以後進一步向社會主義農業發展的第一步，而是集體耕作的最後形式。這樣一來，在這些假集體農莊裏面，富農和貧農之間的關係就被永遠保存下



來，甚至於加強了，在這種集體農莊裏面，富農不僅進行經濟上的統治，而且還盤據着全部的領導地位。這就說明爲什麼富農常常願意，甚至於熱望參加「合作社」，而貧農和中農却成羣結隊地進行抵抗。

以沃伊沃丁納的富饒的農業區爲例：這裏約有二十五萬一千個農戶，其中一萬四千六百七十二戶是富農。一九四六年，沃伊沃丁納的「農業合作社」裏面有三千四百富農；一九四七年增至二千一百一十七戶；一九四九年激增到二千一百二十二戶，即佔所有富農戶數的一半。

「合作社」裏面較窮苦的社員的收入揭露了隱藏在「合作社」外表下面的剝削。普里熱多爾附近德拉戈丁村巴比奇合作社裏的農民每個工作日單位只拿十五狄那；而納普里熱德合作社（也在普里熱多爾區）只有約十一狄那；「合作社」裏的貧農平均每天所得爲十五到二十狄那。收入裏面有百分之三十之多都被用來作爲入股土地的「租金」。此外，很大一部分支出給了各種各樣的管理人員；他們一般都是富農。在克羅西亞沃爾班熱的「合作社」的二十八個管理人員中，有十六個是富農。合作社全部收入中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作爲工作報酬而分給「合作社」的普通社員的。但就是這種付款也經常發生長期拖欠的情形。

波斯尼亞某村鐵托分子「合作社」主席所支的現金和實物比其他所有的十五個社員所得的總和還要多。當貧農替他做工耕地時，他却在養尊處優。有些富農把土地分開；一

部分參加「合作社」作為牟利的投資，並以利潤償付耕種他的其他土地的貧農。一九五〇年斯洛文尼亞黨的會議上宣佈斯洛文尼亞「合作社」的社員這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四，但是「入股」的土地却增加了百分之十七。這說明了參加進來的農民的性質。

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全世界資產階級報刊對蘇聯的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的發展都暴露如雷地大肆攻擊。同樣這些報刊對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走向真正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的發展也不惜用最惡毒的字眼來進行謾罵和誹謗。但是南斯拉夫發生的事初看起來却好像是一個奇蹟。這是一種使資本家為之傾心的「新型共產主義」，一種使他們欽羨雀躍的「新型集體農莊」。「經濟學家」雜誌寫道（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八日）：

「南斯拉夫的集體化比其他地方進行得迅速，但是對富農的迫害並沒有其他地方那樣嚴酷。原則上富農並不像在其他「人民民主國家」那樣，被排除在集體農莊之外。……共產黨理論家對於不首先清算富農就打算實行農業集體化的看法和牙醫師對不首先鑿去齲齒就補牙的看法頗為相似。不過鐵托採取這種政策的理由很簡單。他的政策已經使他成為衆矢之的，如果他要維持自己的統治……他最低限度必須避免引起農民的整個上層的敵對。」

鐵托南斯拉夫這種為富農們熱烈參加，為貧農所深感痛絕，並為「經濟學家」推崇備至的假集體農莊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集體農莊的距離正像英國工業聯合會和產業工人工會之間的距離一樣，都是相去十萬八千里。人民民主國家的集體農莊團結了小農和中

農、提高了他們的生活水平，並且加強了他們對農村富豪——富農的鬥爭。而鐵托南斯拉夫的假合作社却使富農得以聯成一氣，更慘無人道地剝削勞動農民。

富農們在假集體農莊內外的農村中的作威作福引起了勞動農民對鐵托統治日益激烈的抵抗。這種抵抗蔓延範圍之廣連鐵托的官方機關報都不能不予以重視。甚至於鐵托在國外的最狂熱的資本主義的支持者也不能不加以評論。這種抗拒表現在農民羣衆的拒絕播種穀物上。甚至鐵托於一九五〇年三月中旬在德伐爾演說時也只得承認：農民不願交納強迫徵收的實物稅。他被迫承認：

「……地方當局一直錯誤地把捐稅強加在農民身上，很多人的倉廩已經一掃而光了……農民們現在拒絕播種做麵包的穀物。」

這種情況反映在勞動農民拒絕參加假集體農莊這件事上面，如果他們被迫參加了，他們就實行怠工破壞。就如鐵托在德伐爾所承認的：

「當農民們被迫加入合作社時，他們就把農具和牲畜賣掉或者把牛殺掉，因此就犯了罪。」

但是他的補救之道是威脅，還加上一種新的關於「合作社」的法律。這種法律規定可以把那些「在合作社內進行破壞活動」或「損壞合作社財產」的人判處死刑，而非法離開合作社的人則判處長期徒刑。

農民的抵抗也反映在他們拒絕繳納現金或實物稅這種情形上。這種抵抗逐漸高漲到

了使鐵托的報紙稱之爲農民「暴動」的程度。

三年來南斯拉夫農村裏發展的一切情況都證明富農的控制在逐漸擴展，鐵托集團在農村裏一天比一天更依靠富農；這些情況都證明共產黨情報局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的決議是正確的。該決議說：

「在鄉村中用強力培植起來的僑協作社，都落在富農及其代辦手中，而成爲剝削廣大勞動農民羣衆的工具。」

### 南斯拉夫經濟的慘狀

農民們起而抵抗了。他們抵抗的主要表現之一就是拒絕耕地。爲什麼他們要種地讓鐵托的收稅人好來掠奪他們的產物呢？

一九四九年的耕地面積已經比前一年減少了，但一九五〇年的面積縮小得更多。這是官方報紙也不得不承認的。「星期日泰晤士報」駐貝爾格萊德記者在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引用「戰鬥報」的話報道說：

「……留給我們迎頭趕上的時間已不到一週，而私有農地上的春耕播種運動却

仍然危險地落在後面——私有農地仍佔耕地約百分之八十。

「在塞爾維亞，該報說，在仍由「自由」農民耕種的土地上只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已經下種，波斯尼亞——赫茲戈維拉約百分之五十一，克羅西亞百分之四十五。

在斯洛文尼亞、馬其頓和門的內哥羅，數字都在百分之四十以下。」

時間一天天過去，南斯拉夫農業崩潰的情形越來越顯著，產糧食的國家受到了飢饉的威脅。斯洛文尼亞經濟委員會主席克萊格一九五〇年十月在斯洛文尼亞首府路布里雅納演說時說：

「今年共和國的王蜀黍收成比去年減低百分之三十五。……糖的出產將減少很多。人民將得不到足夠的糖的供應。農民們沒有儲存飼料。他們都在屠宰他們的牛。……第三季交稅計劃實行的情況不佳。而人民的肉類供應情況則更為惡劣。……」

注意南斯拉夫國內發展情況的觀察家早就預言到這種災難。他們知道農民羣衆的抵抗和拒絕種地會使收成減低到災難性的程度。但是在結果出來以後，鐵托分子又想給這種災難找一個藉口——用旱災把它解釋過去。旱災的確是有的，但只是南斯拉夫糧食匱乏中一小部分原因；基本原因是：農民不耕地，一般富農在農村中的統治和對勞動農民的壓迫，以及大批糧食輸出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去。「泰晤士報」駐的里雅斯特記者一九五〇年十月十日報道：

「據說南斯拉夫今年的收成還趕不上一九四九年收成的一半，比一九四四

着說：

年——國內大部分地方都在進行激烈戰爭的一年——還要差……農民們公開拒絕把產品交給政府。……牛隻的屠宰暫時地改善了城市肉類供應，但是上個星期的報告顯示肉類配給已復微不足道。」

這位記者承認：如果旱災是這種災難的原因之一，它也「不是唯一的原因」。他接着說：

「據官方承認，南斯拉夫今年最多種了戰前耕地的五分之三到五分之四。一部分理由是由農民缺乏在絕對必需以外作更多工作的興趣，因為付給他們的生產品的價錢低；而且買不到任何消費品。附帶的原因是缺乏農業機械，甚至於普通工具。……國營集體農莊的生產亦已下降。……」

瑞士「民族日報」十月底（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六日）寫道：

「今年秋末，在即將到來的以飢餓和困厄威脅南斯拉夫人民、以混亂與憂戚威脅南斯拉夫統治的冬天面前，局勢是戰爭結束以來從未有過的惡劣，鐵托的統治也遭遇到戰爭結束以來從未遭遇過的困難。……物價在飛漲，貧窮在逐月增加。」

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副總理拉科西揭穿了鐵托分子說旱災是飢饉的唯一原因的藉口：「鐵托匪幫把經濟危機和混亂的責任推卸在今年的旱災上；我們匈牙利今年也經受了一次旱災。程度也的確不比南斯拉夫的輕微。誰都知道，南斯拉夫的主要農業區和匈牙利接壤，馬科和維利卡—基金德、士額特和蘇布的薩、拜亞和松波爾、

培斯和奧薩克的旱災是完全相同的。但是旱災在我們國家裏並沒有引起像南斯拉夫那樣的不幸，因為我們的農民，在人民民主的國家幫助之下，熱烈地、迅速地、而且及時地完成了一切農作，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旱災的影響。」（拉科西：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全體大會上的演講。）

旱災也襲擊了南斯拉夫的其他鄰國：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但是在勞動農民擁護政府和國家、政府和國家也支持勞動人民的人民民主國家就能够抵禦並且消除旱災的影響。

南斯拉夫工業方面的情況一點也不比農村裏的情況好。即使根據官方材料，五年計劃已淒慘地失敗了。一九四八年電氣、冶金、煤礦、食品、紡織、玻璃、化學及其他工業部門（根據官方材料）都未達到計劃目標。一九四九年的情形更壞。鐵托政府給聯合國組織歐洲經濟委員會的報告承認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南斯拉夫工業產量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一九五〇年一系列的工業部門連這一年目標的百分之五十都未能完成。卡德爾和南斯拉夫其他領導者都在談論至少需要展期一年才有希望完成五年計劃的目標。在制定了長期計劃的所有東歐國家裏面，只有南斯拉夫宣告失敗了。

農業和工業方面這種岌岌可危的形勢的必然結果就是生活水平的急驟下降。定量分配制度雖然還在實行，配給物却愈來愈少了。勞動農民被迫到自由市場上去忍受投機倒把者的高價。一九五〇年的配給理論上據說包括人民需要的約百分之三十五，事實上幾

乎連人民最基本的需要的百分之十五都不能滿足。肉類、糖、脂肪和油類的配給票常常並不比印它們的紙更值錢。通常熱烈支持鐵托集團的「紐約先驅論壇報」也承認（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六日）南斯拉夫的全部人口都仰賴自由市場。但是自由市場情況又如何呢？情況是這樣的，連最起碼的消費品都驚人地缺乏，而且價格的昂貴簡直不可想像。現在來研究一下那些在政治方面狂熱地支持鐵托的統治的報紙上面刊載的親眼看到南斯拉夫情形的人的報告。

「法蘭克福日報」記者的薩格勒布通訊說（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一日）：

「薩格勒布貨物缺乏的情形正和南斯拉夫任何其他地方一樣嚴重。就是像針、棉花、肥皂等這些最普通的日用品也都踏破鐵鞋無處尋。從家鄉收到包裹的走運的外國人只要送一把牙刷或一板按扣給他或她的南斯拉夫朋友作為禮物，就無疑會使他們喜出望外。商店的櫥窗景色黯淡！幾公尺很不結實的料子，幾瓶次等貨的科隆香水，一排粗刷子、藤籃子。……」

同月，「新蘇黎世報」記者報道（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

「薩格勒布的埃斯普朗納德咖啡店給客人備辦的是一種用破杯子盛着的液體。這種液體只有顏色看上去像咖啡。街上一般人的樣子都說明他們一定生活在艱苦的環境裏面。薩格勒布貨物缺乏的情形——包括布疋、肥皂、針、棉花、刀片以及任何日用必需品——和南斯拉夫其他任何地方一樣嚴重。」



醉心於鐵托反蘇活動的格·埃·爾·格德在熱烈推崇鐵托統治的「論壇報」上寫道（一九五〇年六月九日）：

「……買刀片和袖珍梳子這樣微不足道的東西也要付令人不可想像的高價。我親眼看見一個南斯拉夫人拿一把舊梳子賣三百五十個狄那，這把梳子新的時候也許只值到三先令六辨士。」（以英鎊貶值前二百狄那等於一英鎊計算：三百五十狄那等於一鎊十五先令。貶值後折合英鎊更多。）

一九五〇年六月「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加斯頓·柯布倫茲詳細報道了南斯拉夫人民的生計情況：

「當貝爾格萊德全部居民實際上都在仰賴自由市場來勉強維持足夠的營養時，某些基本物品的價格的上漲却已如脫韁之馬，以至於要用一個普通城市居民每月收入的約百分之二十才能買到兩磅牛油。」

「按照普通城市工資每月四千狄那來計算其他幾種物品就可以估計到情況是怎樣的。」

「兩磅糖要五百狄那。去年約為二百狄那。」

「兩磅咖啡要一千七百至兩千狄那。去年是一千至一千二百狄那。」

「兩磅豬油要五百五十狄那。去年是二百五十狄那。」

「一公升食用油（向日葵子油）要六百五十至七百狄那。去年是二百至三百狄」

那。

「一對子雞要四百五十至七百狄那。去年是二百至三百狄那。

「兩磅蕃茄要一百五十狄那。去年是三十至四十狄那。

「兩磅猪肉要五百狄那。去年是三百至四百狄那。

「這種情形正引起許多幾乎毫不隱諱的怨言。有資格的西方經濟觀察家認為這種情況主要是由於下面幾種原因造成的：

「(一) 以鐵托元帥為總理的政府除了那些品質低劣的定量分配的消費品外未能供給農民任何其他物品。這正驅使農民對他們自由出售的生產品素憤愈來愈高，以便在首都自由市場上能以高得驚人的價格購買消費品。

「(二) 統治者大批輸出糧食。……

「(三) 對數量巨大的農民徵收了沉重的稅款。」(「紐約先驅論壇報」歐洲版，一九五〇年七月十日。)

關於這個報告只有一點必須加以說明的：在自由市場上以「高得驚人的價格」出售的剩餘貨物完全是從農民裏面的富農那裏來的，而「沉重的稅款」卻緊緊壓在勞動農民——貧農和中農的頭上。

這位記者也拜訪了匈牙利邊境附近的蘇波提加城。他在一篇強烈地傾向鐵托、反對匈牙利的文章裏報道：

「在市中心區一個小巧玲瓏的漂亮公園周圍的那些商店是經濟情況的指標。按照一個普通的城市居民的月薪四千狄那來衡是『納洛尼·瑪加辛』（人民商店）裏面的下列價格，就可以了解這些價格的意義：

「一個普普通通的湯匙要五百二十狄那（記住在英鎊貶值前一鎊合二百狄那，現在則更少——著者）。質料最差的男人襯衣要七百二十一至一千狄那（買不到別種的）……顧客可以用手一戳就穿的『毛』毯要兩千八百七十八狄那。質量粗劣的男用羊毛衫要一千八百九十五狄那。……」

國會議員非茨羅·麥克林准將非常讚賞他所說的鐵托的「自由列寧主義」：認為他曾經不惜工本地爲之捧場的鐵托是一種很有用的反蘇工具。可是當他報告一九五〇年九月他在南斯拉夫各地旅行的情形時也不得不承認：

「……消費品奇缺，用錢購買任何東西都感覺困難，使工業中產生大規模逃亡的風氣，和已經被政府的干涉激怒了的農民方面的日甚一日的只生產他們自己所需要的那麼多種食的傾向。」（星期日泰晤士報）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七日。

伊安·麥凱在一九五〇年九月初發給「新聞紀事報」的貝爾格萊德通訊中寫道：

「……（牛油和糖的）配給已有幾星期未發。自由市場上的價格天文數字般地飛漲。和去年比較起來，牛油從每磅四十先令上漲到每磅六十先令，糖從二十先令漲到了五十先令；馬鈴薯從一先令六辨士漲到了十先令；豬油從二十先令漲到了五

十先令，咖啡從七十先令漲到了二百先令，蛋從每個一先令八辨士漲到了三先令。  
（一九四六年我在貝爾格萊德時每個約三辨士——著者。）（「新聞紀事報」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八日。）

敦尼斯·馬丁在兩年來不遺餘力地和鐵托表示親善的「每日先驅報」上報道他一九五〇年年底在南斯拉夫各地旅行所見所聞時，用這樣的話來描寫貝爾格萊德的情況：

「我發現自己處在一羣彷徨終日的活稻草人中間。衣服、裝飾、外衣、鞋襪和帽子的極端缺少，剝奪了這些人的一切式樣和時髦。簡陋的伙食使他們每小時都想到冬天會帶來什麼。基本配給品好幾個星期都沒有足量發給。……」

「南斯拉夫人越來越被迫轉向所謂『自由市場』，這種『自由市場』裏的騰貴的物價和原始的物物交換制度反映出任何正常生活都是不可能有的。這裏對於那些走投無路的家庭主婦們來說，就是馬鈴薯要三先令八辨士一磅，麵包三先令十辨士一磅，肉十四先令一磅，糖、牛油和食用油脂每磅價格在二十五先令至三十先令之間猶不可得，茶葉和咖啡則已漲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每磅各需十鎊和五鎊。……日常生活最起碼的必需品也都缺少。工人要積蓄一個月的工資才能買一雙經得起日晒雨淋的鞋子。沒有人能買到好的肥皂。一支牙膏要三十先令才能成交。面容焦急的婦女整天在尋覓針線、縫補用的毛線和紐扣。……」

「公衆的情緒是不好的，公衆的健康則更令人擔憂。一個工作過度並疲憊的醫

生說，「這些人都在受肺結核病的折磨。」肥皂和熱水的缺乏使疥瘡的傳播將打破紀錄，並且助長因社會災難而引起的病症。」（《每日光驅報》，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美國最右翼的雜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曾經為鐵托集團作了很多有利的宣傳，並且經常要求美國支持鐵托政權。它描寫鐵托如何把南斯拉夫人民出賣給美國資本家做奴隸，把國家財富「抵押」給美國資本家的情形說：

「鐵托無疑已至山窮水盡之境，迫切需要外援。如果不從國外運來糧食，南斯拉夫某些地區就可能發生飢荒。……鐵托已經在使用南斯拉夫的未來出口貨作抵押來償付過去的入口貨。……連笨重貨物的質量通常也都很低劣。半完成的建築物證明計劃做得很糟。勞動力變遷很大。例如特列普加大鉛礦（也已經抵押給美國——著者）僱用的一萬一千名工人中，不過數月就走了一萬零五百人。」（「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這就是齊里亞庫斯宣揚的「新型共產主義」的「光榮業績」。這就是鐵托與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斷絕友誼和相互合作的政策的結果。這就是美國及其他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仁慈而慷慨的援助」的結果。不幸的南斯拉夫人民在工資凍結，配給不足，一切必需品價格瘋狂上漲，最起碼的消費品驚人的缺乏以及疾病蔓延的情況下，已經被鐵托集團從戰爭結束時的滿懷希望迅速地帶到了貧窮的深淵。

我們還可以摘引接連不斷的類似的報道：有的是從西方支持鐵托的報刊上蒐集來的，也有人民自己從鐵托南斯拉夫偷漏出來的。它們互相映證。同時，有一小撮從西方來的「客人」——有的是被收買過去了的，有的是誤入歧途的——被鐵托的官員們請去花天酒地，被他們親自引導到少數準備得很好的「模範」機構去，然後回來就成了鐵托的宣傳家，就如希特勒德國的「客人」回來以後常常會發誓保證希特勒是需要和平的、德國人民是幸福繁榮的、集中營和迫害猶太人都是「共產國際的神話」。

在鐵托集團統治下，南斯拉夫人民的情況一天比一天更符合於西方帝國主義的典型半殖民地的情況了。

### 南斯拉夫人民所受的壓迫

此外，和任何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一樣，南斯拉夫勞動人民不僅面臨經濟上的壓迫，而且也面臨政治上的壓迫。甚至在共產黨情報局決議發表以前，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海布朗和尤約維奇橫遭逮捕時，對共產黨領袖和民族解放運動領袖的逮捕就已經開始了。

情報局決議一公佈以後，鐵托集團就無法再把世界上幾個最大的經驗最豐富的共產黨的批評在南斯拉夫黨員面前隱瞞起來，於是他們立刻就開始了全面的逮捕和迫害。凡

是主張繼續與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保持友誼的人，或者用任何方式公開批評鐵托集團的叛變的人都按開除黨籍，逮捕，監禁起來，或者被關到集中營裏去。

舉例來說，諾維沙德大約有八十個共產黨員在情報局決議發表以後的頭幾天內被開除出黨。克拉多沃黨委會的十七個委員裏面只有兩個人是支持鐵托的（其中一個是當地的秘密警察頭子）。波斯尼亞——赫茲戈維拉區委會的二十五個宣傳員領導人裏面，只有一個是支持鐵托的。薩拉熱沃市黨委會的四十個委員裏面有三十九個擁護共產黨情報局的批評。大規模開除黨籍和逮捕是給他們的回答。一九四八年七月舉行的第五次黨代表大會的前後都掀起了逮捕以至屠殺的浪潮。薩拉熱沃、里熱加、薩熱卡爾、昂戈丁、比熱諾——波爾熱、塞克文尼加、波拉、普里斯丁納和全國各城市 and 鄉村的主要黨委會的委員都被開除了。在聯邦和各共和國裏面有二十多個部長被捕。

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間，他們對人民的進攻日益肆無忌憚。當戰犯和以前的賣國賊們從監獄裏被釋放出來的時候，共產黨和游擊隊的領袖們就填補了他們在監獄裏的位置。而當舊有監獄不夠的時候，鐵托集團就大規模地擴充監獄設備，建立老式的法西斯集中營。共產黨員們常常回到他們在兩次大戰之間的獨裁政權下已經熟悉了的那些監獄裏去。

被捕者裏面有幾位民族解放軍的最傑出的領袖。阿爾索·約凡諾維奇將軍被捕殺了。他是一九四一年第一個游擊支隊的主要組織者之一，從一九四一年七月起到戰爭結束一

直是解放軍的參謀長。由於他對於維護南斯拉夫人民利益的始終不渝的態度經常招致英、美首腦軍事聯絡官的厭惡，所以在戰爭結束的時候他的位置就被科查·波波維奇（從前是超現實主義者，西方使團和大使館的親信）接替了。一九四八年七月，約凡諾維奇被任命為南斯拉夫軍事學院院長。他因擁護情報局對鐵托集團的批評而在八月間慘遭暗殺。

斯拉弗科·羅迪克將軍——游擊隊裏面最年輕的將軍——在獄中被殺害了。被逮捕起來的最高級的軍事人員裏面有布蘭科·彼得里塞維奇將軍、克爾德熱奇將軍、民族英雄薩伐·史坦諾耶維奇上校、弗拉多·達普塞維奇上校和曾經組織馬克伐暴動並指揮鐵托的近衛旅的莫馬·朱麗奇少將。部隊報紙「人民軍隊」編輯部的五個工作人員被「清洗」了。南斯拉夫空軍的皮羅·波皮沃達少將不得不避難到國外去，以免被捕。他的弟弟是陸軍少校，從一九四一年鬥爭開始起就是游擊隊員。在他的哥哥皮羅的行動消息傳來以後，他就被革去軍職，關到監獄中去並且受到非刑拷打。曾經把姓家裏六個人都獻給了游擊隊的、波皮沃達將軍的母親被逐出貝爾格萊德。這只是成千上萬在解放鬥爭中有輝煌成績然而遭遇同樣命運的軍官和兵士裏面幾個例子而已。

各種勞動人民也受到同樣的壓迫——逮捕、拷打、經常的教害。主張對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保持友誼、主張忠實於社會主義原則的人就是「共產黨情報局分子」，這種主張會構成最嚴重的叛國罪。青年和學生是其中受難最深者。數以千計的學生被大學閉除，成百的學生被逮捕。最早而且最強有力地反抗鐵托分子的浪潮就是從擁有反法西斯、反



獨裁鬥爭的偉大傳統的貝爾格萊德大學掀起來的。貝爾格萊德大學甚至在舊的獨裁政權時代就是傳播馬克思影響的強大中心。遭受打擊最沉重的也是貝爾格萊德大學的學生。

南斯拉夫很多左翼知識分子的領導人物都被逮捕了。其中包括貝爾格萊德大學幾個最著名的教授和最出色的游擊隊詩人之一拉多范·佐哥維奇。

壓迫的對象也包括外國人士。很多曾經在南斯拉夫居住很久的蘇聯公民在莫須有的罪名下被捕入獄。兩千名馬其頓和保加利亞的公民想離開南斯拉夫到保加利亞去都被拒絕了。報道反鐵托集團的消息的外國記者都被驅逐出境了。但是他們對於極端憎恨和迫害共產黨人的英、美報紙代表却倒屣相迎。

「泰晤士報」駐貝爾格萊德記者總結他的所見所聞時這樣說：

「只要內政部長一紙命令就可以不說明任何理由把人逮捕起來，繫獄累月也不進行審訊。……」

「爲了根除共產黨內部的共產黨情報局分子反對派和勒令農民繳納生產品定額，政府進行了很多次逮捕。……據大部分觀察家估計，現在身陷囹圄者至少在十萬至二十萬之間。的確，儘管建築方面嚴重缺乏勞動力和材料，監獄設備已經大大地擴充了。要說明究竟有多少囚徒真正經過審訊是不可能的。」

據估計，到一九五一年年中爲止，鐵托監獄裏面已經拘禁了二十萬愛國志士，其中包括一萬五千名軍官和幾千個軍士。單是一九五〇年這一年就逮捕了約九千五百名工會

## 職員。

監獄和集中營裏面的統治是希特勒式的——飢餓、鞭笞加上德國秘密警察絞盡腦汁想出來的酷刑。

鐵托集團爲了徹底實行這些鎮壓勞動人民的手段，就不得不把主要的政權機構改組成對要求南斯拉夫向社會主義前進的人民羣衆實行鎮壓的機構。鐵托在這方面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發展一支「可靠的」——即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工人階級的——軍隊和秘密警察。

從一九四一年第一個游擊支隊剛組織起來的時候開始，隱藏在南斯拉夫共產黨和解放部隊裏面暗中進行活動的鐵托集團就已經合謀把他們自己的人安插到武裝部隊裏面去担任要職。鐵托的主要黨羽如佩科·達普察維奇、科查·波波維奇、伊凡·戈斯尼亞克等都被提拔到領導地位上去了。很多因爲反動的大塞爾維亞（塞爾維亞沙文主義）觀點而臭名遠揚的舊皇家南斯拉夫軍隊的軍官被容納到游擊隊裏面來，保持着他們原有的軍級；而且很快就被擢升到最重要的職位上去。從形形色色賣國賊的部隊——烏斯塔希（克羅西亞恐怖分子集團），多莫布蘭齊（軸心國傀儡克羅西亞「獨立」國的軍隊），斯洛文尼亞「白衛軍」和米哈伊洛維奇的跟從者——按過來的軍官也得到同樣待遇。原來指揮巴夫利奇部隊、被游擊隊俘虜後却被鐵托提升爲少將的克里夏尼奇上校，和原來是克羅西亞傀儡軍中校現在担任高級軍事教官的蘇萊曼·菲利波里奇等就是這一類的人。

鐵托本人今天是南斯拉夫軍隊的總司令。鐵托的主要黨羽——伊凡·戈斯尼亞克、科查·波波維奇（貝爾格萊德百萬富翁的兒子）、佩科·達普查維奇、俄特瑪爾·克里亞息奇等等——都在軍隊裏高據要津。從前的契特尼克，烏斯塔希分子和舊政權皇家軍隊的反動軍官也在鐵托的軍隊裏作指揮官。這支軍隊是反動派的公開武器。舊皇家軍隊的烏列皮奇中將指揮着南斯拉夫空軍；舊南斯拉夫皇家海軍的約瑟夫·捷爾尼現在是鐵托艦隊裏面的海軍中將；前契特尼克分子、大塞爾維亞沙文主義者、原屬於南斯拉夫皇家軍隊的約凡諾維奇少將在指揮鐵托的砲兵；舊皇家軍隊的阿波斯托爾斯基現在是少將、薩拉熱沃軍區司令。米哈伊洛維奇在塞爾維亞的主要黨羽之一，因等待塞爾維亞人民而臭名遠揚的拉多斯拉夫·朱麗奇上校也盤據重要的職位。

一九四八年六月底共產黨情報局決議才一發表，南斯拉夫軍隊裏馬上就開始了瘋狂的清洗。這種清洗一直繼續到今天。大部分兵士都是從民間來的。他們都要求與蘇聯友好。爲了打敗軸心國家，建立一個他們所希望的人民的新南斯拉夫，很多人會經英勇地作過戰。他們是得不到信任的。因此，在東歐所有人民民主國家都在訓練新的人民的軍隊，從人民當中提拔新的軍官幹部，使工人和小農成爲將軍和空軍元帥的時候，鐵托南斯拉夫軍隊的領導地位却塞滿了鐵托自己的主要黨羽和舊政權的軍官。

這說明爲什麼美國右翼報刊會把鐵托的軍隊和佛朗哥的部隊以及納粹部隊相提並論，作爲西方帝國主義集團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這說明爲什麼最反動的美國前國務卿

詹姆斯·弗·貝爾納斯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宣誓就任南卡羅林納州州長時能說：

「從去年九月起我們就在與法國和英國討論對於在西德招募軍隊應該做些什麼限制。我們早就應該鼓勵西德建立一支軍隊……我們派到西班牙去的應該不止是一個大使。我們應該儘快地把軍需品送去……我們應該尋求鐵托的友誼並以軍需品供給南斯拉夫。鐵托有訓練有素的軍隊。……」（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這說明杜魯門總統爲什麼會在一九五〇年最後幾個星期裏面匆匆忙忙地給鐵托的軍隊送去價值一千二百萬美元的糧食。他們認爲納粹和佛朗哥的部隊及鐵托的軍隊都是「靠得住的盟友」。

同樣，對於鐵托集團也許更爲重要的是把秘密警察、民事和軍事保安部隊變成反人民的「靠得住的」武器的問題。

拉伊克、科斯托夫和霍克西審判案列舉出來的證據說明從一九四一年起鐵托分子就在用外國特務、舊政權的警察和秘密警察人員以及以雷科維奇爲首的集團裏的可靠分子担任保安部隊中的領導職務。O·Z·N·A·（所謂人民保衛部）的領導幹部一開始就是從這些來源挑選出來的。在戰爭期間用各種方法排除和殺害伊凡（羅格）·利巴爾——共產主義青年團領袖、米盧丁諾維奇將軍和佩塔爾·德拉普辛將軍等共產黨領袖的就是這些「靠得住的」工人階級的敵人。

一九四八年，甚至於在共產黨情報局決議公佈以前，鐵托分子就進一步清洗了保安部隊。O·Z·N·A·被由警察、邊防軍和各種秘密警察組織起來的U·D·B·（國家保安處）取而代之。

前國家保安處上校維西林·波波維奇，因為厭惡他奉命去完成的任務而從鐵托集團那裏潛逃出來。據他報道，一九四八年四月曾經在蘭科維奇主持下召開了全南斯拉夫國家保安處代表大會，討論對真正共產黨人採取行動、加強國外活動和建立「剷除共產黨情報局分子」的特別機構等問題。會後國家保安處內部就進行了一次新的清洗，因為很多過去被認為「靠得住的」人已不能指望他們去實行蘭科維奇和鐵托現在所公開闡明的明顯的反蘇、反進步的計劃——在各人民民主國家進行破壞活動和從肉體上消滅真正的左派。

國家保安處在按照他們的需要清除了所有的進步分子以後就開始統治南斯拉夫國家機器的一切部門。他們的統治方式有點像過去德國秘密警察所做的那樣。國家保安處的官員統治着「黨」組織、地方委員會、羣衆團體和所謂「人民」團體。

蘭科維奇本人擔任「人民解放鬥爭退伍軍人聯盟」總書記。塞爾維亞、克羅西亞、斯洛文尼亞和馬其頓的警察部長們在裏面佔據着領導職位。國家保安處的官員在文教組織裏面也佔據着領導職位。國民經濟方面很多重要位置上都安插着國家保安處的官員。

蘭科維奇從前的副官米庫諾維奇中將當上了冶金工業總監，前國家保安處間諜部主

任瑪克斯中將做了航運部部長，曾經在保加利亞組織間諜活動並且担任過國家保安處人事部部長的約凡·波約維奇則被派去管理民用航線。

因此，鐵托集團使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誕生出來的南斯拉夫的國家機器完全顛倒過來了。爲了建立這樣的國家機器，人民曾經在民族解放鬥爭中茹苦含辛乃至犧牲生命。理應代表勞動人民利益來反對舊統治階級和外國反動派的政權變成了代表外國反動派的利益和便於恢復國內資本主義的，反對南斯拉夫勞動人民的工具。

鐵托南斯拉夫的政權雖然還保留着某些人民民主的外形以假迷惑國內外的進步人民，但是實質上則已經變成了公開鎮壓工人、勞動農民和進步知識分子的政權。在人民協助下建立起來的用來對付軸心國殺人犯和國內的賣國賊的軍隊和保安組織，由於內部叛變的結果變成了一種在國外攻擊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和在國內攻擊由真正共產黨人領導的勞動羣衆的機構。

鐵托集團通過在共產黨和國家內部組織秘密暴動的方法掌握了政權。有一個時期，南斯拉夫的統治者被迫在表面上實行人民所要求的政治和經濟政策。就如蘭科維奇對拉伊克所解釋的那樣：

「必須明確地了解這一點：無論是鐵托或是南斯拉夫政府的其他人員，解放後都並不想在南斯拉夫建立民主制度和建設社會主義。不過如果他們被迫採取……革命的措施……這並不是他們認真想實行社會主義計劃，而只是在南斯拉夫勞動人民

羣衆的壓力下才不得不這樣做的。」（拉伊克審判案記錄一）

鐵托集團掌握政權以後說着手把南斯拉夫國家改組成法西斯式的壓迫人民的國家，並且儘可能地保持着早期的組織形式的外表，以便更好地掩蓋他們的真正目的和混淆人民視聽。

但是蓄謀恢復資本主義的鐵托分子不可能只是把南斯拉夫變成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南斯拉夫人民有堅強的革命傳統和民族解放鬥爭的深刻經驗。即使只容許他們得到有限的民主；他們也會利用這種有限的民主來驅逐賣國賊和清除鐵托分子。鐵托分子在設法使歷史倒退並引導他們的人民從初生的人民民主制度退回到資本主義制度的時候，不可避免地需要一個獨裁的、法西斯式的、强有力的、壓迫人民的國家機器。鐵托的祖師爺托洛茨基在鐵托以前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托洛茨基妄想——如果他能夠用秘密的反革命的暴動奪取政權的話——強加在蘇維埃人民頭上的就是這樣的一種統治。拉狄克在托洛茨基反蘇中心的審判中作證時談到已爲皮達可夫和謝甫布里亞科夫所證實的托洛茨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信。他解釋說：

「在政治方面，這封信裏一種新的調子就是它對於權力問題的提法。托洛茨基在這封信裏說：任何民主都是談不上的。工人階級已經經歷過十八年的革命，胃口很大；這個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將不得不送回私營工廠去，一部分送到必須在最艱苦的條件下和外國資本競爭的國營工廠中去。這就是說，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將被

急驟降低。農村中貧農和中農反對富農的鬥爭會重新開始。那時候，爲了保持政權，我們就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不管用什麼形式把它掩蓋起來都是一樣。」（着重點是我加的——著者。）（「托洛茨基反蘇中心審判案記錄」第一一四頁。）

托洛茨基的承繼者鐵托今天努力在南斯拉夫實行的就是托洛茨基所未能完成的計劃。鐵托所實行的是一種波拿帕特式的政變。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的著作中曾經寫到這種類型：

「波拿帕特主義就是企圖把少數人的意志強加在多數人身上。波拿帕特主義就是少數人窺奪黨的領導權或國家的政權來反對多數人。」（「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十卷，第一六四頁。）

隱藏在黨內的鐵托集團用秘密政變方式奪取了政權。但是鐵托分子爲了保持政權並「把少數人的意志強加在多數人身上」，正努力在南斯拉夫恢復資本主義。雖然這並不是一夜之間進行的簡單行動，雖然鐵托分子千方百計地想掩飾他們使資本主義復辟的事實，但逐漸發展着的鐵托主義的階級基礎却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我們已經看到，他們在農村裏是以剝削勞動農民羣衆，使勞動農民羣衆陷於悲慘的貧困境地的富農爲基礎的。今天，七萬二千戶富農佔有等於六十二萬九千戶小農的兩倍半的土地。

南斯拉夫已經國有化了的工業部門並不是按照勞動人民的利益進行工作的。我們從



英國的經驗已經知道，國有化本身並不就是社會主義，即使督權的政府希望把它說成這樣。國有工業是否已經社會主義化，最後分析起來，決定於控制着工業的國家的性質。南斯拉夫國家已經被鐵托分子變成一部受官僚政治和等級制度支配的反動機器。這部反動機器正在努力使這個國家變成外國——主要是美國——帝國主義的附屬國，正在努力恢復資本主義。南斯拉夫的國有化工業基本上已經變成了代表西方資本主義的利益來剝削人民的工具。鐵托集團的國有化工業掩蓋着等級制度的統治和外國帝國主義的剝削，正如鐵托的假集體農莊掩蓋着富農對勞動農民的剝削一樣。

鐵托分子最近使用的煽動手段，所謂分權措施，實際上掩蓋着工業中部分恢復到私人資本主義佔有制的事實。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中旬鐵托本人宣佈某些工業公司將「解除國有化」，交還給原來的私人業主。很有意思的是一系列的國營農業機器站都完全被解散了，機器交給了假集體農莊——也就是交給了富農。某些工業企業的管理被交給鐵托分子所說的「勞動集體」，而由鐵托分子的國家保留最後的控制權的過程和墨索里尼的「勞動（法西斯）組合」幾乎完全一致。

他們大肆吹噓的這種「分權」——就是取消過去作為國家控制國民經濟的形式的面和國家中央機構（五個管理經濟的部和中央計劃委員會）——只是用典型的籠絡人心的方式來掩蓋把南斯拉夫經濟的控制權交給外國帝國主義的事實，這就是鐵托分子的「理論家們」所宣揚的「國家的消亡」。

鐵托政權的階級基礎包括農村裏的富農和城市裏日趨恢復的資產階級。現在，貿易差不多已經完全回到私商手裏去了。國家對外貿易的壟斷已經廢除。各種組織、企業和個人都得到了和外國公司進行貿易的便利。現在有一百家以上的進出口公司和九家出口公司在營業了。

西方帝國主義明目張膽地誇耀說：由於「勸說」的結果，鐵托集團已經回到了資本主義。美國商業機關報「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一九五一年八月三日刊載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鐵托發現共產主義是得不償失的——國家面臨崩潰，轉向西方」。它把西方的援助和鐵托放棄社會主義這件事的聯繫大大地吹噓了一番。

「……當鐵托日益向西方覓取他所需要的援助時，一種與嚴格的計劃和控制分道揚鑣的工作正在進行。自由經濟的措施將被恢復，以代替共產黨做生意的辦法。以一件小事為例，負責分配成品給商店的人過去一直是直接拿薪水的。現在將把他們歸於拿佣金一類去了……銀行家們正以會計人員的身份上場給工業簿記定下些制度……商業和生產方面訓練有素的專家們將被安插在比黨的領袖們更高的地位……原料的集中分配將有一定限度。各公司將可保留純利百分之七十作為再投資之用。他們希望用這些辦法來鼓勵改進和自由競爭。仿效美國而不是俄國的樣式來改變工資制度的辦法正在研究中……評論家們認為現在的時機最好，因為這個國家正顯於

互解。」

這家經常把工黨治下的英國「社會主義」的發展罵得狗血淋頭的美國壟斷資本的商業機關報，却發現鐵托南斯拉夫的「自由經濟」、「利潤」、「自由競爭」和「美國工資樣式」是非常令人滿意的。

倫敦「經濟學家」(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對於它的美國同僚的熱烈情緒也有同感。它說到「貝爾格萊德發作的一篇洋洋可觀的聲明說明新的內部改革」最遲將在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生效。這種改革「將比任何從前所採取的走向行政分權和削減政治特權的步驟更能觸及南斯拉夫經濟的心臟」。『經濟學家』宣稱，這些建議已經在「實行經濟計劃與財政新制度的準備工作」這個令人注目的標題下發表了。

「經濟學家」認為值得西方刮目相看的這些改革是什麼呢？第一，「聯邦政府……建議將詳細的經濟計劃工作交各共和國辦理，各共和國則委託給地方當局和各個「經濟企業」。其次，「各企業得保留其純利」。第三，「工人通過分紅方式分享利潤解凍的利益，反之：如該企業所得不足支付基本工資，則工人不得不少拿工資」。第四，「這就是所謂「新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吧！」「價格將由市場即供求關係決定之」。

這些最新的建議使「經濟學家」歡欣若狂。它興高采烈地說，對於這些建議，「西方只能鼓掌歡迎」。「每日郵報」記者亞歷山大·克利弗德對於鐵托新經濟改革的遠景更是高興得心迷意亂。他寫道(一九五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如果改革成功，結果南斯拉夫

社會主義化的程度似乎比英國還要差得多。他躊躇滿志地觀察着鐵托保證實行的經濟措施：「物價……由市場——這就是說，由供求關係——決定之」，「工資和薪金……按企業收入或利潤規定之」——經濟企業「獨立自主地決定生產產品的種類和數量」。

他的結論是——實在很正確——「在這一切裏面並沒有多少古典式的馬克思主義」。

美國和英國的商業報紙都歡迎鐵托的「新型共產主義」：「每日郵報」記者稱之為「自由共產主義」。因為它變成了——一種相當舊式的資本主義。

整個國家正在被置於外國——主要是美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下面去。

鐵托分子統治下的南斯拉夫已經回到資本主義，但並不是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今天的南斯拉夫是由一個反動階層統治着的半殖民地國家。這個反動階層管理着一個法西斯式的警察國家。他們所代表的是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的富農與日益復活的資本家的利益。

奧地利卡林西亞人安德雷·哈德拉普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作的關於鐵托南斯拉夫的報告是特別有趣的，因為哈德拉普是卡林西亞自由陣綫（斯洛文尼亞少數民族的組織）的一個職員。一九四八年年中情報局決議公佈以後，他因為替鐵托撐腰而被奧地利共產黨開除黨籍。因此他就變成了鐵托集團所喜歡的人。他訪問斯洛文尼亞以後（他懂得斯洛文語言並且可以在那裏自由活動），在一九五〇年四月寫道：

「一九四九年我曾經三度訪問南斯拉夫。在訪問期間，我可以了解到共產黨情報局認為南斯拉夫所遵循的是一條錯誤道路的批評的公正性。我可以看到南斯拉夫領導機構對蘇聯的立場已經完全改變，南斯拉夫只有一部分人，那些地位顯赫的人才能過得舒服服，並且可以窮奢極侈，而勞動人民只好挨餓。」

「在南斯拉夫，信仰堅定的老黨員都被禁錮起來了。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監獄裏關滿了這些信仰堅定的黨員，而代替他們的位置的是鐵托集團的人，或甚至是以前支持米哈伊洛維奇的人，白衛軍或勾結納粹和德國秘密警察的賣國賊。……」

「現在，我認為盤據着南斯拉夫領導地位的是一個和共產主義思想或工人階級沒有任何共同點的集團。……」

「民主陣綫的政治路線也已經改弦易轍。斯洛文尼亞的民主陣綫中央委員會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和奧地利共產黨、各人民民主國家、特別是蘇聯作鬥爭。鐵托集團的叛變已經確鑿證明，使自己隔離在進步陣營之外的人無論遲早不可避免地會走到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那一邊去的。」

## 南斯拉夫人民的反抗

鐵托匪幫已經把南斯拉夫人民引向災難。他們再度面臨飢饉。這樣的情形又出現

了：一個富饒的國家把它的財富大量送到外國資本家和國內一小撮人的手裏去，而人民羣衆却在飢餓中。勞動者又成了受苦受難者，又變成了輾轉於貧困泥沼裏的人。警察和軍隊又在逮捕爲改善生活條件而鬥爭的人，往往不經審訊就把他們送到監獄和集中營去受折磨。南斯拉夫又出現了這樣一個反動政府——這個反動政府企圖煽動民族仇恨的方法來維持自己的政權，企圖用分裂的辦法來統治他們。南斯拉夫又出現了這樣一個反動的當權集團——這個集團千方百計想鼓動人民反對他們國外的真正朋友和盟邦，想把他們交給他們的真正敵人和剝削者去任意擺佈。所有南斯拉夫人民在兩次大戰之間所熟悉的和所遭受過的，甚至於比那更壞的，他們今天在體驗着和遭受着了。

但是人民以日益廣泛的組織和日益強大的力量逐漸在對鐵托分子進行反抗。

起初，鐵托集團的叛變使人民惶然不知所措。他們被解除了武裝。反抗屬於一種無組織的性質，表現爲個別的，主要是工人的抵抗行動。個別工人隱藏起來不去參加無酬（「志願」）勞動大隊。他們不完成工廠經理部所規定的標準和目標。他們受到剝奪配給票、削減工資、減少休假日、喪失免費醫療的權利、開除和坐牢等懲罰。

這種個別抵抗階段逐漸轉變到比較集體的反抗階段。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逃亡情事在大規模地發展，特別是在採礦和其他重要工業部門裏面。鐵托分子統治者用強迫工人簽訂長期勞動合同這種辦法來對付他們。但是，據估計，簽訂了這種合同的工人不過百分之三十，而且任何大企業裏面簽訂這種合同的工人都從來沒有超過半數。此外，即使

已經簽就的合同也常常被撕毀。

當工人們受到強迫勞動的懲罰時，他們就轉而採取更先進的行動方式——罷工和破壞。一九四九年被送到塞爾維亞特別普加礦上去的一萬一千個工人裏面有一萬零五百人離開了那個地方。在嚴厲的懲罰和逮捕的威脅下，工人們轉而採取了破壞行動。有一條上山鐵路被炸毀了。附近鐵路的一條隧道裏面埋了炸藥，以阻止鐵托分子把礦砂運給帝國主義者。有一次要求歸還配給票的罷工達到了很大的規模。在國家保安處努力破壞罷工，派遣三千個囚犯到礦上來的時候，礦工們就推毀了一座主要發電機作為答覆。連鐵托分子「工會」的「拉德報」都承認，一九五〇年上半年被送往塞爾維亞做工的工人裏面有百分之二十二都離開了他們奉命去工作的礦山和企業；克羅西亞有百分之三十，波斯尼亞、赫茲戈維拉有百分之二十八。

在對鐵托分子的反抗日益蓬勃的第二階段，貧農和中農，勞動農民，也開始和工人攜起手來。一九四九年耕地面積大大地縮減了。一九五〇年縮小更多。農民的反抗開始從消極的逐漸發展到更積極和更富有戰鬥性的形式。

有組織地拒絕繳納實物稅的情形開始在農村中出現，後來更發展到和當局進行武裝衝突。「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在波斯拉夫鄉村旅行時報道（一九五〇年八月一日）勞動農民中間劇烈的不滿情緒說：

「鐵托元帥在波斯拉夫這個地區（克羅西亞和波斯尼亞）的農民中碰到了嚴重

的麻煩。上一個月，在一次反對當地共產黨（讀作鐵托分子——著者）當局的騷動後，此地附近某村有十二個農民被處死刑。附近其他三個區裏面也發生了譁變式的示威遊行。

「……據農民說單是格林納村五月份就監禁了一百五十個人，他們現在還關在監獄裏面。捲入旋渦的城市是在克羅西亞及鄰近的波斯尼亞地區；在南斯拉夫第二大城市薩格勒布以南三十哩到六十哩。……」

「……鄉村裏面仍然是怒氣沖天，對當地共產黨委員會和共產黨的經濟政策有着毫不隱諱的憤恨。」

令人感到有趣的是這位「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不得不承認這種抵抗並非來自富農，而是毫無例外地來自貧苦的農民：

「很多農民顯然都生活在慘不忍睹的貧困中。曾經和記者接談的人沒有一個是有兩英畝以上土地的。」（同前，一九五〇年八月一日。）

一九五〇年八月，農民「暴動」和反鐵托分子的示威開始在塞爾維亞風起雲湧。八月二十六日一天就逮捕了一百一十八個貧農，因為他們繳納規定的穀物太遲或根本沒有繳納；六十八個人被判處沉重的勞役。過了幾天又有三百四十二個勞動農民被逮捕並被判罪。勞動農民對假集體農莊的抵抗已經達到了更高的階段。同樣在八月，塞爾維亞的農民縱火燒掉了波林納「集體農莊」的穀倉和磨坊及布拉哥伊·尼斯科維奇「集體農



莊」的穀倉。一九五〇年七月，一百零三個馬其頓的農民因為「沒有正當理由」就脫離了他們的「集體農莊」而被判刑。

消極的拒絕耕種土地日漸發展到積極的戰鬥性更強的拒絕納稅，發展到破壞以至武裝抵抗。

「曼徹斯特衛報」外交記者在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四日「南斯拉夫在轉變中」這篇文章裏評論南斯拉夫農民對鐵托統治的反抗的日益高漲的情形說：

「若干西方和南斯拉夫的觀察家表示，鄉村黨的基層幹部中擁護共產黨情報局的情緒仍然相當強烈。……他們認為如果南斯拉夫站在西方列強那一邊參加戰爭的話，共產黨地方幹部就害怕農民們會乘機割斷他們的喉管。」

「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加斯頓·柯布倫茲於一九五一年八月底，九月初在南斯拉夫的馬其頓旅行時報道說：

「在南斯拉夫馬其頓各地旅行可以看到一種令人觸目驚心的景象：由於農民拖延不向政府繳納穀物，尚未打過的麥子仍然躺在很多莊稼地裏……成百堆無人照管的麥子亂七八糟地鋪滿了一望無際的田野。……在某些地區，打場工作已經比正常時間晚了一個月。和過去幾個星期南斯拉夫各地都盛行的說法一樣，高原的農民都說農業機器已經壞了。」（「紐約先驅論壇報」薩隆尼卡一九五一年九月三日電訊。）

到一九五〇年，人民對鐵托分子的純粹經濟性的半自發性的反抗開始轉為政治性的。

反抗。這種轉變反映在三月份聯邦國民議會「選舉」時很多地區不願恐怖威脅對這種統治表示反對的大量選票上。這種轉變也反映在逮捕著名的共產黨和游擊隊領袖的情事日益增多上。一九五〇年九月的上半個月裏被捕的有克羅西亞政府的三個成員——他們同時也是克羅西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克羅西亞副總理杜桑·布爾基奇，經濟委員會委員拉德·齊吉奇和林業部長奧帕西奇。

「……他們被控的罪名是……在南斯拉夫黨的普通黨員中散播下面這些破壞性的消息：說鐵托和他的黨羽在『浪費』國家財富，『剝掠人民』；說『任何鄉下商人』都比這位元帥『更善於管理經濟』；說『三年來（自從與莫斯科分裂以來）我們一直在倒退着』。」（「紐約先驅論壇報」駐貝爾格萊德記者通訊，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三日。）

「泰晤士報」駐貝爾格萊德記者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報道：南斯拉夫金屬工人工會主席拉扎爾·普拉弗西奇被開除了會籍，並且因「勾結共產黨情報局陰謀叛變」的罪名而被捕。一九五一年六月底，「紐約先驅論壇報」報道說有一連串高級共產黨幹部因為進行「傾向共產黨情報局的活動」而被捕。據報道：被捕的人裏面有：財政部副部長沃伊斯拉夫·斯增蒂奇，他的兄弟，國家保安處（秘密警察）少校尼可拉，他的在外交部裏面担任高級職務的妻子，農業部副部長馬克西姆·戈拉諾維奇和他的曾經在貝爾格萊德一家大商業機構裏做經理的妻子瑪麗亞。

斯增蒂奇和戈拉諾維奇都出生在具有共產主義和進步傳統的家庭；斯增蒂奇是一個游擊隊員，他有一個弟弟在戰前一次反法西斯的學生遊行中死在警察手裏，戈拉諾維奇是一個在游擊隊裏堪稱領導地位的軍官。斯增蒂奇從前是對外貿易部副部長；在他的前任歐布倫·布拉戈耶維奇博士因反對鐵托政權而被捕後才調到財政部來。

對鐵托集團的反抗顯然已在老一輩的共產黨員圈子裏日漸增漲起來。歷史正在揭露鐵托分子所扮演的角色。連那些最初受了欺騙的人也逐漸看清楚。

在生活水平日益下降，鐵托分子對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進行的攻擊和誹謗日益露骨的今天，廣大的人民羣衆已經在逐漸擺脫他們對國家領導者的幻想的殘餘。這時候，在這個廣泛的、但是還沒有完全組織起來的反鐵托運動中，一個範圍比較小但是組織很嚴密的地下共產黨——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為基礎、忠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的真正共產黨——正在發展着。

以鐵托及其黨羽為首的舊的南斯拉夫共產黨已經變成了和共產黨背道而馳的東西。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的南斯拉夫共產黨的一萬二千名地下黨員裏面有八千名在戰爭中喪失了生命。很多人是被鐵托分子蓄意置之死地的。剩下的四千人裏面很多人現在身繫囹圄。舊的「黨」已經變成鐵托的警察國家的附屬品了。

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的黨，儘管受到恐怖迫害，仍然在成長。地下黨小組在散播反對鐵托分子的地下刊物和傳單。路上和牆上都寫了反對鐵托分子的標語。新的領導

者在成長中，他們將站在廣大人民羣衆反對鐵托賣國統治運動的前列。

南斯拉夫人民不會心甘情願地讓他們的國家回到它在兩次大戰之間所處的半殖民地地位去。他們是不會被引到反對他們最好的朋友和最親密的盟邦蘇聯和其他斯拉夫民族以及相鄰的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戰爭中去的。他們是不會忍氣吞聲地、一聲不響地眼看着資產階級專政的復辟的。

具有爭取獨立、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國內外反動派的悠久的英勇鬥爭傳統的南斯拉夫人民將展開反對鐵托集團的鬥爭，解除它的權力，懲辦賣國賊，再度沿着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

## 第七章 強烈的對照

鐵托分子報紙製造出來的一大堆廢話和謊言被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報紙如獲至寶地大量地翻譯成各國語言予以轉載。在所有這一切廢話和謊言中，有一種主要的誹謗，一個蓋過其他一切的瀾天大謊。鐵托和他的主要鼓吹者德吉拉斯、德狄耶爾之流，從希特勒和戈培爾那裏學來了戰術，就是：撒下瀾天大謊，然後令人作嘔地加以重復。

這個瀾天大謊說蘇聯企圖使東歐各國殖民地化，企圖阻止它們工業的發展，使它們的經濟停留在落後狀態。這種謊話說：在鐵托領導下抵抗了「赤色帝國主義」捷南斯拉夫為殖民地的計劃的「英勇的小南斯拉夫」，現在正受到慷慨的西方的經濟援助；但是仍然留在「蘇聯統治」下面的人民民主國家經濟上却一籌莫展。

從鐵托分子數以百計的聲明裏面隨便舉出三個典型例子來看一下：

「如果從較小的或較不發達的國家的經濟只有附屬於已經發達了的大國的經濟並作為這些大國的超額利潤的來源這種立場出發，而不是從提高每一個國家的經濟力量並使其繁榮的立場出發，要修談兩個之間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平等合作當然是荒謬無稽的。」

這是一九四九年十月鐵托的外交部長卡德爾在聯合國第四屆大會上講的話。他所攻擊的既不是英國帝國主義，也不是美國帝國主義，而是蘇聯。

「……蘇聯的領袖們通過他們的壓力阻止了保加利亞的重工業建設，因而使保加利亞停留在農業國的水平上，成爲蘇聯工業原料的來源……蘇聯對於南斯拉夫懷着類似的陰謀，但是對於這種不民主的意圖我們是不會同意的。」

以上是鐵托的小戈培爾、南斯拉夫宣傳部長德狄耶爾在科斯托夫審判案時期講的話。「世界上的基本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不平等的關係——蘇聯對於小國的頹指氣使，使小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處於從屬地位。」

這是鐵托機關報「戰鬥報」一九五〇年六月初講的話，曾爲「紐約先驅論壇報」讚許而予以轉載。

在這一章裏面，我們要仔細研究一下鐵托分子誹謗誣蔑的這一主要路綫。首先我們可以看看「英勇地擺脫了赤色帝國主義的束縛的」鐵托南斯拉夫的命运是什麼，而仍然留在「蘇聯統治」之下的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命運又是什麼。

讓事實和數字來說話吧！

## 蘇聯的援助和西方的「慷慨」

當紅軍和南斯拉夫民族解放軍在一九四五年年初把最後一批軸心部隊逐出南斯拉夫國土時，這個國家，在四年的軸心國佔領和蹂躪以後，經濟上已是山窮水盡。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冬天，達爾瑪特海岸發生了飢荒。交通綫已經遭到摧毀和破壞，橋被炸斷了，路上埋了地雷。當西方軍事和民政當局被請求運糧食到飢荒地區去時，他們提出了苛刻的條件。當談判尚在繼續時，當糧船停泊在意大利東部港口待命時，男人、女人和小孩已成餓殍。這是戰後西方的「慷慨」援助的第一個例子。糧食霉爛了，人民死亡了；而這只是亞得里亞海相隔一箭之遙的兩岸發生的事。

首先給南斯拉夫人民送去援助物資的是蘇聯。蘇聯自己也是一個遭受戰爭蹂躪的國家；蘇聯的軍隊和人民在戰爭中又是首當其衝。但是首先給南斯拉夫飢荒地區迅速供應糧食，送燃料去恢復南斯拉夫的運輸、送原料和裝備去重建南斯拉夫工業的都是蘇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首先與南斯拉夫大規模發展貿易，把恢復工業最必需的物資運到南斯拉夫去的是蘇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一九四六年六月和一九四七年七月的貿易協定的基礎上，蘇聯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間供給南斯拉夫的貨物價值達五億四千一百六十萬盧布，此外還有作為信貸的、價值達七億九千五百萬盧布的貨物。黑色金屬、橡膠、原料、機器、機車、五千七百輛車廂也都以借貸方式源源不絕地運到南斯拉夫，幫助南斯拉夫進行重建工作。

此外，在鐵托把南斯拉夫拖入西方軌道並且和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斷絕友好互助

關係以前，蘇聯政府曾經同意供給南斯拉夫一座每年生產銑鐵四十萬噸、鋼五十萬噸、鋼板三十萬噸和焦煤六十萬噸的鋼鐵廠。一個年產量為三十萬噸的煉油廠設備，石油和採礦工業設備，以及有色金屬冶煉工廠和硫酸廠的設備。

蘇聯對解放後的南斯拉夫的援助和貿易的整個基礎事實上正是為了使南斯拉夫工業得到最迅速的恢復，使南斯拉夫迅速地進一步工業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三年中，鐵托分子的叛逆活動在人民面前是隱藏着的。因此他們不得不公開表示他們人民對蘇聯人民和政府的感激。

一九四六年年中南斯拉夫宣傳部發出的第一篇標題為「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戰後對外貿易」的官方新聞稿說：

「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從國家解放初期起就特別注意恢復和發展與蘇聯的商務關係。早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就在莫斯科簽訂了商務協定。

「如果沒有蘇聯大公無私的援助，殊難想像過去一年我們的經濟會遭遇到什麼情況。這種援助包括我們的工業和礦山最迫切需要的燃料、原料、半製成品和零件。

「蘇聯按時履行協定的義務，同時完全了解我們的困難。今天蘇聯在我們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前兩季對外貿易統計數字中佔第一位……」

南斯拉夫當時的對外貿易部長尼古拉·彼特羅維奇，一個主要鐵托分子（當時也同樣在隱瞞自己的真面目，所以不得不反映人民羣衆的感覺）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九



月的「特里德塞·端納」雜誌上面寫道：

「蘇聯過去是現在也仍然是世界經濟裏面一個堅強穩定的點。她不受週期性危機和動盪的影響；她有無限的財富和經濟力量，穩定明確的經濟發展的可能性和遠景。」

「最重要的是：蘇聯在與其他國家的經濟和商務關係上不受自私自利目的的支配，沒有剝削其他國家和民族的財富的意圖。」

「因此，需要保護自己不受外國帝國主義兇惡的貪慾威脅的弱小民族在政治、經濟和商務方面覓取蘇聯的合作、支持和保護是符合與他們的切身利益的，這不是當然的結論嗎？」

到一九四七年，任何人都很清楚：與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友誼、蘇聯的援助和貿易，以及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援助和貿易將為南斯拉夫的復興和工業化奠定基礎，為一個獨立而繁榮的南斯拉夫奠定基礎。

聯合國組織關於「若干國家的經濟發展」的報告說：

「協定（捷南經濟協定）的五年期間預定將從捷克斯洛伐克運來價值一億五千萬美元的基本建設裝備，這對於（南斯拉夫）五年計劃目標的完成將有巨大的貢獻。」

「對於實施五年計劃特別重要的是與蘇聯簽訂的貿易協定。這個協定是一九四

七年七月三十日正式宣佈的。根據這個協定的規定，南斯拉夫將得到冶煉鐵金屬和有色金屬的工廠和設備、石油和化學工業的工廠、煤礦工廠。而南斯拉夫則要等到一九五〇年才開始交貨。……」

蘇聯的目的是要幫助南斯拉夫恢復它的工業，但是西方國家的目的是想在所謂「援助」的名義下使南斯拉夫降到殖民地的地位。這兩種目的之間所存在的對立同樣也在聯總——即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幕後進行着。

建立聯總的目的是想使它成爲一個幫助曾經遭受軸心國侵略的國家復興的國際機構。紙面上，它的目的是使這些國家能夠重新自立起來。這就是說，在初期救濟飢荒的階段過去以後，首先要進行恢復工業的工作。然而這並不是在聯總裏面担任大部分職務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表們的目的，更不是聯總存在的整個時期內一直坐在華盛頓的辦公室裏操縱聯總這個機構的美國政府的目的。

但是，這的確是蘇聯駐聯總代表的目的。蘇聯的代表始終不渝地在爲實行國際協定、爲使聯總成爲一個忠於自己的宗旨——以必要的物資供給遭受軸心國侵略的國家，使它們在經濟上重新自立起來——的組織而奮鬥。這的確是聯總駐南斯拉夫使團裏的蘇聯代表——包括担任這個使團的團長的蘇聯公民——的目的。

蘇聯駐聯總代表和聯總駐南斯拉夫使團裏的蘇聯工作人員（在許多西方國家的正直團員支持之下）日以繼夜地，始終不懈地奮鬥着，要聯總給南斯拉夫運去爲工業復興所

必需的物資——用來修整港口、建築道路、重建礦山、恢復運輸和設立工廠的物資。但是，華盛頓的目的是和這截然不同。

華盛頓——即美國帝國主義——認為聯總這個組織基本上具有兩種主要目的。第一，這個組織不是按照遭受蹂躪的程度，而是按照對美國的政策俯首聽命的程度來決定建設那些國家。這就是說，它要盡量犧牲東歐各國去照顧希臘和意大利。雖然南斯拉夫，由於現在已經盡人皆知的理由，比其他國家享受的待遇要好一點，但是在一九四五年至四六年期間因為鐵托和他的集團還沒有成功地從一切職務上趕走真正的南斯拉夫共產黨員，南斯拉夫在帝國主義眼裏還不是一個像希臘那樣可靠的附庸國家，所以南斯拉夫的需要常常因為照顧最惠國——保皇法西斯希臘而遭擱置。其次，華盛頓——即美國帝國主義——認為聯總是他們處置和大量傾銷現在已經不再需要的、品質低劣的、而且往往是已經用過了的剩餘軍用物資的工具。

從華盛頓聯總和倫敦聯總發給貝爾格萊德聯總下面這種性質的電報實在多極了！「茲有豆粉數十萬噸，必須加以處置。向南斯拉夫當局說明以豆粉做麵包味道鮮美。儘速回電說明具體需要。」或者是：「茲有數十萬盒美國克字口糧<sup>○</sup>，對南斯拉夫農民必有用處。你們可否接受這樣多？」但是南斯拉夫人民需要的不是豆粉，不是克字口糧，也

○ 克字口糧 (Kration) 係美國倉裝軍用口糧。——譯者

不是其他剩餘的，往往是已經壞了的美國貨，他們要的是恢復工業的物資。蘇聯駐聯總代表和聯總駐南斯拉夫使團裏的蘇聯團員經常地，始終不懈地爭取的就是這種物資。

最後終於通過聯總在東歐——包括南斯拉夫在內——的機構而獲得的工業品是由蘇聯駐聯總的代表和工作人員繼續不斷地努力從華盛頓和倫敦方面力爭過來的。支持這些蘇聯代表和工作人員的有聯總裏面各國——包括英國和美國在內——工作人員中有良心的人。這些人的政治見解雖然各有不同，但是他們都要求聯總忠於自己的憲章，完成它原來計劃的使命。

美國政府是別具用心的。它希望殖民地附庸國家都在工業上成爲美國經濟的附庸。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政府把被納粹掠奪過去的多瑙河的南斯拉夫船隻送到多瑙河上游的奧地利西方佔領區，拒絕把這些船隻交還給南斯拉夫。它拒絕發還被扣在美國的屬於南斯拉夫的黃金。它通過大石油公司，組織起來定期地拒絕出售南斯拉夫希望通過聯總而輸入的石油。當時，西方資本家對他們的傀儡鐵托分子的勝利還沒有把握，結果南斯拉夫人民就只好挨餓而死了。「紐約先驅論壇報」駐貝爾格萊德記者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引用南斯拉夫外交部某官員關於美國駐奧當局扣留南斯拉夫船隻一事的談話說：

「我們無法估計去年年初因缺乏鐵路運輸而喪命的數字。船隻是運糧食到我國災區去的唯一工具。但是船隻也搞不到手。」

這就是西方的「慷慨」的具體表現。南斯拉夫收不回被納粹偷去而現在毫無用處地停泊在美國佔領區的它自己的船隻。就是鐵托自己（那時候他還不敢明目張胆地現出自己的叛徒面目）也不得不反映南斯拉夫人民對美國和蘇聯的感覺。他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共產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的演講中說：

「我們的確曾經從國外，就是從聯總方面，得到若干援助，但是主要的而且是數量最大的援助却來自我們的偉大盟邦——蘇聯。」

這樣：對於鐵托分子所謂「蘇聯帝國主義」這種誹謗的答覆的第一部分，即答覆的第一段，就是把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戰爭結束後不久期間的事實全盤托出。從這裏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西方的「慷慨」完全是一種嘲弄，它卑鄙無恥地玩弄着南斯拉夫男女老幼的生命；但是蘇聯，雖然自己在戰爭中遭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損失，却首先給南斯拉夫送來了援助，堅持不懈地努力用一切方法恢復南斯拉夫的工業，幫助南斯拉夫穩步走上戰後工業化的道路。

### 鐵托南斯拉夫走向西方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幾年中，首先援助南斯拉夫這個國家的就是蘇聯，雖然蘇聯自己在建設方面的需要也很龐大，它仍然自我犧牲地幫助南斯拉夫進行經濟建設。

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也通過與南斯拉夫訂立互助協定的方式，給南斯拉夫的建設以巨大的幫助。

但是，鐵托統治下的南斯拉夫，早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共產黨情報局決議很久以前，就開始破壞共同訂立的貿易協定，並開始轉向西方。

鐵托南斯拉夫不按照它與東歐各鄰國所達成的協議交貨。南斯拉夫與各人民民主國家簽訂的貿易協定規定在一九四七年這一年裏面互相交換同等數量的貨物。但是南斯拉夫比規定的數量少交了百分之十八。南斯拉夫給它在東歐的最重要的貿易對象捷克斯洛伐克交的貨差百分之二十八。鐵托和卡德爾在他們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三日給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的信裏面也不得不承認這件事：

「我們並不否認：關於這件事，我們在商業事務方面有疏忽之處。」（「有疏忽之處」在皇家國際事務所發表的貝爾格萊德版英譯本裏面譯為「未予適當注意」。）

在這封信裏，鐵托和卡德爾對於蘇聯或各人民民主國家並沒有提出反控訴。它們那方面並沒有這樣的「疏忽」。但是在鐵托分子這方面，「疏忽」却愈來愈驚人，這種「疏

● 詳細情況請參看維克托·佩德雷的「南斯拉夫的對外貿易」和「誰在把南斯拉夫向後推」。這兩篇文章刊登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和二月出版的《今日蘇俄》雜誌（紐約出版）上面。這一段主要是根據這兩篇文章寫的。

忽」直接打擊了各人民民主國家的計劃經濟。鐵托分子一方面定時接收了各種重要物資，如波蘭的煤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機器等，一方面愈來愈多地延不交付和這些物資交換的重要原料，他們不是根本不交貨就是企圖用無關緊要的奢侈品來代替他們保證交付的重要貨物。

在此期間，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會經過相互貿易和信貸來幫助南斯拉夫建設工業。由於他們的援助，南斯拉夫貿易的構成逐漸從舊有的半殖民地地位中脫穎而出。這是南斯拉夫的貿易官員自己承認的事實。南斯拉夫一九四八年的對外貿易公報說：

「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大大地改變了它進出口的構成。戰前南斯拉夫對外貿易的構成具有一種典型的輸出農業原料的性質，而進口方面製成品所佔的百分比也遠較其他貨物百分比為高。因此，紡織品在南斯拉夫戰前最後兩年全部進口貨裏面佔了百分之四十五。一九四八年我們對外貿易構成上的變化特別顯著。該年全部進口貨的百分之六十七點二為原料和為當前生產所必需的其他貨物。資本財達全部進口貨百分之二十五點六，製成的消費品佔百分之七點二。」

但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進口貨裏面的主要部分（約佔南斯拉夫貿易額百分之六十）都是從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來的。南斯拉夫在兩次大戰之間曾經由於自己的半殖民地經濟地位而備嘗艱辛，而幫助南斯拉夫擺脫這種舊的半殖民地經濟地位的就是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

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這幾年裏面，蘇聯運到南斯拉夫去的貨物，按人口計算要比運到任何人民民主國家去的多。南斯拉夫從各人民民主國家輸入的總額比任何一個人民民主國家的輸入來得多。一九四八年達到了平均每人六元二角美金。同時期匈牙利的平均數只有六元美金，波蘭和保加利亞只有四元一角美金，羅馬尼亞只有二元。由此可知，整個歐洲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在發展工業方面從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得到的援助有像南斯拉夫所得到的那麼多。

就在這種情況下，就在這個時期，早在共產黨情報局決議以前，鐵托就已經苦意背叛各人民民主國家，明目張胆地背棄互助貿易協定，開始引導南斯拉夫向後退，一直退到西方帝國主義經濟軌道裏去。

在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南斯拉夫違反與各人民民主國家簽訂的換貨協定的情形日益露骨。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一日的聲明說得很清楚：

「兩國之間商務關係上最重要的問題是：由於南斯拉夫的變不講理，一直到現在還無法商定南斯拉夫作為交換它所收到的基本建設性質的工廠等等而應於今後三年交付的貨物。根據現有協定，這些在今後三年中交換的貨物應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底以前予以確定。供應這種基本建設物資的全部合同已經交給捷克斯洛伐克各工業部門。現在這些部門正在為製造這些物資而緊張地工作。因此，南斯拉夫方面這種破壞協定的行為給捷克斯洛伐克帶來的損害就更大了。」



直到雙方協議規定的最後期限過期整整一年（在情報局決議公佈以後），而且經過再三努力促使南斯拉夫履行協定所規定的義務均歸無效以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才下令所屬工廠停止生產南斯拉夫所訂的基本建設物資。

鐵托南斯拉夫和波蘭的關係方面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波蘭政府在它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的照會中不得不指出，南斯拉夫保證供給波蘭的銅完全沒有交貨，協定規定的純鉛，南斯拉夫只交了百分之三十五；原來已經裝車準備運到波蘭去的木材訂貨也被扣下來了。另一方面，南斯拉夫曾經企圖用大量的酒、葡萄、乾果和烟草濫竿充數，來交換波蘭的煤和其他重要物資。

因此，當各人民民主國家謹守諾言，把礦產運到南斯拉夫去，使它發展工業化建設的時候，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工業化計劃却受到鐵托分子拒不交付協定所規定的貨物這種行動的破壞。

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仔細檢查一下南斯拉夫的貿易關係就可看出這種「疏忽」完全是故意的。鐵托分子拒絕往東運的那些貨物正在被他們輸出到西方去。

英國對外貿易統計數字說明，從一九四八年開始，從南斯拉夫入口的東西增加了四倍。到一九四九年八月為止的十二個月中，鐵托南斯拉夫運到英國去的貨物價值達三千九百萬美元（按貶值前兌換率計算），從英國輸入的貨物價值是一千四百萬美元。由此可知，在履行對鄰國以平等交換為基礎的義務方面束手無策的鐵托分子却能够運往英國

相當於他們所收到的三倍的東西。一九四九年前八個月內，英國從鐵托南斯拉夫收到了價值達兩千五百萬美元的木材。鐵托一方面找不到任何木材來履行對於波蘭的義務和償付從波蘭運來的煤和其他貨物，一方面却有本領運木材到英國去，其價值幾乎等於南斯拉夫一九四八年輸往波蘭貨物的總額。還有，南斯拉夫木材加速運往英國是早在一九四八年年中就已經開始了的。

南斯拉夫在銅的出口方面也玩弄同樣的把戲。鐵托南斯拉夫一九四七年運到美國去的銅約重兩千萬磅。一九四八年運到美國去的銅數量銳減。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並不是爲了履行對各人民民主國家的諾言，而是爲了表示他們沒有銅來履行這些諾言。千真萬確的事實是：他們只是把銅貯存起來了，以便以後運到美國去。一九四九年頭兩個月，南斯拉夫運到美國去的銅達一千零五十萬磅；也就是說，比一九四八年全年所運去的銅多兩倍以上。「紐約時報」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報道這幾批入口貨時解釋說：這些貨物包括塞爾維亞波爾銅礦一九四八年的產品。一九四八年，當鐵托南斯拉夫拒絕交付它保證運到各人民民主國家去的銅的時候，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家被迫用美金向美國購買了一千零九十七萬五千磅銅；這就是說，差不多剛好等於該年鐵托分子拒不交貨以便他們日後運到美國去的銅的數量。

關於鐵托分子在貿易上的兩面政策還可以寫很多。結論是什麼呢？十分清楚。對於鐵托分子所謂「蘇聯帝國主義」這種誹謗的答覆的第二部分就是：

與各人民民主國家經濟關係的決裂是鐵托分子自己做下的事，並且是早在共產黨情報局一九四八年六月決議以前很久就開始了的。鐵托及其黨羽用他們有計劃的「疏忽」與東歐斷絕了對於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工業化非常有利的相互貿易關係，並且同樣有計劃地把他們不幸的國家引到西方帝國主義的軌道裏去。

## 重返半殖民地地位

結果如何呢？把南斯拉夫帶到西方帝國主義軌道裏去對於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人民產生了什麼影響？

第一個結果是：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以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為基礎的現在的南斯拉夫貿易，已經回到它在兩次大戰之間的老地位去了，即用輸出原料來交換工業製成品。南斯拉夫已經回到一個半殖民地國家對它的帝國主義主子的典型的貿易關係中去

了。

西方帝國主義者對南斯拉夫有些什麼經濟要求呢？他們需要購買廉價的原料——木材、食品，特別是有色金屬，其中很多東西是在他們的備戰計劃裏估着舉足輕重的地位的。他們要南斯拉夫的工業停留在落後的狀態，使南斯拉夫成爲他們出售剩餘物資的永久的市場。如果他們現在真正需要發展南斯拉夫的工業，那也只是爲了他們自己的目

的，而不是爲了南斯拉夫人民的利益——他們這樣做只是爲了他們自己的利益！是要在他們的控制下來發展南斯拉夫的工業。最後，他們認爲南斯拉夫是使他們的投資有利可圖的搖錢樹。這就是南斯拉夫在兩次大戰之間所處的地位。這種地位對於南斯拉夫的人民是爲害甚大的。

現在我們來看看從鐵托公開投降西方以來南斯拉夫貿易方面的變化吧！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向美國輸出的原料（主要是戰略物資）價值達五百萬美元；一九四九年達一千六百萬美元；一九五〇年則超過三千萬美元。在一九四九年頭九個月裏，美國從南斯拉夫進口的貨物，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銅、鉛、錫、鉻及其他戰略原料；同一時期南斯拉夫從美國輸入的貨物只有百分之十二是機器和交通器材。南斯拉夫這個時期從美國運來的機器還不及前一年頭九個月從蘇聯運來的木材工業機器一項的四分之一。

現在南斯拉夫的銅幾乎全部都運到美國去了。運到英國去的是木材、鉛、鋅、鉻以及從俄國半死的人民那裏奪來的食物。南斯拉夫所輸在一九四九年就已經有百分之八十用極低的價格賣給了英國和美國。

被鐵托分子輸出到前軸心國家去的南斯拉夫原料的數量也一天比一天多。肉類運到奧地利去了，而在南斯拉夫排起來等候買肉的隊伍越來越長，肉價也提高了。運到意大利去的有鐵礬土、鉛、鎂、銻及其他有色金屬。鐵托分子賣糖給意大利只要六十五狄那一公斤，但他們賣給自己的人民却要高到五百狄那一公斤。他們賣給西德的玉蜀黍只要

四狄那一公斤，而南斯拉夫工人却要花四十多狄那才能買一公斤。銅、鎳、錳和鐵礬土都運到西德去贖充他們的軍備。在南斯拉夫人民挨飢受餓的時候，在糧食配給制有名無實和黑市投機商人大發橫財的時候，西德報紙「信使報」（一九五〇年八月四日）寫道：

「十萬噸麥子，三十萬噸玉蜀黍和六萬噸大麥」將由南斯拉夫出口運往西德。

南斯拉夫人民這方面得到了些什麼呢？美國把糧食運給輸出糧食的南斯拉夫，價格比南斯拉夫自己出口的糧食高很多倍——它供給南斯拉夫的是豬油、精製麵粉、奶粉、化學製品、惡劣不堪的影片和用來廣播誣蔑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謊言的無線電裝備。常他們居然把工業設備和機器運到南斯拉夫來的時候，他們也明確規定這些東西是給那些替美國和西歐資本主義生產原料的採掘工業的——都是用來搜括南斯拉夫的木材和掘盡南斯拉夫的有色金屬的機器，留給南斯拉夫工業的是一無所有，使南斯拉夫市場仍為西方產品大開方便之門。

因此，今天南斯拉夫與西方之間的新貿易關係也就是兩次大戰之間南斯拉夫與西方之間的舊貿易關係。南斯拉夫人民在富饒的國度裏却過着貧窮的生活，到處都是原料，但是他們自己的工業却因缺乏原料而奄奄一息。粗劣的剩餘物資以高價向他們傾銷。南斯拉夫人民的財富也就不斷地流到西方資本家的口袋裏去了。

鐵托分子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曾經慷慨地給南斯拉夫貸款和信貸。來研究一下這種「慷慨的援助」的性質，是很有趣的。美國進出口銀行曾經借給南斯拉夫信貸兩千萬美

元，隨後一九五〇年四月又借了兩千萬，一九五〇年九月借了一千五百萬。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一九四九年十月借給南斯拉夫二百七十萬美元，從那時候起一直在和南斯拉夫談判其他貸款事宜。國際貨幣基金給了南斯拉夫兩筆貸款（一九四九年十月三百萬美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百萬美元）。英國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給了南斯拉夫八百萬鎊的信貸，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又借了三百萬鎊。美國國會一九五〇年十二月批准給南斯拉夫三千八百萬美元作「賑災」之用，一九五一年四月又批准給南斯拉夫二千九百萬美元「以便購買其武裝部隊所迫切需要的物資」。（「泰晤士報」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三日：「經濟學家」算了一下賬：總計鐵托南斯拉夫在那以前十八個月裏所從英國那裏獲得的貸款和信貸一共是二千二百萬鎊，從美國那裏獲得的是五千三百萬鎊；再加上一筆大部分是用來購買軍用的一千萬鎊。七月五日，英國外交大臣赫伯特·莫里遜宣佈說，美、英、法三國正在考慮進一步聯合「援助」鐵托的計劃，其中英國擔負的數額在該會計年度可能達一千萬鎊之譜。但是，這種「慷慨」的援助裏面沒有一塊美金或一個英鎊是沒有代價的——而且代價是很高的。

「紐約先驅論壇報」（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五日）評論英國第二次借給南斯拉夫的信貸時寫道：

「據說大不列顛現在也正在考慮南斯拉夫提出的新的長期援助要求，貝爾格萊德政府期望用這種援助來發展它的某些天然資源。這些資源包括各種有色金屬礦藏。」

和廣袤的產木地帶。其生產品將供應西方國家作重整軍備之用。」（着重點是我加的——著者）

因此，貸款所意味的是按照舊的殖民地的方式而開發南斯拉夫的資源，這種開發既不是爲南斯拉夫的工業，也不是爲南斯拉夫的人民，而是爲西方帝國主義的利潤和西方帝國主義戰爭。

英國「泰晤士報」談到它的美國「合夥人」時也同樣直言不諱。這個報紙在同一天（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五日）寫道：

「據悉美國政府曾考慮尙可（對南斯拉夫）作何種援助，然而面臨的困難是如不對貸款使用方式附有某種控制辦法，則殊難取得國會同意。」

「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南斯拉夫通訊更爲率直，他說：鐵托的「共產黨」和南斯拉夫人民是「兩個敵對集團」，只有美「援」可以把他們拉在一起。但他同時承認：如果有了這種援助，「鐵托將因他對美國的依賴與日俱增而在某種程度上變成華盛頓的囚徒」。「華盛頓的囚徒」對於南斯拉夫人民現在的處境倒是一種很恰當的描寫。鐵托則是監視自己人民的拿津貼的獄卒。

美國的和美國所控制的銀行和基金甚至於不耐煩掩飾他們「慷慨的一信貸和「利他主義的」貸款所附帶的條件。當進出口銀行第一次貸給南斯拉夫兩千萬美元時，它的代表公開說明，其中百分之七十五是指定作爲恢復有色金屬礦山和熔煉這些礦砂的工廠之

用的。這樣做的目的，他說，是使南斯拉夫可以增加鐵礬土、水銀、銅、鉛及其他戰略原料的輸出以便滿足美國的需要。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卡德爾宣佈南斯拉夫正在設法與國際復興開發銀行（這個銀行的基金百分之八十七是美國供給的）談判其他貸款事宜。這個銀行派遣了一個以美國商人霍爾爲首的考察團到南斯拉夫去。霍爾說如果決定貸款的話，該銀行將保留控制貸款在南斯拉夫的用途的權力。他解釋說，這個銀行將集中其注意力於發展農業、運輸業和採礦業，使南斯拉夫能保持其輸出農業和工業原料尤其是戰略原料的作用。

這個銀行的官員們的臉皮一向是特別厚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該行首席經濟學家安東寧·巴希在美國雜誌「國際協調」上寫了一篇冗長的文章。他在這篇文章裏解釋說：

「借款者的一般經濟情況對於本行頗然有直接的利害關係……因此本行要求借款者在接到要求時供給有關經濟和財政重大發展事項的全部情報。這樣就會在銀行與借款者之間建立遠較國際範圍內借方與貸方的一般關係更爲密切和更爲持久的關係。」

「紐約先驅論壇報」（一九五〇年一月三日）敘述該行對借款者的「標準條件」是這樣的：

「（一）借款者須將利用貸款所購之貨物、計劃執行情況、一般活動及財政情



況隨時通知本銀行，並須承認本銀行有權在必要時審查、稽核和抄錄其賬目與記錄。

「(二) 本銀行有權檢查利用貸款所購之貨物並監督貨物按貸款計劃使用之情況。

「(三) 借款者，除某些另有規定的情況以外，同意給予本銀行以和以後任何貸款者有同樣優先權的資產留置權或抵押。這種資產留置權或抵押須和以後任何貸款者獲得的此種權利或抵押成適當比例。

「(四) 本銀行有權出售按貸款協定而獲得的、作為貸款抵押品之債券。」

這裏必須說明：甚至於英國政府也感覺這些「標準條件」是難以接受的。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英國殖民地開發公司解釋說：它正在向國際復興開發銀行收回請求貸款五百萬美元的申請書，因為條件太「苛刻」了。

儘管鐵托一方面在空口叫喊「獨立」，但是另一方面，據他看來，這些「標準條件」倒不算過於「苛刻」。「紐約先驅論壇報」在前面所引的那篇文章裏面解釋說：「標準條件」的前兩條將使該銀行「對借方的活動具有控制權或否決權」。鐵托分子已經使南斯拉夫人民和他們的國家屈從華爾街所操縱的這種控制權或否決權了。

就是這樣，把南斯拉夫拖進西方帝國主義執道去的鐵托已經使南斯拉夫貿易降到它過去的半殖民地地位，使南斯拉夫經濟受到西方大壟斷資本家的任意支配。「紐約時報」

駐羅馬記者評論一九四九年八月在美國「仁慈」的保護下簽訂的意大利—南斯拉夫貿易協定時說：

「這個協定將使意大利的傳統的歐洲市場之一重新爲意大利大開方便之門；使意大利可以出售它的製成品來交換它所需要的原料。」

因此，南斯拉夫還只配做美國的次殖民地，就是對於經濟上已經附屬於美國帝國主義的國家，也只能發生半殖民地式的經濟關係。

這還未完。

我們已經了解鐵托分子的國有化的性質。鐵托分子今天正在利用他們在鐵托分子國家裏面的地位所賦予的權力把所謂「國有化」經濟部門整批出賣給西方帝國主義。他們建立了一種「租讓」制度，使某些重要的經濟部門成爲西方壟斷資本的附屬品。美國壟斷資本家用信貸換得了開發南斯拉夫鐵礦土礦，一部分鋁工業、銅礦和鉬礦的權利。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九日「國際論壇」報寫道：美國伯利恆鋼鐵公司的代表正在南斯拉夫遊歷。據說安納康達銅礦公司已經得到了「租讓」權。一九四九年年底，美國麥肯齊機器公司的代表據說也正在「訪問」南斯拉夫。巴黎「世界報」報道說鐵托政府「完全同意由一個美國特別委員會來控制美國人運到南斯拉夫來的產品的分配」。納粹「旅行家」、「專家」和托羅斯的代表們在三十年代後期所充當的角色已經完全由華爾街的特使們接收過去。

爲了他們被美國帝國主義變成殖民地的「權利」——這就是鐵托所說的「獨立」的眞正定義——南斯拉夫人民不得不付出現金的代價。鐵托已經同意償還南斯拉夫保皇政府向美國借的數約三億八千五百萬美元的一切舊「債」。他保證對「國有化」工業的外國業主進行賠償，其數爲：美國一千七百萬美元，英國一千八百萬美元，法國一百六十萬美元。「觀察家報」駐巴黎記者在評論鐵托承認對從前剝削南斯拉夫的法國人進行賠償這件事時寫道（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五日）：

「南斯拉夫破天荒第一次同意清理這些回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開始的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和奧地利的債務。」

因此，鐵托已經承担起一種任務，來酬報帝國主義甚至在南斯拉夫成爲一個國家以前就已開始的對南斯拉夫人民的剝削。

南斯拉夫人民也不得不因爲自己的被奴役而付代價。這種代價就是：完全放棄計劃經濟，使南斯拉夫的衰弱的經濟受西方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的影響。一切和這相反的聲明都不過是鐵托分子的宣傳。鐵托國民議會主席團副主席莫薩·皮雅傑在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五日倫敦外國報界協會宴會席上大吹大擂地說：

「因爲我們自己控制着南斯拉夫工業裏面的一切重要職位，所以在促進與其他國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著者）的經濟關係時並無任何危險。」

這只是胡說八道！因爲不但今天控制着南斯拉夫的工業的並不是南斯拉夫人民，而

是代表西方帝國主義的鐵托分子那一個階層；而且這個工業以及整個南斯拉夫經濟都已經從屬於帝國主義列強的經濟，特別是美國的經濟。在這種情況下，實行計劃經濟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鐵托分子希望這樣做的話。

而且，千真萬確的事實是：連經過粉飾的南斯拉夫官方數字也暴露出南斯拉夫的計劃工作已經完全垮台，這是鐵托叛變的必然結果。

一九四七年聯合國報告中用南斯拉夫政府的人口概算與南斯拉夫計劃的需要來比較，估計兩種數字相差達三億八千三百萬美元。該報告說：

「南斯拉夫必須得到外來的貸款，否則政府的人口計劃勢必劇烈地被削減……因此，入口計劃的任何劇烈削減預料必將影響五年計劃所訂之目標。」（一九四七年成功湖聯合國出版：「若干國家的經濟發展」）

一九四八年日內瓦公佈的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一九四八年調查報告裏說：南斯拉夫一九四七年的投資計劃只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七，而且各工業部門並無分類詳細數字可查。

一九四九年四月「紐約時報」的塞魯斯·勒·蘇茲貝格寫到南斯拉夫的經濟發展時說：

「這個國家裏的制訂計劃的人不得不預防糧食的匱乏。他們必須適應通貨膨脹和工廠與設備損壞的情形。五年計劃已經修改了……如果不增加新的採礦設備，礦

砂的生產就差不多已經到頂了。爲了適應發現新的可以出口的生產品這種需要，運輸的負擔已經過重，木材貯藏量也日趨涸竭了。」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一向是美國大企業的見解的忠實反映者。它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吹噓說（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南斯拉夫野心勃勃的工業化計劃勢將東諸高閣。可能鐵托在政治或軍事方面也不得不作些讓步。」

「現在，重要的事實是：鐵托必須得到美元，他已經是騎虎難下了。」

鐵托的確在虎背上騎下去了。結果一年以後沃伊沃丁納的鐵托分子人民陣線的機關報「匈牙利評論報」（用匈牙利文出版的南斯拉夫報紙）不得不承認：

「按照計劃，我們應該輸出至蜀黍，以使我們可以購買爲實現五年計劃必不可缺的機器和設備。可是，我們却不得不輸入我們以前從來不向國外購買的貨物來滿足我們最基本的需要和保存我們的牲畜。」

在鐵托分子大吹大擂的宣傳下開始的南斯拉夫五年計劃在一九四八年曾經受到劇烈的削減，一九四九年作了第二次的劇烈削減，一九五〇年年初又決定延長一年。到一九五〇年年底，南斯拉夫報紙幾乎已經絕口不提這個五年計劃了。這個計劃變成了一次可恥的失敗。五年計劃悲慘地失敗了，其他任何長期計劃遠提也不敢再提出來了。在西方帝國主義軌道裏，計劃經濟只是空中樓閣！

一九五一年九月，美、英、法三國政府通報其他十八個「西方」政府，呼籲他們准許南斯拉夫延期償還外債。這些外債估計約達六千萬英鎊（見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泰晤士報」）。鐵托分子領導者關於「計劃」的誇誇其談的消沉和他們對帝國主義負債的增加是成正比例的。

約在同時，南斯拉夫「計劃」委員會的頭子鮑里斯·基德里奇這樣一個人居然也揚言反對製訂計劃，認為製訂計劃是危險的。

「經濟自由主義者將在鮑里斯·基德里奇的一系列描寫南斯拉夫赤黨的新動向的文章中找到安慰。計劃太多是不好的，基德里奇先生說。他是這樣講的：『經濟機構對於供求法則沒有怎樣注意……無論我們怎麼努力想扼殺這些法則，它們總會通過非法投機的出現、貨物的消失和其他經濟紊亂情況向我們進行報復的……』」因此，鐵托政權將允許「這些法則的活動得到某種程度的、甚至於相當大的程度的自由」。」（一九五一年九月四日「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貝爾格萊德通訊。）

計劃壽終正寢，自由市場萬歲！鐵托的「理論家們」已把馬克思主義往後「發展」到最初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去了。

每一次「慷慨的」西方援助都意味着進一步的貧困化，更多的債務。每一項新債務都把鐵托南斯拉夫更牢固地束縛在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上。

把南斯拉夫拖入西方帝國主義軌道的結果就是使這個國家降低到殖民地的地位。沒

有帝國主義操縱的帝國主義「援助」是並不存在的。

鐵托曾經千方百計掩飾他自己所扮演的賣國賊的角色。他企圖取得「馬歇爾地位」而並不正式參加馬歇爾集團。「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早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就作過這樣的說明：

「南斯拉夫參加馬歇爾計劃一事現在尚未予以考慮。因為那樣做會使鐵托元帥在政治上陷於狼狽困窘之境……（着重點是我加的——著者）無論如何，用小額貸款來幫助南斯拉夫，從各方面看都要簡單得多。」

美國政府和美國間諜機構認為鐵托的特殊用處就在於他是進行左派宣傳的幌子，因此至少在一定時期內，心甘情願幫他進行掩飾活動。

「鐵托所亟於避免的——要是他辦得到的話——是去要求必然會引起美國國會辯論的援助，因為這種援助將不可避免地被解釋為「間接的馬歇爾援助」——就是附帶政治條件的援助。不過在貝爾格萊德的美國人中間流行的看法是：可以找到辦法來照顧他，使他不致於這樣不光彩。」（亞歷山大·韋爾思：「鐵托轉向西方」，載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七日「新政治家與民族」雜誌。）

但是，從一開始，這種掩飾的手法就非常明顯，掩不住人的耳目，尤其騙不了帝國主義者自己。接受西方「援助」，不管貼不貼上馬歇爾的商標，總是有政治條件的；要實行對帝國主義投降的外交政策並不必要正式參加大西洋公約。「旁觀者」（一九四九年

十二月三十日）說得十分清楚：

「南斯拉夫發言人硬說星期一與聯合王國簽訂的貿易協定以及賠償協定對南斯拉夫的內政外交政策都沒有任何影響，他們把這一點強調到這種程度，幾乎使他們自己都相信這是真的。但是怎麼可能是真的呢？南斯拉夫國內的經濟措施和這個國家的外交關係跟鐵托元帥和共產黨情報局的爭端以及後來他和西方關係的日益改善是緊緊聯在一起的。在這種情況下，否認這兩方面中間有聯繫是毫無意義的……」（南斯拉夫）在東方和西方之間所處的舉足輕重的地位使它的經濟政策不可能離開大國的均勢而孤立起來。他們裝出一副可以這麼辦的面孔是徒勞無益的。」

美國大企業的肆無忌憚的猴舌照例說得比較直率和露骨。例如，美國「商業週刊」（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二日）曾經這樣說：

「無論是對美國這一個國家或是對整個西方來說，這種對鐵托的鼓勵都證明是現在所能發現的防止俄國共產主義氾濫的最廉價的方式之一。」

「到現在為止，西方給鐵托的援助已達五千一百七十萬美元。但這和美國爲了同一目的而在希臘花掉的約十億美元比起來就微不足道了。……」

「南斯拉夫曾經不得接受以下兩個原則爲基礎的西方貸款政策：

「（一）具有生產能在西方隨時銷售的大量出口物資的最大潛力的工業可以得到優先援助；基本工業的援助要盡可能地減少……剛够應付安全的需要和便利輸出



就行了。

「(二)分期給予信用貸款。這樣就可以激勵南斯拉夫人，使他們在接受外援的計劃方面竭盡所能。他們愈努力，則在以後要求美元時愈有機會得到有利的考慮。」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每一期「援助」都會把操縱南斯拉夫的錢拉得更緊；每一筆小額貸款都意味着更屈辱的投降。這就是說：在所有賣國賊中間，鐵托是以最賤的價格求售的猶大。

這就是說，鐵托、鐵托集團和整個鐵托政權都是美帝國主義的傀儡。鐵托分子已經把國家和人民置於美國大托辣斯的豎琴支配之下。「紐約先驅論壇報」駐貝爾格萊德記者加斯頓·柯布倫茲先生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寫道，「美國國會把鐵托元帥的命運掌握在它的手裏。」

這就是說，自謂為把南斯拉夫從「赤色帝國主義」手裏拯救出來了的鐵托，事實上是斷絕了與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國家的友好互利的關係，而把這個國家五花大綁地送到帝國主義剝削的軌道裏去了。

對於鐵托分子所謂「赤色帝國主義」這種諱謗的答覆的第三部分就是鐵托分子在拒絕蘇聯與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友誼、慷慨援助和貿易時，已經把南斯拉夫變成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南斯拉夫已經被拖回到它在兩次大戰之間所處的殖民地的地位，而現在的

帝國主義主子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為貪婪。

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共產黨情報局決議的話來說：

「……南斯拉夫政府處在完全依賴外國帝國主義者的地位，並變成了後者侵略政策的工具。……鐵托「蘭科維奇集團」為外資滲入南斯拉夫經濟一事大開方便之門，使南斯拉夫經濟落到了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監督之下。」

## 另一條路

但是對於鐵托分子所謂「赤色帝國主義」這種誹謗的答覆還有第四部分。鐵托分子宣稱：「抵抗「赤色帝國主義」的「英勇的小南斯拉夫」因為轉向西方而「維持了她的獨立」。然而事實與數字說的話却與此不同。事實與數字說明：「羣賣國賊已經把他們的國家出賣給西方壟斷資本主義；被鐵托分子拖入西方軌道的南斯拉夫已經回到兩次大戰之間的半殖民地地位，而且遭受着比以往更巨大的剝削。」

鐵托分子宣稱：「共產黨情報局的東歐附庸國家」已經俯首就縛地成為「蘇聯帝國主義的犧牲品」。南斯拉夫，「在鐵托的英勇領導下逃脫了赤色魔網」；而其他東歐國家則「在蘇聯羅網下嚴轉呻吟」。「蘇聯」，鐵托分子說，「企圖阻止南斯拉夫和附庸國家的工業化」。現在讓我們用事實和數字來說明那些仍然對蘇聯以及在它們相互之間保持和平、

友好與密切經濟關係的人民民主國家的情形吧。我們已經知道鐵托分子所說的話。現在讓我們來尋求真理。

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在兩次大戰之間的二十年中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半殖民地。它們的重工業被剝奪了。它們的主要輸出是糧食和工業原料。它們的經濟是不平衡的、片面的，是按照西方資本主義的需要而不是按照它們自己的人民的需要而發展的。它們的經濟受着外國資本的統治。它們的人民羣衆——工人、農民、各種職業的人，從事有益的工作的人——在擁有富饒的潛在財富的國度裏過着最可怕的貧窮生活，它們的資源不是尚未開發就是爲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富翁的利益而發展。他們的命運，在兩次大戰之間那些年代裏，和南斯拉夫人民的命運同樣苦難。

西方資本主義佔有着和控制着這些國家的物質資源。在波蘭，外國資本（主要是英、法、德三國的）在各種不同工業中的投資佔各該工業部門投資總額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八十五。保加利亞在一九四四年解放以前，工業股票的一半以上都在外國資本家手裏。英、法、德、美諸國資本統治着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主要工業。在阿爾巴尼亞，整個財政與信用系統都在意大利、英國和美國的寥寥可數的幾個壟斷組織控制之下。它們每年要從這些國家裏榨取數量龐大的貨物。例如，保加利亞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四四年之間就有一萬億利瓦，等於這個時期內國民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跑到

外國資本家的腰包裏去了。

政治經濟計劃協會的報告「東南歐的經濟發展」描繪出了下面這樣一幅圖畫。外國的貸款都用於：

「累積國外的私人利潤；償付……主要進口貨物；……大部分外國貸款都附帶規定了超額的利息；……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間外債方面的付款佔去……匈牙利（出口額）百分之四十八，南斯拉夫出口百分之二十九（僅指公開的債務方面的付款），羅馬尼亞百分之二十八，波蘭百分之二十四。……應該加以說明的是：這些利息的百分比只說明和出口額的關係，但事實上外債的利息是要用只有少數幾種出口貨才能獲得的『強有力的貨幣』來支付的。因此，決算時所受的實際壓力要比這些百分比所代表的沉重得多。」

這些國家的整個經濟都是西方帝國主義的附屬品。它們過去得到容許而發展的工業主要都是些從事採掘帝國主義者所需要的原料並且是由帝國主義者投資的工業。

保加利亞擁有鐵和有色金屬等重要寶藏，但是過去自己並沒有冶金工業，它的經濟是以植物油出口為中心而發展的片面性的經濟。在羅馬尼亞，受外國控制的石油工業有了高度的發展，但是它沒有機器工業，不能生產農業裝備。匈牙利製造出口的機車和火車車廂，但是不製造工具機。波蘭雖然擁有那麼多煤和金屬資源，却没有適合人民需要的機器工業。捷克斯洛伐克的工業是不平衡的、片面的，專門從事紡織品和陶器及其他

輕工業品的生產，而重工業則異常缺乏。

在兩次大戰之間那個時期，當現在的東歐人民民主國家和南斯拉夫的經濟都還屬於這種半殖民地形態的時候，它們輸出的是糧食、原料和少數輕工業和奢侈工業產品，它們在重工業生產和各種製成品方面大部分都依賴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人民在豐饒的財富中間過着最窮困的生活。

多琳·華林納爾博士在她最近寫的「東歐的革命」（一九五〇年騰斯梯出版社印行）這本書裏面描寫當時東歐的一般情況時這樣說：

「外國資本並未減輕之的程度，因為它僅投資在西方所需要的原料方面，例如羅馬尼亞的石油和南斯拉夫的礦產；它把這些東西的精華，把產品和利潤都從這個國家裏拿走了，而且並不重新投資在長期發展計劃方面……統治階級是一個拒絕改革的、唯利是圖的、癱瘓無力的系統，加上一種君主制度或軍事獨裁制度。」

這一段描寫對於南斯拉夫和現在已經變成人民民主國家的那些國家在兩次大戰之間那個時期所處的地位都很適用。那末現在有什麼不同呢？

這很簡單：南斯拉夫：在人民英勇鬥爭被出賣以後，已經被錢托分子拖回到從前的舊的地位；而與蘇聯和在它們彼此之間保持友好合作的人民民主國家却已經向前邁進了，它們邁進的方式和速度在兩次大戰之間那些苦難的日子已經逐漸從記憶中消失了。

波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受的蹂躪是非常驚人的。但是，新波蘭的工業生產（一

九四六年尚僅及戰前百分之七十七）到一九四九年三年計劃結束時已超過戰前百分之七十五。這主要是蘇聯的援助和對蘇貿易的結果。

匈牙利雖然遭受了戰爭的破壞，它的工業生產在一九四九年年底三年計劃完成時（只用了兩年零五個月的時間）已經超過戰前百分之五十三點四。重工業生產超過戰前百分之七十四。這主要是蘇聯援助和對蘇貿易的結果。

保加利亞工業生產在一九四七年就已經超過戰前水平，到一九四九年年底則超過戰前百分之九十以上了，這主要是蘇聯援助和對蘇貿易的結果。

一九四九年實行的羅馬尼亞第一個計劃——一年計劃——在僅僅一年之內增加生產達百分之四十。捷克斯洛伐克工業生產早在一九四七年年底以前就超過了戰前水平。阿爾巴尼亞兩年計劃的第一年，一九四九年年底，工業生產達到一九三八年水平的百分之四百。

所有這些在工業方面的巨大進步和這種進步的驚人的而且經常是一天比一天快的速度都發生在曾經在戰爭中遭受極端可怕的摧毀的國家，而這些進步主要是蘇聯援助與對蘇貿易的結果。

一九五〇年，這六個東歐人民民主國家工業的發展在蘇聯繼續援助和對蘇貿易、相互貿易增加的情況下前進得更快。波蘭工業產量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三十點八；捷克斯洛伐克工業產量在同一時期內增加了百分之十五點三，匈牙利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

點一，羅馬尼亞增加百分之三十七點三，保加利亞增加百分之二十三點三，阿爾巴尼亞增加百分之三十四。

一九五〇年是南斯拉夫人民經濟上極爲慘澹的一年，也是南斯拉夫計劃被無限期擱置的一年。但是到一九五〇年年底，阿爾巴尼亞的工業產量，由於蘇聯的援助，達到了戰前的四倍以上，保加利亞幾乎增加了兩倍，波蘭增加一倍以上，捷克斯洛伐克每人平均產量將近增加一倍。羅馬尼亞工業產量在一九五〇年一年之間增加的比過去在資本主義統治下二十五年以內增加的還多。匈牙利工業達到將近戰前兩倍的產量，比在資本主義統治下二十年以內的發展還大。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年這個時期，是很清楚地看出鐵托的叛變已使南斯拉夫的計劃完全失敗的時期。但是在各人民民主國家裏，這是從短期計劃變爲長期計劃的勝利時期。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亞都在一九四九年開始了五年計劃。一九五〇年，波蘭開始實行六年計劃，匈牙利開始實行五年計劃。而一九五一年年初，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也都開始了五年計劃的第一年。

當南斯拉夫逐漸淪於殖民統治下的時候，各人民民主國家人民的面前却展開了新的從來沒有想到過的遠景。現在它們可以互相一起來計劃。它們的主要貿易關係（對蘇聯的和它們相互之間的）本身就是受計劃支配的，是一種本質上不同的新穎的關係。它們的經濟關係是以平等爲基礎的；一個國家計劃經濟的力量可以提高和加強另一個國家計

劃經濟的力量。每一個國家可以預期其經濟之日益擴展，不為危機所破壞，互相交換而互為輔助的貨物數量也與日俱增。

波蘭六年計劃（一九五〇——一九五五年）預計至一九五五年年底工業產量將為一九四九年的二點五倍，等於戰前的四倍以上。波蘭的工業將破天荒第一遭製造很多重工業機器——拖拉機、蒸氣透平、高壓坩鍋、複雜的工具機。捷克斯洛伐克五年計劃（一九四九——一九五三年）預計將增加工業生產百分之七十五。隨着採煤、冶金、機械和電力工業的發展，捷克斯洛伐克工業的不平衡性和片面性將告結束。但是，即使這樣大胆的估計都很快就被歷史趕到前面去了。一九五一年二月，這個長期計劃的目標作了很激烈的修正——提高了。捷克斯洛伐克五年計劃前兩年的成功使原計劃可以預期在三年半時間內完成。這就需要提出各方面都大得多的目標來作為一個完整的五年計劃。所以後來決定工業總產量要在計劃實行期中超過一九四八年百分之九十八，而不是原來定的百分之七十五；這就是說，要在五年內增加一倍。重工業產量到一九五三年將達一九四八年的二點三倍。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杜蘭斯基一九五一年二月宣佈：

「我們在三年半時間內就可以完成原來的五年計劃。保證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的是廣大人民羣衆的巨大勞動熱情、社會主義競賽的發展、工業及其他國家經濟部門裏蘇聯先進經驗的應用，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內部為實現這一點的絕大的在機會的存在。幫助我們擴充五年計劃的任務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捷克斯洛伐克與領導和平



與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之間經濟合作的日益加深和擴大，以及捷克斯洛伐克與各人民民主國家之間的合作。」

保加利亞的五年計劃（一九四九——一九五三年）將保證它的工業發展向前邁進一大步。一九五三年工業產量（手工業生產在外）將達戰前四倍左右。羅馬尼亞在五年計劃（一九五一——一九五五年）期間不僅石油要超過戰前最高產量，而且在電力和機器方面也要發展規模宏大的新工業。

匈牙利的五年計劃（一九五〇——一九五四年）打算使工業生產超過一九四九年百分之八十六，同時重工業生產要增加百分之二百零四。五年以內，生產工具的產量按照計劃將增加十七倍。匈牙利的工業，在蘇聯幫助之下，將破天荒第一次生產柴油機、複雜工具和技術上提高的採礦設備。

從來沒有一種反蘇的誹謗比鐵托分子——華爾街的這種叫囂更為虛偽了，鐵托分子——華爾街大肆宣傳說蘇聯企圖阻止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工業化。我們只要研究一下事實就會發現真正的情況剛好與此相反。鐵托分子的戰術和戈培爾的戰術一樣：就是顛倒黑白。

因為，正是有了蘇聯的友好的經濟援助與貿易，才能使和鐵托南斯拉夫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的各人民民主國家在工業方面得到如此勝利的、迅速的發展，儘管它們遭受了戰爭的一切破壞，儘管西方帝國主義用盡了一切的抵制辦法。蘇聯的經濟政策和帝國主

義的經濟政策剛好相反。蘇聯是使各人民民主國家從軸心統治下解放出來的主要因素；蘇聯在戰爭結束以後保護了這些國家使它們不至於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軍事干涉，並且通過自己大公無私的社會主義的援助和貿易，讓這些國家恢復它們飽受摧殘的經濟，並且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上飛躍前進。

這樣一種工業化在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統治下是不可能的。所有曾經老老實實研究過戰後東歐發展的非共產主義的經濟學家都不得不承認：

「東歐首先需要的是工業革命。如果歐洲的均勢並未因為蘇聯的勝利而轉變，這就決不可能發生。西歐如果對東歐還多少有點興趣的話，其興趣就在於使它永遠停留在落後狀態，作為廉價糧食與廉價勞動力的源泉。……假設西方列強有能力影響事物的發展方向（在第一次大戰以後），它們早就會使和從前存在的政府一樣的政府復辟了——那些政府的失敗曾經引起法西斯主義。」（倫敦斯拉夫研究院譯師多琳·華林納爾博士「東歐的革命」：一九五〇年出版。）

但是，只有在南斯拉夫：在鐵托分子叛變的協助下，「西方列強」才有能力影響事物的發展方向」並且使「它永遠停留在落後狀態，作為廉價糧食與廉價勞動力的源泉」。幸虧有了蘇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才未能把它們貪得無厭的手放在那六個人民民主國家的頭上。這些國家有忠誠的共產黨人和善良的愛國者；領導它們政府的是季米特洛夫、科拉羅夫、契爾文科夫、貝魯特、潘治烏——德治、哥特瓦爾德、拉科西、格羅和霍查，

而不是鐵托、卡德爾、蘭科維奇、德吉拉斯和皮雅傑。對於人民民主國家審判和判決這個或那個鐵托分子賣國賊的事拚命抗議的西方帝國主義者，在他們一本正經的正義憤怒的幌子下，實際上是在抗議他們自己的失敗，因為他們未能把這些人民民主國家也降低到和鐵托南斯拉夫同樣的半殖民地地位——也就是這些國家戰前所處的半殖民地地位。

社會主義的援助和貿易並沒有「馬歇爾條件」。它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對方的國家完整與主權的基礎上，在平等和互相加強的基礎上。這在過去是，現在也仍然是蘇聯援助和蘇聯與各人民民主國家的貿易的基礎。給各人民民主國家供應重工業機器、現代裝備和原料，使這些國家如此迅速工業化，使這些國家的人民生活水平飛速提高的就是蘇聯。蘇聯派遣技術人員到各人民民主國家去，不是按照西方的老傳統去偵察它們，不是像納粹和美國的「專家們」那樣去接收它們的經濟，而是去幫助它們用社會主義蘇聯精湛的現代化的技術訓練它們自己的先進技術人員。

使各人民民主國家得以發展它們的勇敢的長期計劃，在它們人民面前展開如此雄偉壯觀的遠景的，就是以社會主義原則為基礎的蘇聯援助和貿易。

各人民民主國家利用蘇聯的長期信用貸款從蘇聯那裏取得了冶金、化學、機器製造方面的原料。蘇聯曾經給它們送來整套的大規模的現代工業設備——工具機工廠、電力廠、水電站。在蘇聯裝備的幫助下，各人民民主國家現在能夠自行生產從前需要進口的重工業產品和複雜工業品，製造很多有史以來從來沒有製造過的機器，包括將為發展社

會主義農業奠定基礎的機器。這些國家不再仰賴帝國主義。它們已經擺脫了，而且是永遠擺脫了半殖民地地位。蘇聯的援助和貿易以及友誼使它們能夠獨立自主地發展，不再依賴西方帝國主義，並且使它們第一次了解到獨立的真正意義——爲了這種獨立，它們的人民曾經進行長期的艱苦戰鬥，英勇犧牲，流了大量的血。

在蘇聯援助和貿易幫助下，波蘭人民現在正在建築哥瓦爾塔鋼鐵廠，這個廠將使波蘭鋼鐵工業產量增加一倍。

「按照預定計劃，（一九五五年波蘭的）工業生產將比一九四九年激增百分之八十五，等於戰前人口每人平均產量的四倍以上。從蘇聯運來的新鼓風爐將使鋼的產量有可能達到戰前兩倍。……」（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紐約先驅論壇報」馬格麗特·希金斯華沙通訊。）

蘇聯已經供給波蘭使波蘭可以建設一個龐大的水泥廠的計劃和物資。這個廠將成爲歐洲規模最大的，最現代化的水泥廠之一。但是這不過是蘇聯運到波蘭去的幾十種這樣的工業設備裏的一種而已。全部機器都已經到達工地，從一九五一年初就開始裝配了。韋茲比加水泥廠和資本主義建築的廠不一樣，它不僅是一個最高度的機械化的工廠，而且僞工人準備了良好的衛生條件。工作將在乾淨空氣裏進行，吸塵器已經毫無必要了。這個廠將在一九五二年開始生產。一排排最現代化的住宅、學校、商店、電影院、診療所和托兒所，文化站，工人俱樂部，游泳池和運動場已在建築中，準備爲職工服務。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波蘭和蘇聯簽訂了長期貿易和信貸協定。從那時起，波蘭和蘇聯的貿易額就與日俱增。如以一九四七年為一百計算，則一九四八年增加到了五三。一九五〇年為二一二，而且還會繼續增加。波蘭已經得到了並且還會繼續得到錳和鎳礦砂、液體燃料、肥料和為波蘭的生產所需要的原料、鋼珠軸承、石棉、拖拉機、農業機器，以及像諾瓦胡塔鋼鐵廠那樣的整套工業設備。蘇聯已經免費地把它的所有權讓給波蘭。蘇聯過去和現在都在幫助波蘭計劃如何把這些龐大的工程建築和裝配起來，而且還培養了許多波蘭工程師和有專門技術的工人。

保加利亞人民在蘇聯的援助和貿易幫助下正在建設保加利亞過去從來夢想不到的各種工業——一座氮肥製造廠、鋼鐵廠、汽車修理廠，甚至於對於這些國家採取敵對態度的西方觀察家也不得不承認：

「除了羅馬尼亞以外，保加利亞所採取的政策和蘇聯政策最接近……（蘇聯對保加利亞的輸出）主要包括使保加利亞工業化並且使它的農業現代化最最重要的原料和物資。」（弗農·巴特勒特：「鐵幕以東」）

保加利亞之所以能夠恢復和擴充它的紡織工業，就是因為從蘇聯運來了棉花。蘇聯供給的金屬、建築器材、機器和裝備使保加利亞的重工業得到了發展。沒有蘇聯的石油和石油產品、車輛、公路和鐵路運輸設備，保加利亞工業的發展就不可能達到這樣空前的速度。沒有蘇聯的拖拉機和其他農業機器、零件、肥料和在保加利亞製造這種設備和

物資的原料，保加利亞在走向社會主義農業的道路上，不會得到這樣勝利的進展。沒有蘇聯專家的幫助，保加利亞就絕不可能爲自己工業化——而不是按照舊的帝國主義方式爲了出口——而開發它的礦產資源。在一九五一年這一年裏面，在蘇聯的幫助下，規模宏大的「斯大林」氮肥製造廠，馬里查三號及「共和國」兩個火力發電站，紺青染料製造廠，兩個大煉鋼爐，尼柯波爾——比倫灌溉計劃，採油廠和其他很多廠都要開工了。

保加利亞部長會議和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一九五一年初頒佈了一道法令，決定要發展多布魯甲地區的農村經濟，裝置自來水設備，並且要使這個地區電氣化。多布魯甲在資本主義時代是農民的貧困的象徵。在過去五、六十年的資本主義統治下，森林地帶縮小了一半，河流都乾得可以看見底了。夏天，熱風在不長樹木的土地上肆虐；冬天，風又吹走了積雪，使泥土受到霜的侵蝕。唯一的水源是屈指可數的幾口井；從二百呎到二百五十呎深，而且連這幾口井也是富農和地主用來漁利的東西。現在，電氣化和灌溉工程都已經在着手進行，到一九五四年，多布魯甲的面貌將爲之一新。到一九五六年，所有的村莊都將有自來水和排水道、電氣、公路和鐵路。利用米丘林的方法，從前的半沙漠地區將開始變爲綠洲。

蘇聯送到羅馬尼亞去的東西有金屬、焦煤、棉花、機器、汽車和先進的農業設備。羅馬尼亞一九五〇年利用蘇聯技術挖出的煤要比一九三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八。在蘇聯的幫助下，天然煤氣管網在四年之內（一九四七——一九五〇年）增加了四倍。通過蘇聯的

援助和貿易，曾經被剝奪了機器工業的羅馬尼亞現在能够生產自己的拖拉機、蒸氣機、打禾機、紡織機器和石油工業設備。羅馬尼亞已經開始製造自己的汽車、機車、貨車、油輪、沿海航行的輪船和駁船。在五年計劃期間，由於蘇聯的援助，羅馬尼亞將在自己的工廠裏生產兩萬一千架拖拉機。

阿爾巴尼亞人民在蘇聯信用貸款、援助和貿易的幫助下，正在改變着他們國家的面貌，使它完全煥然一新。他們從蘇聯那裏得到了建築水電站的機器和高壓電纜；石油工業設備和油管；拖拉機和聯合機；運輸設備；在地拉那建築一個紡織廠的機器，以及建築兩個規模宏大的木工工廠和一個年產量為十五萬噸的煉油廠的機器。新紡織廠的建設已在一九五一年年初大部完成，這些紡織廠每年可以生產兩千萬公尺的棉布。用蘇聯設備建築的西里塔水電站一九五一年年初也已經接近完成。

馬加斯·拉科西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講話時，說明了蘇聯在匈牙利工業化中所起的作用：

「蘇聯幫助我們建立了我們最現代化的工廠，把它最好的機器交給我們，把最新式的生產方法教給我們，並且同樣重要的是將它最優秀的科學家 and 頭等工人供給我們使用。蘇聯最優秀的工程師和技師會由舉世聞名的鑄造專家巴爾金院士率領來我國訪問。這些人的建議和指導對我們的幫助是無可估量的。

「比科夫同志曾經在我們這裏傳授他在高速切削方面的經驗。左拉沃略夫同志

曾經把快速鍛鍊的方法教給了我們的鑄工。斯大林汽車工廠鑄造主任彼特羅夫同志傳授他在鑄造方面的經驗。杜比雅加同志幫助我們在紡織工業裏面實行了一個工人照料很多部機器的制度。安娜涅瓦同志教我們的紡織工人如何在紡織廠裏把白花減少到最低限度。沙沃柳金同志把高速砌磚法教給了我們的瓦工。馬克西孟科、科巴和祖耶夫同志在我們建築工人中間發展了一整組的斯達哈諾夫工作者。帕寧同志教匈牙利火車司機如何增加我們鐵路運輸的平均速度。菲利芒曼諾夫、帕德加諾夫和洛格維連科幫助我們的礦工學會了使用採礦機器的方法，等等。我這裏就不再一一列舉了。

蘇聯工程師和熟練工人的作用和蠟集在南斯拉夫的美國「專家」的作用的區別在於：一是兄弟般的友好的顧問，一是聯邦調查局的密探；一是來幫助的，一是來偵探的；一是幫助發展匈牙利的社會主義，一是加速使南斯拉夫變成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西方帝國主義把鐵托南斯拉夫的原料搜括殆盡，並且在鐵托的默許之下把工業成品（主要是次等貨）傾銷到南斯拉夫來——這是殖民地與殖民國家的傳統經濟關係。這時，蘇聯却以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的貿易關係從各人民民主國家不僅輸入原料，而且一天比一天多地輸入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工廠裏製造出來的工業品，這些工廠往往是用蘇聯的裝備建設起來的，而且用的也是蘇聯原料。

舉例來說，蘇聯從捷克斯洛伐克輸入了百分之七十二的製成品。就是愛挑眼的西方



觀察家也被迫承認這種新的貿易關係。

「現在似乎有必要來拆穿我們的反共宣傳家們所喜愛的另外一個神話——說捷克斯洛伐克現在正在遭受蘇聯的『無情剝削』。事實並不是這樣的。蘇聯政策的目的顯然是要使捷克斯洛伐克在經濟上得到出色的成功……當然，捷克帽子、鞋子和紡織品，也是運到蘇聯去的，和我談過話的捷克人對這件事只有高興的。（『不然我們的輕工業怎麼辦？』）捷克斯洛伐克這方面則不僅從蘇聯那裏得到原料和大批糧食，而且，像一個捷克領袖對我講的那樣，還得到與日俱增的很複雜的重型機器……有一個人們喜滋滋的故事說俄國人只是利用捷克斯洛伐克來『把他們的原料變成鞋子和紡織品』，然後全部送回俄國去。這個故事不過是另一個故意騙人的謊話。」（亞歷山大·韋爾恩，「新政治家與民族」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故意騙人的謊話，一點不錯！但是，這是保守黨人、右翼工黨領袖、華爾街的新聞撰稿人、特別是鐵托分子宣揚出來的惡毒的謊言，其目的是一方面想掩蓋蘇聯的援助和貿易的慷慨和真正的社會主義性質，另一方面想掩飾美國和它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與附庸國家——不僅包括鐵托南斯拉夫，而且也包括英國本身在內——的經濟關係的帝國主義的剝削性質。

社會主義的貿易關係不只存在於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之間。這種關係也是、一九四九年一月成立的經濟互助委員會的基礎。一九五一年年初，這個委員會的會員國有蘇聯、

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這個委員會所進行的工作和馬歇爾集團所進行的工作剛好相反。這個委員會用互助的辦法來加強每一個會員國。專業化的程度不致於使各會員國的經濟逸出常軌。每一個會員國的力量都加強了整體的力量。但是馬歇爾集團！現在非正式地包括鐵托南斯拉夫在內——却使弱小國家更趨衰弱而使比較強大的國家特別是美國可以從中取利。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合作互助意味着參加經濟互助委員會的各國的總和比它們個別加起來的力量要強得多，整體的作用大於各部分作用的總和。但是在馬歇爾集團裏面，美國的生產業越多，各附庸國的生產業就越少；整體的作用小於各部分作用的總和。美國建立一個新拖拉機工廠就等於宣佈一個西方附庸國家的拖拉機工業的死亡，但是如果蘇聯建立了一個新的拖拉機工廠，就等於說所有參加該委員會的會員國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又向前進了一步。這種不同就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在實際工作中所表現出來的簡單然而完全不同的不同。

各人民民主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工業化的驚人速度已經使它們的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相應的提高。最近幾年來，鐵托南斯拉夫的各族人民每年的經驗是：物價漲得更高了，實際工資更減低了，飢荒更嚴重了，生活也更苦了。但是，這個時期各人民民主國家的人民的經驗却是：工資經常在增加，物價不斷在下降，消費量一天比一天增加，社會事業也日益發展。

波蘭的豬肉產量一九五〇年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四，棉織品增加了百分之七，毛織品增加了百分之十三，皮鞋增加了百分之十三。一九五〇年匈牙利的糖產量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棉織品增加了百分之八，鞋襪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同一時期內羅馬尼亞的糖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麵包製品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二。在保加利亞，作爲一九五〇年的標織品的是棉織品的生產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七，毛織品百分之三十七，鞋襪百分之一百二十七點六。一九五〇年上半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棉織品產量增加了百分之十五，牛油百分之十七，合成油脂百分之十二。肉的消費量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油脂消費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

所有這些國家裏的物價都經常在降低，與鐵托南斯拉夫急驟上漲的物價和與日俱增的匱乏適成極端尖銳的對照。捷克斯洛伐克自從成立了特種限價「商店」以後，食品價格降低了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五十，紡織品價格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九到六十一，鞋襪價格降低百分之五十八。羅馬尼亞商店裏的內衣與紡織品價格在一九五〇年這一年裏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一九五〇年年初，阿爾巴尼亞的肉類和牛油的價格減低了百分之五十，糖價減低了百分之二十八。波蘭在一九五〇年年底又一次宣佈了一系列的物價的減低，其中香腸、豬肉、油脂和洗滌用的肥皂價格下降百分之十，鞋襪價格降低百分之五到二十。在所有這些國家裏面，實際工資經常在上升，各種社會事業不斷在發展，在工業方面工作的男女人數也不斷在增加。

## 教 訓

我們需要寫一部篇幅浩瀚的書才能夠說明戰後這幾年裏面各人民民主國家在走向社會主義的迅速的、一天比一天快的進程中所取得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和政治上的巨大的進步。

它們的道路和成就在每一方面和每一個領域內都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鐵托分子獨裁與鐵托分子出賣國家利益的情況下開倒車與受苦受難的情形成一對照。

在人民民主國家這方面是經濟上的迅速發展；在鐵托南斯拉夫那方面却是經濟上遭受奴役和殖民地化。在各人民民主國家是飛躍前進的社會主義農業；在鐵托南斯拉夫是假「集體農莊」幌子下面的富農的統治。在各人民民主國家裏面，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一天比一天多地參加政府每一個部門的工作，從部長一直到最小的村人民委員會；在鐵托南斯拉夫，鐵托集團對人民的壓迫與日俱增。在各人民民主國家是向社會主義突飛猛進；在鐵托南斯拉夫却是以日益露骨的法西斯形式在向資本主義倒退。在各人民民主國家，和平運動得到了巨大的發展，軍事預算減少到了最低的限度，社會事業費的預算却在盡量提高；在鐵托南斯拉夫是戰爭預算的不斷上升和對戰後幾年舉辦的社會事業的打擊。在各人民民主國家是計劃、安全、對未來的信心；在鐵托南斯拉夫是計劃被棄若敝

屍、窮困、飢餓、不安全和陰沉黯澹的前途。在各人民民主國家，民族形式和社會主義內容的文化在大踏步前進，在鐵托南斯拉夫是文化的毀滅和好萊塢的影片。在各人民民主國家是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獨立，在鐵托南斯拉夫是殖民地化，是回到兩次大戰之間的半殖民地地位，而且比從前的地位更低。

這種強烈的對照的關鍵在於，各人民民主國家一直是依靠着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平陣營的領導者蘇聯的援助、貿易和友誼的，而南斯拉夫却被出賣民族解放鬥爭、出賣南斯拉夫人民的犧牲和希望的鐵托分子拖入了英美帝國主義的軌道。

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曾經生動地說明了從這些事實裏面得出來的教訓。他說：  
「與蘇聯的真摯友誼對於保加利亞人民的民族獨立和繁榮就如陽光和空氣對於每一個有生命的東西一樣重要。」

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鐵托分子離開了與蘇聯友好的道路，就把他們的人民引到一條遭受奴役、飢餓和戰爭的痛苦的路上去了。沒有蘇聯友誼這樣的「陽光和空氣」，他們就被帝國主義扼住喉嚨，窒息致死。

我們在這一章裏面詳細討論的只是鐵托誹謗宣傳的一種，然而也是最主要的一種——是鐵托南斯拉夫的戈培爾所製造的「彌天大謊」裏面最大的一種謊話。這種謊話說「蘇聯帝國主義」、「赤色帝國主義」千方百計想阻止它的「東歐附庸國家」的經濟發

展，而「南斯拉夫在鐵托英勇的領導下抵抗了蘇聯帝國主義的威脅，並且採取了依靠西方的慷慨援助的獨立自主的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但是我們所看到的是什麼呢？我們看到的是：鐵托分子這個主要誹謗的每一個字和每一段話不僅徹頭徹尾是捏造的，而且這種誹謗的論據的每一個方面都是和真理恰相反。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不顧自己的重大損失、第一個去援助南斯拉夫的就是蘇聯；為重建南斯拉夫工業而鬥爭的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裏面的蘇聯公民和蘇聯代表；蘇聯的援助和貿易，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援助和貿易，都為南斯拉夫真正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奠定了基礎、帶來了機會。

其次，我們看到的是：鐵托南斯拉夫在共產黨情報局一九四八年決議以前很久就破壞了與忠於自己諾言的各人民民主國家訂立的合同，轉向西方，投入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懷抱。

第三，我們看到的是：鐵托分子把南斯拉夫拖進了西方帝國主義的尤其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軌道，從而拋棄了南斯拉夫的經濟和政治獨立，結束了一切社會主義計劃，使他們的國家變成了美國的半殖民地，使南斯拉夫回到了兩次大戰之間的半殖民地地位，而且比從前的地位更低。因此，這地是財富的南斯拉夫的人民又一次在可怕的貧窮中輾轉呻吟起來。

第四：也是最後，我們看到的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愛國者和季米特洛夫型的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各人民民主國家正在享受蘇聯的友誼，從蘇聯那裏接受真正慷慨的社會主義的援助和貿易。所以它們的經濟得到了發展；它們工業化的速度是空前的，是從前連它們的英勇果敢的人民裏面最大胆的人幾乎都不敢想像的。我們看到：這些人民、這些國家在相互友好合作以及與蘇聯友好合作之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改變自然和人性，並且正在以巨大的速度建設它們的繁榮、文化與和平的前途。

## 第八章 幾點結論

### 爲西方反動派服務的鐵托

鐵托分子宣傳家們另外還有一種最心愛的宣傳路綫。就是說「鐵托是一種新型共產黨人，鐵托主義是一種新型共產主義」。這種宣傳在每一種資本主義報紙上都得到了附和。

對於這種宣傳有一個非常簡單的答案。只要看看今天爲鐵托分子大聲喝采的是些什麼人，什麼黨派，誰的報紙雜誌。

早在一九四九年年底，英國保守黨的領袖們就在對他們的小丑表示敬意。范西塔德爵士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八日說鐵托是「整個共產主義帝國的裂縫」的起源；並且說：

「竭盡一切可能來加寬這一裂縫，應是我們外交上的事。」（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曼徹斯特衛報」。）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邱吉爾先生本人在下院講話時也爲鐵托南斯拉夫（而不是捷克斯洛伐克）（在美國壓力下）被選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一事而眉飛色舞。一九四



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每日電訊報」發表了艾登先生寫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說：

「鐵托的範例和影響可以決定性地改變中歐和東歐事物的發展方向。」

這的確是一種非常「新」的共產主義，所以連邱吉爾、艾登和范西塔德這些先生們也都願意替它撐腰了。

美國方面也反映了同樣的情緒，而且照例更為直率。「紐約先驅論壇報」寫道（一九四九年九月二日）：

「當鐵托元帥對俄國抵抗增加的時候，同時，（美國）商務部的記錄昨天表明過去十個月中批准運往南斯拉夫的貨物也急驟上昇了。」

「華盛頓明星報」則說（一九四九年十月八日）：

「從東方和西方之間的冷戰這方面來看，南斯拉夫今天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之一。」

倫敦「泰晤士報」在說明鐵托爲什麼必須掩飾他投降西方的事實時寫道（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四日）：

「南斯拉夫並不是得到貸款再作讓步，而是預先作讓步的。」

華爾街的附庸國家裏面最露骨的反動派的一切機關報都異口同聲支持這位元帥。斯圖勃特出版的西德商業機關報說（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貝爾格萊德的這位元帥正在逐漸變成進行冷戰的西方國家的寵兒。這些國家

爭先恐後地從政治上和經濟上給他進一步的援助，甚至於還可能準備運軍火去給他。最近在倫敦和巴黎開會的美國外交家們曾經徹底討論了鐵托和莫斯科的對立如何能有助於美國對蘇政策的可能性。」

在意大利，鐵托分子爭取南尼的社會黨人支持的企圖悲慘地失敗了，但是他們却得到「意大利社會運動」(M. S. I. 墨索里尼的擁護者)的新法西斯黨徒的明目張膽的支持。在「意大利社會運動」的新法西斯黨徒的領袖阿弗雷多·庫何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五日所提出的提案裏面說：

「意大利社會運動對於政府目前的外交政策的軟弱，缺乏智力和縮手縮腳表示不滿，因為現在正是我們東方鄰國……迫切需要我們互相了解的時候。」

西方帝國主義在一天比一天更露骨地讚揚鐵托的「新型共產主義」之際，開始一天比一天更爲彰明較著地把他們的真正動機吐露出來。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日「經濟學家」的一篇關於「美國對鐵托的援助」的文章解釋說：

「四年以來，美國政府和美國人在國會裏的代表都在對美國人說，美國是始終不變地反對共產主義和獨裁制度的。可是將近一年以來，美國政府得到了驚人的便利，沒有經過絲毫辯論就一直在給予南斯拉夫的共產主義獨裁制度與日俱增的援助和道義上的支持。現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甚至於還贊成在發生侵略事件時進行軍事援助，而據新任美國大使的喬治·艾倫暗示，所謂「侵略」可能包括由「某個外國」

所扶植的內部叛亂在內。……國務院和整個西方世界的主要問題就是抑制蘇聯。……

「這種政策已經卓著成效。貝爾格萊德與莫斯科之間的鬥爭在保加利亞及其他附庸國家造成了政治上的劇變；俄國人在上次聯合國大會上喪失了威信；在「鐵托主義者」問題上「陣線」組織分裂了，西方共產黨也叛變了；的里雅斯特已經不再是國際議程上的危險地區；希臘內戰結束了，奧地利卡林西亞問題也解決了。這些都是國務院所提倡的政策之報酬。……此外，這個政策所生的子息早已超過所耗的母金。事實上，這是至今一切西方投資裏面最便宜而且收穫最大的一次投資。」（着重點是我加的——著者。）

在這種頗堪玩味的半伊索寓言式的英國外交辭令的字裏行間可以了解到些什麼呢？這等於直率地承認西方反動派眼裏的鐵托主義和鐵托分子是一種反蘇反共的重要武器，是爭取和平的人民陣綫的分裂者。是的里雅斯特和卡林西亞的希臘人民和斯拉夫人民的叛徒；這等於坦白承認：鐵托在所有的賣國賊裏面是最便宜的貨色。

同樣地，美國大企業的報紙也把牌攤到桌上來了：

「必須指出：從鐵托元帥之生存這件事產生的利益包括：使俄國離開亞得里亞海更遠了；削弱了希臘的共產黨流寇——這是使他們瓦解的重要因素；使西方在奧地利的地位在有戰爭發生時得到某種程度的保護。……」（「紐約先驅論壇報」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二日。）

「在鐵托元帥的首都貝爾格萊德，一個新的鐵托上台了。一九四八年以前的舊鐵托似乎已經無影無蹤了。……這個新鐵托說他也許要派兵到亞洲去支援聯合國，說他願意把希臘孩子送還給希臘，把一個天主教的大主教從監獄裏釋放出來，削減共產黨人在南斯拉夫的特權，並且接受美國的貸款和禮物。」（「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請看地岡。南斯拉夫今天作爲一個與蘇聯敵對的國家是美國外交關係上有史以來的最大一筆買賣。」（「展望」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

在西方資本主義報刊上，「鐵托」已經成爲「西方帝國主義的朋友」的同義字，資本家們滿懷希望地在各國逐一尋找鐵托這一流的人——一般都是白費心血。

「如果政治局那羣人和毛澤東之間會發生像南斯拉夫的鐵托那樣的分裂當然是值得高興的。」（倫敦美國新聞處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引自「費城問詢報」。）

「自從中國共產黨人取得政權以來，西方，特別是美國，曾經公開表示希望毛澤東會變成亞洲的鐵托。他們幾乎已經公開進行引誘。假設毛澤東願意做鐵托，西方是不會拒絕進行經濟援助的。」（坎塞姆大廈機關報「今日世界」一九五〇年六月號。）

他們的希望都成了泡影，而且反倒使自己露出了原形。做鐵托的意思就是投降帝國主義，成爲蘇聯、共產黨人、社會黨人、工人階級以及所有擁護進步與和平的人們的敵人。

我們這裏所引用的話——還有成千上萬的類似的話我們並沒有引用——使某些資本主義和右翼工黨的宣傳家所說的「新型共產主義」的真正性質昭然若揭。帝國主義需要鐵托扮成一個共產黨人：

「鐵托主義不失爲一種力量，然只在鐵托元帥能够自稱爲共產黨人時才是這樣。」（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三日「泰晤士報」。）

但是帝國主義公開承認他們有一個隱藏在共產黨招牌下面的俯首帖耳的廉價工具，隨時準備執行他們反對蘇聯、反對各人民民主國家和一切國家的勞動人民的戰爭政策。他們說：「共產主義有兩種」。但深得資本家歡心，爲邱吉爾大聲喝采；受到杜魯門支持，爲右翼工黨領袖所景慕，爲迫害赤色人士者認爲朋友，爲希臘保皇黨人、意大利法西斯黨徒和德國壟斷資本家引爲盟友的却只有一種「共產主義」，這豈不是有點奇怪嗎？

不！並沒有什麼奇怪。因爲共產主義是只有一種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只有一種，真正的社會主義也只有一種；因爲鐵托的「共產主義」與真正共產主義就如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與真正社會主義觀點一樣毫無共同之處。

## 鐵托與右翼王黨領袖

說鐵托的「共產主義」是共產主義，就等於說希特勒的「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但是鐵托分子對帝國主義的特殊價值，就和他們以前的以及與他們在一起的托洛茨基分子一樣，在於：他們的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觀點和行動是隱藏在超級革命的假馬克思主義詞句這樣一層薄薄的外衣下面的。這就是他們的效用，也就是英國帝國主義曾經加以利用的一點。

戰爭結束後，南斯拉夫駐英大使館曾經千方百計引誘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特別是青年，到鐵托南斯拉夫去。很多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爲鐵托分子宣傳所欺騙，接受了邀請。當一九四八年六月公佈的共產黨情報局決議揭穿了鐵托分子政策的反社會主義的性質時，鐵托分子就通過南斯拉夫大使館，用他們從現在已不難猜測到的來源得到的充裕的金錢對英國共產黨作了一次孤注一擲的進攻，以各種各樣的宣傳、邀宴、免費休假期和數不盡的大吃大喝使英國共產黨的黨員應接不暇。他們的目的是表示得很明白，就是要分裂共產黨。

他們在英國是一敗塗地了。就全國範圍來說，他們最多只是使十一、二個動搖分子離開了黨。失去這樣一些人無疑地使共產黨更加堅強了。在遭受這種慘敗以後，英國的

鐵托分子就注意力轉到工黨，工會與合作社運動方面去，和一小撮（一度自封爲「革命共產黨人」的）托洛茨基分子騰起手來。這些托洛茨基分子在一九四八年這一年裏面大部分都參加了工黨。

在資本主義報刊的全力支持之下，他們在這次「戰役」裏力圖以一種新的「左派」社會主義者的姿態出現。他們在這方面使用的策略很清楚。在廣大的英國勞工運動裏面，右翼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仍然擁有很大的勢力，而且在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這個時期中還能夠阻止大部分英國工人去和共產黨人以及戰鬥性的工黨工作者團結起來對資本主義進行鬥爭。右翼社會民主黨人的理論還能够在政治上解除很多勞動人民的武裝。但是他們在節節敗退着。對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的進攻，對民主的進攻越來越頻繁。艾德禮和貝文這一流人的戰爭宣傳一天比一天緊張，他們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投降也一天比一天明顯。日益增多的工會工作者、合作社運動者、工黨黨員都在逐漸擺脫供深蒂固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參加爭取增加工資、爭取民主、獨立與和平的鬥爭，開始和共產黨人以及戰鬥性的工人採取一致行動。這就使得帝國主義——也使得右翼工黨領袖——有必要尋找一種工具，來分散和擾亂日漸增強的戰鬥性和日益緊密的團結。這便是交給鐵托分子的任務。

在一九四九年這個時期，英國鐵托分子首先把注意力放在青年和學生方面。道理不難明白。因爲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在青年和學生中間的勢力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都是最

薄弱的。青年是天生的戰士，對迫害和惡劣條件反抗很快；他們熱烈希望和平。他們不斷發現自己在鬥爭中不僅受到保守黨人的反對，而且還受到右翼工黨領袖的反對。工黨領導機構屢次插足進來解散勞工青年同盟，或者用「紀律」來約束他們，制止他們和其他青年（包括他們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同志在內）進行團結一致的鬥爭。至於學生方面，沒有任何人能夠說運輸大廈對他們有什麼高度的心理上的吸引力；也沒有任何人能夠說青年學生會在艾德禮或莫里遜身上發現什麼希望。因此在青年和大學這方面，帝國主義首先而且最迫切地感覺到需要鐵托分子。

當勞工青年同盟的年青盟員對抗議工黨拋棄社會主義時，就有人把他們的視線轉移到鐵托問題上來。這些人對他們說，「你們要求社會主義，那末到南斯拉夫去吧，在那裏你們會發現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當勞工青年同盟的青年們因為在和平問題或工資問題上和共產主義青年團採取了一致行動而受到紀律處分時，當運輸大廈的報刊在痛罵共產主義的罪惡時，這些青年却受到一切鼓勵，希望他們去訪問和接觸這種鐵托牌的「新型共產主義」。在大學裏面，這些人把老牌派兵工廠出產的反蘇謠言加上馬克思主義的包裝，大量搬出來迷惑逐漸左傾的學生。青年和學生都被南斯拉夫大使館免費贈送的不邀自來的宣傳品弄得應接不暇。經過仔細安排的去鐵托南斯拉夫的旅行組織起來了。在



精選出來的翻譯的幫助之下，青年們像羊羣一樣從一個準備得很好的展覽品趕到另一個去。很多富有經驗、長於轉移目標的辭令和技巧的托洛茨基分子被徵調到勞工青年同盟裏面去了。

鐵托分子在英國的活動同時也特別集中於住在英國的殖民地人民中間，特別是在殖民地學生組織中間——在非洲、西印度、印度、錫蘭等地的學生組織中間。在殖民地，由於不言而喻的理由，同樣沒有使社會民主主義可以產生很大影響的經濟基礎。殖民地人民和殖民地青年不管在什麼地方都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我們在前面有一章裏已經看到：帝國主義認為鐵托主義是可以迷惑、破壞和偵察殖民地人民的一種非常重要的武器；英國主義認為鐵托分子可以在殖民地學生組織裏面做一種（按照軍事情報局第五處的意思來說是）「有用的」工作，可以利用這些學生組織作為橋樑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本土發生一種影響。鐵托分子的宣傳在這方面使用着特別富有煽動力的話。他們力圖利用殖民地青年的革命情緒，利用他們的民族革命願望來反對蘇聯，混亂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引導他們忽略革命鬥爭的階段，並且把鐵托南斯拉夫提出來作為一種「典範」。

到一九五〇年為止，這些活動所得到的成就仍然是非常微不足道。在進步青年和學生認識到有必要揭露鐵托主義的真面目的時候，在每一個月的歷史都使鐵托分子領導南斯拉夫人民走的災難、飢饉、和俯首聽命於帝國主義的道路暴露得更清楚的時候，這

些活動在起初所獲得的些許成功也很快被一筆勾銷了。但是在 一九五〇年這一年中，不僅在青年和學生裏面，就是在廣大的成年人的勞工運動——工會、合作社和工黨支部——裏面對社會民主主義的幻想也開始了加速度的破滅。

因此在 一九五〇年這個時期——一九五一年更是有加無已——右翼工黨領袖開始親自和鐵托分子直接聯系，把支持鐵托的運動從冒牌「左派」手中接收到他們自己手裏去。鐵托分子和運輸大廈之間這種直接勾結日益公開地建立起來。「每日先驅報」和工黨的一切官方宣傳都開始日益露骨地大捧鐵托。

工黨的部長們和工黨領袖們曾經訪問南斯拉夫，並且公開對鐵托主義表示敬意。諾爾·貝克、摩根·菲利浦斯、杜爾漢的右翼礦工領袖賽姆·華生和外交部駐議會的大長歐內斯特·戴維斯先生都首途到貝爾格萊德去了。勞工運動裏一切最露骨地、最頑固地反對共產主義的人都開始把鐵托的「新型共產主義」捧上天去。鐵托分子也開始在自己的官方報刊上禮尚往來地讚揚起工黨領袖和他們的右翼政策來。當然，他們更進了一步——他們開始和保守黨領袖也公開聯系起來，並且開始說他們的好話了。

貝爾格萊德的「國際問題評論」（這個雜誌有英文版，辦這個雜誌的目的是想使它成爲一個國際鐵托——托洛茨基分子的「思想」中心）曾經替賈茲克爾的預算大聲喝采說：

「工黨部長賈茲克爾先生提出了有決定性意義的然而深得人心的（原文如此——著者）辦法，因此使新的預算得到了平衡，這些辦法使保守黨反對派無法公開採取

反對整個預算的立場。……工黨追隨者都很高興（原文如此——著者），因為富有者的稅已經增加了。……」（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五日貝爾格萊德「國際問題評論」。）

鐵托的不管部部长德吉拉斯曾經在一九五一年二月間偷偷摸摸地去訪問英國，和工黨的部長們開會，進行了好幾次秘密談話，並且對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召集的反動派中堅分子作了一次如何歪曲馬克思主義的演講。不用說，德吉拉斯牌的「馬克思主義」受到了英國最反動的報紙的熱烈歡迎。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戰鬥報」刊載了路透社記者的一篇鐵托元帥訪問記。這位元帥已經皈依社會民主主義了。他說：

「我認為英國工黨……（是）一個工人政黨。這個政黨在實踐上是受社會主義的科學原理引導的，特別是在解決它本國的經濟問題的時候。」

一九五一年三月中旬，鐵托分子「理論家」莫薩·皮雅傑率領一個鐵托分子的代表團到了英國，並且在英國報界協會組織的正式宴會（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五日）上發表了下列談話：

「……昨天我們和議會兩院代表的會晤剛巧碰上政府和反對黨之間的一場激烈的（原文如此——著者）舌戰。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單就對南斯拉夫的友好情緒來說，這兩個互相對抗的黨之間並無任何差異。」

當然，保守黨和右翼工黨的領袖們都是非常「激烈地」爭着去準備帝國主義戰爭和

保衛英國資本主義的。他們對爲他們共同所有的、千依百順的奴才怎麼可能有不同的態度呢？保守黨人對鐵托和運輸大廈的公開勾搭是頗爲高興的。早在一九五〇年九月，「經濟學家」在評論右翼工黨代表團訪問鐵托分子一事時讚揚地說：「這個代表團可以在南斯拉夫發現：

「一、例已經和蘇聯破釜沉舟地斷絕了關係的共產黨」，這個「共產黨」能够克服這些不願遭受共產黨情報局罵罵的西方民主人士代表所可能碰到的任何障礙。……」（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六日「經濟學家」。）

「泰晤士報」在敘述皮拉傑、行人等的訪問時對鐵托分子的新「自由主義」曾經表示鼓掌歡迎（見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七日該報）。「彭敦尼斯」在「星期日觀察家週報」的「桌旁閒話」裏面談到「南斯拉夫（如何）繼續不斷地、悄悄地靠攏西方制度」（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當然，歷史已經使鐵托分子不得不日益顯露原形。他們甚至開始承認自己已經皈依資本主義了。鐵托分子的黨的政治局委員鮑里斯·基德里奇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中旬經濟學會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勉勵南斯拉夫經濟學家要加倍努力研究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他認爲說美國有失業的理論「都是非常可笑的」。他說，「經濟學會應該大力注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曼徹斯特衛報」外交記者在報道他訪問南斯拉夫的情形（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四日「南斯拉夫在轉變中——西方與將來」）時說到鐵托分子官員是怎樣對他說，他們「承

「認資本主義制度有很多優點」。

這樣，歷史本身，就如慣常那樣，已經說明托洛茨基——鐵托分子用革命詞句的外衣掩蓋起來的理論和右翼社會民主黨人的理論實際上並無不同之處，兩種理論都是保衛垂死資本主義的工具。儘管話說得多麼動聽，鐵托分子、保守黨人和右翼工黨領袖都是為同一目的而服務的。

這並不是說，鐵托主義在英國工人和進步運動裏的一切部門裏都已經被揭露出來了。這並不是說，現在已經沒有更多迫說明鐵托分子真面目的迫切需要了。因為，在爭取和平、民主、獨立和生活水平的羣衆運動開始行動起來的時候，在反對資本主義的勞工和進步運動的團結在鬥爭中日益緊密的時候，在馬克思主義對人民的與日俱增的貧困和戰爭威脅的原因的說明，馬克思主義關於免除危機和英國人民走向獨立、和平與社會主義的道路的指示一天比一天容易發生效果的時候，帝國主義就會尋找各種武器來轉移這個運動的視線，分裂它和迷惑它。在人民羣衆一天比一天多地掉頭不願右翼社會民主黨人的時候，反動派就要轉而以鐵托主義和各種各樣的冒牌左派宣傳作為他們進行破壞的主要武器了。

此外，在英國和在其他國家一樣，鐵托分子已經成為幫助間諜、挑撥者、形形色色走狗暗中滲入工人階級運動去的調配中心。當鬥爭發展時，的確需要日益提高警惕，並且對鐵托分子充當反動派工具的真相作更清楚的揭露。

一九五一年六月、七月間另外兩個鐵托分子領袖之造訪英國只是更證明了這一點。六月，鐵托分子鎮壓部隊的頭子蘭科維奇繼德吉拉斯和皮雅傑之後親自來到英國。英國和南斯拉夫的官員對於他這次訪問的使命同樣諱莫如深。七月間，剛到過華盛頓的參謀長波維維奇將軍也來了。這位將軍在華盛頓「據說已造成良好印象」。(紐約先驅論壇報)一九五一年七月九日。

### 幾點經驗教訓

向人民羣衆說明鐵托分子所扮演的叛徒角色並不是專家們的任務。因為，在英國和在所有其他國家一樣，爲爭取和平與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人將發現他們所必須面對的不僅是公開的保守黨人和反動派，不僅是努力掩飾階級鬥爭、覓取階級合作、提出在資本主義體系內部不需要鬥爭就可以獲得社會主義這樣的遠景的右翼工黨領袖。同時，他們將發現自己不可避免也要面對用左的辭令隱藏右翼政策的左派煽動家（在我們英國，這種人是很多的），和企圖滲入戰鬥性的勞工運動內部來進行削弱、破壞和間諜活動的資本主義的特務。

從我們對鐵托分子扮演的角色的研究裏面可以得出一些什麼教訓呢？

## 社會主義理論

第一點教訓是：社會主義理論對於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建立社會主義英國的鬥爭的重要性。鐵托分子之所以能夠出賣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解放鬥爭並且把政權篡奪到自己這個集團的手裏來的背景是：社會主義理論和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的水平不高。

凡是鐵托分子能夠通過自己的秘密工作而在這個或那個國家的工人階級運動裏面取得了領導地位的地方，他們使用的辦法都是利用政治理論水平不夠的弱點——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抽象的教條主義的態度、缺乏政治教育和討論。

在英國，右翼工黨領袖稱工人階級並不需要自己的理論，自己的哲學；艾德禮和莫里遜一流的人則在勞工運動中到處供應資產階級的理論。在這樣的國家裏面，鐵托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的危險性是特別大的，除非共產黨和工黨工作者裏面具有戰鬥性的那些人始終不懈地為爭取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基礎的政治理論水平而鬥爭。

單靠行動是不會帶來社會主義的。不知有多少工黨工作者曾經不辭勞苦、犧牲生命來組織勞工運動，結果却發現他們最後終於被右翼工黨領袖出賣了！只有在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知道他們在往哪裏走，在他們前面有一條明確的道路，有一個能給他們指引方向的羅盤的時候，行動和鬥爭才能導向社會主義。這個羅盤只可能是具體運用於他們自

己的國家，適合於他們自己的歷史條件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否則，無論勞動人民怎樣樣努力和犧牲，他們都會一次又一次地被騙誤入歧途，被出賣，並且看到他們經過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運動遭受破壞。

右翼工黨領袖們的一切理論都企圖用這種或那種形式說明階級合作的必要，說明工人階級和他們本國以及其他國家的資產階級合作的必要。他們對大家說，國家是一種中立的機構，是超階級的；不管那個政黨被選舉上台，這個國家機構都會忠實地爲它服務。但是整個歷史一再地，突出地提供這樣的教訓：階級合作會導致災難；比方說，和美國資本家友好的結果就是使自已被美國帝國主義變成殖民地；只有在始終不懈的，反對國內和國際資產階級的鬥爭中才有可能轉變到社會主義。

### 對蘇聯的友誼

保守黨人、右翼工黨領袖和鐵托分子的矛頭都指向同一個方向；他們的怨氣和憎恨，他們的謊話和誹謗，最主要的，都是指向蘇聯的；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

這是因爲蘇聯給全世界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作了一個榜樣。蘇聯的範例告訴大家：勞動人民能够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取得政權；沒有資本家，人民就可以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因爲蘇聯的存在和它在生活的一切領域中的巨大成就鼓舞着一切資本主義和殖民地國



家的勞動人民，使他們想學習蘇聯人民的榜樣，結束資本家和地主的統治，在一個屬於他們的國家裏建設他們自己的新的自由而繁榮的生活。

這是因為蘇聯領導着世界爭取和平的鬥爭，這個鬥爭今天已經變成了顛斷資本家最大的恐懼。帝國主義者認為戰爭是解決他們的問題的唯一的「辦法」，他們最憎恨的是那些最強烈地、最堅持不渝地爲和平而戰鬥的人。

帝國主義者憎恨蘇聯共產黨及其領袖斯大林，因為這是全世界經驗最豐富、眼光最敏銳的一個工人階級政黨，是垂死資本主義的最大敵人。

當鐵托分子的詭計和權術正在欺騙全世界各國工人階級時，當他們把自己的真正目的和意圖掩飾得很成功時，首先對鐵托及其黨羽叛變這件事提出警告，首先揭穿他們違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事實，首先暴露鐵托分子的陰謀的就是具有偉大經驗的聯共（布）。

我們中間那些早期曾經爲鐵托分子的裝模作樣所欺騙的人，和我一樣，很能夠了解我們——當然也有世界各國人民——對於蘇聯共產黨提出這種警告的智慧應如何感謝。的確，我們只要想一想如果共產黨情報局沒有在蘇聯共產黨提議下警告和揭露鐵托匪幫的陰謀就會發生什麼事情，就不難理解所有進步人民應該如何感謝蘇聯共產黨人了。

因此，在研究鐵托主義扮演的角色以後，我們的第二種任務就是要重視這一點：必須在工人和進步運動裏始終不懈地爲使人民知道和了解蘇聯在世界爭取和平與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所起的先鋒隊的作用而奮鬥，必須始終不懈地爲爭取與蘇聯人民友好和貿易而

奮鬥。

## 團 結

與社會民主主義和鐵托、托洛茨基主義作殊死鬥爭不單純是一個解釋與教育的問題。解釋與教育是必要的。但是同時，人民要在鬥爭過程中才能學得最快，解釋和教育要在反對資本主義、爭取和平、獨立、生活水平、民主——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過程中才能真正扎根、開花和結果。在鬥爭很薄弱的時候，在政治脫離行動的時候，鐵托分子就可以滋長蔓延。

因此，我們在對於鐵托分子扮演的角色的研究中懂得了需要團結，需要勞動人民與工人階級一天比一天團結得更緊。這種團結會幫助人民在鬥爭過程中把他們運動中間的叛徒驅逐出去，分清煽動家和真心誠意準備鬥爭的人，加強最富有戰鬥性的、階級覺悟最高的和眼光最遠大的工人和勞動人民羣衆之間的聯繫。

## 警 惕 性

英國資產階級是全世界最老練的資產階級。任何國家都沒有比英國資產階級更懂得

如何使殘酷無情的鎮壓和詭譎的賄賂收買相結合的資本家。沒有一個統治階級在裝模作樣、以退爲進、掩飾真正目的方面曾經學到英國資產階級這樣的本領。

長期以來，英國帝國主義曾經利用它從殖民地人民那裏搜括來的超額利潤的一小部分去勾引工人階級中間的一部分人（常常在他們不知不覺之間）來搞階級合作。現在英國帝國主義已經陷入深重的危機，它已經不能像從前那樣進行賄賂和讓步了。但是仍然有一羣右翼工黨領袖在幫助和教唆它，千方百計想隱蔽壟斷資本家在工黨政府執政下通過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進行剝削的事實和實行獨裁的真相。

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宣揚說國家是中立的，超階級的，說那些在保守黨政府當權時爲資本家服務的將軍、警察頭目、殖民官員、大使、間諜、軍事情報局第五處的特務和外交部的首腦們會在工黨政府統治下爲勞工運動的利益服務。他們不惜一切手段企圖解除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武裝，鬆懈他們的警惕性。

但是英國統治階級及其國家機器對實行階級統治的一切形式都很有經驗。我們已經看到：除開他們公開的、露骨的階級統治工具——政黨、軍隊、警察、法庭——以外，首先建立警察密探和挑撥者的網，在工人階級運動內部進行偵察和破壞活動的就是英國資本家。英國資本家在帝國內部每一個殖民地國家的工人和民族解放運動中都已建立了他們的警察特務和挑撥者的網。首先大規模發展以反對蘇聯爲目的的間諜機構的也是英國。英國資產階級一直保持它在勞工運動內部進行秘密偵察和破壞活動的機構，雖然

它總想努力把這件事偽裝和掩蓋起來。

他們有一整套規模龐大的機構來偷聽進步人士的電話，拆開和記錄這些人的私人信件，密報工會和政治集會的情況。他們有一套機構經常設法使各種各樣的特務滲入工人和進步運動的組織，尤其是共產黨，去進行內部偵察與破壞活動。

因此，被社會民主主義解除了武裝的英國工人很久以來過於忽視的警惕性問題是對整個勞工運動都具有非常迫切的重要性的問題。這並不是說，每一個爲鐵托分子宣傳所愚弄因而迷失了方向的工人或青年或學生都是警察密探。絕沒有這種意思。然而這的確意味着：工人和他們的人民必須隨時留神，防止警察或間諜機關派來的人，其中特別是托洛茨基分子和鐵托分子，設法鑽到勞動人民的組織裏面來，奪取領導地位。

### 和南斯拉夫人民團結一致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從有史以來就曾經以無法形容的英雄氣概對外國統治不斷進行鬥爭。他們在反對軸心的遊擊戰爭中的鬥爭和犧牲竟會以這樣陰險的叛賣爲結束，這的確是個悲劇。

但是南斯拉夫人民也曾經遭受過其他的失敗，他們中間也不是第一次出現叛徒。藍科維奇的一切鎮壓和殘暴並不會使他們俯首帖耳。當他們一步一步地認識到叛變的性質

時，他們的抵抗就會加強，他們就會組織得更好，一直到鐵托集團的統治被粉碎，南斯拉夫人民可以回到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道路為止。

但是我們不能消極地對他們的艱苦鬥爭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使英國人民認識鐵托分子的實際作用與鐵托主義的真正性質的每一步驟都會幫助南斯拉夫人民結束鐵托分子及其帝國主義主子對他們的統治。

爲了勞動人民國際大團結的利益，爲了和平與社會主義的利益——與帝國主義統治的工具、鐵托主義作殊死鬥爭，是一種迫切而光榮的任務。